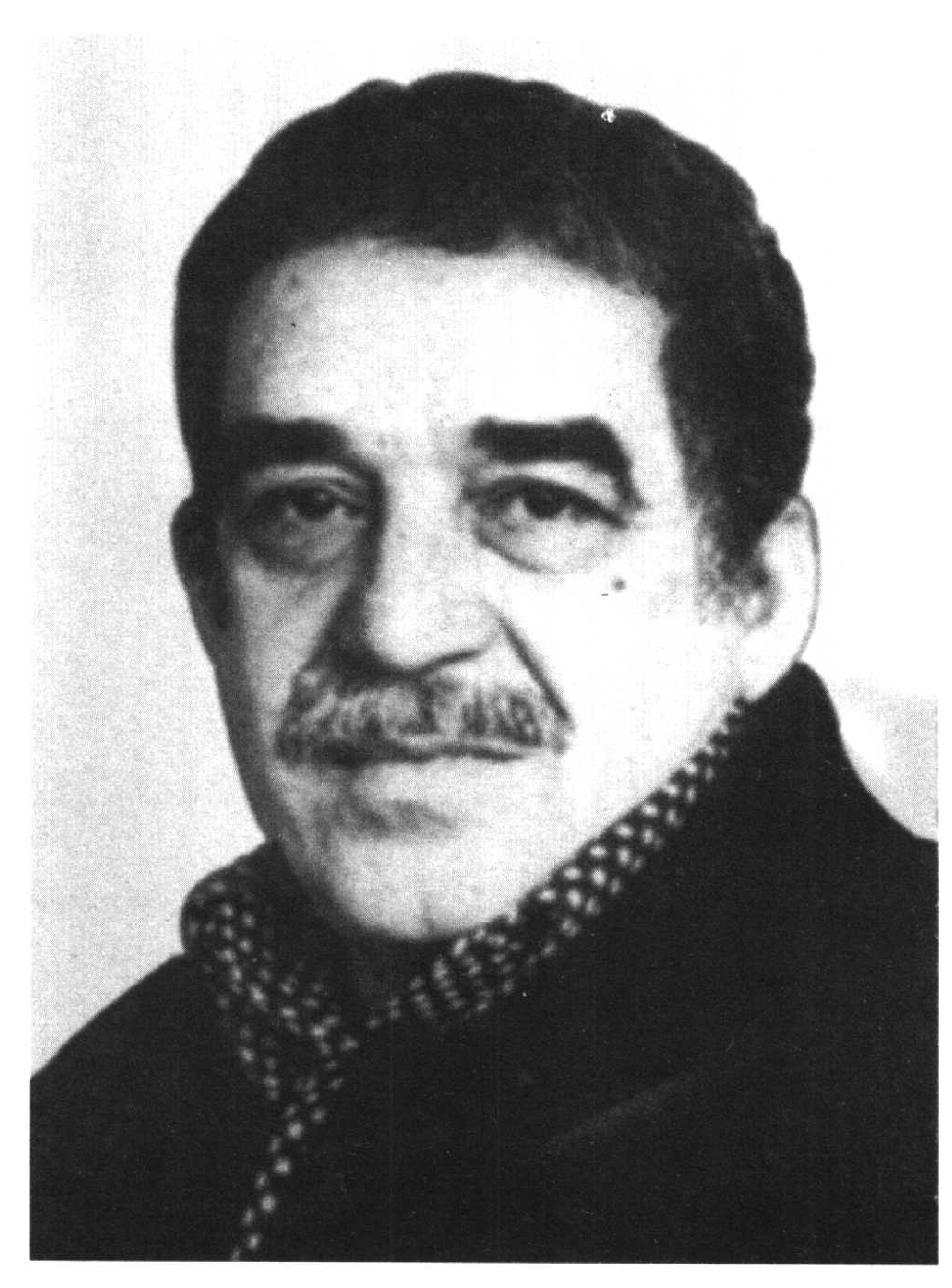


〔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8- ）

前　言

朱景冬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cl Garcia Marquez，1928—　），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随笔作家、新闻与电影工作者。生于马格达莱纳省加勒比海边阿拉卡塔卡镇，八岁前寄居在外祖父家，后去外地上小学、中学和大学。五十年代任《观察家报》记者，曾赴欧采访，并访问东欧和前苏联。多年侨居巴塞罗那和墨西哥。

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年酷爱文学和写作。读过大量世界文学名著，汲取丰富的文学营养。上大学时读卡夫卡的《变形记》生发灵感，写了第一篇小说《第三次忍耐》，受到名家赞赏。五十年代跻身文坛，六十年代名满天下。迄今已出版《枯枝败叶》(1955)、《恶时辰》(1962)、《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2)、《百年孤独》(1967)、《家长的没落》(1975)、《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中的将军》(1989)、《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爱情与其他邪

魔》（1994）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蓝宝石的眼睛》(1955)、《12篇异国旅行的故事》(1992)，报告文学《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55）、《铁幕内的九十天》(1959)、《米格尔·利丁历险记》(1986)，文艺评论集《海边文集》等。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获得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已遐迩闻名。但是作为散文家的马尔克斯，却鲜为人知。其实，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写过大量随笔、小品、杂文、评论和新闻报道等。他担任《观察家报》的记者和编辑时，分管的工作是写电影评论和去各地采访。他在报上开辟了《一周波哥大电影》专栏，每日点评四五部本国和外国的影片，文章短小精悍，文字通俗易懂，受到影迷和电影人的欢迎。他采访的对象有文艺界的名人（电影导演、画家、雕塑家……），也有平民百姓(邮递员、斗牛士、士兵……)。然后写成人物纪实,或报告文学,既有生动的故事,也有风趣的议论,深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他在担任《宇宙报》编辑时，负责写社论、短评、按语和新闻报道，并主持题为“句号，换行”的专栏，头一年就发表专栏文章38篇。

后来他进《先驱报》社工作，又开辟了一个名叫“长颈鹿”的专栏，每天写一篇关于当地新闻或人物的随感。这类文章用文学技巧写成，语言生动活泼，叙述引人入胜，完全可以当短篇小说来读。

1953年他去罗马学习电影时，发生了年轻姑娘蒙特丝

惨遭杀害的事件，此事轰动意大利全国。据此，他写了总题为《本世纪的丑闻》的系列报道，包括十四篇文章，陆续在《观察家》报上刊出。报道采用侦探小说手法，写得有声有色，似章回小说，讲到紧要处便戛然而止，留下一个悬念，以吸引读者。

1957年，他有幸随哥伦比亚民间艺术团访问东欧和前苏联，在三个月中，他访问了前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先后在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莫斯科等城市逗留，耳闻目睹，社会主义国家方方面面的生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根据这些见闻写了十一篇散记，发表在哥伦比亚《万花筒》杂志上，文章详尽而贴切地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如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使美洲读者感到耳目一新。

此外，他还写了《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米格尔·利丁历险记》等长篇纪实文章。

加西亚·马尔克斯毕竟是一个文人、一位作家，他最关心的还是文化、文学、各艺术门类、作家和艺术家。他利用各种媒体，热心谈小说和诗歌，谈语言和人物，谈技巧和风格，谈电影和音乐，谈不同地域的文化，谈自己写作的甘苦，谈别人创作的特色，谈个人的坎坷经历，谈同作家和艺术家朋友交往和相处的美好时刻。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散文触及面异常广泛，可以看到他对人生经验的深刻感悟，对人文精神的独特见地，对爱情、亲情以及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思考，对生活和事业的

永不改变的热爱，对社会问题和重要事件的关注……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加西尔·马尔克斯的散文创作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真正体现了散文的随意性特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长可以短，可抒情可议论，可叙事可状物……散文本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文体，应该根据表现的内容量体裁衣，灵活运用，不必限于既定的模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笔自由洒脱，不追求词藻的华丽和风格的夸饰，而只注重形式、内容和语言的朴实无华，采用多种多样的散文体表达感受，描述见闻，赞扬所爱，鞭挞所憎，使读者感到其作品具有时代气息，表现了他的真情实感，特别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让人觉得亲切，产生共鸣和同感。无疑，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深厚的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和时代、和现实、和人民的脉搏一同跳动。

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散文不计其数，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如《海边文集》(1981)、《纪事与报道》(1976)、《在朋友们中间》(1982)、《报刊文集》(1982)、《卡查科文集》(1982)、《作家有何用?》等。

本书所收的作品译自作者的多部散文集和报刊上散载的文章。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散文创作的范围和特色。在欣赏过他的小说之后，再看他的散文，读者也许会感到别有天地，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位文学大师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读这些散文的过程中还能得到美的怡悦和写作上的裨益，译者的付出也算得到满意的回报了。

目　　录

前言 ……………………………… 朱景冬（1）

人间百态

何塞利约的斗牛生涯 ………………………（3）
小侯爵夫人的传说 ………………………（11）
快活的死者 ………………………………（17）
马尔维纳斯，一年后 ……………………（24）
六点钟自杀的幸福妻子们 ………………（28）
波哥大的自行车热 ………………………（33）
九年不算什么 ……………………………（39）
格雷戈里奥神父的小天地 ………………（43）
遭冷遇的乔科省 …………………………（46）
哥伦比亚不承认的乔科 …………………（51）
小贝伦，一个飞速前进的城市 …………（60）
丰蒂蓬与波哥大 …………………………（67）

人生轶事

重返阿拉卡塔卡 …………………………（75）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漫长幸福生活…………（100）
马格达莱纳河 …………………………………（117）
自巴黎，怀着爱 ……………………………（122）
回忆胡安·鲁尔福 ……………………………（127）
我见到了海明威 ……………………………（134）
年轻作家的不幸 ……………………………（141）

欧洲见闻

世界上最古老的新职业 ……………………（149）
神奇的加勒比 ………………………………（153）
对付恐机症的办法 …………………………（158）
一个令人困惑的星期天 ……………………（162）
莫斯科，世界上最大的村庄 ………………（167）
苏联人对差别感到厌倦了 …………………（179）
柏林，一座荒谬的城市 ……………………（186）
“铁幕”是一根红白条栏杆 …………………（195）
一张可口可乐广告也没有 …………………（204）
尼龙袜是一件珍宝 …………………………（214）
租来的妻子 …………………………………（224）
两个命运交叉的人 …………………………（228）

花儿遭受怎样的痛苦 …………………………… (232)

艺海拾贝

我们的海明威 ………………………………… (239)
坡的生平与小说 ……………………………… (251)
故事里的故事 ………………………………… (256)
拉丁美洲的孤独 ……………………………… (261)
爱护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 …………………… (268)
了却一桩不愉快的事件 ……………………… (273)
灾祸的因素 …………………………………… (281)
诺贝尔奖的幽灵 ……………………………… (288)
没有能获奖的大作家 ………………………… (292)
为什么去看下午场? ………………………… (299)
一位绝食的电影导演 ………………………… (305)
波哥大首映的影片 …………………………… (310)
漫谈音乐 ……………………………………… (314)
巴兰基利亚的画展风波 ……………………… (324)
一位哥伦比亚大雕塑家在墨西哥 …………… (330)

创作漫谈

《百年孤独》的写作方法 …………………… (341)

文学创作漫谈 ……………………………… (350)
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 ………………………… (362)
故事写完后的故事 …………………………… (372)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 (377)
我没有写的那许多篇小说 …………………… (384)
阅读、影响和写作 …………………………… (389)
如何写一部长篇小说 ………………………… (397)
好，让我们只谈文学 ………………………… (402)
作家应该肩负的责任 ………………………… (407)
需要一位作家 ………………………………… (411)

人间百态

何塞利约的斗牛生涯

1949年的那一天——赶集的日子——，典型的考卡城镇桑坦德尔大清早披上了安达卢西亚民间的盛装。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城镇集市朴实的却是不平凡的历史上，第一次请来了两位西班牙斗牛士。他们是真正的西班牙斗牛士，据说他们都有一段漫长的斗牛生涯，曾经多次被牛抵伤。他们也有其真正的西班牙名字：何塞利约和马诺洛。

对两个真正的西班牙斗牛士来说，气氛也应该是热烈的，应该有骑马的姑娘，窗口应该摆上石竹花，就像以往惯常做的那样。乡村乐队适当地提前准备了一支真正的西班牙进行曲，走在以市长和市政府参事为首的组织委员会前面，伴随着爆竹声和钟声，热烈欢迎斗牛士的到来。

众人的情绪十分激动，因为两个技艺高强的年轻人赶在斗牛这件大事的前头，光闪闪的斗牛服里流着汗，于早晨十一点钟就来到了桑坦德尔。两人穿的斗牛服一样，都用黑毛

料制成，装饰着七彩的金属片。他们没有发表讲话，但是具有一切看上去是真正西班牙的东西。

下午三点钟，乡村乐队的小号手吹响了第一阵号声。牛栏打开了，一头高大的母牛，真正的考卡谷地的母牛，像一阵暴风一样冲进斗牛场。十分钟以后，何塞利约和马诺洛已遍体鳞伤，衣被撕破，人们赶紧把他们抬到卡利的大路上。

“合同上说，我们将斗公牛，而不斗母牛。”斗牛士中年长的何塞利约对桑坦德尔市长说。他还用内行人的口吻解释说，真正的斗牛士不能斗母牛，“因为它们会睁着眼睛攻击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何塞利约和马诺洛生来就没见过一头公牛，也没见一头母牛。

叫何塞的重要性

这两个勇敢的小伙子是卡利市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理发师堂阿维尔·苏尼加的小儿子，他们从来就和斗牛毫无关系。理发师给两个小儿子取名叫何塞和马努埃尔，同样也给长子取名叫埃尔南多。因为他喜欢这些名字。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叫这样的名字竟然成了发生在桑坦德尔的一件丑闻的主角，因为正像堂阿维尔·苏尼加希望的那样，他们叫这样的名字是可能成为医生或工程师的。为了这个，他先是为他们注册上公共学校，然后上圣路易斯学校，最后又上圣利夫拉达学校。直到哥哥何塞偷偷地离开家在波哥大和麦德林转游了4个月回到卡利谎称他是持有证书的斗牛士之

前，两个小伙子从未表现对斗牛有什么兴趣，也未读过介绍斗牛术的杂志。听哥哥那么说，马努埃尔也异想天开，说他受到传染，也要当斗牛士。这样，兄弟俩便开始叫何塞利约和马诺洛，并签订了去桑坦德尔集市斗牛的合同，连他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会那么做。他们的母亲堂娜赫苏西塔从来也不相信冒险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正是她为他们缝制了斗牛服，即在他们第一次领圣体时穿的黑毛料衣服上缝上了迷宫似的箔片。由于小伙子们已经长大，衣服穿在斗牛士的身上太瘦了。

“都怪那个该死的探戈”

在桑坦德尔的两个受伤的斗牛士中，其中之一如今成了哥伦比亚的何塞利约，在西班牙获得盛名的真正的斗牛士。另一个，即马诺洛，在西班牙举行的仪式上也由新手晋升为主要斗牛士，崭露头角。

现在，再不用说什么谎话了，再不是当初的何塞利约。那时，何塞利约离开家乡，逃出圣利夫拉达中学，脑袋里充满模糊的想法，口袋儿里装着十个比索。一爬上驶向卡塔戈的大卡车，他就想当一个斗牛士。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从来也没想过什么斗牛。事情始于一个星期六，是在卡利“豪尔赫·伊萨克斯”剧院的楼厅里，何塞利约看了墨西哥电影《斗牛，爱情和荣耀》。他的爱好突然产生。一个星期后为了当斗牛士，他便爬上卡车到了卡塔

戈；在那里他又爬上另一辆卡车去了麦德林，在麦德林又搭上另一辆卡车去了波哥大。当他提着装满好衣服的手提箱住进圣维克托里诺街的罗马宿膳公寓时，十个比索只剩下一个了。何塞利约不记得经受过任何不同于寒冷的异乎寻常的感觉。当时的情形他没有理由忘记：漫长的十天，他穿着单薄的灰衣服，盖着报纸和广告，缩成一团，打着哆嗦睡在桑坦德尔的公园里。

只读分类广告

现在，何塞利约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小说和加西亚·洛尔加的诗歌了。可是当他睡在桑坦德尔的公园里、一天十二小时挨饿的时候，却只看报上的分类广告。他去了所有用人的单位。但是多少天、多少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工作，更没有找到当斗牛士的门路。一天，在六十四街——他从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大道徒步走到那里——他的要求被拒绝后，他在报上看到有一个单位需要一名印刷助手。他徒步返回，等走到那个单位时已是下午五点钟，那里有六十个求职者在排队。“但是他们见我面黄饥瘦”，何塞利约说，所以人家要了他，每月工资三十个比索。

“不能再喝玉米面粥！”

他用省下来的第一笔钱买了一件短披风和一根斗牛棒。

是一个学徒工要四十个比索卖给他的，那人的名字他不记得了。这样，下班后，他常去国家公园看斗牛技术训练。但是何塞利约是个胆怯的小伙子：从来不敢对人说他想当斗牛士，所以在国家公园里他只是站在一边看。夜晚，他把自己关在“谷地一户姓加西亚的家中”他寄宿的房间里，用短披风和斗牛棒练习，直到天亮。睡觉前——在铺在地上的床垫上——，他用酒精炉为自己熬一锅玉米面粥。当他厌倦了想象的斗牛、喝饱了玉米面粥睡觉后，梦见了许多事情，却不会梦见斗牛。

由于喝腻了他自己做的玉米面粥——后来再也不喝，一辈子也不想再喝了——，所以他回到了卡利。为了不改初衷，他便谎称他是持有证书的斗牛士，可是他在波哥大连一场斗牛也没看过。他的天真的弟弟马努埃尔相信了他的话，既然相信他的话，自己便说服了自己，也当了斗牛士。

慧眼识好苗儿

谁也没有教何塞利约斗牛。他是利用卡利加西亚·巴霍牧场的监工“波兰科先生”给他的机会独自学习的。在桑坦德尔斗过母牛后过了几个月，他第一次在牧场看到了一头有血有肉的公牛的模样。但是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他还不了解斗牛的基本概念，人们就已开始把他视为一种“谷地现象”，这仅仅是因为卡尔托雷尼奥先生看见他在斯特利亚先生的“塔夫隆”牧场上斗过小牛，并给波哥大的“自由报”

寄了一张照片，编者还写了一篇充满赞扬之词的按语。虽然还不是优秀的斗牛士，但是何塞利约已成为斗牛界的希望所在。

何塞利约——1930年8月9日生于卡利市圣安托尼奥区——1951年到达马德里，因为应该把他运到哥斯达黎加的飞机把他丢在了巴拿马。几乎在西方的所有市场上斗了两年牛后，他想用在哥伦比亚省下来的钱去墨西哥。在帕尔米拉，他和他的同乡尼托·奥尔特加出现在广告上，当时他的同乡是掌剑手，何塞利约是斗小牛的优秀斗牛士。1949年，企业家胡利安·巴贝罗曾在布加看见他两次救助受到攻击的斗牛士，便对自己说（据他现在讲）："一个斗牛士已经诞生"。他试图利用他得到的这一印象，便在波哥大掀起一场新闻运动，并把一群内行和记者带到布加，组织了一次斗牛活动，以便公开介绍他的发现。在何塞利约的全部斗牛生涯中，这是一头活生生的公牛第一次向他发动进攻：一头淡黄色的瘦公牛使何塞利约受伤，也使胡利安·巴贝罗受伤。不过，这仅仅是一段时间，因为第二年何塞利约在基多名声大振；他第一次在圣玛丽亚斗牛场斗牛。然后他飞往哥斯达黎加，顺便去墨西哥。但是由于他弄错了航班时刻表，他只好在巴拿马签订了七场斗牛的合同。斗牛结束后，他看到，他挣的钱不仅够去墨西哥的旅费，而且也够去西班牙的旅费。在西班牙，人生地疏，他被一位短扎枪手介绍给一群斗牛爱好者：

"他是一个非凡的委内瑞拉小伙子，哥伦比亚的何塞利

约。”

牛耳“三烤乔”①

来到西班牙三年后，何塞利约赢得了很好的名声，在卡斯特洛博士街三十一号有一套宽敞豪华的楼房，他和紧紧跟着他的弟弟马诺洛住在那里。对他来说，进入专业的斗牛士圈子并非易事，但是他从一个斗牛场到另一个斗牛场，遇到的障碍比在哥伦比亚少。和在哥伦比亚的处境相反，在西班牙他再也不在公园里过夜了。尽管他到西班牙时他在整个半岛的熟人只有他在哥伦比亚认识的、女歌手特雷·阿莫罗丝的兄弟，但是他总有地方居住。

1953年9月20日，在洛尔卡斗牛场，他取代安东尼奥·宾拜尼达成为主要斗牛士。由于是在西班牙，为了庆祝此事，何塞利约割了四只牛耳和一条牛尾。倘若在卡利，他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据他说，他所做的也许还不只于此，他还要做他生来最喜欢的事：在河边吃一顿鸡肉“三烤乔”②。

“更害怕了?”

何塞利约自豪地用数字总结他的斗牛生涯：作为掌剑手

① 用木薯、香蕉、牛耳做的一种菜。
② 用木署、香蕉、鸡肉做的菜。

斗牛二十场，只有两场没有割牛耳。他被牛抵伤八次。第一次是1950年在帕尔米拉斗牛时被牛抵伤了大腿，花了四百比索治好了伤。颧骨上的伤疤是去年一个星期五在科尔多瓦省塞雷特斗牛时留下的。何塞利约一点儿也不迷信，他很高兴没有迷信思想。但是他是一位坚信不移的天主教徒，他把脸上的伤疤归罪于“圣周星期五斗牛的愚蠢主意”。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烈性的、妒忌别人的人。”有人请他谈谈对自己的真诚坦率的看法时他回答。关于他的斗牛技艺他说，他比任何时候斗得都好，因为距离缩短了，但是也觉得更害怕了。

“更害怕了?”

“是的，”他说，“我愈来愈感到害怕。”

小侯爵夫人的传说

若干年前，一个生得怪模怪样、体质虚弱，肚子像鼓一样绷得又大又紧的男人来到城市的一位医生的诊所。他说：“大夫，请你把我肚子里的一只猴子取出来。”他接着解释说，他来自玻利瓦尔省东南部的一片沼泽地，那片沼泽位于圣豪尔赫和考卡河之间，在拉·莫哈纳甘蔗田、拉·普雷萨低地、拉·温图拉崎岖的荆棘地和拉·瓜里帕沼泽那一边。他来自拉·谢尔佩，哥伦比亚大西洋海岸内地的一个传奇般的镇子。在那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使用魔法报复伤害人的行为，比如让侵犯者的肚子里孕育、生长一只猴子，并让它繁殖。

难以归来的旅行

谈论拉·谢尔帕已不是新闻，因为马甘格城的圣豪尔赫

米商知道那个地方出产的大米颗粒又大又好，用正常的价钱就能买到，只是运输比较困难。凡是渴望去那个地区并有勇气前往的人，可以在马甘格搭船，沿着莫哈纳支流旅行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苏克雷港。在那里租一匹马，半天就能到拉·瓜里帕。最后，在齐腰深的泥水上旅行两天，就到了拉·谢尔佩沼泽地。想去是容易的，回来可就难了，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毫无奇怪：那里的人会用砍刀把你打下马，就在那里让你坐着被活活埋掉，或者给你的肚子填满青蛙，患腹膜炎死去。

敢于冒那种危险的人，不会遇见一个村庄，他遇到的只会是一片乱糟糟的沼泽地区。在那样的地区，走很久才能见到一线阳光，走两三个小时才能遇到一幢原始房舍，房子里住着被虐疾折磨得枯瘦不堪的男女。从种族上看，他们和一般的哥伦比亚人没有什么区别。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那里有好人和坏人，但是他们比任何地方的外地人都多疑。他们像所有的人一样，用一面鼓、一根玉米杆和一个蒸馏酒缸在一个房间里开心娱乐。他们住得不好，吃得不好，但是在这两方面他们耗费巨大。为了预防被蛇咬伤，他们发明了咒语，但是他们必须时刻准备去旅行：两天两夜穿过沼泽地去交付别人让他们交付的一副止痛药钱。

兀鹰唱歌的日子

什么事情也不能让拉·谢尔佩的居民离开他们那座疟疾、

巫术、动物和迷信的地狱。他们收获稻谷，掌握着让土地长出上等稻米的咒语；他们去附近的村庄推销大米，用卖得的钱购买煤油、衣物和特效药品。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像大多数哥伦比亚人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实践其信仰，用美味的牛肉庆祝圣星期五。但是他们的圣星期五不是可以改动的，总是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据他们讲，那一天“兀鹰会唱歌”。

他们像天主教徒和西班牙人一样谈情说爱。他们对爱情有一种悲剧观念，他们嫉妒心重，酗酒，用砍刀决斗；他们的爱情还有一种诗意，爱情激励着追求者为他们的心上人唱情歌，情歌悠长而优美，纯朴而奇特。他们在邻近的村镇以天主教的方式结婚，用疯狂的娱乐活动庆祝这件喜事，有一次竟有人用砍刀杀死了新娘。他们信奉上帝，信奉圣母，信奉神秘的三位一体。但是他们的崇拜遍及一切，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有神圣的意志，并且用他们自己创造的祈祷词对神灵祈祷。但是他们尤其信奉小侯爵夫人——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哥伦比亚人——。

小侯爵夫人

最年迈的拉·谢尔佩居民从他们的祖辈口中知道，许多年前在当地住着一个和善、小巧的西班牙女人。她非常富足，拥有许多牲畜、金制品和宝石，人们都管她叫小侯爵夫人。根据传说，这个西班牙女人肤色白净，头发金黄，一生

不知道丈夫是什么。但是，小侯爵夫人之所以受人敬重和服侍，不只是因为她为人和善和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因为她通晓行善和为恶时使用的一切秘密咒语。为了使一个垂死的人从床上站起来，只要知道他的体形和确切的住址就够了；她还能通过咒语让一条蛇游过沼泽地，六天后咬死某个敌人。

小侯爵夫人是拉·谢尔佩地方为她效力的人们的一位族长。她有一处豪华的大宅院，宅院位于现如今名叫“拉·谢纳加·德拉·谢尔佩”的中央。“宅子里有走廊和铁窗”，如今谈论那个非凡的女人的人们这样描述道。她的牲畜“多得很，要从街上通过，九天也过不完”。小侯爵夫人独自住在家中，但是每年她都要做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各地去探望她所保护的人，为患者治病，解决经济问题。

小侯爵夫人可以同时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在水上行走，可以在家中呼唤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在拉·谢尔佩的任何地方。只有让死人复活的事情她做不到，因为死者的心灵不属于她。“小侯爵夫人跟魔鬼订有契约”。拉·谢尔佩有人解释说。

在世界的彼岸

传说，小侯爵夫人活了她想活的岁数。根据更加普遍的说法，她很想活二百多岁。她的死亡是由天上的星象、地球的变动和拉·谢尔佩的居民的恶梦预示的。在死前，小侯爵

夫人把她的许多秘密法宝传授给了她宠爱的仆人，只有长寿的秘诀除外。她把她的庞大的牲口群赶到他的房子前，让它们围绕她转了两天，直到出现了拉·谢尔佩沼泽地那一片无法摆脱的泥水的汪洋，水面上布满了海葵，让人看不见彼岸究竟在哪里。对于了解可以到达的岸边的人来说，那就是沼泽地的彼岸。但是直到几年以前，位于世界尽头的那道彼岸还由一头长着金角金蹄的黑色公牛守护着。

拉·谢尔佩的居民们相信，小侯爵夫人的金银财宝和长寿的秘诀埋藏在那片沼泽地的中央。

冒险寻宝的人

在拉·谢尔佩附近的破村子里，有一个拖着一只变形的浮肿的脚走路的稻农，无人不晓。他曾到达临近小侯爵夫人埋财宝的地方。他自己讲述说，有一天他决定不再继续收割稻谷，便冒险去沼泽地中央寻找埋在那里的财宝。跟拉·谢尔佩的所有居民一样，他知道寻找财宝的工作必须在“不是闰年的一年”的十一月头两天进行。他期待着这个日期，于十月底来到沼泽地岸边，弄到一只木筏，带着一个炉灶，一箱大米，还有大蕉、丝兰、盐，和一盏煤油灯。此外，还带了一葫芦水，因为沼泽地的水会让男人患疝气，让女人生活规律失常，让牲畜患肠道病。

据传说讲，在每年的十一月二日这天，在沼泽地中央总出现一棵挂着金葫芦的加拉巴木，树干上系着一只独木舟，

独木舟没有主人，可以独自向女族长埋财宝的地方划去。传说还讲，独木舟由一些巨大的响尾蛇和白鳄鱼守护着。

奇妙的旅行

稻农对他的冒险经历的描述就像小侯爵夫人的传说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在十一月一日头十二个小时里，他在水中的花草中间划行，越往前走，花草就越稠密、越高。他没有发现那天有什么异常的事情。但是到了傍晚，他闻到他周围有一股扑鼻的饭菜香味，这刺激了他的食欲，他狼吞虎咽地又吃又喝，直到天亮。后来，饭菜的香味被“赶路的公牛群的哞叫声似的奇妙声音和沼泽地的猴子、鹦鹉和雉鸻的嘈杂声取代。在十一月二日天亮时，他看见一些长着鸟嘴鸟头和鸟翅膀的四足动物和长着金属般闪闪发光的羽毛的石鸻在木筏周围飞舞。他还说，尽管周围有各种声音，尽管木筏在乱糟的水草中间艰难地前进，他还是不停地向沼泽地中央划行，去寻找小侯爵夫人的金制品、宝石和长寿的秘密。十一月二日傍晚，一切声音突然停止，草木也不那么可怕。在地平线上，神奇的葫芦树在浓密的白柱子围栏里闪光。但是远在三天的路程之外。

贪心的冒险者说，他只好知难而退，因为他带的水和食物已不够用，不可能划到那棵树跟前。当他上岸后，双脚开始浮肿，觉得累极了。但是使他高兴的是，他是拉谢尔佩唯一敢于根据传说冒险寻宝的人。

快活的死者

棺木天亮前运到。气氛于是改变了，因为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西埃尔佩的居民，让人们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因素并不是尸首本身，而是瓜里帕的木匠用马马虎虎钉在一起的、连刨都不刨的木板匆匆打制的棺材。每当沼泽地有人拿着一段按照死者的身高截好的绳子走来，他就打一口这样的棺材。无论白天黑夜，西埃尔佩的送信儿的人任何时辰来敲瓜里帕的木匠的门，他都起来动手工作，因为他知道，不管送信儿的人行动多么快，等待入敛的死人至少要在一个角落里躺六小时，在猪和鸡中间腐烂。来买棺材的人总希望在路上别遇见到瓜里帕买更多的棺木的其他送信儿的人，但是他的速度往往不那么快。在西埃尔佩卖的白酒可以让人喝得烂醉如泥，其结果并非人人都患惯常的头疼和身体不适。如果棺材来迟了、悼念活动推迟到明天的某个时间，中毒和吵架事件是可能在葬礼上发生的。只要把尸首装入棺材，人们就离开

牌桌和餐桌回家，九天以后再返回死者亲属的家去参加纪念活动。

瓜里帕的墓地

按照传统，西埃尔佩死了人，要埋在瓜里帕。去墓地埋人，无需填表格办手续，也不用请求有关机构批准。死去的男女和无名的孩子，疟疾和痢疾的牺牲品，或者被蛇咬伤的十个人有一个人浮肿和变形的尸体，不加区分地统统埋在墓地的许多十字架下。只有被淹死的人和被砍刀砍死的人不能埋在潮湿而狭小的瓜里帕墓地。前者被暴露在野外，让老鹰饱餐一顿，因为按照西埃尔佩的古怪的道德法则，他们是由于道德败坏而被淹死的。后者，如果路上被人发现，可以在能够埋他们的地方掘坑掩埋。

漫长的旅行

死人由自愿参加的男人和女人送往瓜里帕墓地。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死者的感情，出于对死者亲属的敬重，或只是为了继续他们的娱乐活动。棺材绑在四根木头上，被抬着穿过沼泽地，走过不深的小路，免得深处的水漫过抬棺人的腰部。后面跟着一队带着酒葫芦的男人和抱着孩子、牵着家畜的女人，他们要利用送葬的机会去瓜里帕购买东西。但是这样的旅行要比正常的旅行多花一倍时间，因为这种旅行常

常中断，停留很久。在这种旅行中，死者又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每经过一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就停下来交谈、喝咖啡和白酒。如果除了渴还觉得饿的话，住户的主人便杀一头猪或几只鸡，做一顿午饭，算是对送葬队伍的捐助。但是旅行的目的[①] 不能进主人的家门。死人要被放在离小路很远的地方，不能让死了二十四个多小时的死人的臭味飘过来。

从离西埃尔帕最近的地方到瓜里帕墓地附近的房舍，最性急的送葬人一天也抬不了一个死人。抬着棺材穿过沼泽地非常困难，除了这种境况，还有把旅行变作喧闹和有趣的活动的人的慢慢腾腾和满不在乎。一般说来，死者要六个人伴随离开家门，再由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送到瓜里帕，因为在漫长的旅途上，凡是因缺乏合适的旅伴而推迟旅行的人，都加入了送葬的行列。因缺乏合适的机会而推迟野游的人也加入了送葬的行列。在至少一个白天另半个夜晚的时间里，送葬的人群把沼泽地的水淌得哗哗响，在水中开着路，一面喝酒、交谈，抬着棺材，棺材的缝隙里冒着尸体的浓烈的臭味。只有到达瓜里帕的干燥地带后，送葬的队伍才加快脚步，找回损失的时间。

---

① 指死人。

快乐的死者

这不是一种癖好，是一种仪式。凡是听说过西埃尔佩的人，也一定知道它的最凄楚的现象之一：快乐的死者。这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仪式，通过这一仪式，死者会告诉送葬的人他对自己的状态满意还是不满意。

由于尸体没有用布包裹，而是原样放在一只尺寸不准确的匣子里，所以尸体不总是很合适地躺在里头。当送葬的队伍在瓜里帕的干燥地带小跑前进的时候，尸体便随着抬它的人的小跑节奏撞击棺木板。在某些情况下，尸体不撞击棺木，抬他的人认为它的沉默是对它死后的境况不满意的表示。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尸体会敲击棺材板，伴随和保持着小跑的节奏。

“死者在快乐地行进。死者在快乐地行进。”西埃尔佩的纯朴居民这样叫道，他们气喘吁吁、兴高彩烈地拥到将要埋葬一具腐尸的瓜里帕的一条街上来。那是一个正直的人的尸体，他用头部撞击棺木板的强有力的、有节奏的声音告诉人们，他在天堂里感到很幸福。

以萨福拉结束

在博利瓦尔乡村，在两种情况下唱“萨福拉”：收割庄稼的时候和掘坑埋人的时候。在西埃尔佩，人们保留着这种

习俗，但是仅仅用于掘墓埋人的时候。所以当送葬的队伍抬着快乐的死者来到墓地时，掘墓人已等在墓穴边，用一种源于地方的、宏亮而刺耳的歌谣欢迎他们。古怪而优美的歌声和令人迷惑的智慧，让人不由得回想起豪尔赫·曼里克的民歌。歌谣的名子很朴实，叫作："悲痛的萨福拉"。

悲痛的萨福拉
棺木就是一条船，
搭船的人不复返。
这是一个永恒梦，
只有上帝才清楚。

这个世界是一只球，
它转动着永不停。
如果不在这一刻，
不是今儿就是明儿。
但是许多人相信，
钱财何时都管用。
上帝是个大名人，
他将善恶赐予人。
棺木就是一条船，
它用雪松木做成。

那座真正的神殿，

和它那高耸的钟楼，
终有一天会倒塌，
但是钟声永不停。
聪明的人们这样说：
有钱人是丢钱人，
穷人什么也不会丢。
这是一片不安的海，
乘船者一去无踪影。

有钱会让人敬畏，
这个道理非常对。
但是一旦时候到，
死亡会把我们全杀掉。
可能有人会相信，
用钱可以来救人，
他却并无此运气，
其实他一点不知道，
死亡既可以杀穷人，
当然也可以杀富人。
按照基督的安排，
这将永远是一场梦。

我的记忆力不强，
不能清楚地理解事情，

但是上帝讲实际，
他把善恶赐予人。
我的双唇这样说：
做人应该性温和，
对待别人要友爱，
不可伤害任何人，
世界转动了多少圈，
只有上帝才明白。

马尔维纳斯，一年后

战争结束后一名阿根廷士兵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归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帕莱莫一团打电话给他母亲，恳求她允许把他的一位残废的、家住他乡的战友带到家里来。据他讲，那是一个十九岁的新兵，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此外，还失掉了双眼。为儿子的生还感到高兴的母亲恐惧地回答说，天天看见一个残废人她不能忍受，便不同意那人来她家。于是儿子放下了电话，对自己开了枪。他所说的战友就是他自己。他撒那个谎是想知道他母亲看见他肢体残缺回家时的态度如何。

这不过是近十二个月来在阿根廷流传的许多可怕的故事之一。这类故事都没有见报，因为军方的检查机关不准这类故事通过流亡者收到的私人信件在全世界流传。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墨西哥见到一封这样的信，我没有勇气重复信中的某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英国和美国的杂志今年 4 月 2 日却庆祝不列颠取得的辉煌胜利一周年。我觉得在同一时刻听不到

拉丁美洲气愤的声音、不能展示纪念章另一面的某些残酷的、令人恼怒的方面：阿根廷的失败，是不公平的。面对被自己的母亲鄙弃的想法自杀的年轻残废士兵的故事，仅仅是被那场荒唐的战争所掩盖的一个戏剧性插曲。

现在人们知道，有无数十九岁的新兵被强行送往部队，不经训练就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同职业的英国兵作战。他们穿着网球鞋，衣服单薄得难以御寒，在某些时刻，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度。许多战士脱鞋时不得不连同冻烂的皮肤一起脱下来。由于长时间坐在战壕里，睾丸被冻坏，九十二个战士不幸遭阉割。由于缺乏遮挡强烈的雪光的防护眼镜，仅在圣卢斯地方就有五百个士兵眼睛失明。

在教皇访问阿根廷之际，英国人归还了一千个俘虏。其中有五十人不得不动肛裂手术，那是在达尔文地区俘虏他们的英国兵鸡奸造成的。所有的人必须住在专门的康复医院里，不让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平均体重只有四五十公斤，许多人患贫血症，还有许多人不得不截肢，一批士兵因患严重的精神失常而住院。

"在上前线之前孩子们就被军官们施用了兴奋剂，"一封见证人的信里说，"先是用巧克力，然后用针剂，为的是让他们不觉得饥饿和保持最清醒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严寒，许多人睡觉时被冻死。这些人也许算最幸运的，因为另一些人在从罐头里掏取硬如石块的肉团时被饿死。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知道的关于阿根廷军方在马尔维纳斯采取的食品供应方面的荒唐措施是很多的。轻重缓急完全

被颠倒:一线的战士勉强吃到几条冻透了的沙丁鱼,二线的战士吃到的饭菜好一些,后方的战士有时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

和如此可悲、如此非人的条件相比,敌对的英军却拥有在极圈作战的各种现代手段。阿根廷人的武器被冻坏,英国兵却配备一种如此精良的步枪:它可以击中二百米远的活动目标,具有一种最精确的红外线瞄准器。此外,他们还穿着保温的衣服,有的还穿着防弹背心。这种防弹背心一定使可怜的阿根廷新兵不胜困惑了,因为他们眼见他们被一梭子子弹击中倒地,但是过了一会儿,却看见他们安然无恙地爬起来,灵活地继续进行战斗。英军在前线打一星期的仗,然后回到坎贝拉号船上休整一星期,在地球上一个最遥远最荒凉的地方,从事城市的各种娱乐活动,得到真正的休息。

但是在技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留给幸存的阿根廷士兵最可怕的记忆却是郭尔喀人营——在阿根廷港战役中冲在英国部队前面的神奇而残暴的尼泊尔人砍头军的野蛮行为。“他们狂叫着、砍着人头前进,”一位目击那种残酷的屠杀情景的人写道,“他们用杀人弯刀砍杀我们不幸的孩子的速度是七秒钟一个。出于一种古怪的习俗,他们揪着头发提着人头,把耳朵割下。”郭尔喀人怀着如此疯狂的决心对付敌人,上岸的七百人只有七十人幸存。“这些畜生如此凶残,”见证人最后写道,“阿根廷港战役结束后,他们接着杀英国兵,英国人不得不把最后几个郭尔喀人铐起来,使其降服。”

一年前,我曾像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阿根廷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意图表示支持,但是我也很清楚,这种支持不

能理解为可以忘记阿根廷执政者的野蛮行为。许多阿根廷人包括一些要好的朋友不大理解这种区别。但是我相信，对那场荒唐战争中发生的不可理解的事件的回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相互理解。所以我认为，再一次甚至千百次地提问——和马约尔广场上的母亲们一起——前十年失踪的八千人、一万人、一万五千人在何处，并不是多余的。

六点钟自杀的幸福妻子们

有时我在超市里游荡，观察家庭主妇们在货架前选东西时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看见她们推着小车儿在商品的迷宫里徘徊，好奇地看这儿看那儿。观察了半天后，我总是这样问自己，她们当中哪一位将在那天下午六点自寻短见呢？我的这个坏习惯来自一项医学研究。关于这项研究，几年前一位要好的女友对我谈起过。据她讲，西方国家那些最幸福的妇女在享受过快乐母亲的富足生活、帮助丈夫摆脱了困境、用铁的手腕和温柔心肠教养完子女后，觉得一切困难似乎已经解决，应该在其秋天的平静的沼泽上航行了，于是便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根据统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在傍晚的时候自杀。

人们一直在著书立说，谈论女人的境况和她们的神秘天性，但是很难了解他们最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我记得一种激烈的看法，在此我不想披露发表此看法的人是谁，因为我十

分敬佩他，担心这会引起偶然读到本文的女人对他的愤怒。他的看法是这样的："女人只渴望家庭的温暖和屋顶下的安全。她们总担心发生灾祸。对她们来说，任何安全措施也不十分安全。在她们看来，未来不但不安全，而且多灾多难。为了提前同那些不知道的灾难做斗争，没有什么欺骗的手段她们不求助，没有什么掠夺办法她们不使用，没有什么娱乐和幻想她们不反对。倘若文明掌握在女人的手里，我们会仍然住在山洞里，男人的发明会为了取火而停止。她们对洞穴的全部要求，除了遮风避雨外，就是希望它比邻居的洞穴豪华一点。在子女的安全方面，她们的全部要求是能够让他们安全地呆在一座像她们的那样的山洞里。"在我知道他讲这些话的那个时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曾说："所有的男人都是阳萎患者。"许多朋友，特别是一些未患阳萎的朋友克制不住他们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冲动，公开和私下里辱骂我。他们的恶言秽语可以概括为这一句："贼喊捉贼。"现在我认为，无论上述关于女人的评论，还是我关于男人讲的那句话，应该受指责的只是夸大其词。毫无疑问：当我们不希望和不愿意阳萎的时候，我们却患了阳萎，因为我们知道，女人期望于我们的要比我们能够办到的多得多。在真行动的时候，某种幻觉会防碍胆怯的人，搅扰自命不凡的人。在关于女人的那番实际上是针对罗马帝国的女人的话里，没有指出那种现象的恐怖性，正是那种恐怖性导致我们时代的许多家庭主妇一瓶接一瓶地吃安眠药（如果在下午六点钟用一杯白酒冲服更好）。

没有什么事比家务事更难做、更徒劳、更乏味的了。在这个世界上，最让我感到好奇、也最令我佩服的事情之一是，女人们如何使厕所里永远不缺少卫生纸。为了准确地计算日常需求——每个家庭成员最密切、最难预见和最根本的需求——，不仅需要某种特别的本能，而且需要可以用来从事更重要的工作管理才能。倘若我不像在我的书中写的那样为了这么多理由佩服她们的话，仅凭这种美德我也足以深深佩服女人们了。我认为能够那么自然而有效地保持家庭的秩序的男人是很少的。我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金钱和理由去那么做。

在家政当中，包含着历史学家常常看不到的历史的隐蔽面。毫不过分地说，我一向认为，如果不是女人留下来支撑家庭这个世界，上世纪哥伦比亚的内战是不可能进行的。男人们无所顾忌地扛起猎枪去冒险。当他们不在家时，他们无需为家庭生活采取任何决定；当他们面临死亡的危险时更是如此。我外祖母对我讲过，我外祖父很年轻就跟着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部队走了，几乎过了一年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一个黎明，有人敲她的卧室的窗户，一个她始终分辨不清的声音对她说："特兰基利娜，你要是想看看尼古拉斯，你就马上打开窗子吧。"当时她年轻、美丽、立刻打开了窗子，但是只看见马队离去掀起的尘烟。有一名骑兵的确是她丈夫，但是她根本就没法儿看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独自养育着儿子，为了其他女人而把他们养大，那些女人也将成为未来的其他战争的无形的英雄，她们为了奔赴沙场的别

的男人而把女儿养大，她们肩负着家庭的重担，直到丈夫归来。她们是怎样做的，她们怀着什么样的理想、采用什么办法做的。这一切在男人们写的历史著作里是读不到的。实际上，在陈腐的、装模做样的哥伦比亚历史研究院的全部历史上，只有一个女人。她在那里刚刚工作了一年多。我有理由相信，她在那里肯定被头上笼罩着光环的同事们吓倒了。

遭受家庭主妇目前这种命运的女人们最终会在下午六点自杀。其原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她们当年那么美丽，很年轻就和刚开始工作的，既有事业心又有能力的男人结了婚。她们手脚勤快，不屈不挠，保守着她们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一方面帮助丈夫发展，另一方面负责养育子女，她们却并不认为她们每天在创造奇迹。"她们把家庭的全部重担子放在了自己肩上。"我不只一次听我母亲这样讲。就像她的祖母在过去那么多次被遗忘的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然而，那种不为人知的英雄主义尽管令其疲惫、得不偿失，但是对她们来说却是她们生命的一个证明。许多年后，当丈夫安定下来找到一个职业并开始独自收获共同努力的果实时，她们的存在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当儿子长大成人离开家后，她们的存在就更不重要了。这是巨大的空虚的开始。但是这还不是不可补救的，因为它在世界上最乏味的工作即家务劳动中留下一个轻松的空隙，孤独的主妇们可以借此消磨早晨的时光。如果丈夫在最后一刻来电话说不要等他吃午饭的话，她们还不会独自进餐，因为一些处境相同的女友很愿意陪伴她们。但是，在无成效的午睡后，做完令其着魔的头

发，看过电视剧或听完没完没了的电话通知后，等待她们的就只剩下下午六点钟的深渊了。在那个时刻，她们或者接待一位情夫的短暂来访，他连脱鞋的时间也没有；或者一下子把一瓶儿安眠药吞下。许多女人曾是高贵的夫人，这两件事她们都要做。

朋友们的评论总是如此：“真奇怪！她们是有一切条件做个幸福的女人的。”我个人觉得，实际上，那些幸福的妻子只有在不怎么富有的时候才是幸福的。

波哥大的自行车热

任何时候都会发生骑自行车的人酿成的交通事故。在波哥大，甚至在全哥伦比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是自行车运动员。他只是时不时地骑一骑自行车，常常不遵守交通规则，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说，城市里的骑车人很勇敢，因为他们知道——或者希望——汽车司机很小心，不会撞他们。《观察家报》的一位编辑今天早晨到城市的各个地区转了转，见到许多骑自行车人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首先是骑自行车的小孩。他们在公园周围骑着车横穿马路。有一些孩子不过五六岁，显然没有人照看，他们骑着小三轮车在汽车中间穿梭。有一些自行车没有牌照。大多数骑车人——包括骑三轮车的孩子——没有执照。在圣菲区的"奥斯卡"公园里，一个没有执照的孩子在马路中央骑着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车。车子不是他的，是按一刻钟三角钱从一家服务社租来的。

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

狂热的自行车运动，尤其是轻率的自行车比赛，冲击着城市，近年来引发了无数起悲惨事件。这个问题的发生，特别应该归咎于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尤其在查皮内罗——，几十辆自行车放在人行道上，它们的主人正在街角上的百货商店里收听关于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的情况广播。一个赛段结束后，城市的那些骑车人为自行车赛的激动人心的广播所鼓舞，纷纷冲向街头，确信他们是对拉蒙·奥约斯的竞技改进和提高的一代。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像在喝醉酒的状态下骑车——，发生恶性交通事故是毫不奇怪的。

二十四小时没收三百辆车

波哥大交通局对不断上升的自行车事故感到不安，向自行车违规现象展开了彻底斗争。二十四小时以来，阿莱杭德罗·塞龙少尉和第一位摩托车运动员罗伯托·阿科斯塔专门处理自行车违规问题，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由于下面的原因，他们没收了三百辆自行车。

一、自行车没有牌照；

二、骑车人没有执照；

三、没有许可证在禁区行驶。

在多数情况下，前两种违规现象同时存在。同样，有一些骑车人还被拘留，因为他们在禁区超速行驶——禁区是指波哥大中心区，只有持有从事人员特别许可证的人才可以通行——，并且发现，除了明显的违犯交通规则外，这些骑车人也没有执照，车子没有牌照。

明天将加强工作力度

负责对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骑车人进行整顿的人认为，从明天起他们必须加强工作的力度。今天，学校的课程已经结束。明天早晨孩子们要放假了。他们也为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感到兴奋，他们将投入危险的自行车体育运动，特别是在居民区里。那些地方管理得不严，但是危险性并不很小。

中小学的学生为数可观，不少人去上自行车运动学校。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构成令人不安的危险。但是在假期里——交通管理人员肯定地说——，他们像获得了自由一样发疯，整天都在居民区里组织自行车比赛。这种现象今年更加令人担忧，因为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恰好在假期里举行。

租来的自行车

从明天起骑自行车的孩子，大多数骑的是自己的自行车。少数孩子骑的是从波哥大众多出租自行车的店铺租来的车子。正是这些租车骑的孩子构成了主要危险。一般说来，

有自行车的孩子有丰富的骑车经验。但是租自行车的孩子不一定会骑车。在街道上，可以看见一群群的孩子在用租来的自行车练习骑车。自行车有各种各样的型号和各种各样的牌子。租用自行车不需要任何担保。明信片、学生证或其他任何证件，都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凭证，一个孩子可以用来租一辆自行车。

危险来自租车行业

毫无疑问，轻率的自行车比赛最重要的根源是自行车租赁行业。《观察家报》的一位编辑访问了位于不同城区的四家租车店铺。没有一家店铺由成年人来负责租车业务。经营方式十分轻率，陈旧，平常总让一个孩子负责租车。他的工作不过是收钱，看证件，掌握用户租车子的时间。只有星期日才增加营业人员，因为星期日自行车需求量大，所以收入也多，丢车和发生事故的危险也大。

租用旅行自行车的租金和租用三轮车的租金相同：一刻钟三角钱，或者一小时一个比索。在很少的情况下和很少的店铺租车时要求用户出示行驶许可证。

出租赛车的危险

比赛用的自行车情况特别。经营这种生意的店铺，大多数都出租赛车。但是条件特殊：赛车比较贵重，比较精致，

想租的人也较多，所以租金较高，担保条件也苛刻。要想租一辆赛车，必须交二十比索的押金和每小时二比索的租金。平时租赛车的人不多。但是自从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开始后，租赛车的人数猛增。租到赛车的人只追求骑车的高速度。但是出租赛车的店铺既不过问顾客的年龄，也不要求他出示许可证。

在波哥大交通管理局，登记在册的自行车有一万一千零四十三辆。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数字仅占波哥大实际使用的自行车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还有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情况：持有有效通行证的人只有五百一十五个。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很简单：办理自行车执照时，不要求车主拥有通行证。如果考虑到每辆自行车往往不只是一个人骑的话，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会更加令人忧虑。所以，尽管有许多人持有通行证和执照，但是仍然可能查到许多没有通行证的骑车人。好在波哥大有一些自行车没有人骑。

一个漂亮的理由

最后，在目前的机制内，想掌握自行车的登记工作是困难的——几乎也是徒劳的。在转让这种交通工具时，既不要求卖者也不要求买者持有行驶许可证。一个没有执照的骑车人可以把自行车卖给另一个没有执照的人。在法律上二者谁也不必有行驶许可证。

“没有必要，”过去的一位交通局领导者说，“因为不管

怎样，父亲买了自行车，儿子们都可以骑。为了办执照而要求这位父亲办理通行证，是不合理的，因为归根结底，骑车的人并不是他本人。

波哥大交通管理局承认，目前的规章制度特别不完善。波哥大的交通问题十分严重，交通管理人员在管制骑马人方面从来不敢分心。目前的问题是纠正某些现象。原则是加强交通管理工作，并根据几天后将发布的几项法规继续进行。其中一项法规是为整顿自行车租赁行业而制定的。

九年不算什么

几天前，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成立了一个由十一个男人和唯一的一个女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筹备哥伦比亚参加庆祝美洲发现500周年的活动的工作。筹备工作似乎开始得过早了，因为通知进行的周年纪念活动不是在明年，而是在1992年10月12日。然而，筹备工作的提前本身却说明了对那件大事的重视，并让人们明白为庆祝活动所做的准备工作的规模。正是因为这样，委员会的一位杰出成员才用这句话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建议："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只差九年了。"谁也不认为这话是开玩笑，完全相反，都认为是直率的现实主义的表现。

但愿这九年能够让我们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在给哥伦布到达我们大陆一事确定最后的名称方面达成一致。

欧洲人按他们的考虑决定称之为"美洲的发现"。我们对这个轻率的说法没有过多考虑就接受了。赫尔曼·阿西涅

加斯在比较严肃地提到他常常私下里谈论的这件事情时曾说，对哥伦布的到来和黑暗的征服时期，与其称为发现，毋宁称为“美洲的遮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也许也不正确，但是毫无疑问，发现者们和被发现者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符合历史真象和彼此的友谊的关系，而庆祝美洲五百周年的活动却是能使我们达成一致的良好机会。

如果想象一切都恰恰相反，玩这种游戏将是可笑的。在自己的废墟上依然得到明显而惊人的发展的玛雅文明，具有通过大海大洋走向世界的丰富天文学知识。这样的事情毫不奇怪：一群玛雅人冒险考察大西洋；到达比他们的视野远得多的地方，并在卡迪斯港由赫丘利本人建港几个世纪后抵达该港，该港是为人所知的世界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玛雅人的航海家——或阿斯特克人的航海家，或印加人的航海家——可以用哥伦布使用的权利宣布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他们的王国的一部分，并着手征服它，推行他们的宗教和语言，九年后庆祝发现欧洲五百周年。

当你参观西班牙那些和美洲的历史有较直接的关系的地方时——怀着我们拉丁美洲人参观时应有的热情——，不能不产生这些历史幻想。当看到小学教师以夸张的言辞教我们想象为我们生活的原始码头的帕洛斯·德·莫格特港时，你不能不为那儿条旨在改变世界的形式和内容的船居然是从一个那么破烂的小船傍靠处起航的而感到惊讶。但是当观赏恒星般美丽的马丘毕丘高峰，或尤卡坦神奇的礼仪中心，或富有诗意的金巴亚金银匠手艺，或从月球上容易看到的亚马逊内

地广阔的地球表面时，同样会感到惊讶。

童年时代令人着迷的东西之一是表现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归来的一幅石版画。刚刚把阿拉伯人逐出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和王后让哥伦布去巴塞罗那，他在那里受到他们隆重接见，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像石版画描绘得那么隆重。我这样说是根据一份奇特的证明材料：巴塞罗那市政府保存着一部记述从中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日记，国王接见哥伦布的那一天并没有做特别的记述，而仅仅在许多关于某位航海家归来的记述中顺便提了一下，是在国王的召见厅里接见的。那幅情景，就像那幅石版画描绘的那样，让人想起我们加勒比海地区的祖先：他们肤色黝黑，身躯高大，衣着考究，装饰着羽毛、项链和各种各样的金饰品，携带着看上去像有毒的奇异果品和稀有的动物。见到这些东西，召见厅的官员肯定觉得是在做恶梦。然而，像我们在哥伦布日记——几乎是拉斯卡萨斯神甫重写的——中了解的那样，我们的祖先并没有被描绘得那么让人惊愕。据说，他们长得非常匀称，身条很美，面孔很好，头发很粗，几乎像马鬃。那种描绘让人确信，他们的身上涂了颜色，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具有卡纳里亚斯岛土著人的肤色。根据航海者最初见的情景可以认为，瓜纳尼岛上的居民像他们的母亲生下他们那样在海滩上活动，尽管看来在坐着木排来欢迎他们的人中没有一个女人，就像他们的三桅帆船上也没有一个女人、哥伦比亚庆祝500周年委员会中只有一个女人一样。这一点允许我们推测，拉美人中间众所周知的大男子主义可能

是伴随着三桅帆船传入的（因为在西班牙大男子主义早已过剩），但是不管怎样，大男子主义在我们中间已习以为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那幅石版画上也只画了一个女人。这似乎符合历史的真实。

不管怎么说，那幅石版画比什么都有用处，因为它允许人们自问：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归来时从那些不幸的加勒比人那里带来了什么。有人怀疑西班牙人是最早到达美洲的欧洲人；但是相反的，石版画上的加勒比人是最早到达欧洲的美洲人却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今天，人们不但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且对他们的最后命运也所知甚少。人们只知道，他们接受了洗礼，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在阿拉贡修道院里被冻死。包括我根据记忆引证的、在一个匆忙的星期五下午不能立刻查证的这份材料，应该引起历史学家们的高度注意。为了纪念最先呼吸到欧洲空气的美洲人——也为了纪念他们被迫做的、但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旅行五百周年——，我们至少应该做的是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确定，他们和他们的不幸的遗骨的命运如何。也许我们大家会惊异地发现，有多少杰出的西班牙人是他们的后代，这对我们和他们是多么光荣，尽管我们永远不能破解他们在带着痛苦的乡愁来到一个分散的、破败的、没有土豆、没有巧克力也没有玉米和西红柿、也许永远不了解——如果没有美洲的黄金——什么叫灿烂的复兴的欧洲之前是什么样的人这么秘密。

总之，我们——在大洋两岸——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要一起做完那许多尚未做完的共同的事情，九年的时间是很短的。

格雷戈里奥神父的小天地

塞维里亚处在马格达莱纳省，是个只有四条街的村子。枝残叶败的老杏树下温度为 35 度。它是当地唯一没有铁路穿过的村子。这种情况使它与其它村子不同，矮小昏暗的木板和铁皮屋顶的房子聚集在一望无际的整整齐齐的香蕉园正中。

在塞维里亚村有一家露天电影院，门口有一棵大树。村政府前也有一棵树，还有五六个小卖部（在村子的街角上)。每个小卖部门前都有一棵树保佑着它。在所有树的中间是街心广场，广场的一侧是教堂。这是个巨大的建筑物。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它是国内最引人注意的东西，因为它里里外外完全是由横木板搭成的。这座教堂是塞维里亚村唯一门口没有树的房子。

这个又热又干的村子里住着那些对土地的秘密最谙熟不

过的人们。回忆起每个星期六晚上都用美元燃起篝火的那段日子，香蕉园的工人们就感到憋闷。这个小小的令人窒息的天地同卡米略神父的天地十分相似。在这里，格雷戈里奥·德赫苏斯·达维拉每天主持弥撒，每星期日和弥撒日照例讲经布道。

本月 19 日是圣约瑟节。格雷戈里奥神父平和虔诚的教民汇集到街心广场参加传统的宗教游行，可是却听说教堂的神灵不出教堂。这可是村子历史上破天荒的，这是因为有人募集了捐款一百二十比索，说是为教堂募捐，可教堂并没有收到这笔款，所以神父做了这样的安排。这简直是专断独行，是对公众信任的亵渎，而格雷戈里奥先生想简单地以不准圣约瑟像离开教堂来进行惩罚。

但事情是，像往年一样，圣约瑟像被肃穆激动的人群抬了出来。这是一次有人民而无神父参加的宗教游行，就像那次令人难忘的卡米略神父的只有神父而无人民参加的宗教游行一样。事情很简单，当时有人虔诚地抽下一块木板，于是塞维里亚村所有教民在虔诚的启发下便照着样子也纷纷从教堂墙上抽下木板来，一直到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好让圣约瑟抱着耶稣，手中拿着晚香玉的塑像能够被抬出来。

于是，3 月 19 日在塞维里亚村就举行了宗教游行，虽然自 20 日起可能会有五个老百姓被关进监牢，其罪名是违反了教区神父的意愿进行宗教游行。教会当局进行了干预，以使塞维里亚村的生活恢复往日的正常状态。但是尽管如此，格雷戈里奥也并不示弱或感到手足无措。在司法大天使

的启示下他每天讲经，看起来要讲到那 120 比索出现时为止。另外他还给报纸去信。在这些信和讲经中刑法条文和福音派格言占有同等的份量。

可是，那五位被捕的老百姓也没有示弱或感到手足无措。当他们被问到："是谁带头违反神父的规定的?"时，他们今天的回答同四个世纪以前一样："是羊泉村全体人民，老爷"。

李盛华 译

遭冷遇的乔科省

1954年9月23日，星期四，乔科省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波哥大拜见了共和国总统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中将，请求他不要签署肢解乔科省的法令。在对话进行时，在整个乔科省，从北部的阿特拉托河口到南部的圣胡安河口，人民群众已经坚持了四百小时的游行。面对强有力的民众运动，第一行政长官在部长会议里担任了乔科省的发言人，乔科省没有被肢解。三天后，总统在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发表讲话，把乔科人民树为爱国主义的榜样，他保证为乔科省举办一定数量的公益事业，并答应去乔科省巡视。自1953年6月13日就职以来，只剩下乔科省他没有巡访了。

从总统在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发表讲话，答应访问乔科省，保证在全国最偏僻的省份建立一条复杂的通讯系统，迄今已过去了六个月。从在聚集在广场上的基夫多市民面前隆重地签定两党的领导人休战协定以来，也过去了六个月。

二十六年的漫长历史

反对肢解运动的高潮使乔科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不能不让人想到，至少最紧急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但是那些问题并非新产生的。在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日子，德梅特里奥·巴尔德斯曾对《观察家报》发表声明：

“目前的这股热情由来已久。到明天，即9月23日，现在我们这几个为避免乔科被支解、为了帮助它进步而进行斗争的人签署给当时的共和国总统米格尔·阿巴迪亚·门德斯博士的、关于我们省的困难和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备忘录将整整26年了。

“在那份备忘录中，关于基本建设项目我们提出，乔科省需要修建索拉诺湾码头，修建基夫多——索拉诺湾公路，修建博隆博洛——基夫多公路和普埃夫洛里科——塔多公路，直到使它们同基夫多——索拉诺湾公路和卡塔戈——诺维塔谷公路衔接起来。

“这一次，”巴尔德斯博士接着说，“作为回答，乔科省的发言人收到一封由总统的私人秘书签署的便笺，便笺上说，总统已充分注意到备忘录的重要性。”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

就在给阿巴迪亚·门德斯博士的备忘录签署26周年的那

一天，基夫多的乔科行动委员会和波罗大的乔科行动委员会一致要求国家政府修筑在备忘录中向阿巴迪亚·门德斯博士提出的那些公路。因为在26年间一块石头也没有铺。

从这一天起，在乔科省公益事业的光秃而漫长的历史上开始计算一个新的周年。时间过去了六个月，一块石头也还没有铺，共和国总统也还没有去乔科巡视，对9月23日两党签署的政治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一分钱也不给乔科

莱奥波尔迪诺·马查多博士刚刚给全国的乔科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写了一封具有见证意义的长信，他在信中对9月事件后政府的冷淡态度做了令人不安的披露。”目前，“马查多博士说，“不存在任何旨在满足乔科省人民的任何要求的趋向，或保留和改善现有的少数工程的趋向。新近，负责实施城市发展计划的办公厅及其对麦德林市办公处的领导职能已经取消。”

政府严重失职

这封信中包括一份令人震惊的材料。即：“由于缺乏地方，今年一些学校已关门；由于缺乏资金，所谓的保健中心都将消失或不能尽其职责。”材料还说，“一直向农民提供的、稻谷脱粒方面的服务已经撤消。”

由于政府如此严重的失职，乔科省的经济状况非常令人不安。对商家税收的额度巨增，因为省政府和市政府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满足公益事业的需要。乔科省的农民纷纷流向巴拿马。

胡拉多还存在吗？

三个月前，大海把胡拉多从地图上抹去了。胡拉多是乔科省位于同巴拿马的边界上的一个贫困村庄。那里没有任何公益事业。邮件是由某个愿意帮忙的游客带来的。胡拉多的一名游客给基夫多市带来消息说，那个村子就要被大海吞没了。基夫多把这个惊人的消息报告政府。得知这个确实的、令人绝望的惊人消息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目前在哥伦比亚，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胡拉多在二十四小时前是否还存在，或者在三个月前是否已被大海从地图上抹去。

胡拉多的消失是乔科省的预兆。乔科是一个产生有影响的人物的省份。这些人物在以往的任何制度下都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但是二十六年以来，它一直需要一系列工程，从阿巴迪亚·门德斯执政以来却连一座桥——不可缺少的塞塔吉桥——也没有架设。

斗争的方案

为了重新展开斗争，莱奥波尔迪诺·马查多博士致乔科

行动委员会的信最后提出下列各点供大家讨论：

一、请共和国总统先生召见，以便向他重伸乔科人民在该省的某个重要地方：基夫多、伊斯特米纳、索拉诺或阿坎迪求见他的强烈愿望；

二、如果可能的话，应趁总统来访的机会在基夫多或伊斯特米纳召开乔科省各界重要人士会议，从佛朗西斯科·何塞·恰乌斯、埃利塞奥·阿兰戈和阿尔瓦雷斯·德尔·皮诺等最著名的人物到离开家乡的普通教师，不遗漏任何一位分散在全国各地为乔科省增光的从业人员；

三、趁总统先生来访和地方代表大会召开的机会，特邀全国的报社领导人来乔科省；

四、指任一个名人委员会，从现在起负责起草一份概述乔科省需要挽救和改进的紧急事务的备忘录；

五、委托我们两党的两位最杰出的人物，在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儿女和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向国家的首席行政长官平静地表达我们的爱国要求。

关于莱奥波尔迪诺·马查多博士在上述信件中提到的一切，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乔科省杰出的政治首脑巴洛伊斯·阿尔塞今天早晨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不相信目前政府会为乔科省做什么事情。”

哥伦比亚不承认的乔科

今天重建基夫多城，将花费和二百年前同样多的劳动。只有三条道路通到那里。尽管时代不同，有了进步和技术，但是最省力、最可行和最安全的道路还是阿特拉托河。运送货物的小巧而谨慎的机动船，经过八天的旅行，就能从卡塔赫纳到达基夫多。基夫多没有飞机场：飞机的降落跑道是阿特拉托河，一架水上飞机每周在河上停泊两次。这种飞机，不只一个理由可以说它像搜寻塔尔桑[①] 的远征飞机。乘飞机空中旅行去那里，和坐阿特拉托河上的机动船去那里，两者的条件相差无几。船上装载着做笤帚用的大包大包的纤维、食品和纺织品。当那架飞机穿过暴雨时——这种情况每次旅行都可能发生，因为在乔科一年有三百六十天下雨

① 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伯勒斯（1875—1950）笔下的主人公。

——，雨水会从机身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八百英尺的高空中会有一种沉船的感觉。然而，那是一座救人的空中桥，飞行员有着和最早的移民一样勇敢无畏的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桥，从波哥大去基夫多最合理的途径是首先到卡塔赫纳。

前所未有的冒险

地图上绘有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公里的公路，那纯粹是制图者的推测：从麦德林到基夫多。顺着这条公路旅行等于坐着装满货物和牲畜的车子遭受二十二小时痛苦而疲惫的旅程。像阿特拉托河和几乎全部乔科省的河流和村镇一样，那条公路与其说实际存在毋宁说在理论上才存在，它只允许一个方向通行，是一条笼罩着金黄色尘土的土路。在它的某些地方，尤其是距离基夫多九公里的“拉·普拉蒂那”，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里挖了一条沟，无限期地开采金矿。由于这些原因，一个世纪以来，去乔科一直是一种有点神奇的、甚至有待认识的冒险行动。

丛林中的城市

为了清楚地理解近几个星期乔科省发生的事情，首先必须知道如何到达基夫多。基夫多的教堂没有盖完，用马口铁进行了修补，它的城市公园破烂不堪，像地震造成的废墟。基夫多是一个有着文明、好客、温和的居民的城市，但是却

像丛林中央的一个营地。它那榫接的、盖满灰尘的房舍，有白铁皮的屋顶，千篇一律都是二层；石铺的马路弯弯曲曲；人们穿着白衣服，胳臂上必不可少地挂着一把雨伞。这一切不由得让人想到：在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基夫多，而是一个非洲村落。在中央大街阴暗的商店里——一条和阿特拉托河平行的商业街——，商品都摆在街门口，在街门前销售，一是因为商店都没有橱窗，二是因为在营业时间里城市背荫处的气温也高达 35 度。在那里出售的哥伦比亚商品像舶来品。

第一条新闻

基夫多有一万六千人。这一万六千人像所有的乔科省人一样，在他们的丛林围栅里只会以他们在每天考虑同一件事的习惯中养成的细心和深刻性牢记造成他们的领土与世隔绝的严重问题。部门的查帐人、擦皮鞋的人和在饭店里服务的小黑女人，用不同的言语、但用相同的论据解释乔科停滞不前的原因。

若干年前乔科人就要求修一条公路。不管公路通到哪里，只要打破丛林的包围就行。可以通到索拉诺海湾，以便在远离基夫多一百公里的太平洋岸边建一座港口。可以通到库皮卡，那里有一片野甜橙林，一个世纪以前就腐烂了，因为没有办法把甜橙运出去。可以通到麦德林或者日本。但是不管怎样，乔科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打破他们的封闭状态，他

们在议会里、在部长会议上、在报纸上、活页上和咖啡店桌上发出呼吁。一个时期以来，他设法建立一个短波电台，通过无线电提出要求。由于没有钱建电台，他们便在主要街道上安装了一系列扬声器，整天播送新闻、民间乐曲，一有机会就播放一篇讲话。讲话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坚持不懈地要求中央政府改变乔科的封闭状态。然而在18天前，通过扬声器系统宣读广告的那个职业广播员却向基夫多的居民预告说，他们多年来要求修的公路不修了，当局要干的恰恰相反：乔科将被大笔一挥分割为小块，被瓜分。

火灾发生的时刻

消息于晚上七点半传遍了基夫多。正是人们收听波哥大的新闻广播的时刻，也是火灾发生的时刻。听见警报声时，知道自家的房子是用木柴盖的基夫多居民提着水桶和马口铁容器迅速跑去和人数少却效率高的消防队一起灭火。全城的居民是通过主要街道上的扬声器得知火灾消息的。一连十三天，他们在街上唱歌，听演说，挥动哥伦比亚国旗和旧圣玛丽亚省雀旗，后者也是乔科省旗。在这十三天中，至少有九天不停地下雨。

只有很少的乔科人知道他们的感人的运动被封锁了一个多星期。在报纸记者用充斥着爱国文学的小册子轰炸国家的头几天，没有人前往乔科，也没有人离开乔科。人们根据乔科人传播的消息得知，人民拥向街头，连日降雨，尽管如

此，演说仍在进行。人们还知道。游行的人在哭泣，写了请愿书，在大街上洗漱，政府做出了肢解乔科的计划。但是运动的真正规模、参加运动的人的心情，人们却一无所知。在国家的其他地区，谁也不知道乔科在打破封锁的运动中正在起草独立文件。

没有发生一起事件

然而，在乔科，了解乔科人的人，和乔科人一起生活过的人，深刻了解他们的运动的人，一定认为他们的独立宣言很可能根本没有产生。在四百个小时的持久游行中，没有听到他们喊一声反对哥伦比亚或反对哥伦比亚政府的口号，没有听到一句反对任何人的口号。游行队伍在不带武器的警察监视下前进，在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暴力事件。直到昨天为止，在乔科发生的唯一的流血事件，唯一的意外事件，唯一的治安事件——的的确确是唯一的——，是发生在卡门·德尔·阿特拉托的杀人案，其原因，看来完全是由于个人恩怨。

如果这些结果是由于人民的冷静和乔科行动委员会一次又一次谨慎的请求，那就应该承认，问题几乎完全是政府的态度造成的。在近些年、也许比估计的时间还要长的本国的全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如此容易演变成公众流血事件的局势。只要发出一声仇视的叫喊，只要当局采取一项不谨慎的措施，这场广泛的民众斗争就会变成一场流血事件。

还要谨慎些

直到上星期二，乔科一直由一位乔科的省长治理。当省长退隐、一位军人——在全省深受敬重——被任命为新省长时，这项任命被认为是为签署肢解命令而做的一项谨慎准备工作。当新省长走马上任时，三天前共和国总统就写好了托凯马宣言，似乎是最后的。基夫多市民没有参加新省长的就职仪式，但是也没有采取任何敌视的举动。当最高法院院长发表他的新省长就职演说时，在两个街区那边，几位即兴演说者在三千民众面前欢迎《观察家》报的代表团，这是踏上乔科大地的第一个记者代表团。在这天下午，为了完成 300 个小时的持久游行，游行队伍开始在城市的街头游行，走的是往常的路线。在前进中，改变了路线，免得让新省长认为游行队伍从他的官邸门前经过是一种敌视的表现，尽管一连十天都从那里经过。

瘫痪的城市

那天下午，省政府分裂的危机发生了。省政府的成员们面临着困难的局面：他们不能接受新的任命，因为被任命者是乔科省人；他们又不能拒绝，因为他们想竭力避免新省长把这种态度视为挑战。困境通过事实得到解决：两天后，得知肢解乔科的计划已撤销，省政府的成员们坚持他们的辞职

要求，于是乔科新成员开始和新省长合作。

鉴于这一切，可以认为，乔科的独立宣言始终没有产生，那怕在该省被一下子肢解的情况下。无论游行的群众还是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上星期二都现出队伍因遇挫而分裂的迹象。商业活动中断，小学、师范和中学的学生，和成年人一起走上街头，脸上显露着艰苦的日程带来的疲倦。运动中出现了懒散表现。人们同自然斗争，冒过巨大的危险，幸运的是没有产生令人难过的后果。两个星期中实际上领导乔科省的一小批人，十五天没有睡过一整夜觉，没有正常地吃过一顿饭。事实证明，尽管如此，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丧失理性和冷静。

好样的男女

虽说乔科的男人的顽强、谨慎和坚决的态度是支撑斗争的盘石，但应该承认，妇女也进行了伟大的抵抗斗争。直到上星期四，无论在基夫多还是全省其他任何一个城镇，人们都没有正常地吃过饭。工作站和街头的家事服务点的主妇们唱着一支民歌：“在乔科，人们吃沙丁鱼、海枣树和面包树……”但这是古老的故事。十五天中，谁也没有提过一条沙丁鱼，没有摘过一颗海枣，也没有吃过一个面包。在斗争的关键日子里，他们吃的是罐头食品、炸大蕉和少量匆忙做的大米饭。乔科行动委员会和它周围的合作者，作为基本食品，一共吃了36筒苏打饼干。

用歌声抵抗

在乔科，和所有的热带地区一样，人们保持着从黄昏起把凳子拿到街门口聊天的习惯，一直聊到晚上九点。近几个星期，这种习惯中断了。不再在门口聊天的乔科省人关在家里练习写民歌和制订未来的计划。不可避免的是，那类聚谈往往带有密谋的气氛。由一位住在几乎和巴拿马接壤的一个乔科村庄的学校老师编的优美而悲伤的歌《乔科人的唉叹》受到人们如此持久、如此热情的传唱，斗争开始五天后，大多数最热情的歌唱者嗓子都哑了。在那些关着门的大厅里，在那种充满了炭灰和期待的气氛中，面孔憔悴的男女一直唱到天亮，看来他们能够唱到时间结束的时候。看见他们，听到他们唱歌，你会联想起墨西哥革命中传唱的《蟑螂》和《阿德丽塔》。

在那种和平的但是富有戏剧性的聚会上，大家研究了在肢解命令签署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措施：把全体乔科人的身份证收集起来，寄给共和国总统；撤回银行的资金；继续游行，直到正义使签署命令的要求落空。消极抗拒的计划无穷无尽，每天都会产生新的办法。

我们这些目击那类聚会的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乔科人民具有永远抵抗下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有力的证明是，从星期四晚上根据波哥大的新闻广播得知政府的企图发生变化后，乔科人民继续唱歌，现在唱得更起劲了，并将夜

以继日地一直唱到下一个月。目前，他们在庆祝守护神节。庆祝活动结束后，狂欢节将开始。实际上，乔科人的持久游行并没有中止。

小贝伦，一个飞速前进的城市

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我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像小贝伦的工作那么紧张、热烈和拚命。小贝伦是一座现代城市，具有世界性大都市的喧闹和混乱。它距离索加莫索城七公里，位于一片从事农业的辽阔平原上一条河流拐弯的地方。八年前，该城还不存在。在广阔的平原上，除了一幢殖民地时代的安满窗子的狭长住宅外没有其他建筑物。直到一个世纪前，那所宅子一直是圣奥古斯丁教派的一家修道院和一座只有一个钟楼、一个难看的小窗和一只钟的小教堂。“小贝伦”是一个只有一年一度前去朝拜的香客感兴趣的地方，近年来历史学家也对它产生了兴趣，因为据说，那里安葬着鲁克将军的尸骨。鲁克将军是爱尔兰人，在潘塔诺·德·巴尔加斯战役中，他把被砍断的一只手装在口袋儿里用另一只手继续战斗，死后“被葬在附近一家修道院里”。

树木栽上就挺拔高耸

一座城市在修道院周围成长起来。按计划城市将在来年年初建成，但是根据一项突然下达的命令，城市必须在五天内按照要求迅速结束建城工作。小贝伦比我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建设的速度都快，也许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曾像最后几天的小贝伦以那么快的速度和那么让人头晕目眩的节奏干那么多的事情。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城市的树木一开始是新栽的小树。小贝伦人行道旁的美丽树木本来也很小，但那是在许多公里外的苏瓦，是由一位日本的农艺学家培育的。后来像日本的商品一样用黄色大卡车运到了这个新城市。那些树用纸包着，用铁丝捆着，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栽在了马路旁。小贝伦新城最后的装饰也以同样的速度和同样的效果完成。小贝伦既有人类的伟大业绩的风貌，又有黑色魔幻的色彩。

到处有法国人

目前，在工作时间，小贝伦有两千人。在休息的时间，有五千人。八百辆汽车——载重大卡车、公共汽车和现代小汽车——运送着在城市周围工作的三千人：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和法国人。特别是法国人：从代价最高的专业工程师到动力生产厂强壮的、最基本的工人。

自巴黎与荷兰银行给了帕斯·德·里约工程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后，法国人就开始到小贝伦这个地方来。实际上，是法国人开始建立这个城市的，也是他们为他们目前居住的地区打上了异国的烙印，那个地区几乎占据城市郊区的一半。在那里听不到一句西班牙语。那里有一家法国餐馆，只要花二个比索就能吃到美味的法国菜。餐馆里张贴着一张用法文写的、让本国人和外国人都知道的告示："本馆服务人员尽一切可能使大多数顾客满意。在此，顾客应尽的义务和在法国的任何一家餐馆一样。"

法国人的个性依然如故

小贝伦的法国人的个性并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改变一丝一毫。为了和不愿费力学法语的哥伦比亚人沟通，他们学会了西班牙语。但是在他们自己住的地区内，他们完全像住在法国一样生活。他们喝酒，在发出爆裂声的炉灶旁翻阅刊登着关于法国政治的报道和评论的巴黎报纸。印度支那的和平在小贝伦像在任何一个法国外省城镇一样受到欢迎。五年过后的 7 月 14 日，在哥伦比亚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像在法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街上一样举行了庆祝活动。"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是好榜样。"阿维利亚神甫说。阿维利亚身材高大，强壮，肤色黝黑，是教区的神甫，他觉得需要用他的法语来和他那些不寻常的新教民沟通。同样，学校的老师也这样做。那位老师是一个热心的波帕扬市人，他用他的语言给一

群顽皮的法国孩子上课。

它是哥伦比亚城市吗?

从它的意外出现，从它的巨大活力，从它那种实施某种重大的、只有以顽强精神才可能实现的想法的方式来看，小贝伦不像一个哥伦比亚城市。除了健身房里那些永恒不变的标语“打倒哥特人”、“打倒自由派强盗”外，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和我国的其他城市相同。另一方面——在一个没有时间谈论政治的城市里——，小贝伦像一个外国城镇，因为它有一家自动化娱乐场，在那里，两个小时可以提供上千人用的午餐，工作效率极高；还因为它有一座奇大无比的高炉，五天后它将开始生产十二万吨钢铁。

这一切开始于 1942 年，有一天工程师奥林波·加利奥带着一个消息来到工业发展研究院。消息虽不新鲜，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完全证实。消息说，在博亚卡省帕斯·德·里约市方圆几十里的阿奇拉斯大庄园里，埋藏着十分丰富的铁矿，在那里完全可以建造一座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钢铁厂。在此之前的 1938 年，博亚卡省议会曾讲过此事，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政府将尽快通过一个由矿产方面的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着手对那座铁矿的地理位置、地质情况和岩石结构进行研究。矿藏的主脉始于贝特伊蒂瓦市的科斯瓜峡谷，然后沿着帕斯·德·里约市的科拉科特、索亚巴加、萨利特雷、迪瓦里

亚和奇塔科戈区伸展，最后在本省的萨蒂瓦苏尔辖区结束。”

直到1945年，阿尔贝托·列拉斯·卡马戈博士的政府才采取一项有效措施，这就是为帕斯·德·里约铁矿的勘测工作提供资金而批准发行一千万比索的国债。

非把事情办成不可

然而，在后来的若干年间，人们提到帕斯·德·里约钢铁厂时，总认为那是一种美丽的疯狂举动。所有的人更喜欢想的是政治，而不是工业。由工厂的第一任经理——现在仍然是——罗伯托·哈拉米略·费罗博士委任的第一届资助问题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计划，但是没有得到国会批准，原因很简单：因为国会闭幕了。该计划只得通过一项行政命令批准；哈拉米略·费罗博士没有别的期望，他估计，如果不采取勇敢的措施，计划恐怕得拖四十年才能实现。“此事没有必要三思。”他用常说的一句话说。不久，他根据批准的计划，争取到一笔外国的资助。凭此可在4年内建造一座钢铁厂，这简直像一个中国故事，一个永远讲不完的中国故事。从那以后，帕斯·德·里约的这位可爱的、非常积极的经理没过过一分钟的假期。最近几星期，他甚至每天坐着DC—3型舒适的新飞机从波哥大到小贝伦旅行三次。这架飞机属工厂所有，四十五分钟可以飞三百公里，但是从飞机总是听凭哈拉米略·费罗博士支配来看，它很像他个人的小汽车。

大跃进的速度

按照和经验一样的工作节奏，结束了钢铁厂的建厂工作。五天后将举行由共和国总统主持的、两千位来宾参加的落成典礼。应该四十年建成的工厂，八年就竣工了。像小贝伦这样大的、也许五十年才能建成的城市，正在由手拿能够想象的巨大油漆刷的油漆匠们迅速完成最后的工作。他们拿着在巨大的漆桶里蘸满油漆的巨大鬃刷油漆着一幢五十米的大楼。工人们在半天内铺完一条街，垒完一道水泥围墙，栽完高二米的树。这是每天将生产五百吨铁的城市的自然节奏。

高炉——一个庞然大物

任何人都会问，七千人、两条铁路、八百辆车和一个经理，都在干什么事情。经理，也许是一天到晚为了一件巨大而复杂的、然而在小贝伦、在城市的复杂结构内看来又是渺小而简单的东西即高炉乘飞机旅行次数最多的人。总而言之，高炉不过是每天炼五百吨铁的一口复杂的大锅。关于它，人们已经谈了许多，所缺的只是，还没有为它写一首诗。五天后，它很可能成为全国拍摄次数最多的设施。因为直到现在，小贝伦最重要的东西——尽管有紧张的活动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帕斯·德·里约铁矿——就是高炉，它像一座星

际间的钢铁大教堂，但是它却有一个女人的名字：“艾伦娜”。这是帕斯·德·里约钢铁厂的经理的美丽而热诚的妻子的芳名，为的是纪念她这个被取作国家的第一座高炉的名字的人。

从小别针到火车头

巨大的钢铁厂中那件最昂贵、最可敬的怪物也许是未来最罕见的东西。四天前第一次点火，可能在未来的五十年间不会熄灭。在一个有着十八度的理想气温的城市里，参观者就喜欢观看高炉以地狱般的高温炼铁的情景。但是它将成为各种铁器的源泉。那些铁器也许会乘坐打着“帕斯·德·里约钢铁有限公司”钢印的黄色大卡车游遍全国和全世界，就像现在在小贝伦的马路上迅速运行一样。

在生产一颗铁钉之前，这家企业的活动就已开始影响国家的经济。在离小贝伦最近的索加莫索城，一个单人房间，几年前的月租仅为七个比索，如今却上升到五十个比索。索加莫索人的生活费用正在以这个比例增长。索加莫索的主要市场上经常出售产羊毛的羊和农产品，也许几年后它会成为一个销售钢铁产品——从小别针到火车头——的大市场。

丰蒂蓬与波哥大

波哥大没有跑马场，也没有飞机场。但是博莎却有国家最好的飞机场，四通八达的国内和国际航线每天运来全世界的旅客。旅客们愉快地微笑，热情地致意，确信到达了穿越蓝天的终点。满怀希望参加星期日下午跑马的竞争者也产生同样的错觉，以为他们来到了波哥大跑马场，而实际上，他们所到的是丰蒂蓬城跑马场，该城既没有渡槽、石铺街道，也没有下水道和公园，但是它有国家最好的跑马场。

既近又远

有一些城镇，其最大的优越性是离共和国首都很近。但是丰蒂蓬的问题是离首都太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近，近到了极点：几年前去一趟丰蒂蓬是周末的一个大问题，而今天，却不清楚首都的郊区到哪里结束，那个重要的小城又从

哪里开始。人们都说，丰蒂蓬“是离波哥大最远的城区”。

当来到丰蒂蓬时，首都的房舍还看得见。而这座小城，虽然拥有漂亮的砖瓦房和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是它的街道狭长，泥泞，难以通行。“最高时速，十五公里”，政府钉在路灯柱上的牌子上写着。这样的牌子有没有都行：因为在丰蒂蓬，由于街道状况差，实际上车辆一小时行驶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十五公里。

全是理论上的

尽管那里有一位市长、一位代理人和一系列市政职员，实际上市政并不存在。所谓的“波哥大的一个城区”似乎不错，但是它同样不存在。在丰蒂蓬的居民中，只有很少的人是该城的人。当堂贡萨洛·希门内斯·德·克萨达[①] 来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小城就已存在。如今出现在泥泞街道两边的小巧玲珑的房舍住的都是来自全国的人。几年前，大西洋海岸边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的先辈曾根据首都的经验劝告他们预防肺炎——到丰蒂蓬来住了七十二小时，以便适应首都的气候环境。但是，丰蒂蓬的气候和首都波哥大的气候一模一样。

---

① 西班牙征服者（1500—1579）。

两个地方差不多

就像适应气候环境的神话一样，丰蒂蓬也产生了生活消费水平低的神话。“住在丰蒂蓬跟住在波哥大一样，但是生活费用低。”人们说。在全国的家庭中，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在首都工作，但是由于薪水太低，不敢在首都定居，只好住在丰蒂蓬。只有在丰蒂蓬出生和长大的居民才开始意识到，首都和相邻的小城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一个鸡蛋的价钱在首都的尼埃维斯集市和在丰蒂蓬市场一样。所以，最后迁居到波哥大比继续住在一个和大城市消费相同但不那么舒适的小城要好得多。

结果是，丰蒂蓬的大多数人都迁到波哥大去了，丰蒂蓬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外地人过多的小城。这个小城的百分之八十的家长每天早晨花八角钱乘公共汽车去波哥大上班，好像进城去打工，不过，吃午饭的时候不回来，因为他们仍然认为是从一个城市去了另一个城市。

破败的村镇

在丰蒂蓬的街道上行走，可以发现，这个小城的特点已经丧失。位于市中心的公园，不像公园，更像一个破败的街区。在铁路旁有一幢有四个门的小平房。第一个门是一家肉铺；第二个门是一家殡仪馆；第三个门是理发店；最后一个

门是饭馆，门前有一个跳房子的场地。仿佛整个小城，古老而美丽的丰蒂蓬就是这幢房子，它的四个门浓缩了小城全部美丽的、已经消亡的地方风尚。

丰蒂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乡土味儿。历史消失了，包括那段新近的过去的历史。那时，在波哥大乘维克托里亚街车去丰蒂蓬的美丽客栈吃土豆和烤肉，是一种奢侈。曾经十分兴隆的大饭店的生意如今每况愈下，去乡下的人谁也不会在那里落脚吃饭，因为这和特意开车去波哥大某个城区吃饭一样愚蠢。

两个地方的钟

就像由于时代的进步所有的美国村镇被夷平一样，乡下的丰蒂蓬也只剩下了教堂。那是殖民地时代的一座教堂，它是一座牢固的石砌建筑，它有一只随着波哥大圣佛朗西斯科钟楼时钟的节奏准确走动的钟。对丰蒂蓬的时间，大多数居民不感兴趣。如果丰蒂蓬的时间和波哥大市中心的时间不同，他们就更不关心了。住在丰蒂蓬的人知道，要想上班不迟到，就必须听从圣佛朗西斯科的钟声，尽管小城教堂的钟坚持按不同的时刻打点。

圣佩德罗·克拉维尔曾在此居住

教堂的院子里，有一座圆形花园，花园中央有一眼石

泉。神甫的美丽的白房子在教堂旁边。房子低矮，阴暗，有绿色的窗子，有一个用瓷砖铺砌的寂静的小院子。那里躲藏着过去。在那幢房子和对面的人行道之间，在时间上相距遥远。它那些墨守成规的居民似乎不记得丰蒂蓬的历史并不是波哥大的历史。然而，应该读一读神甫的房子的石头上刻的字："圣佩德罗·克拉维尔[①] 曾在此居住"。的确，他曾于1610年在那里居住。那时房子是耶稣会的修道院，仆人的仆人[②] 刚刚入教。

问题的关键

有人说过，哥伦比亚的每个小城拥有16000居民，从这个方面讲，丰蒂蓬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拥有16000人的符合规定的小城。不过，这是相当可能的：倘若离波哥大再远些，它一定会像同级的城镇一样有渡槽。然而，丰蒂蓬离共和国首都太近了，它的公共汽车上钉着波哥大的牌子，这些车辆每天运送它的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丰蒂蓬却一分钱也捞不着。

一个时期以前，和城市发展局签定了修建渡槽的合同。丰蒂蓬应提供六十万比塞塔，以便使工程得以完成。但是该市预算仅三十七万比塞塔。如果丰蒂蓬决定成为波哥大的一个区，它就不一定要渡槽了。无疑，这是更可能的事。

---

① 西班牙耶稣会员（1580—1654）。

② 指克拉维尔。

人生轶事

重返阿拉卡塔卡

我母亲要我陪她去卖老家的房子。那天早晨，她从家庭所住的遥远的镇子赶来，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我。她在熟人中间问来问去，人们指给她说，可以到世界书店或到附近的咖啡馆里去找我，因为每天下午一点和六点我总去那些地方和我的作家朋友们交谈。对她说这话的人提醒她说："你去那里要留神，因为他们都是缠人的疯子。"她十二点整到来，她迈着轻快的步子从陈列图书的台子中间穿过，走到我面前站住，面带她年轻时代的笑容望着我的眼睛，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对我说：

"我是你母亲。"

她变得叫我一眼认不出来了。她已经四十五岁，我们四年没有见面了。算起来，她一共分娩十一次，怀孕的时间几乎有十年，至少还有十年花在了教养儿女上。她的头发已过早地全白了。她戴着一付双光眼镜，眼睛显得更大了，更无

神了。她母亲刚刚去世，她穿着一身严肃的丧服。但是不管怎样，她依然保持着她的结婚照上的罗马女人般的美丽容貌，只是现在多了几分贵妇的气质。她还没有拥抱我，便直截了当地、像往常那样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我来求你帮个忙，陪我去把房子卖掉。”

她用不着说卖什么房子，房子在哪里，因为对我们来说，世界上只有一处房子：阿拉卡塔卡我外祖父母的那处老房子，我很幸运地出生在那里，快满八岁时我离开了那里，再也没有回去过。当时我刚刚离开大学法律系，我学习了六个学期，把时间全部用于了阅读和背诵西班牙黄金世纪的不可重复的诗。那时我阅读了翻译的和翻版的、足以使我掌握讲故事的技巧的一切书，并已在报纸的增刊上发表了4篇故事，那些故事引起了我的朋友们的兴趣和若干批评家的关注。下个月我就要满二十三岁，躲过了服兵役，患过两次淋病，每天都要毫无顾忌地吸六十支用粗烟丝卷的烟。我在巴兰基利亚和卡塔赫纳以及哥伦比亚加勒比岸边改换着种种恶习，用我写的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挣的钱十分自在地生活，而那点钱几乎等于零。夜晚无论在哪里，我总是尽可能找个伴睡觉。与其说由于爱好，不如说由于贫困：二十岁我就追求时髦了：胡髭不修理，头发乱蓬蓬，穿着牛仔裤、大花衬衫和旅行用的凉鞋。在一家阴暗的电影院里，那时的一位女友不知道我就坐在附近，对某个人说：“可怜的加维托[1] 算玩

---

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称。

儿完了。”所以，当我母亲要我陪她去卖房子时，我便毫不犹豫地对她说“行”。她对我说，她的钱不多。我自豪地回答说，我的花费我自己付。靠报纸生活是困难的。每天写一篇按语，只付给我三个比索，写社论的人不在时我写一篇社论给四个比索，但是几乎不够我花。我想借点钱，但是经理提醒我说，我写一百条按语也还不清欠款。那个下午，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的朋友们谁也不会那么做。从紧靠书店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出来，我和老导师、卡塔卢尼亚书店老板堂拉蒙·宾耶斯一块走，我向他借十比索，他只有六个。

当然，无论我母亲还是我，都根本想象不到，那次只有两天的单纯旅行对我竟具有那么决定性的意义，生命再长再勤奋也不够我用来讲故事的。如今，我十分谨慎地活了七十多岁后，终于明白那是我在我的全部作家生涯即我的整个生命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自从十四年前我外祖父去世、我被送到巴兰基利亚和父母一起生活后，我没有再回阿拉卡塔卡。直到少年时代，人的记忆都更喜欢将来，而不是过去，所以我对故乡小镇的回忆还没有借助怀念变得完美起来。我记得它是这样的：一个有利于生活的好地方，在那里能够了解全世界，小镇位于一条河边，河水清澈，奔流而下，河床由史前的那么光滑、洁白、巨大的卵石铺成。傍晚，特别是在12月间，当雨过天晴，天空像宝石一般透明，圣玛尔塔的雪山仿佛带着它的白色峰顶走到了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可以望见当地的印第安人像蚂蚁一般排着队，沿着山路奔跑，他们背着大口袋生

姜，嘴里嚼着可可球，为的是让生命富有活力。那时，我们这些孩童总幻想用终年不化的白雪滚雪球，在炎热的街头玩打仗的游戏。天气热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在午睡时刻，成年人叫苦连天，好像每天都热得让人意想不到。自打我出世的时候起，我就听见人们不疲倦地说，铁路和联合果品公司都是夜间建造的，因为白天不能握被太阳晒得烫手的工具。

从巴兰基利亚到达阿拉卡塔卡的唯一办法是搭乘乱糟糟的机动小客轮沿着殖民地时期让奴隶挖的河道航行，然后穿过一片水质浑浊、凄凉不堪的沼泽地，直到神秘的西埃纳加小城。在那里登上普通客车。刚有火车时，它是全国最先进的东西。坐着火车可以沿着广大的香蕉种植区完成最后的旅程，在每个尘土飞扬、酷热难忍的村庄都要懒洋洋地停一停，车站荒凉不堪。这就是 1950 年 2 月 19 日——狂欢节期间的星期天——我和我母亲所走的路，那是晚上七点钟，下着不合时令的大雨，身上带着三十二个比索，如果房子不能照预想的条件卖掉，这些钱勉强够我们回家用的。

那个夜晚，信风那么猛烈，在码头上我费了许多口舌劝母亲搭船。她是对的。那些船只都是新奥尔良的轮船的不高明的仿制品，不过，用的是柴油发动机，机器一发动便弄得全船上的东西振动得令人难受。船上有小客厅，厅内的柱子上高高低低地挂着吊床。船上还有木制靠背长椅，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过重的行李、货包或鸡笼甚至活猪筐子，肩挨肩地靠在一起，尽可能舒服地坐着。有几间令人窒息的客舱，每个客舱有两张行军床，床铺几乎总被卑贱的妓女们占据。

她们在旅途中为人提供紧迫的服务。由于最后没找到一个空床位，也没有带吊床，我和母亲便从中心通道搬来两把铁椅子，准备这样过夜。

还像她担心的那样，在横越马格达莱纳河时，暴雨抽打着船只。在距离河滩没几步的水面上，河水像大海一样翻腾。我在码头上买了不少最便宜的香烟，香烟卷的是黑烟丝，烟纸几乎像破布一样，我用那时我的方式吸起烟来：用剩下的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一面吸烟一面读威廉姆·海明威的《八月之光》。海明威是我最得力的守护神。我母亲紧紧地抓着她的念珠，那念珠好像一台绞车的钢索，可以吊起一台压路机或者能够让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按照她的习惯，她不为自己祈求任何东西，而只为她的十一个孤儿祈求顺利和长命。她的祈求肯定能如愿以偿，因为当我们进入港湾时雨下小了，风也几乎像吹跑蚊子的微风了。于是，我母亲把念珠收藏起来，好一阵子默默地观望着我们周围的喧闹生活。

她出生在一个朴实的家中，但是适逢香蕉公司短期的繁荣时期。在那个时期，她至少在圣玛尔塔的圣母献堂瞻礼学校受到了富家小姐的良好教育。在圣诞节假期里，她和女友们用绷子刺绣，在施舍穷人的市场上弹拨弦古钢琴，和她的一位姨妈参加当地畏神的贵族的最纯洁的舞会。但是当她违背父母的意志和镇上的一名报务员结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男朋友。从那时起，她最引人注目的美德是幽默感和钢铁般硬朗的体魄，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多灾多难、陷阱

重重的生活没有把她压倒。但是最令人惊奇的、并且从那时起最无可置疑的美德是她那种过人的聪慧，她凭着这种聪慧成功掩盖了她那种咄咄逼人的性格。她是一个完美的狮子宫。这使她得以确立一位女家长的权威，其权威甚至达到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的最遥远的亲戚那里，就像一个行星系，她在厨房里用很小的声音、几乎不眨眼睛地掌握着，同时望着煮菜豆的小锅沸滚。

瞧着她不动声色地经受那番让人苦不堪言的旅行，我不禁自问，她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有本领地把不合理的贫困踩在脚下。什么事情也不如那个恶劣的夜晚对她的考验大。吸人血的蚊虫，难忍的酷热，船只经过时翻搅起来的泥水的臭味，不得安歇而失眠的旅客的来来往往，一切的一切，仿佛故意用来搅扰受过良好锻炼的性格。我母亲坐在椅子上承受着，一动也不动，与此同时，收租金的姑娘们在附近的客舱里进行着夜间的收获。有一个姑娘从她的客舱里出出进进好几次，每次都带着一个不同的男人，他们就从我母亲的椅子旁边走过。我想，她准没看见她。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她第四五次带着男人进出的时候，我母亲用惋惜的目光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通道尽头。

"这些可怜的姑娘，"母亲叹了口气。"为了生活，她们被迫做的事情比打工还糟糕。"

我母亲就这样坐到半夜。在通道的暗淡灯光下我不安地颤抖着看小说也感到累了，便坐在母亲身边吸烟，竭力想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伯爵领地的滚沙中逃出来。一年前我从大

学里开小差，大胆地幻想靠报纸和文学谋生，无需再回学校学习。我那样做，我想是受了肖伯纳这句话的影响："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中断了我在学校受的教育。"我没有勇气和任何人讨论此事，因为这种事解释不清，我觉得我的道理仅仅对我自己讲得通。

当我父母已把那么多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并且花了那么多他们并没有的钱，我试图说服他们相信那种失常的举动为时已晚。特别是我父亲，他原谅了我，除了没有把他未能够有的任何毕业证书挂在墙上。联系没有中断。差不多过了一年后，当我母亲赶来要我陪她去卖房子时，我仍然想去看望他，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但是直到在船上过了半夜后她才提起这件事，当时我觉得仿佛是神使鬼差，她终于找到了把事情告诉我的合适机会，而此事无疑是她来找我的真正目的。于是她用肯定在开始旅行以前很久就考虑好的方式、语气和简短的话语说：

"你爸爸很难过。"她对我说。

如此可怕的地狱就在这里。她像往常一样开始讲话，让人意想不到，声音那么平静，面对任何事情也不会改变。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因为她非常清楚我的回答。我问道：

"为什么？"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我没有放弃，"我说。"只是改变了一下。"

好好争论一番的想法提起了她的精神。"你父亲说反正一样"，她说。父亲那样说显然不诚实，我说："他也放弃过

学业改弹小提琴吆。”“不一样”，她反驳说，语气特别有力。“他只是在节日和奏小夜曲时才弹小提琴。他放弃学业是因为实际上他连饭也吃不上了。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就学会了发电报，在当时这种职业非常好，尤其是在卡塔卡。”

“我也是为谋生才为报纸写东西的。”我对她撒谎说。

“你这么说是为了不伤我的心。”她说。“但是你的境况不好，很远就看出来了。在书店里看见你，我都认不得了。”

“我也没有认出你来。”我说。

“但是原因不一样，”她说。“我以为你当了叫化子了。”她瞧了一眼我的破凉鞋，加了一句：“你没有穿袜子。”

“这样更舒服，”我说。“我有两件衬衫，两条短裤：一件穿着，一件凉着。还需要什么呢？”

“还要有一点尊严。”她说。但是，她这样说肯定欠考虑，因为她立刻用缓和的语气说：“我这么对你说，是因为我们太爱你了。”

“我知道，”我说。“不过，告诉我一件事：如果你是我，你不会这样做吗？”

“不会，”她说，“倘若这会让我的父母不高兴的话。”

我想起她为了结婚而顽强地战胜了父母的意志一事，便笑着对她说：“你大胆地看看我。”但是她严肃地躲着我，因为她相当清楚我在想什么。

“得不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不会结婚。”她说。“我迫使他们同意了，是的，但是我得到了祝福”。

她中断了争论，不是因为我用道理说服了她，而是因为

她想去厕所，但她不相信厕所的卫生条件。我问水手长，是不是有比较卫生的地方。但是他解释说，他自己也用公共厕所。仿佛他刚读过康拉德的著作，最后说："在海上，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我母亲只好屈服于公共法则。当她走出厕所时，和我担心的相反，她几乎克制不住地笑起来。

"你想想看，"她说。"如果我被折磨得生了病回到家，你父亲会怎么想啊？"

半夜过后，我们耽搁了三个小时，因为排水管道的堵塞物绊住了螺旋桨，驾驶员失去了控制，船在那片丛林里搁了浅，许多乘客不得不在岸上用吊床的牵绳用力拖。炎热的天气和蚊子让人不堪忍受，但是我母亲用一阵阵断断续续的磕睡对付着。她打磕睡在家里是有名的，这使她既得到了休息又不错失聊天的话头。当旅行重新开始、凉风吹进来时，她完全清醒了。

"不管怎样，"她叹了一口气，"我总得带给你父亲一个答案。"

"最好你不要操心"，我照样用无辜的口吻说。"我 12 月份去他那里，到时候我彻底给他做解释。"

"还有十个月哪，"她说。

"总之，今年在大学里已经什么也干不了啦"，我说。

"你保证一定回去吗？"

"我保证。"

我第一次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些许焦急的心情。

"我可以告诉你爸爸说，你将对他说你答应了他吗？"

“不，”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行。”

显然，她想找另一个解决办法。但是我没有给她机会。

“这样的话，最好就是我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她说。“这样，就不像是说谎了。”

“好的，”我说。“就这么对他说吧。”

我们就谈到这儿，不了解她的人一定会认为一切就此结束了。但是我明白，这是一次休战，以便养精蓄锐。过了一会儿，她睡着了。一阵微风赶跑了蚊子，使新的空气充满了花香。这时船儿显得像帆船一般苗条。

我们已经来到西埃纳加·格兰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神话。我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带我从阿拉卡塔卡去巴兰基利亚看我父母时，曾坐船几次路过这里。“对西埃纳加不必害怕，但要尊重”，在提到关于它的河水的意想不到的脾气时，他对我说。它的河水的活动既像一座池塘，也像一片不驯服的海洋。在雨季，它受着山上的暴雨的支配。从 12 月到 4 月，当天气应该平静时，信风却那么猛烈地吹打它，每晚都像是一场冒险。在经过一次可怕的旅行——人们必须寻找避风处，直到躲在一条河的入海口等到天亮——后，我外祖母特兰基利娜·伊瓜兰不敢冒险过河，除非情况万分紧急。

所幸的是，那个夜晚风平浪静。从船头的窗口望去——天亮前我曾去那里换了一会儿空气——，小渔船的灯火像星斗一样浮在水上。灯光多得数不胜数。看不清的渔民们像走亲访友时那样交谈着，他们的声音像鬼叫似地回荡在黎明的

空中。我把臂肘支在栏杆上，正试图辨认山脉的轮廓，怀旧的利爪突然抓住了我。

在另一个类似的黎明，我们穿越西埃纳加·格兰德时，我外祖母让我睡着了，她去了酒吧间。我不知道几点钟被一片伴随生锈的通风装置的嗡嗡声和客舱里罐头的开启声传来的众人的喧闹声惊醒。当时我可能不超过五岁，心里觉得怕极了。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想，那可能是一个梦。那天上午，我们已到达西埃纳加码头，我外祖父在刮脸，门开着，镜子挂在门框上。我的记忆很准确：他还没有把衬衫穿上，但是他已把他那带绿条花的永恒的宽松紧背带挂在了大背心上。他一面刮脸，一面和一个男人聊天，那个人今天我一眼还能认出来。他的侧影像小羊羔，十分清晰；右手上有一块海员的纹身，脖子上挂着好几条沉重的金链子，双手的手腕上戴着也是金质的活手镯和死手镯。我刚刚穿上衣服，正坐在床上穿皮靴，这时那个人对我外祖父说：

"你不要怀疑，上校。他们想对你下手，把你扔到河里去。"

我外祖父微微一笑，没有停止刮胡子，以他独特的高傲口吻回答说：

"他们没这个胆量。"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前一天夜里那阵吵闹声是怎么回事，一想到有人要把我外祖父扔进西埃纳加河我就感到不安。那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今天我还能记起当时的全部细节，我仿佛看那些人像马夫们用毯子把桑乔·潘萨兜起来那样把

我外祖父抬起来从船舷上扔到河里去。但是当时事情一点儿也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二十年后，在我去瓜希拉城乡卖百科全书和医药图书时期，我和我舅舅埃斯特万·卡里约在里奥阿查一家客栈用午餐时，不知何故，那件事又突然准确而清晰地浮上我的脑海。当时，我外祖父已经去世。我把我记得的那件事告诉了我舅舅，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他一下跳起来，十分气愤，因为事情发生后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并且他也很焦急，他要把那个人找到，要那个人交代是谁想把他父亲淹死。我不明白的是，我外祖父为什么没有自卫，而他是一个神枪手，几乎总是带着武器，睡觉也把手枪塞在枕头下。在两次内战中，他曾多次上前线；在和平年代，他出于自卫曾杀死一个侵犯者。不管怎样，我舅舅说，他和他的众多兄弟必定惩罚侵犯行为，任何时候都不算晚。这是瓜希拉的法律：一个家庭成员受到侵犯，必须让侵犯者的全部家庭成员来偿还。我舅舅埃斯特万那般坚决，他从枕头下取出手枪，啪一声放在桌上，免得浪费时间，接着仔细向我查问当时的情形。从那以后，我们每逢在加勒比海边漂泊中相遇，他都希望我不要忘记那件事。一天晚上，他来到报社我的卧室。那个时期，我还为我的一部从未写完的第一部小说搜寻家族过去的材料。他建议我们一起对那个阴谋杀人事件进行调查。他始终没有罢休。我最后一次在卡塔赫纳·德·西印度看见他时，他已年迈，心力衰竭，痛苦地微笑着向我告别说：

“你的记忆那么差，不知你怎么会成了作家。”

然而，我和母亲去卖房子的那个黎明，对那个始终不清楚的事件的记忆却突然浮上我的脑海。那个黎明，我一面旅行一面观赏着山上那在旭日阳光下呈现蓝色的白雪。从那时直到今天，我一直沉浸在对旧事的怀念中。

在河道停留时，我们得以在大白天观赏勉强把大海和西埃纳加河分开的亮闪闪的白沙洲。渔民们在倾斜的沙滩上晒渔网，又脏又瘦的孩子们用破布做的球当足球踢。在街上看到许多渔民由于没能及时把炸药筒扔出而落得臂残手缺，让人感到不安。我们的船经过时，旅客把硬币抛给孩子们，他们跳进河里去捞。八点多钟，我们的船停在离西埃纳加城不远的一片臭哄哄的沼泽地边。一群群膝头沾满泥巴的码头工人把我们抱起来，哗啦哗啦地淌着水把我们送到码头上去。盘旋飞舞的兀鹰争夺着泥沼地里的污物垃圾。

我们不慌不忙在码头的餐桌上吃早饭，那里供应沼泽地的美味金枪鱼和油炸绿色的香蕉片。我母亲趁此机会重新发动了她个人的战争的新攻势。她坐在我旁边，没有抬眼睛，突然问我说：

“那你干脆告诉我，我该对你父亲说什么?”

我想争取时间想一想。

“关于什么?”

“关于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她说，有点生气了。“就是你的学业。”

幸运的是，一个无礼的就餐者对我们的大声谈话发生了兴趣，想知道我辍学的理由是什么。

我母亲回答得那么快，使得我不但感到有点怕，而且对她那么看重她的私生活也感到意外。

“你是想当作家。”她说。

“一个好作家能够挣大钱。”那个人认真地说，“尤其是如果和政府一起工作的话。”

不知道是出于谨慎还是害怕这个意料不到的交谈者的道理，我母亲避开了这个话题。但是最终两个人还是对我这一代人犹豫不决的态度表示了同情。末了，他们在追溯共同认识的名字时，发现我们既是科特家族也是伊瓜兰家族的亲戚。在那个时代，我们在加勒比海边遇见的人，三个有两个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总把这种事当作家族的大事而感到高兴。

我们乘坐一辆单匹马拉的维多利亚四轮马车去火车站。这种马车也许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早已灭绝的传奇式的家族留下的最后一辆。我母亲出神地望着面前那一片从码头的泥沼地开始的、被硝石烧毁的贫瘠的平原，那片平原一直延伸到天边。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外祖父领着我穿过那片炎热的荒野，步履匆匆，也不告诉我去干什么。突然，我们来到一片宽阔的、有一团团泡沫的绿水边，水面上漂着许多淹死的母鸡。

“这是海”，他对我说。

我觉得扫兴，问他对岸有什么，他毫不怀疑地回答说：“那一边没有岸。”我曾在地球的正面和反面见过那么多大洋，而今天我仍然觉得他的回答是异乎寻常的。

我不记得第一次听人提到大海是在何时，也不记得早先通过大人们讲的故事我对大海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我外祖父想在他那部开了线的乱糟糟的旧字典里把海的含义指给我看，但他没有查到。当他从不知所措中恢复正常后，用一个颇有效的解释做了弥补："有些字，字典里没有收，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它们的意思。"由于这次失败，他让人从圣玛尔塔捎来一本插图字典，书脊有一幅画着蓝色天穹的大西洋画面。这是我一生中拥有的无数字典中的第一部。我在小学里像读小说一样按照字母顺序读过它，但是并不理解。我外祖父在这本字典里找到了在那部字典里没有的海的定义："覆盖着大半个地球的广阔的咸水。"当然，如果不是我外祖父说出现在我眼前的那片水就是海，单凭这种含混的解释我永远也不知海是什么。因为我先前的任何印象都不符合那片肮脏的海水。在它布满盐碱的沙滩上，人们很难在呈铁锈色野咖啡树丛和贝壳碎片中间走路。十分可怕。

对于西埃纳加海，我母亲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从马车的小窗口一看见那片水地就叹了口气说："什么地方的海也不如里奥阿查的海。"趁此机会，我对她讲述了关于海里漂着死鸡的往事；就像所有的大人一样，她认为那是小孩子的一种幻觉。后来，她依然观赏我们路过的每个地方。从她沉默的表情的变化，我猜得出他对每个地方的想法。我们从铁路另一边的、不算坏的居民区前面经过，那里有房顶生锈的彩色小房子，有帕拉马里博的老鹦鹉，它们从挂在屋檐上的铁圈上用葡萄牙语呼唤顾客。我们从巨大的铁棚下的机车

给水处经过，棚子顶上住着候鸟和迷路的海鸥。我们从马蒂纳·丰塞卡被害的凶宅旁走过。我们绕着城市走，没有进去，但是我们望见了宽阔而凄凉的街道和古色古香的房子，房子只有一层，窗口高大，学习钢琴的声音从凌晨起不停地传出来。我母亲突然用手指一指。

“你瞧，”她对我说。”那就是世界的尽头。”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了车站：一幢用剥了皮的木头盖的大楼，大楼有两面流水的锌皮顶，有活动阳台，对面有一座荒凉的小广场，广场最多能容纳二百人。据我母亲那天所说，就在那个地方，军队于 1928 年杀死了数目从来就不详的大批香蕉工人。

这个信息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总是认为大屠杀发生在阿拉卡塔卡火车站。许多次和我外祖父去等火车的时候，总是重新经受到那个想象的时刻的恐怖情景：军官宣读把罢工工人宣布为一群歹徒的命令；三千男人、女人和孩童一动不动地站在烈日下，军官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逃离广场；开枪的命令一下，炽热的子弹嗒嗒地射出来，人群被吓得慌作一团，机枪的霰弹像大剪刀一样有条不紊、贪婪无厌地慢慢缩减着活人的数目。我外祖父肯定没有把我的不真实的记忆当作耳旁风，因为有一次在车站上我问他机枪从哪里开始射击的。他正在看一封刚收到的信，没有看我，他指着车厢顶说：“从那里。”随后读完了那封信，一面把信撕得粉碎以确保永远不会被他妻子读到，一面茫然地问我：

“关于那个事件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像实际经历的那样描绘某些事件的能力，尤其在童年时代，常常导致我的记忆混乱不清。但是任何一次记忆也不如认为屠杀发生在阿拉卡塔卡车站那么错误。然而我母亲的断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只于此：当我问她有多少人被枪杀时，她同样冷静地回答我说："七个。"但是她随即又提醒我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死，因为在屠杀那天据说有一百多人被杀，后来这个数字又缩小了，直到一个人也没有死。结果，我的记忆和事实唯一相符的只有一点：士兵们是从车厢顶上射击的。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被屠杀的人数那么少，对我想象的那么壮烈的事件来说现场又是那么平淡，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后来我跟幸存者和见证人谈过此事，并在装订成册的旧报纸和官方文件中查找过，我发现真实情况不在任何人一边。但是我母亲的说法可能性更大。事实上，拥护政府的人说，没有人被杀；极端的反对派用毫不颤抖的声调肯定说，被杀死的人多达百人以上，他们亲眼看见伤亡者在广场流血，并把死者抬到一列货车上，像烂香蕉一样把他们抛到海里去。这样，真实情况便停留在两个极端的某个地方，永远不可能弄清楚。

我的不正确的记忆竟如此顽固，在我的一部小说提到那次屠杀时我讲得那么精确和可怖，好像我是在阿拉卡塔卡亲眼所见的，因为我得不到任何一种和多年间在我的头脑中酝酿的提法不同的说法。这样一来，为了保持事件的宏大规模，我便把死者的数量增加到三千，而不是七个。现实生活

不失时机地站在了我一边：不久前，在关于那场悲剧的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者要求大家静默一分钟，以纪念牺牲在警备部队枪口下的三千名无名烈士。

上午八点钟火车到达西埃纳加，搭船来的旅客和山上下来的人上了火车，一刻钟后，火车继续向香蕉种植区内地开去。上午九点多，我和母亲到了要去的车站，但是火车晚点了。然而，我们是唯一的乘客。我母亲自登上了空空的火车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用诙谐的口气叫道：

“多奢侈！整列火车只为我们开！”

我总是认为，她的快乐不是由衷的，仅仅为了掩饰她的沮丧心情，因为时间造成的破坏很容易在车厢的状况上看出来。都是古老的二等车厢，现在却变成了唯一的一个级别，没有了柳条编扎的座位，也没有可以升降的玻璃窗，只有被穷人的又热又滑的裤子臀部磨光的木板凳。和过去的情况相比，不仅那节车厢，而且整列火车，都是它本身的一个幽灵。从前车厢有三个等级。三等车厢坐的是最穷的人，车厢就是运香蕉或运该杀的牲口用的木板笼子，为乘客放上纵向的长凳。二等车厢有柳条编的座椅和铜窗框。一等车厢坐的是政府官员和香蕉公司的高级职员，通道上铺着地毯，座位是包着红丝绒的、可以改变靠背角度的安乐椅。当香蕉公司的总经理或他的家人或他的贵客坐车时，火车就在尾部挂一节豪华车厢：太阳玻璃窗、金黄色的飞檐，还有一个露台，露台上有两张小桌，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喝茶。我认识的凡人中，谁也没从内部见过这种与众不同的车厢。我外祖父当过

两任镇长，此外他对钱还有一种快乐的概念。但是，如果和家中的某个女人一起旅行，他会只坐二等车厢。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坐三等车时，他便回答：“因为没有四等车。”但是，关于火车，最令人难忘的是准时。镇上的钟表都按照火车的笛声调时间。

那一天，不知为什么，火车晚开了一个半小时。当火车凄凉地叫着缓缓开动时，我母亲划了个十字，不过马上就回到现实中来。

“这列火车的弹簧缺油。”她说。

我们是车厢中唯一的旅客，也许也是全火车的唯一旅客。直到此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引起我的兴趣。我昏昏沉沉地读《八月之光》，不间歇地吸烟。为了知道被我们一一抛在后边的地名，我偶尔抬头瞥一眼。火车一声长鸣穿过西埃纳加的海边沼泽地，全速驶人一条用发红的巨石筑成的振颤的通道，车厢的轰隆声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十五分钟后火车减速了，轻轻地喘着气驶进了种植园的凉爽阴影里。天气变得更加窒闷，海风已经感觉不到。我不用中断阅读就知道我们已经进入香蕉种植区的独立王国。

那里的世界变了。铁路两旁伸展着对称的、没有尽头的林荫大道，路上跑的是牛车，车上装满了绿色香蕉。突然，在尚未种庄稼的不适当的地方出现了红砖垒的驻营地，门窗装着铁丝网、房顶上架着通风装置的办公室，在一块种着虞美人的田地里有一处孤零零的医院。每一条河流都有它的镇子和走火车的铁桥，火车呼叫着通过铁桥。火车经过时，在

冰凉的水里洗澡的姑娘们像青鱼似地跳着，用她们那转瞬即逝的乳房撩拨旅客。

在里奥弗里奥镇，几户阿鲁哈科人背着装满山上产的鳄梨的背包上了车，鳄梨是哥伦比亚最开胃的东西。他们蹦蹦跳跳地向车厢两头跑，找坐的地方。但是当火车重新开动的时候，只剩下两个白种女人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有一位年轻神甫。在后来的旅途中，婴儿不住地啼哭。神甫穿着皮靴，戴着勘探工人的头盔，披着一件补着方块补丁的粗麻布长袍，长袍看去像船上的帆。他伴随着婴儿的哭声讲话，总是像站在布道坛上。他谈论的话题是香蕉公司回来的可能性。自从香蕉公司撤走后，人们就不再谈本地的其他事情。人们的看法分为两种：希望它回来和不希望它回来。但是大家都认为它会回来。神甫的意见却相反。他的理由非常独特，女人们觉得他胡说八道。他说："公司经过哪里，留下的都是废墟。"这是他讲的最新奇的话，但是他未能加以解释，因为带婴儿的女人刚刚用"上帝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个论据使他不知所措。

像以往那样，怀旧又抹掉了错误的记忆，赞美良好的记忆。谁也不能摆脱它的破坏性。从车厢的小窗口可以看见一些男人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只要看看他们的面孔就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盐碱河滩上的洗衣妇怀着同样的希望望着火车通过。每个提着做生意的手提箱来到这里的外国人，他们都认为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人回来重建过去的。在每次相遇，每次拜访，每封信中，迟早都会出现这句神圣的话："听说公

司要回来。”谁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为什么要说，但是谁也不怀疑。

我母亲自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她的父母一去世，她就和阿拉卡塔卡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她的梦幻都背叛她。至少在她认为有某个梦境有必要在用早餐时讲述的时候，那个梦总是和她对香蕉种植区的怀念有联系。她从那些最严酷的年代熬了过来，没有卖房子，幻想等公司回来后可以收取四倍的房租。现实的难以承受的压力终于把她压倒。但是当他听到神父说公司很快就要回来了时，她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对着我的耳朵说：

“真遗憾，我们不可能再等一段时间了。”

在神甫讲话时，我们远远地从一个地方经过，那地方的广场上有一群人，有一个乐队在炎热的阳光下演奏一支快乐的乐曲。我总觉得那里的所有村镇全都一样。我外祖父领我去堂安东尼奥·达孔特的奥林皮亚新影院时，我发现表现牛仔的电影上的火车站很像我们的火车站。后来，当我读福克纳的小说时，我觉得他描写的村镇也和我们的相像。这并不意外，因为我们的村镇是受到联合果品公司的救世主般的启发、按照公司的驻营地的临时风格建立的。除了阿拉卡塔卡，我记得所有的村镇广场上都有教堂，镇上有神话故事里讲的、涂着基本色的小房子。我记得傍晚一队队唱着歌的黑种工人；记得庄园里的棚屋，工人们坐在那里休息，观望着没完没了的货车通过；记得庄园的地界，天亮时在那里发现砍甘蔗的工人在星期六的欢闹中被砍了头。我记得美国佬在

阿拉卡塔卡和塞维利亚建的私人城市，它们位于铁路的另一边，用铁丝围着，里头有巨大的电气化养鸡笼，在夏天的凉爽日子，天亮时笼子上黑呀呀落着一片被烧焦的燕子。我记得那些城市的毫无生气的蓝色草坪，草坪上养着孔雀和鹌鹑，记得城市中有着红屋顶的住宅，窗口装着铁丝网，房内有小圆桌和折叠椅，以便在位于棕榈树和落满尘土的蔷薇中间的草地上用餐。有时通过铁丝网可以看见一些懒洋洋的漂亮女人，她们穿着薄纱衣衫，戴着轻罗纱大帽子，用金剪子在花园里采花。一天下午，香蕉公司的总经理突然像转瞬即逝的幽灵一般从镇子的街道上经过，他坐着豪华的敞篷车，身边有一位留着金色长发的女人，长发随风飘荡，还有一只德国牧羊狗，它像国王一样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他们是那个禁止我们这些凡人进入的、遥远而不可思议的世界的一闪而过的幽灵。

在我童年的时候，想把一些村镇和另一些村镇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二十年后仍然比较困难，因为在车站的门廊上钉着的牌子：图库林卡、瓜马奇托、内埃兰迪亚、瓜卡马雅尔，早已脱落。所有的地名都比在人的记忆中还凄凉，灰尘还多。

大约上午十点钟，火车停在了塞维利亚，在该站换车头，上水，耽搁漫长的十五分钟。此时，天气开始热了。更糟糕的是，当旅行重新开始的时候，每次转弯新车头都把一阵炭灰从没有玻璃的窗口落进来，把我们笼罩在一团黑烟中。我们没有注意，神甫和那些女人已在某个镇子下了车，

这更加使我感到，我和我母亲孤独地坐在一列没有方向的火车上旅行。她坐在我对面，向窗外望着。她已经打了两三次磕睡，但是突然振作起了精神，又一次向我提出了这个可怕的问题：

“那么，我该对你爸爸说什么呢?”

我觉得，为了找到一个缺口打垮我的决心，她永远不会罢休。刚才她提出了几个妥协的方案，都被我毫无理由地否定了。但是我知道，她的撤退不会很久。即使这样，她这一次新尝试仍然使我感到意外。为了为另一次长时间的、毫无结果的战斗做准备，我以比前几次更平静的口吻回答她说：

“你对他说，我这一生唯一想干的是当作家，我一定能成为作家。”

“他不反对你想干什么，他只希望看到你大学毕业”。她说。

她说话时不看着我，假装对我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她更感兴趣的是窗外的活动。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坚持，你很清楚，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对她说。

她立刻看了看我的眼睛，好奇地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清楚?”

“因为你和我一样。”我说。

火车在一个没有镇子的车站停了停，过了一会儿从旅途上唯一的一座香蕉种植园前面经过，香蕉园的名字在门廊上写着：马孔多。自从和我的外祖父进行头几次旅行的时候

起，这个名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长大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喜欢它是由于它那种富有诗意的回响。以前我从没有忘记过它，从没有听谁讲过它，也没有自问过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已在三本书里把它用作一个虚构的镇子的名字，当时我在一部偶然看到的百科全书里得知，它是一种热带树木，很像木棉树，不开花也不结果，木质松软，可以做独木舟，可以制作炊具。后来我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发现，在坦噶尼喀有流浪的马孔多人，我认为那可能是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我从没有调查过，也从没有见过那种树，因为我多次在香蕉种植区询问，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

火车十一点钟通过马孔多镇，十分钟后停在了阿拉卡塔卡。我和我母亲去卖房子的那天，火车晚了两个半小时。当火车加速的时候，我正在上厕所，一股炎热而干燥的风伴随着旧车厢的晃荡声和机车的吓人的笛声从破窗口吹进来。我的心房在胸中怦怦直跳，一阵冰冷的嗯心把我的内脏变得冰凉。在类似对地震的恐惧情绪的推动下，我飞快地跑出了厕所，看见我母亲平静地坐在位子上，正高声地数着窗外闪过的村镇。那些村镇疾速地掠过，像转瞬即逝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这就是人家卖给我父亲的据说有金子的土地。”她说。外国人的宅子像闪电一般掠过，宅旁有鲜花盛开的花园，门廊上挂着牌子：“阳光普照”。[①] “这是你最早学会的

① 原文为英文。

英文字”，我母亲说。“不是最早的，”我对她说：“是唯一的。”火车通过了水泥桥和水渠，自从美国佬改河道引水灌溉香蕉园的时候起，河水就浑浊不清。“这是当年的红灯区，男人们跳孔比安巴舞跳到天亮，把一捆捆钞票当蜡烛点。”她说。接着是我上小学的蒙特索里亚诺学校。一刹那，整个镇子的形象在二月的明亮的星期二闪耀在车窗前。“这是车站”，我母亲叫道。“世界的变化多大啊，已经没有人等火车了。”这时，机车刚刚鸣完笛，减慢了速度，随着一阵长长的气声停了下来。

使我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是寂静，一种实实在在的寂静，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寂静的地方蒙住眼睛一样。热量的反射是那么强烈，看一切都像中间隔着一层波动的玻璃。在石铺的小广场上，再也不存在对三千名被警察部队屠杀的工人的同情的怀念。因为直到视力所及的地方，没有任何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忆，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被带着炎热的尘土的薄薄的露水所覆盖。我母亲望着死气沉沉的、躺在荒凉的街道上的镇子，在车上又坐了几分钟，终于恐惧地叫道：

“我的上帝!”

（这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漫长幸福生活

过了二十二年我又见到了玛格里托·杜阿尔特。他突然出现在特位斯泰韦雷区一条背静的小街上。从他那一副吃力的西班牙语和他那副古罗马人的快活样子我好不容易才算认出了他。他的头发又白又稀。他第一次来罗马时的悲哀心情和安第斯山律师的殡葬制服已全然消失。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从他那些无情的岁月中夺回了他，重新看到了过去的他：寡言少语，做事欠考虑，像石匠一般固执。我们坐在我们从前光顾的一家酒吧里，在喝完第二杯咖啡前，我冒昧地向他提了这个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问题：

“圣女的情况怎样了?”

“圣女还在这儿等待呢。”他回答说。

只有我和男高音歌手拉法埃尔·里维罗·西尔瓦能够理解他的回答具有多么重的精神负担。我们非常了解他的遭遇。

几年来我一直认为玛格里托·杜阿尔特是个寻找作者的小说人物，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整个一生都在期待成为这样的作者。我之所以始终没有让他找到，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历史的结局难以想象。

他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春天来到罗马的，当时庇护十二世遭受呃逆的折磨，无论是高明的还是低下的医术和巫术都无能为力。他第一次离开位于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区托利马省他那个地势陡峭的山村，从他睡觉的姿势上都能看出来。一天早晨，他提着一只光闪闪的柏木手提箱来到我们的领事馆。从形状和体积来看，那只手提箱就像装大提琴的盒子。他对领事说明了他突然旅行来罗马的原因。于是领事打电话给他的同胞男高音歌手拉法埃尔·里维罗·西尔瓦，让他在我们俩住的公寓里找个房间给他住。这样，我便认识了他。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没有进过小学，但是他对文学的爱好使得他凭借对能够得到的印刷品的爱不释手的阅读获得了相当广博的修养。十八岁那年，他作为市政府的秘书和一位貌美的姑娘结了婚。但是没过多久那姑娘就在生第一个女儿时死去了。她女儿长得比母亲还美丽，但是七岁时患严重的热病不幸夭折。不过，玛格里托·杜阿尔特的真正的故事开始于他来罗马六个月以前，当时他村的墓地必须迁移，因为要修一座水坝。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和本村的全体居民一样，把亲人的遗骨挖出来迁到新墓地去。他的妻子的遗体已化为黄土。相邻的墓穴却相反，经过十一年后，他女儿的尸首完好无损。打开棺木时，人们居然闻到了随葬的鲜玫瑰的香

味。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女儿的尸体非常轻。

听说出现了奇迹，村民们纷纷冲出村庄，拥向墓地。毫无疑问，尸体没有腐烂，这是神圣的确凿无疑的征兆，连教区的主教也同意这样的奇迹应该提请罗马教廷裁决。于是，大家搞了一次募捐活动，好让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前往罗马为一桩事业去斗争。这事业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不仅仅是他那个小村庄的，而且也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当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在幽静的帕里奥利城区的寓所里对我们讲述他的经历时，他取下锁，打开精致的箱子盖。我和男高音歌手里维罗·西尔瓦就这样亲眼目睹了奇迹。她一点儿也不像在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里看到的那种干尸，而像一位身穿新婚礼服的小姑娘，在埋在地下的漫长岁月里仍然在沉睡。皮肤平滑而温热，睁着的眼睛亮晶晶，却用死人的目光望着我们，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绸缎和花冠上的假柑桔花像皮肤一样未能经住严酷岁月的腐蚀，但是她手里拿的玫瑰花却依然鲜艳如初。我们把姑娘的尸体取出来后，那只柏木匣子的重量实际上并没有减轻。

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在到达罗马的第二天就开始奔走了。最初他依靠外交上的一种与其说有效的毋宁说富有同情心的帮助，后来则凭借他想出的种种妙计，来躲避罗马教廷设置的数不清的障碍。采取什么办法，他总是很谨慎，但是他知道，他的办法虽然不少，可是没有用。他同一路上碰到的一切宗教团体和仁慈的基金会进行了接触。他们认真听取了他的要求，但是不感到惊讶；他们对他许诺立刻办理，但是始

终未办。事实上，时机不是最适当的。和罗马教廷有关的一切事情都被拖延下来，直到教皇的呃逆病治好才能办理。而他这种病，不仅最精湛的科学医疗方法无效，从全世界找来的各种神丹妙药也没作用。

到了七月份，庇护十二世终于康复，却又去卡斯特尔甘多尔福[①]度假避暑了。玛格里托·杜阿尔特趁着教皇首次星期接见的机会把圣女带了去，希望让教皇看一看。教皇出现在宅内庭院的露台上。露台特别低，玛格里托看到了他那磨得又光又亮的指甲，闻到了他身上散发的熏衣草的香气。但是他没有像玛格里托盼望的那样到露台前面那些从世界各地来看他的旅游者中间来，而只是照例用六种语言发表了讲话，最后向大家表示了祝福。

拖延了这么久之后，玛格里托决定亲自面对这个问题。他向国务院递了一封几乎长达六十页的信，但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事先想到会这样的，因为一向墨守陈规的官员收下他的信后几乎没有屈尊看一眼死去的小姑娘。从旁边走过的职员们也只是毫无兴趣地瞥了一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告诉他，前一年他们收到八百多封信，都请求把世界各地完好无损的尸体封为圣徒。玛格里托最后要求那位官员验证一下小姑娘的尸体是否确实没有重量。他做了验证，但是拒绝接受尸体。

“你这么做肯定是集体的主意。”他说。

---

① 意大利城市，教皇的避暑地。

在他不多的空闲时间里和夏天的枯燥星期天，玛格里托总呆在房间里埋头阅读他觉得对他的事业有用的任何书。每到月底，他都主动地在一个练习本上用他那种熟练的记录员的漂亮书法写一篇关于他的花费的详细记录，以便向本村的捐赠者提供严格而及时的报告。在年底前，他了解了迷宫似的罗马城，仿佛他是在罗马出生的一样，他讲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意大利语就像他的安第斯山地区的西班牙语一样，单词不多。他比谁都熟悉谥给圣徒称号的程序。但是过了很久他才更换了他那身丧服和在当时的罗马只有某些秘密社团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才穿的坎肩和审判官帽。他大清早就提着装着圣女的箱子出门，有时晚上回来得很晚，而且精疲力尽，面带愁容，但是心中总是像燃着一块闪光的炭火，这为他激发了第二天所需要的新的力量。

“圣人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说。

当时我是第一次到罗马，在电影实验中心学习。我怀着难忘的紧张情绪经历了罗马的苦难。我们所住的寓所实际上是离维亚·博尔盖塞动物园几步远的一套现代化的住宅。女房东住两个房间，把另外四个房间租给了外国学生。我们管她叫玛丽亚·贝利亚。她虽然已处在生命的秋天，但是她依然漂亮，气质不凡。她总是忠实地对待神圣的规矩。对这种规矩来说，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都是绝对的国王。其实，把日常生活的担子挑在肩上的是她姐姐安东尼埃塔姨妈，一位没有翅膀的天使，白天每时每刻都要为她干活，带着水桶和拖把把各处的大理石地板擦洗得亮晶晶的。是她教会我们

吃那些会唱歌的小鸟的，那些小鸟是她丈夫巴托利诺由于打仗留下的坏习惯而捕捉来的。也是她看到玛格里托无力交付玛丽亚·贝利亚的房费而决定把他带到她家住的。

对玛格里托的脾气来说，那幢没有什么规矩的房子正合适。每个小时他都为我们保留一条新闻，甚至在大清早我们被维亚·博尔盖塞动物园的狮子的可怜吼声惊醒的时候。男高音歌手里维罗·西尔瓦已经得到罗马人不对他大清早歌唱练习感到不快的特许。他六点钟起床，然后用冰冷的药水洗澡，刮胡子，修理摩菲斯特式的眉毛，直到穿好苏格兰方格布晨衣，系好中国丝绸围巾，身上洒上花露水后，他才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唱歌练习。尽管天空依然寒星闪烁，他还是把房间的窗扇完全打开，开始用伟大的爱情咏叹调的渐进的断句练声，直到放开嗓子歌唱。每天可以听到，当他鼓足气力唱“1”时，维亚·博尔盖塞动物园的狮子就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吼叫。

“你是圣马可再世，我的孩子。”安东尼埃塔大婶真正感到惊讶地叫道。“只有他能和狮子讲话。”

一天早晨，回答他的不是那头狮子。男高音歌手开始唱《奥赛罗》的爱情二重唱：“深夜听得清任何声音”。突然，从院子的深处传来一个女高音歌手的美丽声音回答他的歌唱。男高音歌手继续往下唱，两个人为了使居民们得到娱乐唱完了整段歌曲。为了借那股不可抗拒的爱情洪流使他们的家宅变得神圣，居民们把窗子都打开了。当得知他们无形的德斯代莫娜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玛丽亚·卡尼格利亚时，男

高音歌手差一点晕过去。

我觉得，正是这个插曲使玛格里托·杜阿尔特感到有充分的理由和这个家庭的生活融为一体。从此后他便和大家一起坐在一张桌上，而不再像起初那样坐在厨房里了。当初，安东尼埃塔大婶几乎每天都拿她用唱歌的小鸟做的精美菜肴使他高兴。用饭后点心时，玛丽亚·贝利亚给我们念当天的报纸，帮助我们习惯意大利语的语言，并专断而风趣地补充一些新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快活。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天在谈到圣女时她说，在巴勒莫城有一家巨大的尸首博物馆，那里陈列着没有腐烂的男人、女人和孩童的尸体，甚至还有若干主教的尸体，是从同一座圣方济会神甫的坟墓里挖出来的。这个消息使玛格里托感到如此不安，在我们动身前往巴勒莫之前他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平静。但是，只要顺着摆放着毫无光彩的干尸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展厅粗略地看一眼就可以得到令人欣慰的判断。

“情况不同，”他说，“这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死的。”

吃过午饭后，罗马陷入了八月的昏睡状态。中午的太阳悬在天顶一动不动。在下午两点钟的寂静中，听得见水的响声，这是罗马的天然声音。但是快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窗扇突然敞开，让开始刮起的凉风吹进来。一群人欢乐地冲出家门来到街头，除了在摩托车的隆隆声、西瓜商贩的叫卖声和从花坛的鲜花丛间升起的爱情歌声中间生活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意图。

我和男高音歌手没有午睡。我们坐上他的摩托车：他驾

驶，我坐在后座。我们去为夏天的妓女送冷饮和巧克力饮料，她们在维亚·博尔盖塞的百年月桂树下转来转去，寻找在烈日下睡不着觉的旅游者。她们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意大利女人一样，美丽、贫穷、待人亲热，身穿蓝丝绸、玫瑰色府绸、绿色亚麻布衣服，用经历过大战风雨的虫蛀帽子遮挡阳光。和她们在一起是人的一种快乐，因为她们不顾职业的规矩，满不在乎地放弃一个好顾客，和我们一起到街角上的酒吧喝杯咖啡，开心地交谈，或者坐上出租四轮马车在公园的小路上兜风，或者为被废黜的国王及其在黄昏骑马奔驰的不幸情妇们感到难过。我们不止一次为她们当翻译，同某个放荡不羁的外国佬交谈。

我们把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带到维亚·博尔盖塞来，并不是由于她们，而是为了让他看看狮子。狮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被一道深沟环绕着的荒凉的小岛上。一看见我们站在沟边上，它就不安地吼起来，看管人很惊奇。公园的游人感到惊讶，纷纷跑来看。男高音歌手想验证一下他早晨练声唱的“1”音，但是狮子却不理睬他。它似乎毫不区别地对我们大家吼叫，但是看管人立刻意识到，狮子是只为玛格里托吼叫的。果然不错：玛格里托往哪边走，它就往那边转。他一躲藏起来，它就不叫了。看管人是锡耶纳大学的古典文学博士。他想，那一天玛格里托肯定和别的狮子在一起呆过，它们把身上的气味传染给了他。除了这种站不住脚的解释外，他一时找不到别的原因。

“不管怎样，”他说，“这种吼叫不是狮子好斗的表现，

是同情的表示。”

然而，使男高音歌手维拉·西尔瓦感到不安的并非那种不可思议的插曲，而是当他们停下来和公园的姑娘们交谈时玛格里托的激动情绪。他在桌边谈起了这件事。有的怀着恶意，有的出于同情，我们都一致认为帮助玛格里托摆脱孤独是一件大好事。受到我们的软心肠的感染，玛丽亚·贝利亚用她那双戴满假戒指的手按着她那圣母般的胸脯，说：

倘若不是因为我从来也不容忍穿坎肩的男人的话，我会为了慈善对待这件事的。”

就这样，男高音歌手下午两点去了维亚·博尔盖塞公园，用他的摩托车把他认为更适合同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好好地过一小时的妓女驮了来。让她在他的房间里脱了衣服，用香皂给她洗了澡，给她擦干身子，用他的花露水给她喷了一下，用他的掺了樟脑的滑石粉给她擦了全身，然后给她化妆了一番。最后，除了耽搁的时间，又付了她一个小时的钱，并一字不差地告诉她应该做的事情。

美丽的姑娘一丝不挂，像午睡做的一个梦似的蹑手蹑脚地穿过住宅，走到深处的房间门口轻轻地敲了两下门。玛格里托·杜阿尔特赤着脚、光着背开了门。

“晚上好，年轻人！”她用干这一行的新手的声调和方式对他说，“是男高音歌手让我来的。”

玛格里托听见扣门声，态度非常庄重。他刚刚敞开门让她进来，她便躺在了床上，他赶忙穿上衬衫和鞋子恭敬地接待她。然后坐在她旁边一把椅子上，开始跟她交谈。姑娘感

到惊异，让他抓紧时间，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却莫名其妙。

姑娘后来说，不管怎样，他愿意让她在那里呆多久她就待多久，她可以不要他一分钱，因为像他这么正派的男人世界上是没有的。与此同时她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便仔细察看他的房间，发现壁炉上有一个木箱子。她问他那里头是不是放着一只萨克管。玛格里托没有回答，而是打开一点百叶窗，让光线透进一点来，然后把那只匣子拿到床上，打开了盖子。姑娘想说什么，但是颌骨张不开。她想说的或许就像后来对我们说的这句话：我的屁股都被冻僵了。她惊恐万状地逃走了。但是在走廊里弄错了方向，撞见了要到我的房间来安新灯泡的安东尼埃塔大婶。两个人都惊恐不已，姑娘躲在男高音歌手的房间里，直到深夜才离去。

安东尼埃塔大婶始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失魂落魄地来到我的房间，安灯泡的双手直哆嗦，就是拧不上。我问她出了什么事。“这所房子里闹鬼了，”她说，“现在，大白天都闹。”她还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大战期间，一位德国军官在男高音歌手住的房间里把他的情妇的头砍了下来。有许多次，安东尼埃塔大婶在干活的时候看见那个被杀死的美人的幽灵从原路退回去。

“我刚才又看见她光着屁股在走廊里走。”她说。“错不了。”

城市恢复了它秋天的习惯。夏天，露天咖啡馆由于头几场风的到来而关闭了。我和男高音歌手又回到特拉斯泰韦雷

街的旧饭铺，我们经常在那里和卡尔洛·卡尔卡尼侯爵的学唱歌的学生和我的几位电影学校的同学一起吃晚饭。在我的同学中间，最持之以恒的是拉基斯，他是一位既聪明又富有同情心的希腊人，他唯一的不足就是他那些关于社会不公平的昏昏欲睡的谈话。幸好，男高音歌手和女高音歌手几乎总能用扯着嗓子唱的歌剧片断把他的声音压倒，但是即使在半夜后也不打扰任何人。相反地，一些有熬夜习惯的人也走来加入了合唱，附近的居民也打开窗子鼓掌喝彩。

一天夜里，我们唱歌的时候，为了不打断我们，玛格里托踮着脚走进来。他提着那只柏木匣子，因为在把圣女拿给圣胡安·德·莱特兰教区神甫——他对神圣仪式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看过之后没有来得及把匣子放回寓所里去。我斜眼看见他把箱子放在一张偏僻的桌子底下，刚坐下我们就唱完了。就像半夜三更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小铺子开始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把几张桌子并在一块。那些唱歌的，我们这些谈论电影的，还有大家的朋友，都留下来聚在一起。作为一个喜欢沉默、情绪忧郁的哥伦比亚人，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在他们中间已经有名，但是谁也不了解他。拉基斯出于好奇，问他是不是拉大提琴的。对这种我觉得难以躲避的冒失问题，我感到意外。和我一样感到难堪的男高音歌手没有能够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只有玛格里托泰然自若地对待他的问题。

“里头不是大提琴，”他说，“是圣女。”

他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锁，揭开盖。惊叹之声像一阵

风震动了餐厅。别的顾客，服务员，最后还有系着血迹斑斑的围裙的炊事员，都惊骇地凑过来观看奇迹。有的划起了十字。有一个女厨师合着双手跪在地上，像患热病似地哆嗦着，默默地祷告起来。

但是，最初的激动过去后，我们便卷入了一场关于我们时代缺乏神圣信仰的声嘶力竭的争论。当然，拉基斯是最激进的。最后唯一明确的问题是他关于拍一部以圣女为题的批评影片。

“我敢说，”他说，“老切萨雷肯定不会放弃这个题材。”

他指的是切萨雷·萨瓦蒂尼。他是为我们讲授故事情节和电影剧本的老师，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唯一在校外同我们保持个人关系的人物。他不但设法教给我们职业，而且教给我们看待生活的不同方式。他是一台思考情节的机器。情节几乎违背他的意志大量地涌流出来。它们产生得那么迅速，他常常需要有人和他一起边谈边想，并且及时抓住它们。但是在写完故事后，他却垂头丧气了。“遗憾的是，必须把故事拍下来。”他说。因为他认为在银幕上会使故事的原始魅力丧失许多。他把他的想法记在卡片上，卡片按照内容分类，用大头针钉在墙上。他的卡片多得很，贴满了他家的一间卧室。

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和玛格里托·杜阿尔特去见他。他对生活那么热爱，我们碰见他站在安杰拉·梅里奇街他家门口，正为我们用电话告诉他的想法着急。他几乎没有怀着惯常的热情态度问候我们，而是把玛格里托带到一张准备好的

桌上，他自己打开箱子盖。于是，最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他没有失去理智，而是遭受了一种精神上的瘫痪症[1]

“上帝啊！”他恐惧地低声说。

他默默地看了圣女两三分钟，亲自盖上了箱子，一声不响地把玛格里托带向门口，就像领着小孩学走路似的。在他的背上拍了两下，跟他告别。“谢谢，孩子，非常感谢。”他对他说。“上帝会伴随你斗争的。”他关上门，转身对着我们，把他的决断告诉我们。

“这事不能拍电影。”他说。“谁也不会相信的。”

在回来的有轨电车上，这个意想不到的教训依然伴随着我们，既然他这么说，那就连考虑也不必要了：故事没有用嘛。但是玛丽亚·贝利亚却带着一个紧急的口信迎接我们：当天晚上，萨瓦蒂尼在等我们，但是玛格里托已经走了。

我们碰见他正处在他的一个重要时刻。拉基斯带来两三个同学。但是开门时他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他们。

“我已经想好了，”他叫道，“如果玛格里托能够使小姑娘奇迹般复活，电影就能打响。”

“在电影上还是生活中？”我问他。

他克制着不快心情，“别说傻话了。”他对我说。但是我们马上又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想法的闪光。“如果他不能使她在现实生活中复活的话，”他说，接着严肃

① 意思是说，吓了一跳，吓坏了。

地思索说：

“应该试一试。”

在接着话茬继续交谈之前，这只是一瞬间的诱惑，他开始在房子里踱步，像个快活的疯子一样，挥动着手掌，高声背诵着电影。我们眼花缭乱地听着，觉得好像看到了许多形象像磷光闪闪的小鸟成群地离开他，在整个房子里发疯地飞舞。

“一天晚上，”他说，“当不肯接见他的大约二十个神甫死了以后，玛格里托又累又老地走进他的家门，打开箱子，抚摸死去的女儿的面颊，怀着世界上的全部柔情对她说：“看在你父亲的份上，孩子，你站起来，行走吧！”

他看了看大家，带着胜利的表情结束说：

“小姑娘站起来了！”

他希望我们谈点看法。但是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希腊人拉基斯像在学校课堂似地竖起手指要求发言。

“我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会这样。”他说。面对我们的惊异神情，他居然直截了当地对扎瓦蒂尼说：“请原谅，老师，不过，我不相信会这样。”

此刻，感到惊讶的是萨瓦蒂尼：

“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天晓得。”拉基斯痛苦地说。“反正不可能。”

“天啊！”这时，老师吼道，声音震耳，整个居民区都会听到。

据玛格里托本人对我讲，在后来的十五年间，他曾把圣女带到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看看那里有没有机会展示她。在一次接见大约二百个拉丁美洲的朝圣者的场合，他忍受着人群的手推和肘击得以向仁慈的胡安二十三世讲述他的历史。但是没能够展示圣女，因为他必须把圣女和其他朝圣者的背囊一起放在门口，以防有人行刺。教皇以在人群中能够办到的最大注意力听了他的讲述，在他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以示鼓励。

“好极了，我的孩子，”教皇对他说，“上帝会奖赏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的。”

但是，他真正感到处于实现其梦想的前夕的时间却是在面带笑容的阿尔比诺·卢恰尼的短暂王朝统治期间。卢恰尼的一位亲戚为玛格里托的历史所感动，答应代他去求情。但是谁也不听他的。不过，两天后，吃午饭的时候，有人敲公寓的门，为玛格里托送来一封简单的快信：要他不要离开罗马，因为在星期四以前罗马教廷将打电话通知他去参加私人召见。

天晓得是不是开玩笑。玛格里托认为不会是玩笑，所以他时刻准备着。他不出门上街。如果必须上厕所，他就大声宣布：“我去厕所了。”在进入老年的初期，玛丽亚·贝利亚总那么风趣，她像自由自在的女人那样发出一阵大笑。

“我们知道，玛格里托，”她叫道，“随时等着接教皇来的电话。”

到了下星期，离电话通知还差两天，玛格里托在从门下

塞进的报上看到了这个标题："教皇驾崩"，觉得如坠万丈深渊。但是他一时还没有坠到渊底，因为他幻想那是一张迟到的报纸，是被误送到这儿来的，因为他很难相信每个月都会有一位教皇逝世。但是这是事实：微笑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三十三天前才当选上任，天亮时就在床上死去了。

在认识玛格里托·杜阿尔特二十二年后，我又来到罗马。倘若不是和他邂逅相逢，也许我不会想起他。多事之秋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不愿意想念任何人。愚蠢的细雨像不冷不热的肉汤不住地下着，昔日那种钻石般的光芒如今变得模糊不清，曾经属于我并支撑着我的怀念情绪的地方变了样子，与我无关了。宿膳公寓所在的房子倒是如故，但是没有人能提供关于玛丽亚·贝利亚的情况了。按照几年前男高音歌手里维罗·西尔瓦寄给我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没人回答。一次和电影界的新人一起进午餐，我提起了我的老师，一阵突然的沉默像翅膀一样在桌上扇动了片刻，之后有一个人大胆地说：

"萨瓦蒂尼？从来没听说过。"

不错：谁也没有听到过人们谈论他。维亚·博尔盖塞公园的树木蓬头散发地立在雨中，忧伤的公主们的跑马场已被无花的草木丛吞没，当年的美丽姑娘也被身着姑娘衣服的男性大力士取代了。灭绝的动物群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栖居在干涸的小岛上的一头长疥疮、患感冒的老狮子。在西班牙广场上加塑的小饭铺里没有人歌唱爱情也没有人为爱情而死。因为我们所怀恋的罗马已经成了凯撒王们的古罗马中的另一个

古罗马。突然，一个可能来自阴曹地府的声音在特拉斯泰韦雷区一条小街上猛地叫住了我：

“你好，诗人。”

是他，又老又累的玛格里托。五个教皇先后死去，永恒的罗马开始显露出没落的征兆，他却依然在等待。“我等了这么久了，不会等更多的时间了。”在经过几乎四个小时的叙旧之后，分手时他对我说，“可能是几个月的事情了。”他穿着军用皮靴，戴着老罗马人的褪色帽子，拖着双脚顺着街心走了，一点也不在乎开始反射烦扰人的光亮的水洼儿。当时，我已经毫不怀疑——如果我曾经怀疑的话——，他就是圣人。他没有意识到，通过他女儿的未腐尸体，他还未死就已为他自己被谥给圣徒称号的正当事业斗争了二十二年。

1981 年 8 月

马格达莱纳河

我想重新成为孩子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再一次乘船沿着马格达莱纳河旅行。不曾这样做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在上中学的六年和上大学的两年间，我不得不每年那样旅行两次——一次是去，一次是回——，每次对生活的学习都比在学校里学得多些、好些。在河水丰富的时期，从巴兰基利亚沿河上行至萨尔加尔码头需要五天。然后从萨尔加尔码头转乘火车到波哥大。在干旱季节——旅行时间最长也最有趣的时期——，旅行可以长达三个星期。

从萨尔加尔码头开出的火车必须像猫似的沿着山路向上爬一整天。在最陡的路段，火车得倒退一段路助跑，再像龙一样气喘吁吁地继续向上爬。有时需要乘客下车，自己步行爬一段路，以减轻火车的负重。沿途的村镇冰冷、凄凉。一辈子卖东西的小贩从车窗口把整只又大又黄的烧鸡和散发着医院的饭菜味儿的白土豆卖给旅客。火车下午六点到达波哥

大。城市阴郁而凄楚，有轨电车发出很大的声响，在街角上转弯时溅出许多火花，夹杂着烟垢的雨水下个不停。穿着黑衣、戴着黑帽子的男士匆匆地赶路，好像有什么急事等着去做。街上一个女人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在那里呆一整年，假装进行学习，而实际上只是为了期待着 12 月份再一次到来，好重新乘船沿着马格达莱纳河旅行。

那时的客轮有三层，有两个烟囱，夜晚行驶时像一个明亮的村庄，把一阵阵乐曲和一个个幻梦留给岸边一动不动的村镇。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客轮不同，我们的客轮的推进器不在船舷上，而是在船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也没见过这样的轮船。轮船的名称简单而熟悉："大西洋号"、"麦德林号"、"卡罗上尉号"、"大卫·河兰戈号"。船长们像康拉德恩号的船长一样专横，但是心善，吃东西像野蛮人，从来不单独睡在他们那很远的寝舱里。由于工作的范围，船员们被称为"海员"，好像他们属于大海。但是在巴兰基利亚的酒馆和妓院里，人们用一个独特的名字"轮船人"称呼他们。他们在那里和海上的海员混杂在一起。

在白天，旅行缓慢、新奇，我们这些旅客坐在平台上观看万物。我们看见一条条鳄鱼像树干一样卧在岸边，张着大嘴，等待着可吃的东西落在嘴里；一群群的草鹭被轮船的尾波吓得振翅高飞；一群群野鸭在内地的沼泽地里觅食；海牛在给它们的小崽哺乳，它们的叫声像在河滩上唱歌。有时，一阵令人恶心的气味搅扰了旅客们的午休，那是一头被淹死的母牛，身躯硕大，几乎一动不动地顺流而下，肚子上

还站着一只孤单的兀鹰。在整个旅途中，黎明时你会被长尾猴的欢叫声和鹦鹉的喧闹声惊醒。

如今，在飞机上认识一个人很难得。在马格达莱纳河的轮船上，旅客们最终会处得像一个大家庭，因为每年我们都约好一起搭船旅行。埃尔哈奇村的人在卡拉马尔上船，佩纳村和托罗村的人在普拉托上船，比尼亚村的人在马甘格上船，比利亚凡内斯村的人在班科上船。随着旅行的继续，欢乐气氛愈来愈浓烈。我们的生活短暂但难忘地和停泊码头的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许多人永远和当地人的命运融为一体。学医的学生维森特·埃斯库德罗作为不速之客参加了在卡马拉村举行的婚礼舞会，冒昧地和村里最漂亮的女人跳了舞，她丈夫举枪打死了他。相反的，佩德罗·巴勃罗·纪廉却在巴兰卡贝梅哈醉醺醺地和他喜欢的第一个姑娘结了婚，至今和她以及他们的九个孩子过得很幸福。不能复活的何塞·帕伦西亚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参加了在特内里菲举办的鼓手比赛，赢了一头母牛，在当地以五十比索卖掉，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有时，轮船会搁浅十五天，但是谁也不在乎，因为欢乐活动在继续，船长的一封盖着他的朋友的印章的信可以作为未能及时到校的证明。

1948年我最后一次旅行时，一天夜里，一阵令人心碎肠断的哀鸣传 到岸边，把我们惊醒。克里马科·孔德·阿贝约船长是个非凡的人，他下令用探照灯寻找发出那种哀嚎声的动物。原来是一只母海牛被压在一棵倒下的树枝下。开船的人纷纷跳入水中，用一根绞索捆住它，把它拖了出来。那

是一头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分动人的动物，体长几乎有四米，皮毛苍白而平滑，躯干像女人，有慈爱的母亲般的大乳房，一双又大又忧伤的眼睛流着人的泪水。我第一次从孔德·阿贝约口中听说，如果河中的动物继续遭厄运，世界就会完蛋。他宣布不准任何人从船上开枪射杀动物。“谁要是想杀死什么，请他回自己家去杀。”他叫道，“不准在船上”。但是谁也不听他的话。十三年后——1961年1月19日——，在墨西哥，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大卫·阿兰戈号”在马甘格码头上着了火，化为灰烬。我挂上电话，恐惧地感到，我的青春年华结束了，我们所怀念的河里仅剩的东西毁灭了。

的确，毁灭了。马格达莱纳河连同它那被污染的水和被灭绝的动物死去了。自从一群专心致志的记者把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后政府开始谈论的拯救工作，不过是一出掩人耳目的滑稽戏。只有通过至少四代有觉悟的人整整一个世纪连续而紧张的努力，马格达莱纳河的拯救工作才有可能。

提到重新绿化问题，人们想得太容易了。实际上，重新绿化，意味着要在马格达莱纳河两岸科学植树五百九十一亿株。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数字：五佰九拾一亿一仟万棵。但是最难办的问题不是种这么多树，而是在哪里种。因为马格达莱纳河两岸有用的土地几乎全部是私人的田产。完全重新绿化必须占用那些土地的百分之九十。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思考：那些田产主仅仅为了植树而肯和气地让出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愿意放弃他们目前百分之九十的收益？

不止于此。污染不仅毒化了马格达莱纳河，而且也毒化了它的支流。这些河流是沿岸的城市和村庄的下水道。这些下水道集中和拖带着工业、农业的废物和人与动物的粪便，从灰暗的下水道口泄入容纳全国垃圾的汪洋大海。去年11月在托凯马，有两个游击队员为躲避武装力量的追击而跳入波哥大河中，他们倒是逃脱了，但是差一点被河水毒死。因此，马格达莱纳河沿岸的居民，特别是下游的居民，很久没有喝到、用到干净水，也没有吃到卫生的鱼了。他们得到的——正如夫人们所说——，只有臭狗屎。

任务非常艰巨。但是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实施的完整的计划来自一项研究成果。那项研究工作是几年前由哥伦比亚和荷兰双方人员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完成的。30卷研究成果被不公平地存放在水利与气象研究所的档案室里。此项重要研究工作的副主任是安蒂奥基亚市的青年工程师，名叫哈伊罗·穆里略，他把自己的半生献给了这项研究工作，工作还没结束，他就把自己仅有的生命交了出来：他溺死在他梦想的河里。但是，近年来却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冒过溺死在那条河中的危险。河岸边的居民——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随着“海螺号”的旅行站在国家意图的第一线，并且会想到，从翁达到博卡斯·德·塞尼萨，有足够的选民投票选举一位共和国总统。

自巴黎，怀着爱

1955年12月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第一次来到巴黎。我从罗马坐火车抵达一个装饰着圣诞节灯火的车站。最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在各种场合接吻的一对对恋人。在火车上、地铁里、咖啡馆和电梯里，战后的第一代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爱情的公共消费，这是灾难过去后唯一廉价的娱乐。他们在大街上亲吻，毫不顾忌是否妨碍别人走路。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不看他们也不理睬他们，就像人们对待我们家乡的野狗那样：公狗和母狗在广场中央交配生崽。那种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接吻，在罗马——我生活过的第一个欧洲城市——不多见，在那个时代的雾蒙蒙、假正经的波哥大当然也不多见，即使在卧室里接吻也办不到。

那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黑暗时代。街角上的乐师用手风琴演奏着思乡的乐曲，街头巷尾飘着炒栗子的香味，镇压进步活动的恐怖行动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幽灵四处游荡。警察

突然包围了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或阿拉伯人的一家酒吧，打着骂着把所有长得不像基督徒的人带走。不可避免，我也被他们带走。解释是徒劳的：不仅长的样子，而且我们讲法语的语调，都是导致我们倒霉的因素。我第一次被关进圣日尔曼·德·普雷警察局监禁阿尔及利亚人的牢笼时心里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是拉丁美洲人的偏见：那时进牢房是一种耻辱。小时候，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政治原因，什么是一般原因。我们那些保守的成年人负责教育我们，使我们的头脑保持着糊涂观念。我的处境还要危险，因为尽管警察认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把我带走、关在牢笼里，但是当阿尔及利亚人发现我的面孔虽然像上门卖布的小贩却丝毫也不懂他们的何拉伯语时，便不相信我。然而，无论他们还是我，夜晚仍然坚持不懈地去访问警察局[①]，我们终于彼此理解了。一天晚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对我说，要想成为无辜的囚徒，最好先做有罪的囚徒，并让我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工作。此人是阿迈德·特瓦尔医生，那个时期他是我在巴黎时的一位老朋友，但是在他的祖国独立以后他以和战争不同的方式死去。

二十五年后，当我应邀去参加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那次周年纪念节日活动时，我对一位记者讲了一件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阿尔及利亚革命是我唯一为之被拘留的革命。

然而，那时的巴黎并非仅仅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巴黎，

---

① 意为仍然不断被拘留。

它也是长期以来拉丁美洲流亡者最常留居的巴黎。的确，胡安·多明戈·庇隆——当时他和后来岁月的他不同——在阿根廷掌权，奥德里亚将军在秘鲁掌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在哥伦比亚掌权，佩雷斯·希梅内斯将军在委内瑞拉掌权，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在尼加拉瓜掌权，拉斐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将军在圣多明戈掌权，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在古巴掌权，我们有那么多人从那么多同时执政的独裁者统治下逃出来。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每个黎明都出现在位于居雅斯街大圣米歇尔饭店的阳台上，用西班牙语大声宣布他刚刚从报纸上读到的关于拉丁美洲的消息。有一个黎明他叫道："那个家伙垮台了！"垮台的当然只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大家都醒了，以为垮台的是自己国家的独裁者。

初到巴黎时，我不过是一个不成熟的加勒比人。我对巴黎怀有那么深的怨恨和那么多更深的爱心。这个城市最值得我感谢的地方是它为我提供了用来观察拉丁美洲的新的和敏锐的视野。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整体观念；在这里，在一张咖啡桌周围却变得非常清楚。一个人终于意识到，尽管我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大家却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只要到圣日尔曼·德·普雷各个顾客盈门的小咖啡馆里走一遭，就等于在整个大陆做一次旅行，就可能遇到它的作家、它的艺术家和它的遭难的或成长中的政治家。有些人还没有来欧洲，譬如胡利奥·科塔萨尔——由于他写了《动物寓言集》，从那时起我就敬佩他——。有人告诉我，他经常去奥德纳维，我在那里几乎等了他一年。十五年后，我终于

在巴黎遇见了他。他还是像我很久以前想象的那样：世界上最魁梧的男子汉，永远不让自己衰老。他和他在他的一篇关于另一个天空的故事中写的那个难忘的拉丁美洲人长得极像，那个拉美人喜欢在雾蒙蒙的黎明去断头台前观看处死人的情景。布拉森斯的歌 声在空中飘荡。美丽的塔奇亚·金塔娜——一位勇敢的巴斯克女人，我们各地的拉美人把她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名女流亡者——创造着在酒精灯上为十个人做一种鲜美的菜饭的奇迹。我们中的另一位正宗的法国人保尔·库劳德为那种生活找到了一个名称：金色的贫困。直到一天晚上我突然来到卢森堡公园旁、一整天没有吃到一颗栗子也没有地方过夜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在大街上转游了漫长的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希望遇到押解阿拉伯人的巡逻队，让他们把我也带走，睡在温暖的牢笼里，但是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当天亮时分塞纳河边的高楼大厦开始从浓雾中显现轮廓的时候，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向城市走去，那副模样很像刚刚起身去工厂上班的诚实的工人。走过圣米歇尔桥时，我觉得我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雾中，因为我清晰地听见了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从相反的方向走来，我看见了他在雾中的身影。他在同一边的人行道上走，步调和我完全一样。我离他很近，看到了他那件红黑格子的苏格兰外套。我们在桥中央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的蓬头散发、他那土耳其人的胡子和他那张由于总是挨饿和失眠而造成的憔悴的面孔。我还看到了他那双噙着泪水的眼睛。我的心顿时冷似冰块，因为那个人就像是流

浪归来的我自己。

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现在我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比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地回想起了那件事。从那时至今，巴黎依然如故。

1968年，当我好奇地看到自绝妙的五月爆炸发生以后有什么新变化时，我发现恋人们不再当着众人接吻，街道上换上了铺路方石，墙上写的最漂亮的标语："想象的力量"；"路面底下是沙滩"；"你们要彼此爱护，爱心胜过他人"，都被涂掉了。昨天，我走遍了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只察觉到一件新鲜事：城市的一些男人，身着绿装，骑着绿色摩托车在街上驶过，操纵着探察机械手捡拾一百万只被关着的狗每过二十四小时在世界是最美丽的城市的街道上排出的粪便。

回忆胡安·鲁尔福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茨·卡夫卡[①] 那样，无疑是我的记忆中的重要篇章。就在厄内斯特·海明威开枪自毙的那一天即 1961 年 7 月 2 日，我到了墨西哥。在那以前，我不仅没有看过胡安·鲁尔福的作品，而且也没有听到人们谈起过他。这是很奇怪的。首先，因为那个时期我很清楚文坛的情况，特别是美洲的长篇小说。其次，因为在墨西哥我最早建立联系的人是在科尔多瓦街曼努埃尔·巴巴查诺·蓬塞的德拉库拉城堡里跟他一道工作的作家们和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②] 主持的《新闻报》文学增刊的编辑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非常了解胡安·鲁尔福。然而，至少已经过去了六个月，还没有一个人对我谈到他。这也许是因为胡

① 奥地利作家。

② 墨西哥作家，(1912)。

安·鲁尔福和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的情况相反，是一位受读者广泛关爱的作家，而不是受人们广为谈论的作家。

我同梅塞德斯① 和当时尚不足两岁的罗德里戈②住在安苏雷斯移民区雷南街一幢没有电梯的楼房套间里。我们在宽大的卧室地板上铺了一床双人垫子，在另一个房间里安放了一个摇篮，在客厅里放了一张餐桌兼写字台，还有两把派各种用处的椅子。我们决定在这座依然保留着不少人情味、明净的天空和满街迷人的五颜六色的花卉的城市住下来，但是移民当局似乎不愿意让我们分享这份幸福。

在剩余的时间里，我写了一些关于哥伦比亚文学情况的报道，由当时在马克斯·奥夫③ 主持下的大学电台用有力的声音播出。这些报道如此真实坦率，有一天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竟打电话给电台提出正式抗议。据大使讲，我写的报道不是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而是反对哥伦比亚文学的。马克斯·奥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想，这是我六个月来能够找到的唯一的生活出路的告终。

但是，事实上相反。

“我没有时间听广播。”马克斯·奥夫对我说。“不过，如果情况像你们的大使讲的那样，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当时三十二岁，曾在哥伦比亚从事短暂的新闻活动，

---

① ②作者的妻子和儿子。

③ 西班牙作家（1902），自1940年侨居墨西哥。

刚在巴黎度过了三个艰苦却是有益的年头，在纽约待了八个月。我想在墨西哥编写电影剧本。那时墨西哥作家们的世界跟哥伦比亚作家们的一样，我在他们中间处得很好。六个月前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另有三本书有待面世：《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那个时期在哥伦比亚出版）、《恶时辰》（不久后在维森特·罗霍的要求下由纪元出版社出版）和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妈妈的葬礼》。只是关于这最后一本书，当时还仅仅是一部尚未完成的初稿，因为在我来墨西哥之前阿尔瓦罗·穆蒂斯[1]把原稿借给艾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2]，后者给丢失了。后来，我又重写了书中的全部短篇作品，塞尔希奥·加林多[3]应阿尔瓦罗·穆蒂斯的要求在韦拉克鲁斯大学出版。

所以，我当时已是个暗暗地出版了五本书的真正的作家了。但是我的问题并不在此，因为无论当时还是任何时候，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出名，而只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我相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的大问题是，在写了那五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钻进了一条死胡同。到处寻找钻出来的裂缝。我很了解那些能够给我指明道路的好作家和坏作家。然而我觉得自己徘徊在同心圆中。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山穷水尽。相反的：还有许多作品等待我去

---

① 哥伦比亚作家（1923），侨居墨西哥。

② 墨西哥女作家。

③ 墨西哥作家（1926）。

写。只是我肚子里没有写这些书的令人信服的、富有诗意的方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尔瓦罗·穆蒂斯提着一捆书大步地爬上六层楼，来到我家。他从那捆书中抽出一本又小又薄的书，大笑着对我说：

“看看这本东西吧，有你学的！”

那本书就是《佩德罗·帕拉莫》[1]。

那天夜里，我读完了第二遍才躺下睡觉。自从我在波哥大的一家悲凉的学生公寓里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差不多过去了十个年头了——，我还从没有这么激动过。第二天我又读了《烈火中的平原》[2]，同样使我感到惊讶。很久以后，我又在一家诊所的前厅里看到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连载着他的另一篇杰作：《玛蒂尔德·阿坎赫尔的遗产》。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我不能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小作家。

当有人对卡洛斯·维洛说我能够整段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帕拉莫》时，我依然沉醉在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其实，情况还远不止于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洛建议我把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当时我唯一不知道的故事）即《金鸡》改编成电影。这篇作品密

---

① 鲁尔福的第二部作品（中篇小说），出版于 1955 年。

② 胡安·鲁尔福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出版于 1953 年。

密麻麻地共有十六页，纸张像丝绸一般细薄，简直像一层薄粉。是用三种不同的打字机打成的。即使事先没有人告诉我是谁的作品，我也会马上认得出。语言不像胡安·鲁尔福的其他作品那么细腻，运用的技巧也不那么多，但是他的可爱的人物却在整个作品中跃然而立。后来，卡洛斯·维洛和卡洛斯·富恩特斯还要我对首次改编成电影的《佩德罗·帕拉莫》剧本进行修改。

我之所以提起这两项工作——其最后结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们迫使我更深入地了解胡安·鲁尔福的作品，虽然当时我对他的作品已经比对他本人更了解一些。事实上，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亲自认识他。

为了改编成电影剧本，卡洛斯·维洛的做法令人吃惊：他把《佩德罗·帕拉莫》的段落进行了裁剪，然后按照严格的时序重新做了编排。作为一种简易的工作方法，我认为是合法的，尽管其结果是把作品变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书：结构简单，情节松散了。不过，这对于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隐蔽的匠心很有益处，同时也使我更清楚地了解了他的异乎寻常的智慧。

在改编《佩德罗·帕拉莫》方面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名字问题。从创造名字的主观因素看，所有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讲都和人物相像。这一点在小说中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引人注意。胡安·鲁尔福讲过或者有人说他讲过，他的人物的名字是根据他在哈利斯科地方的墓地的碑石上读的碑文而取的。但不管怎样，这样说是确实无疑的：没有任何人的名字

比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名字更符合人物的身份。我觉得要找到一位这样的演员，使其身份同所扮演的人物的名字完全一致，是不可能办到的。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

另一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分不开——是年龄问题。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胡安·鲁尔福在处理人物的年龄问题上故意采取了粗心大意的态度。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曾着迷地试图确定《佩德罗·帕拉莫》中的人物的年龄问题。出于纯粹的诗一般的直觉，我总是认为，当佩德罗·帕拉莫终于能够把苏莎娜·圣胡安带到他那广大的半月王国时，她已经是个62岁的女人。佩德罗·帕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实际上，如果他从老年人那种不能满足的情欲的悬崖上跌下来，我觉得剧情会显得更宏伟、更恐怖，也更美好。科斯塔·罗斯为这两个人物确定的年龄不是这样的，但是同我所设想的相去不很远。这种诗一般的宏伟构思，对电影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昏暗的电影院里，老人们的爱情不会使任何人激动。

这些可贵的文学探索的唯一缺点是，富于诗意的美好道理并不总是符合理性。某些事件发生的那些月份对于作品分析是很重要的。我怀疑胡安·鲁尔福对那些月份是意识到了的。在诗歌作品中——《佩德罗·帕拉莫》是水平最高的诗作——，作者们往往根据时序的不同需要安排月份，不止于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避免一个不合适的韵脚或不和谐的词语，还要改变月份、日子甚至年份的名称，而不考虑这些改变可能导致一位批评家得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结论。不仅这

样对待月份和日子，对待花草也是如此。许多作家描写花草纯粹是因为它们是名花名草，却不注意它们是否符合描写的地点和季节。所以，在某些作品中写着海滩上盛开天竺葵，冰雪里开放着郁金香，就不足为怪了。在《佩德罗·帕拉莫》中，想确定在人与活人之间的明确界限是不可能的，追求精确性更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谁也不知道死亡的岁月会持续多久。

我谈到上面的一切，是为了最后说明这一点：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现在我还想说明一点：为了写这一篇短短的回忆，我又读了一遍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并且像第一次读时一样感到无比惊讶。他的作品不过300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一样经久不衰。

我见到了海明威

在1957年那个阴雨连绵的春天，有一次他和妻子玛丽·威尔希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散步，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他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正朝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去。他穿着一条很旧的牛仔裤，一件苏格兰花格衬衫，戴着一顶递球人的帽子。唯一不像是他自己的东西是那副金属架眼镜，镜片又圆又小，使他显得像一位未老先衰的老爷爷。他已经五十九岁，身材高大，十分显眼儿，但是看上去并不粗壮有力。无疑，他是渴望这样的，因为他的臀部狭小，双腿有点细瘦，仿佛两根棍子。但是在一个个旧书摊前和巴黎索沃纳大学青年学生的人流中却显得那么朝气蓬勃，让人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到，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四年时间了。

一瞬间——就像我经常发生的那样——，我觉得自己被分割在我的两种敌对的职业中。不知道是该赶上去对他进行一次新闻采访，还是仅仅穿过林荫道向他表示我的毫无保留

的钦佩心情。然而，要达到这两个目的，我却有同样极为不方便的地方：那时我讲的英语和现在讲的一样不甚熟练，并且对他讲的斗牛士的西班牙语也没有多大把握。所以，这两件可能不利于那个时刻的事情，一件我也没有做，而只是像丛林中的塔尔桑[1]那样，将双手握成喇叭状，从这边的人行道冲着另一边的人行道喊道："大——师！"欧纳斯特·海明威明白，在那一大群学生中不可能有另一位大师，于是他转过身来，高举着手，用十分稚气的声音操着西班牙语对我喊道："再——见，朋友！"平生我就这样见到过他一次。

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八岁的记者，在哥伦比亚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得过一次文学奖，但是我却毫无目的地滞留在巴黎。我的两位最重要的文学导师都是美国小说家，他们似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那时我已读过他们发表的一切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把它们作为补充读物对待，而是恰恰相反：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几乎异乎寻常的形式来读的。其中之一是威廉姆·福克纳，我从没有亲眼见过他，而只能根据卡蒂埃·布莱森为他拍的著名照片想象他像农场主一样穿着衬衫、站在两只小白狗旁抓搔手臂的样子。另一位就是刚才从对面的人行道上对我说再见的那个生命短暂的人，他使我感到，我的生活中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并且永远那样发生了。

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过：我们这些小说家读别人的小说只

---

① 美国作家赖斯·伯勒（1875—1950）笔下家喻户晓的冒险人物。

是为了了解那些小说是怎样写的。我认为这话不错。我们不满足于小说正面暴露出来的秘密，还要把它翻个个儿，看看它的接缝。我们以某种难以解释的方式把小说的主要部件拆卸下来，等了解了它那独特的钟表似的结构的奥秘后再把它重新组装起来。这种尝试在福克纳的作品方面是令人沮丧的，因为福克纳似乎没有一个写作的结构系统，而是像一群撒在一家玻璃商店里的山羊，盲目地在他那圣经般的世界里活动。当你得以拆下他的一页小说时，给人的印象却是它的弹簧和螺丝钉太多了，不可能再使它恢复原样。跟他相反，海明威的灵感少一些，激情少一些，狂热也少一些，但是具有一种明显的严格态度，他让他的螺丝钉裸露在外，清楚可见，就像火车车厢上的螺丝钉那样。也许正因为如此，福克纳成为一位和我的心灵息息相通的作家。但海明威却是一位和我的职业有着更密切的关系的作家。

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而且还因为他在写作这门学问的技艺方面的惊人知识。在记者乔治·普林普顿为《巴黎杂志》对他进行的历史性的采访中，他永远——和浪漫主义创作观针锋相对——地指出，经济生活的舒适和健康的体魄有利于写作，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如何把词句组织好，写作感到费力的时候重新读一下自己的作品是有益的，这样可以记住写作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只要没有人来访，没有电话干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人们常常说新闻工作会把作家毁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只要及时放弃新闻工作就行了。“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癖好和最大的乐趣”，他说，

"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此外，他还告诫我们，他发现每天的工作只有在知道第二天如何开始时才能停止。我相信，对写作来说，从来也没有过这么有用的忠告。这正是对付作家们最害怕的幽灵即早晨起来常常极度痛苦地面对空空的白纸的绝好办法。

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表明，他的气势可贵，但是短暂。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像他那样的、由于服从对技巧的严格掌握而造成的内部紧张，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广大而危险的范围内是难以维持的。这是一种个人的气质。他的错误是试图超越他自己的光辉极限。正因为如此，种种多余的东西在他身上就比其他作家显得更突出。他的长篇小说像是无节制的短篇小说，多余的东西太多了。相反的，他的短篇小说中的精品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似乎缺少点什么。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他的短篇小说以神秘性和优美感。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具有同样的极限，但是他很巧妙，决不超越那个界限。

佛朗科斯·麦康伯[①] 对狮子开的那一枪，很像一堂狩猎课，但是也像是对写作学问的概括。他在一篇小说中写道，一头斗牛擦过斗牛士的胸部，然后"像猫转弯儿"一样调过头来。我老老实实地认为，他那种观察是只有头脑最正常的作家才可能做出的既机智又愚蠢的行为之一。海明威的作品充满了这类既简单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描写。这类描写表明，

①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佛朗科斯·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中的人物。

他是多么牢固地抓着他自己的这个定义不放：文学写作——如同冰山——只有得到水下八分之七的支撑，才能成功。

这种对技巧的意识，无疑是海明威不能以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而以其最严谨的短篇小说赢得盛誉的原因。在提到《丧钟为谁而鸣》时，他自己说，写这部作品前，他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计划，而是随着每天写作的情况进行虚构。这一点，无需他说：因为显而易见。相反的，他那来自瞬间灵感的短篇小说却无懈可击。就像某年 5 月 16 日下午在马德里一家宿膳公寓里写的那三篇小说，当时一场大雪迫使圣伊西德罗集市上的斗牛活动取消。那些短篇小说——据他自己对乔治·普林普顿讲——是《杀人凶手》、《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三篇均为精湛之作。

以我的好恶来说，我认为在这类短篇中，最充分凝聚着他的才智的是他最短的短篇中的《雨中的一只猫》这一篇。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过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学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弄虚作假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当这部作品 1950 年出版时，招来的批评十分无情，因为批评不合乎情理。海明威觉得自己最疼痛的地方进一步受到了伤害。他在哈瓦那拍了一封感

情激烈的电报为自己辩护。对他这么一位大作家来说，拍那样的电报似乎不够体面。那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的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的岁月的无法弥补的思念之情和对他生前不多的岁月的难忘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公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当一个人和一位作家的作品共同生活那么多的时间，并且采用一种十分紧张和密切的方式，最后他会不可避免地用他的现实包裹他的想象。我曾在许多天里花费许多小时在圣米歇尔广场那家咖啡馆里看书。他认为那家咖啡馆很适宜写作，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亲切、温暖、干净、可爱。他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下午看见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她生得十分美丽、水灵，头发斜着梳理，像乌鸦的一只翅膀。“你属于我，巴黎也属于我”，他以他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毫不留情的归属力量为她写道。他发现的一切东西，属于他一切瞬间，将永远继续属于他。不看见他在一家已不是原样的书店里跟西尔维亚·比奇交谈，我就不会到巴黎歌剧院街十二号去，以便赢得时间，直到下午六点，也许詹姆斯·乔伊斯会到来。在肯尼亚草原上，只要朝草原上望一下，他就成为草原上的水牛和狮子的主人，成为狩猎术最复杂的秘密的主人，成为斗牛士和拳击手、艺术家和刺客的主人，这些人在

属于他的时候才在一瞬间存在。西班牙、意大利、古巴、半个世界都充满了这样的地方，他只要提一提它们，它们就属于他。在科希马尔，即《老人与海》中的孤独捕鱼人所住的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镇，有一座纪念海明威业绩的小庙，里头有一尊他的上着金黄色油漆的半身塑像。在比希亚庄园，即他在古巴的、直到生前不久他一直未离开的藏身处，他住过的房子原封未动地坐落在树林中，里头放着他的各类图书，他的狩猎缴获物，他的写作架，他的巨大的寿鞋，他生活中使用的和从全世界搜集来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直到他去世都属于他，他死后，它们仍然以他赋予它们的灵魂活着，他仅仅通过支配它们时使用的魔法，就使它们具有了灵魂。几年前，我坐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汽车——他是个酷爱文学的读者——，看见座位上有一本红皮小书。“这是海明威大师的书”。他对我说。事实上，在海明威去世 20 年后，他仍然那么经常、那么短暂地出现在让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就像大概是五月间的那个早晨那样，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对我说“再见，朋友”。

年轻作家的不幸

在我当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双重命运中，迄今为止我只记得两件令我后悔的事。这就是我曾赢得两次文学竞赛奖。第一次是在1954年，主办者是哥伦比亚作家协会。该协会当时的秘书要我拿一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参加比赛，因为他还没有收到一篇够获奖水平的作品，他担心比赛会以失败告终。我交给他一篇未写完的故事，即《周末后的一天》。过了二三天，那位秘书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我获得了一等奖，仿佛这是一桩跟他的奔走毫无关系的奇迹。我不记得当时奖给了我多少钱，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那笔钱刚刚够我庆贺成功的。获得头奖，当然会在报界引起反响。但是，尽管当时我不过二十五岁，对那种转瞬而逝的荣誉我却已不那么激动，因为我依靠在外省的报刊上写署名的文章挣钱餬口已有五年。在那个时期我是《观察家报》的在编记者。隆重的评奖活动——主席台上摆着鲜花，有关人员

发表声音振颤的讲话——留给我的印象仿佛是看了一出公演的令人不快的喜剧。

第二次评奖活动的情况更加可怜。那是在1962年，由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的哥伦比亚子公司主办。奖励内容为当时的三千美元奖金，免费出版获奖作品。那个时期我住在墨西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诱人的事情。但是主办者不惜包下一切费用派我的亲密朋友吉列尔莫·安古洛老师来说服我参加评奖。主办者这么做的原因依然是：他们尚没有收到一部配得其奖的作品，担心评奖活动以失败告终。

一年多以前我就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我并不关心书稿的出版，因为那个时期令我感到愉快的事情不是出书，而是纯粹的写作。我把手稿卷起来，用领带一捆，塞在了箱子底下。我把手稿翻出来，照样用领带捆着交给了吉列尔莫·安古洛，既没有花工夫重看一遍也没有考虑取个什么书名。直到小说要上机印刷了，我才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恶时辰》。我用得到的三千美元奖金买了一辆旧汽车，交了我的小儿子的出生费，这样，也算是一举两得了。但是去波哥大领奖时，我没有让那家公司为我交付任何费用，因为不然的话我会有一种再一次为一家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公司效力的不快感觉。

二十年后，当我回想起那些困难的岁月、看到现在的文学评奖活动这么频繁，我仍然觉得那时我的顾忌是有理由的。然而，今天一些和我那时同龄、怀着同样的幻想的作家参加文学比赛的那股几乎是幼稚的热情，使我想到他们没有

我那样的顾忌，而是完全相反，许多作家不是为了某种不可避免的需要写作，原本应该这样，而是仅仅为了赢得比赛。这是应该让他们感到惶恐的，就像让我感到惶恐那样。因为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是准备将右脚踏进大作家的地狱。

事实上，出版社主办的文学评奖活动不利于任何人，而只利于他们自己。出版商们认为，就像他们从文学评奖活动创办的那个不幸的日子起认为的那样，是他们帮助作家特别是新作家出版了他们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家应该报答他们。不久前一位出版商对我讲，出版业不是作家经营的，也不是作家和出版商一起经营的，而是出版商独自经营的。我对他说，这就如同幻想石油公司不要石油企业的谦恭合作而独自经营石油工业一样。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救世主的思想导致出版社制造了评奖活动的骗局。他们以人类的大救星和文化大天使的高傲态度组织和举办评奖活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以没有人给出书的作家为代价，提高他们自己企业的声望。

我的这些想法是围绕一位哥伦比亚青年小说家正在独自进行的针对“普拉萨——哈内斯”出版社分社——每年在哥伦比亚举办一次长篇小说评奖活动——的正当斗争而产生的。据出版社的《启事》讲，获奖者的奖金为三十万哥伦比亚比索，即六千美元。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笔奖金，因为出版社让获奖者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中规定：这笔钱是出版社预付给作者的版税，将分期从稿酬中扣除。然而，还不只于此。获奖者得到的版税并不是书价的百分之十（这个比例是

正常的)，而只有百分之七。这就是说，出版商用卖掉三千册书的钱——在作品获奖的反响下，卖掉这么多书并不困难——不但补偿了所有的费用，而且在文化机构的帮助和其他作家与艺术家的参加下得到了报界对评奖活动的无偿宣传。根据一种保守的估计，“普拉萨——哈内斯”在每年的评奖活动中通过报界的无偿宣传，可赢得大约三百万比索的收益。这就是说，出版商不仅对新作家进行了一次掠夺，而且让新作家轻而易举地为其发财帮了忙。但是，似乎这样做还不满足，出版商让作家签的合同还要求作家终生把作品的出版权交给出版社，而不像通常允许的那样只有五年。而且不只是在美洲大陆的一部分地区是这样，在讲西班牙语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然而，投入市场的书一旦售完，书就被合同所禁锢，没有希望再重印，书也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整个大陆发行，而只能勉强在获奖的国家发行。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青年作家更不幸的了，尤其是在这个都想成名的不祥的年代。从前，当我们那一代年轻作家由于没有其他出路而不得不写作的时候，出版商都不愿意理我们。为了找到愿意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人，我用了五年的时间。而我找到的人是个没有资金的穷出版商，为了躲避债权人，他逃离了哥伦比亚。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是我真正的文学之父，那时他把他的书商朋友们叫来购买放在出版社书库里的我的书，我的一些老朋友则在报上写书讯，让人们知道我的书已在出售。几年前我发现那次粗糙印出的书没有卖光，所剩的书还在波哥大街

头摆着卖，一比索一本。我尽可能把那些书全买了下来，觉得好像收购了我自己过去散失的东西。我喜欢讲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作家走火入魔，总想谈论我们自己，而只是希望这对后来的、仍然认为没有出版商就不能生活的作家有点用处。总有一天——但愿这一天不太遥远——，他们会相信，不仅没有出版商可以生活，而且完全相反：没有我们这些作家，出版商便不能生活。“出版商是多么可怜。”

欧洲见闻

世界上最古老的新职业

今年巴黎的秋天姗姗来迟，随着一场寒风骤然到来。寒风将树上残留的金色叶子一扫而光。露天咖啡馆中午就关门了。交通混乱不堪。比往年结束得晚的、阳光灿烂的夏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几个小时的工夫仿佛过去了几个月。傍晚来得早，显得凄楚。不过，人们并不抱怨，因为巴黎那种雾濛濛的天气毫不奇怪，它经常伴随着巴黎，使巴黎人感到十分舒服。

在皮加尔区的小巷里从事其老职业的妓女中，最漂亮的是一位光彩照人的金发女郎。在某个光线暗些的地方，你准会认为她是一位电影明星。她穿着最时髦的黑色连衣裤。在寒风吹来的时候，她穿上了一件真正的貂皮领大衣。当一辆小汽车停在她面前时，她正这样站在杜佩雷街一家饭店前以二百法郎的价格出卖自己。另一个衣着入时的漂亮女人在驾驶室里用步枪对她开了七枪。那开夜里，当警察查到凶手

时，发生在城郊的那场悲剧早已在报界引起强烈反响，因为有两个新的因素使此事显得异乎寻常。实际上，无论是遇害者还是杀人者都不是美丽的金发女郎，而是两个不折不扣的男人，两个男人都是巴西人。

这样的新闻不过是验证了在欧洲家喻户晓的事情：大城市街头的卖淫活动如今成了男人的职业，而在这些男人中最贪婪、出价最高、衣着最讲究的是伪装成女郎的拉丁美洲青年。根据报刊上的资料，在法国街头伪装成女人的二百个男人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巴西。在西班牙、英国、瑞士或联邦德国，这种生意似乎还要红火，人数还要多，国籍也多种多样。这一现象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种世界上最古老、最保守的职业在所有的国家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欧洲时，卖淫是一种既兴隆又有秩序的行业，且有准确的等级和恰当划分的地区。

对加勒比地区的妓院，我仍然保留着一种田园诗般的印象。在那些跳舞的院子里，扁桃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花环，一群母鸡在音乐声中和美丽的、不驯服的混血女人中间旁若无人地啄食。那些混血女人卖淫，与其说为了金钱，不如说是为了节日。有时她们会非常纯真地为爱情自杀。有时一个男人会留下来和她们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过腻了流浪生活，而且因为听见她们睡觉时的呼吸声觉得很幸福。早饭比在家里吃的更富有家庭特点，更亲切。真正的节日上午11点在灯光已熄的扁桃树下开始。

我在非常富有人情味的学校里受的教育，欧洲妓女的那种做生意的严格态度只能使我感到沮丧。在日内瓦，她们在湖边转游，她们和真正的已婚女人的唯一区别是她们在雨天、晴天、白天和晚上都像行业的幌子一样撑着花伞；在罗马，可以听见她们像博格谷地丛林里的鸟儿的叫声一样打口哨；在伦敦，她们被笼罩在雾中，变得无影无形，必须像航行一样点上灯才能辨清方向；被法国三十年代的坏电影和可恶的诗人理想化的巴黎妓女最冷酷无情。然而，在极乐净土的通宵达旦的酒吧里，人们突然发现了她们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在对夜晚的收费感到不满的专横的楚佬面前，她们像新娘一样哭泣。经过那么野蛮的职业磨炼的女人竟然会有这么软的心肠，令人难以理解。我的好奇心如此强烈，几年后我认识了一位弗罗里达楚佬，我问他，面对那么凶猛的女人，怎样才能牢牢地控制她们。他满不在乎地回答：“用爱情。”由于害怕听不懂他的话，我没有再问什么。

在那个充满剥削和死亡的世界里，伪装成妓女的男人的闯入，只能使那个世界变得更污秽。他们的重大变化是同时从事两种职业：当妓女和当同性恋者。他们行事自主，性情残暴。由于存在着危险性而被 妓女们放弃的夜晚活动的地盘被他们用手中的枪占领，但在大多数城市，他们用大棒子对付妓女和她们的嫖客，在欧洲城市最繁华的街角上行使他们征服的权力。许多拉丁美洲人加入这种对大男子主义的崇拜，既不能削弱也不能增加我们的荣誉。这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不堪的又一证据，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还有更严重的

社会问题。

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同性恋者。他们有硅晶般光彩照人的胸部。有的最后实现了动手术的金色之梦，永远改变了性别。但是许多人并不是同性恋者，他们凭着借来的——或强夺来的——武器闯荡生活，这是一种不良的谋生方式。有些人是无忧无虑的家长，他们白天从事某种慈善事业，夜晚等孩子们睡下后便穿上老婆的礼服上街。还有些人是穷学生，用这种办法解决学费问题。最精明的人一个晚上可幸运地挣到五百美金。我妻子说，这比写作强多了。

神奇的加勒比

苏里南——并非全世界都知道——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独立国家，直到几年前它还是荷兰的殖民地。苏里南有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十八万四千多一点的人口。居民来源复杂：有印度的印度人、本地的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非洲人、中国人和欧洲人。首都帕拉马里博——我们用西班牙语读它，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当地人读它，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上——是一座充满噪声的凄楚的城市，有一种比美洲精神还强的亚洲精神，除了官方语言——荷兰语外，市民还讲四种语言和许多种方言土语，人们信奉四种教：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摩托维亚教、改革的荷兰教和路德教。目前，苏里南由一群年轻军人统治着。关于他们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包括邻国的人。倘若不是因为每星期有一班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加拉加斯的飞机按常规停留，谁也不会记得这个国家。

我在很小的时候听到过人们谈论苏里南。人们谈到它，并不是因为苏里南本身——那时它叫荷属圭亚那——，而是因为它处在法属圭亚那边界上，在法属圭亚那首都卡宴城里，不久前还存在着像魔鬼岛一样可怕的监狱，它存在时和消失后都无人不晓。有幸从那座地狱逃出来的少数人，既可能是野蛮的罪犯，也可能是理想主义政治家，他们分散在安底列斯的许多海岛上，直到有机会返回欧洲，或者改变身份定居在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边。其中最有名的是亨利·查里，《蝶》的作者，他在加拉加斯开饭店，并从事其他不怎么光彩的职业，几年前正置文学荣誉的峰颠时死去。但是他既应该受到赞扬，也不配受人赞扬。其实，那样的荣誉应该属于写过更好的作品的另一位法国作家，他比《蝶》早得多地描写过魔鬼岛的恐怖景象，但是今天他没有出现在任何地区的文学中，他的名字也没有载入百科全书。他叫勒内·贝尔博努瓦，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前（今天的记者谁也不记得原因何在），他在法国当记者，后来继续在美国当记者，他在那里取得了避难权，诚实地度过晚年死去。

在这些逃亡者中，有些人逃到我的出生地哥伦比亚加勒比岸边的那个镇子。那是在“香蕉热”时代，当时人们不是用火柴点烟，而是用五比索的纸币。有几个逃亡者和居民融为一体，成为十分可敬的村民，他们的特点是讲话困难和闭口不提他们的过去。其中有一个叫罗杰·钱塔尔的，他不会干别的，只会不打麻药给人拔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临近巴比伦节的时候——在一个令人难以置

信的、并不多么羡慕巴比伦的镇子上——，他死命地喝酒，在快乐的发泄中大叫：“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谵妄中，他像施主一样慷慨大方，谁也想不到他会那么傲气。他赠给教会一尊通常那么大的石膏神像，教徒们欢庆了三天，表示对神像的崇拜。一个星期二，三个秘密警察乘坐十一点的火车赶来，立刻闯进他家。钱塔尔不在家，但是警察仍然当着他在当地娶的女人的面仔细地进行了搜查。他妻子最初没有反对，直到警察试图打开卧室的大衣柜时她才提出抗议。警察不顾一切，打碎了玻璃，发现了藏在玻璃和木板之间的一百多万美元伪钞。从此，钱塔尔下落不明，后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一百万伪钞是装在那尊圣像里带进该国的，没有一位海关官员出于好奇而进行检查。

这一切，在1957年圣诞节前不久突然浮上我的脑海，当时我不得不在帕拉马里博停留一小时。飞机场是一片平地，有一幢用棕榈叶盖的小房子，房子中央的柱子上有一台电话，牛仔电影上使用的那一种：有一个摇把，用力摇很多次才能听到回答。天气热得烤人，空气充满尘埃，一动不动，还有一股睡觉的鳄鱼味，从别的世界来的人就靠这种气味辨认加勒比。在紧靠电话柱子的一条凳子上，坐着一个特别貌美的黑女人，长得年轻而结实，头上缠着一块某些非洲国家的女人用的那种五彩斑斓的头巾。她已有身孕，快生产了。她静静地吸着一支雪茄，其方式就像我一个人见过的那样：燃着的一端含在嘴里。烟从另一端冒出，就像轮船上的烟囱。她是飞机场里唯一的人类。

一刻钟后，来了一辆破吉普车，车子笼罩着一团炽热的尘烟，车上下来一个身穿短卡裤，头戴软木头盔的黑人，他手里拿着办乘机手续的文件，他一面办手续一面打电话，用荷兰语大喊大叫。十二个小时以前，我坐在里斯本的海滨露天咖啡馆里，面前是浩淼的葡萄牙海洋，我看见一群群海鸥钻进港口的饭馆，躲避凛冽的海风。那时的欧洲是一块冰雪覆盖的衰老的大陆，明亮的白天不过五小时，人们想象不到真的存在一个像我们刚下飞机到达的那么一个烈日炎炎、番石榴腐烂的世界。然而，从那次经历幸存下来的，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保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形象，是那个冷漠的黑美人儿。她的腿上放着一只筐，筐里盛着卖给旅客的生姜。

现在，我再一次从里斯本飞往加拉加斯时，重新在帕拉马里博停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到错了城市。现在飞机场是一幢装着大玻璃窗的明亮大厦，可调节的空气十分柔和，飘着一股孩子吃的药品味，播放着在世界上一切公共场所都毫不留情重复着的宏亮乐曲，一片片免税豪华商品商店，商品丰富而多样，像日本的商店一样。一家大众咖啡馆里熙熙攘攘，那里汇集着苏里南的七个种族、六种宗教和数不清的语言。那种变化，好像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个世纪。

我的老师胡安·博什，除了写过其他许多作品外，还写过一部关于加勒比的不朽历史。他曾私下里说，我们这个神奇的世界就仿佛水泥底下复活的不可战胜的草木，它们最终会把水泥拱开，弄碎，重新在原地茂盛地生长。当我从帕拉

马里博机场的一道意想不到的门出来时，我对博什的话的理解更深了。我看见一排年迈的女人冷漠地坐在那里，她们全是黑种人，都缠着五彩头巾，都把火头儿含在嘴里吸烟。她们在卖本地生产的水果和工艺品，谁也不肯费吹灰之力说服任何人。她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卖生姜，她不是年岁最老的。我立刻认出了她。说实话，发生这样的事，我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买了她一把姜。我买姜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怀孕的样子，便直截了当地问她的儿子怎么样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不是儿子、是女儿”。她说“她二十二岁了，刚刚给我生了第一个外孙。”

对付恐机症的办法

我又一次干了我曾下决心永远不再干的蠢事。这就是夜间乘飞机不停留地飞越大西洋。飞了漫长的十二个小时。在那十二个小时里，不但不知身在何处，而且丧失了方向。但是这一次飞行却如此完美，有一会儿我确信飞机一动不动地停在了大西洋途中，人们不得不另外调一架飞机来让我们转乘。就是说，我总是经受着恐惧的折磨，惟恐飞机掉下来。然而，这次我却感受到一种新的恐惧，一种巨大的恐惧：飞机永远停在了空中。

在那种令人厌烦的情况下，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飞机飞行中让乘客吃的食物和在陆地上吃的食物那么不同。因为小鸡——死的和烧的——飞的时候也害怕，香槟酒的泡沫会过早地消失，色拉干瘪的样子特别难看。这种情况和电影差不多。我看过一些电影，在飞机上再看的时候会改变含义，因为演员们的心灵不愿意一成不变，生活最终会不相信本身的

逻辑，所以飞机上的电影决不可能成为好电影。不只于此：电影越长，越烦人，人们就越表示感谢，因为这样可以让一个人比看到的还要进行更多的想象，甚至比能够看到的还要做更多的虚构。这一切可以帮助他战胜恐惧。

类似的办法不计其数。我有一位女友，上飞机前好几天睡不着觉。但是当她把自己关在飞机上的厕所里后，她的恐惧心情便完全消失了。只要可能，她就呆在厕所里不出来，她在里头以只有飓风眼才能相比的平静状态看书报，直到飞机上的负责人强迫她回到可怕的座位上去。真是奇怪，因为我一向认为，对飞机的恐惧，一半是由于被关在飞机里的压抑的心情，任何地方也不像被关在医院里那么让人感到恐惧。但是在飞机的厕所里不同，在那里会有一种不可复得的自由感。我小时候坐火车旅行时，最喜欢从厕所的窗口看外面的世界，一个一个地数两个村镇之间的桥梁、赤身在桥下洗澡的姑娘和草中受惊的鳄鱼。我第一次登上一架飞机——三个半小时飞行一千公里的那种原始的双发动机飞机——的时候，我怀着美好的心情想，从舷窗口可以看到比火车上看到的更丰富的生活，可以看到住宅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在虞美人中走动的乳牛和海明威写的冻死在乞力马扎罗雪山上的豹。但是我遇到的却是如此悲哀的证明：那个生活瞭望口是封闭的，像放水那么简单的事情却包含着死亡的危险。

许多年前，我打消了关于白酒是医治飞机恐惧症的良药

的普遍幻想。按照路易斯·布纽埃尔[1] 的处方，离开家之前我喝了一大口干马提尼，在飞机场上又喝了一大口，上飞机时喝了第三口。当然，起飞的头几分钟是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下度过的，那种感觉和人们希望的相反。实际上，平静的心情是那么真实和异常，一个人真渴望飞机一下子掉下去，免得再让人想到恐惧。经验最终告诉我们，白酒不仅是一剂汤药，而且也是恐惧的帮凶。对长途旅行来说，没有比这样做更糟的事情了：喝头两口，心情很平静；再喝两口，有了醉意；喝最后两口，进入了梦乡，三个小时后醒来，神志很清楚，觉得不过睡了三分钟，后来的情况也没什么，不过脑袋疼痛十个小时罢了。

阅读，在地上治愈过那么多疾病，在空中却毫无作用。一个人开始读一部编织得很好的长篇小说，最后却不知道谁杀死了谁，原因何在。我总是认为，在飞机上没有什么人比那些无动于衷的先生们更可怕的了：当飞机发生颠簸要出事的时候，他们仍在看书读报，既不眨眼也不旁顾。我认识一个人，在穿越北极的不平坦的天空、从纽约飞往罗马的漫漫长夜中，他一直坐在我旁边，始终没有中断读他的《罪与罚》，他一行一行地读，一页一页地翻，连吃晚饭也不停止。但是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喘了口气对我说："这本书好像挺有意思"。然而，乌拉圭作家卡洛斯·马丁内斯·莫雷诺却能够证明，对坐飞机来说，没有比带一本书更好的了。二十年

---

① 西班牙电影导演。

来，他坐飞机时总是带着那一本几乎读烂了的《包法利夫人》，即使他几乎能够把它背诵下来，也还是假装在读它，因为他确信这是对付死亡的一种确实可靠的办法。

我总是这样想，除了音乐，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不过，不是飞机上播送的音乐，而是我插进录音机用耳机听的磁带音乐。实际上，飞机上的音乐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我常常不安地问自己，飞机上的音乐节目到底是谁制作的，因为我不能想象还有谁更不了解音乐的药用价值。根据某种十分简单的想法，他们总是喜欢播放和天空、无限的太空和地球现象有关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就像布拉姆斯所称的布鲁克纳的音乐："缓慢的交响曲"。我有我自己乘飞机听的音乐，数量不计其数。我有自己的音乐节目，是根据航线的飞行时间的长短，白天还是夜间旅行，以及飞机的类型制定的。拉丁美洲人回国时喜欢乘坐从马德里到波多黎各的飞机。节目确切而恰当：是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我总是认为——就像我以前讲的那样——，直到这个星期为止——对我来说，这个星期挺晦气——，为了对付恐机症，除此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阿利坎特一位读者来信对我说，他发现了另一种更好的办法，即在飞机飞行中尽可能地做爱，次数越多越好。关于这一点——像电视剧那样——我们下星期再谈。

一个令人困惑的星期天

上星期，一位巴塞罗那的出版商在卡塔赫纳下飞机，和我一道进午餐。在投机的交谈中吃完具有本地风味的午餐后，我带他游览了这座古城。他从心眼儿里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后来，我请他到我父母家里喝咖啡。我父母有五十四个孙子，其中有不少孙子去看过他们。最后，不知怎么，我们在一次官方的招待会上相遇。人们非常热情地对待他，他不得不在三刻钟内恭听六个人讲话，喝了十一杯威士忌。傍晚离开时，他依然被那么多新奇事弄得迷惑不解，觉得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最奇特的事情之一。“你在你的作品里什么也没有虚构”，告别时他对我说。“你是一位不假想象的简单记录员。”其实，前一天他已把纷纷扬扬的大雪抛在世界另一边，准备过一个平静的星期天，却不料想突然被牵绕在加勒比地区的魔幻中。

糊涂感觉在机场上就发生了。在他指给我看之前，我一

点儿也没注意上飞机和下飞机的门那么难以分辨。的确如此，有一扇门上钉着一个牌子，上写“乘客出口”，飞机上的乘客由此门下飞机。另一扇门上也钉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同样写着：“乘客出口”，到达的乘客由此门离机。糟糕的是，两个牌子都对，因为乘客可以从两个门下飞机。另一方面，机场上有一间等候室，它不是为了让人等候到达的乘客，而是为了让离开的乘客等候飞机起飞。那里当然整齐地放着几排干净的椅子，椅子对着好儿道编着号码的门，门上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国内航班出口”。但是这些门并不使用，乘国内航班到达的旅客根本不走这些门，而是走国际航班的出口，那个出口在另一幢独立的楼里；然而，当一个女人的热情声音通过大喇叭要求登机的乘客从那个出口出去时，谁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不必理会那些牌子，”一位管旅游的警察对我们解释，“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从哪里进，从哪里出”。

对我来说，卡塔赫纳最令人怀念的角落是阿尼马斯海湾的码头，不久前那里有一座中心市场。白天，那地方呈现一片节日的叫卖声和缤纷的色彩，到处是加勒比地区那种令人难忘的众人的欢闹声。夜晚，那里是酒鬼和记者们吃喝的好地方。在那里，在露天餐桌对面的海上，一条条轻便船天亮时起航，它们载着红脸蛛猴和绿色小香蕉，载着一批批体弱多病的妓女，驶向库拉萨奥的玻璃饭店、关塔那摩、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世界上最美丽也是最凄凉的岛屿。一个人坐在黎明的星光下聊天，女人气儿的厨师们——他们

粗话连篇，待人和气，耳朵上总夹着一朵康耐馨花——在用灵巧的手烹炒地方风味中最抗饥的菜：肉条炒大葱段加油炸大蕉片。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用在那里听到的事情为第二天的报纸写文章。

我的出版商朋友对那个地方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在《家长的没落》中读到过对它的描写，那是夜间的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神圣礼仪会法官，封圣申请人和宗教信仰倡导者德梅特里奥·阿尔杜斯主教阁下曾在那里用拳头同水手搏斗。我说他记得那个地方，可是当我真的带他去参观时，他却不认得它了。因为公共市场已被取消，码头被拆除，在原地建起了一座高大的古怪建筑物：世界上最丑陋的楼房，和城市完全相反。

“国际会议中心”——甚至它的名称都说明，是受到“迈阿密会议”的启发而修建的——大约耗费了十五亿比索，相当于市政预算的七倍。我的朋友作为杰出的卡塔卢尼亚出版家懂得数目字，这时明白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含义。实际上，三千名与会者至少需要乘十辆最大的汽车才能到达城市里，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走出飞机场的七道门，城市的交通必须瘫痪一整天才能把他们从饭店运到会议中心，再瘫痪一整天才能把他们运回去。即使这样，他们自己的小汽车也会造成可怕的交通阻塞。

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必要的话，多数与会者会成为企业家，和自己的金融中心保持永久的联系。但是卡塔赫纳的电话服务非常落后，打电话时必须开着窗子，因为你说的话，

从听筒里听到的还不如从窗口听到的清楚。仅仅为了让长途电话回答三千名焦急的与会者，就得要三十二年。在我的朋友之前，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就做过这样的估计，他们认为那种计划简直愚蠢透顶。但是当地的倡导者却以这样一个权威性的理由坚持那么做："城市需要它每年给美女皇后加冕"。

我的朋友被这么多神奇的现实主义现象压得透不过气来，为了喘一口气，他感谢我请他在我父母家喝的咖啡。他觉得还不如不喘一口气好。的确，就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父亲刚刚满八十岁，我母亲七十六岁。但是没办法让他们坐下来休息。我父亲每天都冒着灼热的阳光步行，一直走到市中心。他想去亚马孙丛林里去野游，我们没能劝住他。我母亲一辈子坚持干家务活，她甚至想把电动洗碗器洗不干净的盘子洗干净。我的朋友问她是不是有人帮助她。她用自己的语言回答说："我有两个女秘书。"我的朋友问她从何时开始的，她又回答说："从十五天以前。"父母二人的秘密是，他们从来也不考虑自己的年纪。不久前，我父亲买了几张债券，到2000年才能兑换。就是说，到他一百岁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责备他缺乏考虑。他冷漠地回答："我买债券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保证你母亲过一个平静的晚年"。

我们交谈时，一个孙女走来对我们说，前一天夜里，她没有睡好。"我从厕所回来时，"她告诉我，"我看见自己仍然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我们十七个兄弟姐妹中的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走过来。姐妹中有一个不久前还是修女，她

和一个信摩门教的兄弟展开了一场关于比较宗教的对话。另一个兄弟让人按照尺寸锯了一块木板，但是在家里重新测量时，却比在木匠铺里短了些。“问题是在加勒比地区，没有两把米尺是一样的。”他说。果然，他把一把米尺和另一把米尺一比，发现其中一把尺子短一毫米。另一个姐妹用钢琴演奏海顿的第五号四重奏鸣曲。我让她注意，她演奏得太快，像演奏马祖卡。“问题是，我一弹钢琴，速度就快。”她说，“我弹钢琴，是为了使自己平静。但是弹着弹着还是快了。”当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八十四岁的姨妈艾尔维拉敲门时，我们正在这样交谈。我们有十五年没见她了。她乘坐出租快车从里奥阿哈来。她头上包着一块防日光晒的黑布。她张开双臂高兴地走进来。她说话声音很高，让大家都听见：“我是来告别的，因为我几乎就要死了。”我的朋友再也不能忍受了。傍晚，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竭尽全力让他相信，那是我们每天的现实生活；那个使他困惑的星期天的每一件事情，我并没有——只为使他感动——事先准备。

莫斯科，世界上最大的村庄

莫斯科——世界上最大的村庄——，不是按人类的尺寸建成的。它令人感到疲惫、惶惑，连树木都没有。楼房不过是大胆加高的乌克兰农村的小房子，就仿佛给了泥瓦匠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工钱和更长的时间让他们发挥他们那种令人不安的建筑艺术思想。市中心有一个个外省的庭院，把衣服晾在铁丝上，女人在院子里给孩子喂奶。此外，那些农村的庭院大小也不同。莫斯科的一幢普通的三层楼，像西方城市的五层公共楼房那么高，无疑造价更贵，看上去更臃肿，更引人注意。有些房子好像是用机器简单刺绣的。大理石没有留下安玻璃的地方。看不到市场。国营商店的不多的橱窗——贫乏而简单——被淹没在占优势的食品店的建筑中间。在留给行人的开阔空间里，人群像熔岩一样缓慢地不可阻挡地流动着。当把我拉向饭店的小汽车沿着视野无限的高尔基大道冒险行驶的时候，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

——我第一次登上月球才会那么激动——。我心想，至少需要二千万人才能住满莫斯科。译员老实地向我证明说，莫斯科只有五百万人，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住宅。

没有普通的街道。只有一系列林荫道汇合到全城政治、地理和感情的中心：红场。交通工具——没有自行车——五颜六色，光怪陆离。乌拉圭大使的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大使的卡迪拉克样式古老——和苏联的中间色的小汽车形成对照，那是仿照战后美国的车型制造的，前苏联人驾驶起来像驾马车一样。这一定是三驾马车的传统。一辆辆这样的小汽车像球一样跳动着从郊区沿着林荫大道高速滚向市中心。它们突然停下来，然后沿着信号灯转一圈儿，从林荫大道的另一边不顾一切地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必须开到市中心，才能进入辐射型的交通网。直到有人向我们解释了交通的管理问题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到任何地方都需要一小时。有时，为了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搭车，必须走一公里。

人群——在欧洲是最密集的——似乎并不为存在的问题感到不安。在火车站，我们遇到一群莫斯科人，尽管举办联欢节，他们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当车门敞开可以上火车的时候，他们被挡在了栏杆后面，他们像牲口一样以一种迟钝的下意识和纯粹的本能等待着。阶级的消失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人们处在同一水平上，完全平等、穿着旧的、裁剪得很差的衣服，脚上的鞋子质量低劣。他们不慌不忙，好像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生活。他们和农村那些憨厚、善良和健康的人一样，只是人数大量地增加了。“自从我来到莫斯科

后，”一位英国代表对我说，“我就觉得像在放大镜后面。”只有和莫斯科人交谈后，只有具体地了解他们每个人后，你才会发现那个漫不经心的人群是由毫无共同点、一点儿也不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构成的。

巨幅肖像并非斯大林的发明。它是来自苏联人心理深处的一种东西：对大小和多少的直觉。一个星期到莫斯科来的人——包括外国人和本国的游客——多达九万二千人。运输这些人的火车不会遇到麻烦。一万四千名译员带着避免混乱的具体指示准时到达需要他们的地方。每一个外国人都确信会受到特殊的接待。不存在供应、医疗服务、城市交通方面的问题。任何一个代表也没有收到某个人的指示。似乎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活动，既不受限制也不受控制，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构成了一个脆弱的链条的一部分，严格守纪律。每个代表团支配一定数量的汽车：一共二千三百辆。一般不存在交通拥挤和限制问题。此外，代表们还持有写着自己的译成俄文的名字、国籍和在莫斯科的住址的证件，凭此证件可以乘坐任何一辆服务车辆旅行。对谁也不指定睡觉的时间。但是半夜十二点所有的机构都关门。一点钟交通停止。莫斯科于是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城市。

我有幸目睹在那个时刻以后发生的事情。一天夜里，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我们的饭店位于离红场坐公共汽车45分种才能到达的地方。我向在那里徘徊的一个姑娘求助——在凌晨两点钟的莫斯科，她拿着一堆用塑料做的小乌龟——，她告诉我说，可以搭出租汽车。我对她说，我只有法

币，并且在那个时刻联欢节的证件不管用。她给了我五十卢布，指给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出租汽车。她还送给我一只塑料小乌龟作纪念。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一个寂静的城市里，我等了两个小时也未等到一辆出租车。最后我去了警察局。我让警察看了我的证件，他们让我坐在一排条凳上。有几个喝醉酒的傻乎乎的苏联人在凳子上打磕睡。警察收去了证件。过了一会儿，警察让我们上了一辆无线电巡逻车。在两个小时里，巡逻车把集中在警察局的醉鬼们遣送到莫斯科的各个角落。警察一家家的叫门。直到出来一个负责任的人，才把醉鬼交出去。当听见有人那么正确、那么亲切、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喊我的名字时，我正酣睡。是一位警察。他把证件还给我——上面写着我的俄文名字——，并告诉我，到了我住的饭店了。我对他说："谢谢。"他把手举到圆形军帽上，立正站好，突然回答我说："请下车！"

体育场有一种由无形的权威营造的良好秩序。那里可容纳 12 万人。联欢节开幕的晚上，代表们成群结队地前去观看了一个小时的表演。白天，街头的人群送给代表们许多五彩气球。他们拿着气球高兴地漫步，由于开幕式在晚饭前举行，代表们便带着气球去了体育场。七点钟，看台上就渐渐坐满了人。演出八点开始，十点钟体育场便又空了，关门了。一分一秒也不乱。翻译们在模范遵守纪律的、不设警戒线的、五颜六色的人群中开着路，对代表们说："我们就坐在这儿。"代表们仍然拿着五彩的气球。表演由三千名体操运动员担任。表演结束后，一支由四百名乐手组成的乐队演

奏了青年进行曲，苏联代表团的看台上升起了气球。整个体育场的观众都放起了气球。被设在城市四方的防空探照灯照亮的莫斯科的天空布满了五彩缤纷的气球。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副美丽壮观的景象——那是我们自己无意识造成的——，是节目单上事先就安排好的。

那种关于大型活动、关于群众性的组织工作的观念，似乎是苏联人的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最终会对数量习惯的。在克里姆林宫花园里举行的、一万多来宾参加的一次联欢活动中所放的焰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焰火的爆炸声使大地都震动了。没有下雨：乌云事先被炸散了。当下午一点钟，陵墓——那里安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的门打开的时候，陵墓前排队的人已长达两公里，人群不停地向前走，谁也不能在灵柩前停留。四点钟，陵墓关闭，长队依然有两公里。即使在冬天，在暴风雪中，陵墓前的队伍仍有两公里长。队伍不能再长了，因为警察不允许。

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里，剧院的戏剧演出让人难以置信。国家歌剧团在博尔乔伊剧院演出了《伊戈尔王子》，一周内每天演三场，每一场都有六百名不同的演员上台。没有一位演员每天可以超过一场。有一出戏，整个剧团都参加了，此外还有五六匹活生生的马。这种大规模的演出——长达四个小时——仅运输布景就需要六十节火车车厢。

但是苏联人却被一些小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们参加几次联欢节的大型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处在自己的环境中的苏联：它激动人心，宏伟巨大。但是当我们像离群的绵

羊、闯入别人的生活时，我们却看到一个陷在小小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困惑茫然、错综复杂、面对美国产生一种严重的自卑情结的苏联。我们到达时的情况，允许我们从那里开始。没有人等我们，因为我们几乎晚到了一星期。一个看来是偶然来到车站的、流利地讲法语的姑娘把我们领进一间候车室。那里也有几头离群的绵羊：三个非洲黑人。好几个蓬头散发的男人多次打电话，几乎白打。我觉得电话局存在着谁也解决不了的线路问题。最后，有一个人用马马虎虎的英语对我们说，由于语言问题，我们还是分开吧。佛朗科表示和我在一起，好让别人把我们带到同一家饭店去。

一刻钟以后，米查——我们难忘的翻译——来了。他穿着一件乌克兰衬衣，一缕金发垂在双眼之间，嘴里叼着一支散发香味的香烟。那种吸烟的方式，使他现出了一副极为美好的笑容。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懂。我想，他讲的一定是俄语，我问他是不是可以讲法语，他却竭力地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说话，因为他是西班牙语译员。

后来，米查对我讲述了他是怎样在六个月里学习西班牙语的。讲述时，他笑得要死。他本是一个三十岁的屠夫。他学习西班牙语是为了参加联欢节。我们到莫斯科的那一天，他的舌头还不灵活，总是把动词“起床”和“天亮”混为一谈。但是他对南美洲的了解却比一个普通的南美人多得多。在我们逗留莫斯科的日子里，他进步很快，着实令人惊讶。

在讲巴兰基利亚[1] 汽车司机的行话方面，目前他是苏联唯一的专家。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到莫斯科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无疑会遇到障碍。我仍然认为，他们是受过十分明确的指示训练的。莫斯科人——具有可敬的自发性——，当外国人坚持去他们家里访问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可疑的反对态度，许多人让步了。事实是：他们自认为生活很好，实际上生活很差。政府一定有指示，叫他们别允许外国人看到他们家里的情况。从根本上说，许多指示跟上述指示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是陈规旧习。

但是存在着一个非同小可的好处：联欢节是为苏联人民举办的、和世界隔绝了四十年的杂技表演。苏联人渴望看到、摸到某个外国人，以便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是骨肉之躯。我们遇到许多苏联人，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一个外国人。许多有好奇心的人从苏联的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他们飞快地学习外语，好跟我们交谈。他们就这样给我们提供了不用离开红场就能游遍全苏联的机会。另一个好处是，在联欢节的忙乱中，个体警察的控制实际上不可能，苏联人得到了充分自由讲话的机会。

我应该老实地承认，在那混乱的十五天里不会讲俄语，什么我也没有弄清楚。但是相反，我相信我了解了许多不完整的、新近的和粗浅的东西。不管怎样，这总比不来莫斯科

---

① 哥伦比亚城市，作者曾在那里生活。

的纯粹事实重要得多。我有对人感兴趣的职业癖好，我认为任何国家的人也不如苏联人有意思。一个牟尔曼斯克男孩，为了乘火车进行五天的旅行，已经攒了一年的钱，他在街上拦住我们，问：

“你讲英语吗?”①

这是他唯一懂得的英语。但是他扯着我们的衬衣，继续用俄语拼命地跟我说话。有时会走来一位临时翻译，于是同一群渴望听我们讲述世界的人开始了一席长达许多小时的对话。我讲述了哥伦比亚人生活中的一些普通故事，他们那种困惑不解的表情说明我讲的故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穿着破鞋子在街上行走的人那么朴实、善良、坦诚，不可能是联欢节的指示要求做的。我多次故意粗鲁地问他们：“斯大林真的是个罪人吗?”我这样做，只是想看看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只是用赫鲁晓夫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冷静地作答。没有一点儿好斗的样子。相反的，我常常遇到某种早就考虑好的意图，使我们想起关于这个国家的某一件愉快的往事。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使我想到，苏联人——一般说来——对他们的政府是忠实的。他们不是一群让人讨厌的人。他们不急不忙地把事情告诉我们。他们怀着农村人的胆怯心情，像鹅一般不慌不忙，望着我们在街上走过，不敢打扰我们。如果你不想和他们交谈，就对人群而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

① 原话为英语。

说："得鲁日巴"[1]，即："友谊"。于是，他们争先恐后送给我们纪念章和硬币，让我们签字和留地址。这是一个极其渴望交朋友的民族。我们常问自己，现在和过去的区别是什么，一个答案三番五次地重复道："现在我们的朋友多了。"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他们渴望通过私人信件谈他们的事情，和全世界的人通信。现在我的写字台上就有一堆莫斯科的来信，我根本就看不懂，都是那群不知姓名的人寄来的，为了摆脱他们，我们把地址留给了他们。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那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一位代表在圣巴西利奥大教堂前停下来留言题字，半个小时后，好奇的人群红场上就容不下了。不是夸大其词：在莫斯科，事情愈大就愈受欢迎，红场——城市的心脏——却因其小而令人失望。

到莫斯科后不久一位旅游者就会发觉，要评价现实，需要一种和我们的不相同的度量制度。我们的基本概念，苏联人的头脑接受不了。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后，一个夜晚在高尔基公园门前拦住我的一群好奇的人使我意识到这一点。一位姑娘——列宁格勒语言学院的学生——用完美的西班牙语——就是说，在三个小时的讨论中，她没有犯一个语言错误——向我建议说："我们可以回答你随便提出的问题，条件是：你也同样坦率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同意了。她问我，我对苏联的什么事情不满意。在莫斯科一直没看见狗这个问题早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

---

① 原文为俄文 gpymδα 的西班牙文译音"Drushva"。

“我认为把狗全都吃掉太残酷了。”我说。

女翻译不知所措。我的问题翻译出来后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在场的人用俄语低声地交谈起来。后来，人群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用西班牙语叫道：“那是资本主义报纸的诬蔑”。我解释说，是经过个人证实的。他们严肃地否认说，他们没有吃狗。但是又承认，在莫斯科，狗已经少得可怜。

当轮到我提问题时，我想起了安德烈斯·图波列夫教授，他是苏联“图—104”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发明者，是一位拥有数百万财富的特大富翁，却不知道拿钱财干什么。他不能把钱投在工业上，也不能购买房子来出租。他死时，他那些装满死卢布的箱子又回到国家手里。我问道：

“在莫斯科，一个人可以拥有五套房子吗?”

“当然，”他们回答。不过，一个人住在五套房子里干什么鬼事情呢?

苏联人——常在地图上旅行，都把世界地理背熟了——对新闻事业的现状所知甚少，令人难以置信。收音机只有一个旋钮。报纸——属于国家——只有一个“波段”：《真理报》。新闻概念十分狭窄：只刊登十分重要的外国事件，而且全都是有倾向的、加评论的。除了一些欧洲共产党的报纸外，不卖任何外国的报刊。开一个关于玛丽莲·梦露的玩笑引起的反响是难以形容的。影响之广，波及九霄云外。我没有遇到一个知道玛丽莲·梦露是谁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用《真理报》糊的报亭，该报第一版上有一个八行字的大标题。标题说：“关于农业的报告的全文”。我想，准是爆发了

战争了。

自然，当我向苏联记者解释我们关于新闻事业的现状的看法时，他们的头脑简直像一团乱麻。一群职员带着一名翻译来到我们住的饭店门前，问我一家西方的报纸是如何办的。我给他们做了解释。当他们得知中间有一位所有者时，不禁怀疑地评论说：

"不管怎样，那一定是一位非常古怪的老板。"

他们对我谈了他们的想法：《真理报》花费的钱比它挣的钱多得多。我回答他们说，在西方也是这样，只是亏损的部分通过广告补回来了。我画了一些画，算了一笔帐，举了几个例子，但是他们不懂得广告是怎么一回事。在苏联，没有广告，因为没有私人企业，也没有竞争。我把他们带进饭店的房间，让他们看一张登有广告的报纸。有两个关于不同品牌的衬衫的广告。

"这两个厂家都生产衬衫，"我解释说。"两家都对公众说自己的衬衫最好。"

"那人们怎么办呢?"

我竭力向他们解释，广告是怎样影响公众的。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后来，有一个人问道："当人们已经知道谁的衬衫最好后，为什么还允许另一家继续说他的衬衫是最好的呢?"我解释说，做广告的人有权利做他的广告。此外，我说，"仍然会有人买别的牌子的衬衫。"

"他们明知道不是最好的还是要买吗?"

"很可能。"我表示认可。

那些广告他们看了半天。我发现他们在讨论对广告的初步认识。突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苏联人对差别感到厌倦了

在莫斯科一家银行里，这一现象引起我的注意：职员们不接待顾客，却似乎对计算一个框子里的小彩球儿着了迷。后来，我又看到餐馆的管理员、公共机关的公职人员，百货商店的出纳员，甚至电影院的售票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记下了这个细节，准备了解一下我以为是莫斯科最流行的游戏的名称，由来和特点。就在这时，我们下榻的饭店的经理对我们说：那些小彩球儿跟学校里教孩子学算数用的算盘一样，是苏联人用的计算器。当在联欢节期间散发的一些官方的小册子里说苏联有十七种不同类型的电子计算器时，他的证实就更令人感到吃惊了。他们有电子计算器，但是不大规模地生产。他那种解释使我明白了一个国家的这类戏剧性差别：工人们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只有一年买两件衣服的权利，却可知道一颗苏联火箭飞抵月亮而高兴得心广体胖起来。

原因似乎在于，在革命后的四十年间，前苏联决心将全部努力，全部的工作能力都用来发展重工业，而没有充分注意消费品的生产。不难理解，当居民尚存在穿鞋子的困难的时候，要把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推向国际航空市场，消费品是第一位的东西。竭力要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苏联人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大规模工业化的计划遭遇到一桩巨大事件：战争。当德军侵犯苏联时，工业化的进程在乌克兰达到了至高点。纳粹分子却从那里进入了苏联。当苏联红军奋勇抵抗敌人的侵略时，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总动员中把乌克兰工业体系化整为零，把整个工厂搬到的后院西伯利亚去，在那里迅速重建起来，以强行军的速度开始了生产。苏联人认为，那种大规模的转移工作使工业化推迟了二十年。

毫无疑问，人类的这种巨大冒险要求全民族做出的努力，不得不只由一代人来承担，先是在革命征战方面，后在战争中，最后在国家的重建工作中。这是加在斯大林头上的最严厉的罪名之一。斯大林被视为一位冷酷无情、没有人情味的统治者，说他在匆忙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牺牲了整整一代人。为了防止西方的宣传传入他的同胞耳朵里，斯大林从内部关闭了国家的大门，加快了建设的速度，实现了也许没有先例的历史跃进。新的几代人，由于变革观念的存在，无疑开始成熟了。现在他们可以充分地对他们的鞋子问题表示不满了。

斯大林使国家陷入钢铁般的孤立状态。这是使苏联人不知不觉在西方人面前常出洋相的最经常的原因。在对一座集

体农场的访问中，我们有机会经历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时刻，那是由苏联民族的妄自尊大造成的。我们乘车沿着一条公路颠颠簸簸地前进，穿过一个个插着旗子的村庄。汽车通过时，村中的孩子们唱着歌出来欢迎，把用各种西方语言写着他们的地址的明信片从车窗口扔给我们。集体农场离莫斯科一百二十公里。那是国家的一片广阔的封地，周围是一些有着泥泞的街道和色调鲜艳的小房子的荒凉村庄。农场的场长是一位社会化的封建主，头发已全秃，一只眼睛失明，蒙着一个眼罩，像电影上的海盗那样。在两个小时中，他向我们介绍了土地的大规模生产。译员几乎只向我们翻译天文数字。在露天里吃完午饭后，我们被带去参观自动化挤奶厂。一位很胖的、非常健康的女人好像准备为我们展示水力挤奶器的效能。它被认为是农场在牛奶企业技术发展过程中迈出的最先进的一步。其实，它就是一条灌肠器的胶皮管和一个食品袋联结起来。在胶皮管顶端，有一个吸奶的装置，该装置一端连着奶牛乳头，另一端连着自来水龙头。只要打开水龙头，水的力量就能实现中世纪的挤奶员所干的工作了。当然，这一切全是理论上的。而实际上，那是我们的访问中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时刻之一。健康的自动挤奶器女专家没有能把那个装置接在乳头上。她试了有一刻钟，最后还换了一头牛。当她终于达到了目的时，我们已经准备为她鼓一阵掌。由于胜利地摆脱了窘境，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

一位美国代表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实际上相当有根据地对农场的场长说，在美国，乳牛从一端进去，用巴斯德法消

毒的牛奶甚至成罐的黄油就从另一端出来了。场长十分礼貌地表示佩服，但是脸上现出对他的讲述不以为然的表情。后来他对我们坦白说，他确信，在苏联人发明水力挤奶器以前，人类根本想不到什么挤牛奶的机械装置。

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师曾多次去法国，他对我们评论说，一般说来，苏联工人深信他们发明过许多东西，许多年来就在西方得到了应用。一个古老的美国笑话说，苏联人总把最简单的东西——从叉子到电话机——的发明权归于自己，有他们的道理。当西方文明以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贯穿二十世纪的时候，苏联人却关起门来设法独自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西方游客在莫斯科遇见一个神情紧张、头发蓬乱的男孩说他是电冰箱的发明者时，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或疯子：很可能，那个男孩的确在他家里发明了电冰箱，不过那是在电冰箱成为西方通用的一种商品很久以后。

当发现苏联的发展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时，苏联的现实就好理解了。革命领导人最忧心的是如何养活人民。必须像我们相信不好的事情那样诚实地相信：在苏联，既没有饥饿，也没有失业问题。相反的，缺乏劳动力却是一个全国性的烦恼问题。新近成立的劳动调查办公室负责科学地确定一个人的劳动价值。

在我们同劳动部的这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对我们说，有一些工厂经理挣的比某些熟练工人挣的还少。这不仅因为他们投入的劳动强度小，而且因为他们无需负很大的责任。我提问说，在苏联，为什么女

人和男人肩并肩地用镐和锹在公路和铁路上干活？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这样做对吗？回答斩钉截铁：女人之所以进行重体力劳动，因为劳动力奇缺，国家从战争结束后就处在一种紧急状态中。那个下属单位的领导人强调说，在体力劳动方面，必须承认男女之间的巨大区别。他说，根据他们做的调查，在需要耐心和注意力的工作方面，妇女的效益较大。他肯定地说，在苏联，用镐和锹劳动的妇女会一天比一天少。他十分严肃地坚持说，他的办公室最大的忧虑之一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此这般，当妇女们在公路上劳动的时候，四十年来使苏联变成世界上两大强国之一的一种高水平的工业便发展起来。但是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当苏联人透露说他们拥有热核武器时，凡是看到莫斯科的简单橱窗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但是恰恰由于这一点而必须相信：苏联的热核武器、它的宇宙火箭、它的机械化农业、它的庞大的变压设备和把荒漠变成良田的巨大能力，是四十年来人民穿普通的鞋子和裁剪得很差的衣服的结果。一成不变的俭仆生活几乎有半个世纪。相反的，生产过程引起若干使美国人笑弯了腰的失调问题。比如强有力的“图—104”被认为是航空工程的杰作，却没有被允许在伦敦机场上降落，因为英国的精神病专家认为它可能造成英国居民心理紊乱；飞机不同层的机舱之间都有电话服务，但是消除臭味的设备是最原始的。再举个例子：有一位瑞典代表，患有一种顽固的湿疹，本国最著名的专家为他治疗过。他利用去莫斯科的机会，请离代表团住处最近的

医生给他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油膏，抹了四天就消除了湿疹最后的痕迹。但是给他拿药的药剂员却用手指从罐里取油膏，用一块报纸给他包油膏。在卫生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我们从集体农场回来时目睹的事情。那是在莫斯科郊外，我们停下来在一家露天店铺喝一种冷饮。本能推动我们去了卫生间。那里有一个很长的矮木台，木台上有五六个洞，五六个可敬的市民蹲在上面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以一种在理论上不曾预见到的集体生理机能起劲地聊着天。

在一个基础已经打好的国家，善于运用头脑的青年一代正在起来反对东西方差别。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举行公开的辩论会，向政府提出让苏联加入西方舒适节奏的必要性。不久前，莫斯科语言学院的姑娘们掀起了一场风波：她们穿着巴黎时装，留着马尾式头发，穿着高跟鞋，上了大街。在此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位考虑不周的官员批准语言学院接受西方的杂志。有了这种杂志，想当翻译的人可以熟悉西方的日常用语和习惯。这一措施产生了效果。但是姑娘们利用杂志，剪短了自己的衣服，留了时髦的发式。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见她们在街上走，肥胖的苏联主妇们总要把双手举到头上，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这些年轻人完蛋了。"但是应该充分看到，在苏联政治的变化中那一代青年所受的一系列压制。当妇女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昂·迪奥尔在巴黎逝世时，他刚刚收到苏联政府的建议：在莫斯科展出他的时装系列。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夜，我必须用一个充分反映那一代青

年的精神的故事来结束。在高尔基大街，一个不超过二十五岁的青年拦住我，问我的国籍是什么。据他说，他正在准备写关于世界儿童诗歌的学位论文。他需要哥伦比亚的材料。我对他讲了关于拉斐尔·庞博[1] 的情况。他像受了伤害似的红着脸，打断我的话说："当然，我有关于拉斐尔·庞博的全部资料。"面对一杯啤酒，他用一种有力的语调、但是无比流畅地朗诵了一本拉丁美洲儿童诗集，直到半夜。

四十八小时后，莫斯科又恢复了它的正常生活。还是那些密集的人群，还是那些盖满尘土的橱窗，还是红场陵墓前两公里的长队，像另一个时代的幽灵一般——从我们坐着去火车站的巴士车窗外掠过。在边界上，一位像查尔斯·劳顿的双胞胎兄弟似的胖翻译吃力地爬上火车。"我是来请诸位原谅的。"他说。"为什么?"我们问。"因为没有人来向诸位献花。"他回答。他几乎含着眼泪对我们解释说，他是在边界上组织欢送代表团的负责人。那天早晨，他以为代表们都走了，便打电话不要再往车站送花了，并且吩咐火车通过时前来唱歌的孩子们回了学校。

---

① 哥伦比亚诗人（1833—1922）

柏林，一座荒谬的城市

西柏林残留的欧洲痕迹只剩下那座被战火烧焦的、一个钟楼被炸弹炸掉尖端的大教堂了。美国人像孩子一样惧怕蝙蝠。他们不是支撑战后留下的不多的残垣断壁和用它们建设一个修修补补的城市，而是采取一种更有益于健康和更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做法：重起炉灶。

同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实施的资本主义的巨大工程的首次接触，使我产生一种空荡的感觉。整个早晨我们一直在寻找城市，但是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找到它。城市不对称，无头也无尾，但是更缺乏的是让人来到这儿感到激动的市中心。

尚未重建的开阔地带是临时公园。有些马路仿佛是整个从纽约搬来的。有些地方，贪婪的商业活动比技术发展的速度还快。脚手架一年后才能拆掉，可是大商家已经入驻了。在一幢高大的现代建筑——一座像一扇巨大的玻璃窗的摩天大楼旁边，有一个由许多茅屋构成的村庄，泥水匠们正在那

里吃饭。焦急而匆忙的人群在一些木板台子上来来往往。周围响着钻机声，飘着沸腾的柏油味，大吊车在金属结构和巨幅可口可乐广告上方转动。在这项沸腾的外科手术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和欧洲完全不同的东西：一座闪闪发光的、清洁无菌的城市。但是城市中的一切很难让人觉得是崭新的。

据说，这是欧洲最有意义的建筑经验。从技术的角度看，西柏林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实验室。美国指挥一切。我没有关于美国为重建城市而投入的美元数量的材料，也没有关于美国投资的形式的材料。但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老实地认为，它是一个虚假的城市。美国的游客夏天拥进城市，参观社会主义世界，趁此机会在西柏林购买美国进口的商品，在这里购买比在纽约要便宜。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家像美国最好的饭店那么好的饭店，有现代客房、电视机、浴室和电话，每天只收四马克，即一美元，怎么能维持下去。在拥挤的交通中，没有一辆汽车不是最新型号的。商店的广告、宣传品、餐厅的菜单，用的都是英文。在西德的领土上，有五个电台，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德国话。当一个人注意到这一切，并且认为西柏林是镶在“铁幕”上的一个小岛，方圆五百公里没有贸易联系，不是一个大工业中心，同西方世界的交流通过飞机进行，飞机在位于市中心的机场上降落和起飞，每隔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让人不得不这样想：西柏林是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宣传的宠大机构。它的活动和经济现实不适应。在每个细节上

都能看到这种蓄意的企图：制造巨大繁荣的假象，让张着嘴从锁眼里看景象的东德不知所措。

两个柏林之间的官方界线是勃兰登堡门。门上飘着镰刀加斧头的红旗。五十米外立着一块令人惊慌不安的牌子："注意，你要进入苏联辖区了！"看完了西柏林后，我们于傍晚来到那块牌子前。纯粹出于本能，佛朗科减慢了车速。一个苏联警察向我们打手势，要我们停车，用完全是管理人员的眼睛检查了一番汽车，然后命令我们继续行驶。通过是那么简单，就像等待绿色信号灯变亮一样。但是变化是明显的。而且也是巨大的。我们径直驶上了椴树遮荫的宽阔的"下登林登"林荫道，过去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林荫道之一。如今只剩下一行行被烟熏黑的树干，空荡荡的门廊，被青苔和杂草盘踞的地面。一平方米也没有重修。

越是深入东柏林，就越加明白：不仅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区别，而且在勃朗登堡门两边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精神面貌。东柏林的若干原封不动的建筑上依然存留着炮击的痕迹。商店很脏，并且隐藏在被炸弹炸出的洞口里头，出售的东西既粗俗质量又差。有些街上的楼房全都没有了地板，高层的房间只剩了外壳。居民们仍然拥挤地住在低层的房间里，没有医疗服务，也没有流水，衣服晾在窗前，像那不勒斯的窄街上一样。夜晚，不像西柏林那样让广告的色彩充满全城，东柏林只有红星闪着光辉。东柏林的优点在于它的确和国家的经济现实相符合。但是斯大林大道除外。

面对西柏林的气势，社会主义的反映是修建非常滑稽可

笑的斯大林大道。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粗俗的格调说，它都不同一般。它是对符合莫斯科的建筑观点的各种风格的生吞活剥。斯大林大道是一幅巨大的透视画，那里的住宅像外省的吝啬的富人的住宅，但一栋房子摞在另一栋房子上面，都是用不知多少吨重的大理石垒成，柱头上雕着花卉、动物和面具，令人生厌的门廊里立着用钢筋水泥仿制的希腊塑像。

构思那种丑陋建筑的人的考虑是明显的。希特勒的林荫大道是"下登林登"，社会主义柏林的林荫大道——更长、更宽、更乏味、更难看——是斯大林大道。在西柏林，城市建设为了有钱人，为了那些在战前就在"下登林登"约会的人。斯大林大道是一万一千个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大道上有餐厅、电影院、咖啡馆、剧院，供所有的人享用。其中的每个去处都是一个俗气的奢侈场所：用紫色的长毛绒包起来的家具，带金边儿的绿地毯，特别是，到处都是镜子和大理石，连卫生间里也不例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工人能以那么低的价格那么舒适地住在斯大林大道上。但是和住在那里的一万一千个得天独厚的人相反，还有大群大群的人挤住在顶楼上，他们想——并且直率地说——，用购买雕像、大理石、长毛绒和镜子的钱，足够体面地重建这座城市的。

有人估计过，如果爆发一场战争，柏林能存在二十分钟。但是如果不爆发战争，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当两种制度中一种战胜另一种时，两个柏林就会变成一个柏林，那将成

为一个由两种制度无偿举办的博览会构成的庞大贸易市场。

目前的柏林——不只从它的外表看——已经变得荒谬不堪。要想了解它的隐秘生活，要想从反面察看它，要想发现接缝的部位，必须钻进地铁里去。在知道苏军已打到他的家门口而自杀一小时前，希特勒下令往地铁里灌水，把躲在里头的人赶出来战斗。所以地铁又肮脏又潮湿。但是地铁是柏林人民——两边的穷人——为两种制度在表面上进行的无声的争斗中得到好处而使用的工具。有一些人在一边工作，在另一边居住，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利用每种制度最好的东西。在某些城区，只要穿过街道就行了。大街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一边，房屋、商店、餐厅属于国家。在资本主义一边，那些东西则是私人财产。在理论上，谁要是住在街道一边、穿过街道到另一边去买一双鞋，那就至少要犯每一边的三种罪行。

但是在柏林，一切措施都是理论上的。有些协定很明确，不准做投机生意，不准逃离首都，不准败坏社会制度。最初，人们不能在一边消费，在另一边赚钱。每一种商业活动都应该事先对其收入的来源提供证明。但是实际上，有关当局总是假装不知。当局只对表面现象感兴趣。柏林市民在街上走路时，能够从一边到另一边去，但他们遵守游戏规则，从地铁里过去。所有的人都知道人们常从地铁里过去，但是官方不知道。

这种激烈斗争的最惊人的证明，是在西柏林的银行里购买东德马克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的。银行职员按一美元兑十七

东德马克的标准卖给我们东德马克。佛朗科诚实地指出，银行职员肯定搞错了：官方的兑换标准是一美元兑换二马克。但是银行职员解释说，在西柏林不考虑正常的流通，西柏林的银行——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完全合法的手段——一个美元换给十七个东德马克，几乎是官方兑换标准的八倍多。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买卖。如果不能证明我们的钱是从国内带来的，我们在东德什么也不能买。但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我们在西柏林用二十美元换得的东德马克从上到下跑遍了东德。我们算了一下帐，在最好的饭店里开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浴室、广播、电视、在床上用早餐，共花七十五个哥伦比亚分。在最好的餐馆里吃一顿完美的午餐，共花二十个哥伦比亚分，包括服务、雕像、镜子和斯特劳斯的乐曲。

在柏林，什么也不完全真实，谁也不很清楚应该依靠什么，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都有点像变戏法。谁要是不掌握这座城市的钥匙，他就会生活在一种永远焦虑不安的状态中，就会觉得像坐在一只炸药桶上。看来谁也不觉得内心安静。如果巴黎有一条新闻谈到政府首脑又干了什么蠢事，在柏林引起的反应就像爆炸了一颗炮弹。汽车胎的爆裂声也会引起一阵恐慌。

莱比锡是另一副样子。汽车沿着一条弯曲的林荫道行驶四个小时后，我们从一条凄凉的窄街进入了莱比锡。那条街窄得几乎连电车道也铺不下。那是在晚上十点，落起了小雨。没有窗户的砖墙，暗淡的路灯灯光，使我想起了波哥大

南区的黎明。

在市中心，有一种可疑的宁静，灯光像郊区一样稀少。唯一标志着生机的东西是国家酒吧的霓虹灯招牌“H.O”。酒吧里的顾客不多，有几个平民和若干士兵。在徒劳地寻找了一番营业的餐厅——一家“米特罗帕”——后，我们决定去住饭店。饭店的管理人员只讲德语和俄语。那是按照斯大林大道的美化观点盖的莱比锡最好的饭店。柜台上展览着通过飞机寻来的全部西方共产党的报纸。一支小提琴乐队在用枝形吊灯照亮的酒吧里演奏一支怀旧的华尔兹。吊灯显得既沉重又虚夸。顾客们默默地喝着未冰凉的香槟，脸上带着阴郁的表情。有着滑石粉般苍白面孔的老妇人们戴着过时的帽子。音乐声飘荡在浓烈的香气中。

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一群男女在喝茶。他们身穿猎装，红色的长外套完美无缺，头戴黑帽，脚穿马靴。如果再有几条带黑斑的大白狗，那群人就像从一幅根据最奢侈的英国贵族生活绘制的石版画上走下来的了。我们——穿着斜纹布长裤和衬衫，还没有洗掉路上的尘土——成了人民民主的唯一的标志。

我们去城里看了。但是在莱比锡呆了二十四小时后，已不是仅仅观看，而是需要理解了。十五天前——像偶然玩的一种魔术——我们去了西德的大学城海德尔堡，城市明净、乐观，比欧洲的任何一座大学城留给人的印象都深刻。莱比锡也是一座大学城，但是显得凄凉，旧电车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精神抑郁的市民。我相信在这个有五百万人的城市里，

小汽车不过二十多辆。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的是，东德人民虽然夺取了政权、生产资料、商店、银行和交通工具，但是仍然是痛苦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么痛苦的人民。

星期天，人们大批地拥入娱乐园。在那里弹奏舞曲，喝汽水，花很少的钱度过一个令人疲惫的下午。在舞池里，已无插针之地，舞伴们摩肩接踵，几乎一动不动，跟电车上的人一样面带不快的表情。服务工作慢慢腾腾，买面包、火车票或电影票得排半个小时的队。在一座娱乐园里，我们必须在恋人和带孩子的年迈夫妇中间用臂肘挤开一条路，花了两小时才买到一瓶柠檬水。这种坚如钢铁却毫无效率的体制，和无政府状态别无二致。

我们不能理解。那就像为了消磨时间去看电影，看的是一种无头无尾的疯子电影，故事是专门为使观众茫然不知所措而编造的。因为最起码这种情况是让人感到茫然的：在新世界，在革命的中心，所有的事情都像是被废弃的、被损坏的，腐朽的。

我和佛朗科把雅克琳给忘了。一整天她都落在我们后面，毫无兴趣地浏览着落满尘土的橱窗，里头陈列着贵得让人咋舌的劣质商品。吃午饭时，她有了精神头儿：对缺少可口可乐提出了抗议。晚上，在车站一家餐厅里，烟雾、气味和乐队奏的那种从顾客这边的耳朵进去从那边的耳朵出去的乐曲令人窒息。等了一个小时后，雅克琳失去了耐心：

“这个国家简直糟透了！”她说。

佛朗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寻求原

因。他记得，莱比锡有一所马克思列宁大学，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在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那里有一种安静和有利于思考的环境，一座座大楼谨慎地建在树林中间，这一点最像天主教神学院。我很幸运。很高兴地在那里遇到一群南美洲的学生。多亏他们帮助，我们的观点——本来可能是主观的——才建立在具体基础上。

“铁幕”是一根红白条栏杆

“铁幕”不是帷幕，也不是铁的。它是一根像理发店标志那样的红白条栏杆。在栏杆那边生活了三个月后我意识到，希望“铁幕”真的是铁幕的想法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是十二年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工作比整个哲学体系的说服力还大。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文学性报道终于战胜了常识性的错误，直到让人们认识到铁幕不过是一个比喻。

我们一起参加冒险的共三个人：雅克琳，在印度支那出生的法国女士，巴黎一家杂志的版面设计员；佛朗科，一个漂泊不定的意大利人，米兰几家杂志的临时记者，夜晚到了哪儿就在哪儿过夜；第三个是我，护照上是这么写的。事情是 6 月 18 日早晨 10 点在法兰克富开始的。佛朗科夏天买了一辆法国小汽车，却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于是他建议我们“去‘铁幕’后面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时间——一个晚春的早晨——有益于旅行的极好时光。

法兰克富警方不知道开车去东德该办的手续。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贸易关系。每天晚上有一辆火车沿着铁路走廊开往柏林，除了符合要求的护照外，不要求乘客办任何手续。但是那条走廊是一条从法兰克富开始到西柏林结束的夜间通道。而西柏林纯粹是一个四面八方被东方包围着的西方的小岛。

公路是真正能够进入“铁幕”的唯一途径。但是边防检查站非常严格，看来，倘若没有正式的签证和在法国上牌照的小汽车，想冒险去那边旅行是徒劳的。哥伦比亚驻法兰克富的领事是个谨慎的官员。“你们必须留神。”他对我们说，他操的是哥伦比亚波帕扬市的谨慎的西班牙语。“你们想想看，那里的一切全掌握在苏联人手里”。德国官员讲得更清楚。他们提醒我们说，倘若我们能过去，照相机、手表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被没收。他提请我们注意，要带足食品和补充用的汽油，免得在从边境到柏林的六百公里的旅途上停留，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冒着被苏联人用机枪扫射的危险。

除了碰运气，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好吧”，佛朗科说“我们到边境上装疯卖傻吧”。

两个德国被希特勒为便于调动他那强大的战争机器而修建的漂亮的高速公路网划分成了许多方格。那是一种双刃武器，因为它也为同盟国的进军提供了方便。但是那也是有利于和平的巨大财富。像我们坐的小汽车，可以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沿高速公路行驶。为了在天黑前到达“铁幕”，我们行驶的速度是一百公里。

八点钟，我们穿过了西方世界的最后一个村庄。村里的居民，特别是孩子，既热情又茫然地向我们致意。他们中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法国小汽车。十分种后，一个德国军人——不仅从方形的下巴和挂满奖章的制服看，而且讲英语的语调，都和电影上的纳粹军人一模一样——，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番护照。然后，对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准许我们通过无人居住的区域：把两个世界隔开来的、宽八百米的地带。那里没有集中营，也没有长达多少公里的著名的带电铁丝网。落日余辉洒满了没有耕种的土地。像战争的第二天一样，土地依然遭受着皮靴和武器的蹂躏。这就是“铁幕”。

海关检查站的人员在吃饭。值勤的士兵是个青年，穿着又旧又脏的制服。他打了手势，让我们停车，等着海关人员把饭吃完。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海关的灯依然未亮。公路的另一边是火车站，那是一幢木头楼房，门窗都关着。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散发着一股热饭的气息。

“共产党人也吃饭”。我不无幽默地说。

佛朗科趴在方向盘上打磕睡。

“当然”，他说。

十点钟差一点儿，灯亮了。值勤的士兵叫我们到灯前去检查护照。检查人员像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的人那样既狡猾又困惑地仔细检查了每一页，然后升起栏杆，要我们把车开到前面 10 米远的地方停在一幢有铁皮屋顶的木楼前，那幢楼很像牛仔电影里出现的舞厅。一个不带枪的、年龄和前面

那个士兵相同的值勤士兵把我们带到一扇小窗前，那里有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等着我们过去。他们的表情与其说呆板，勿宁说惶惑，脸上一点儿热情也没有。我感到意外的是，东方世界的大门竟然由几个笨头笨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年轻人守卫着。

那两个士兵用蘸水笔和软木塞盖的墨水瓶抄写护照上的材料。工作很辛苦。一个人念，一个人用乡村学校最初级的潦草字写下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读音。他的手指上沾满了墨水。我们身上冒出了汗水。我们耐心地忍受到口授和抄写我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的倒霉时刻。

在下一个小窗口，我们申报了随身带的外币。但是窗口的改变只是一个形式：在里头工作的还是前一个窗口的那两个士兵。最后，在第三个窗口，我们必须按照符号把小汽车的一切细节填写在一张德文和俄文调查表上。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瞧着他们那种古怪的表情，听着他们用五种语言叫喊和咒骂，我们意识到，我们陷入了说不清的经济问题中。小汽车的关税是二十个东德马克。西德的银行一美元兑四个西德马克。东德的银行一美元却只能兑两个东德马克。但是，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面价相当。问题在于，如果用美元交付，小汽车的关税得交十美元。但是，如果用西德马克交付，只要交二十个西德马克就行了，就是说，只交五美元。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失去耐心，并且早已饥肠辘辘。当海关关长出现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早该通过了“铁幕”

的一切过滤器。他是一个穿着和举止都很土气的人。下身是一条脏兮兮的卡其布长裤和一双四十公分高的皮靴，上身是一件破旧的毛外套，改变了样子的口袋儿里似乎装满了纸头和面包屑。他用德语跟我们讲话。我们的理解是应该跟他去。我们走上了刚刚被初现的星斗照亮的荒凉的公路，穿过铁路，从车站后面绕过去，走进一间狭长的饭厅，那里散发着刚刚卖完的食物的香味，椅子堆在供四人用的小餐桌上。门口有一个挎着自动步枪的卫兵，他旁边有一张桌子，桌上展览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政治宣传小册子。我和佛朗科跟海关关长一起走，雅克琳在几米外跟着我们，她的鞋后跟擦着木地板，发出响亮的声音。海关关长停下来，用粗暴的言语命令她赶上来。她听从了。我们四个人默默地继续向前走，穿过荒寂的走廊迷宫，到达尽头的最后一扇门前。

我们走进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里头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挨着一个保险柜，一张小桌周围摆着四把椅子，桌上放着政治宣传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洗手盆和一张床紧贴着墙壁。床上方的墙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东德共产党书记的肖像。海关关长拿着护照坐在写字台后，我们坐在椅子上。我想到哥伦比亚的村庄，想到乡村的裁判所，白天那里什么也不做，但是夜晚却成了在影院里商定的幽会地点。雅克琳似乎很激动。

我说不清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呆了多久。我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回答由我一生记得的最愚蠢的官员用德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一开始，他的言语很粗暴。我们千方百计对他解

释说，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的间谍，我们只是想去东德转一转。我有这样的印象：他以为自己是一个装了铁甲的德国人，英国话、法国话、意大利话和西班牙话，甚至最生动的表情，撞上他都会被弹回来。那番不理智的对话使他感到恼火。当他不得不三次撕掉被涂改坏了的签证时，他先对那番对话感到愤慨，后又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恼火。

轮到雅克琳时，气氛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因为海关关长对她那张印度支那人的面孔产生了兴趣。他通过手势对我们解释说，在旅行中她可能遇到“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心上人”，为了证明他个人的敬佩心情，他免费为她办了签证。我们离开办公室时，感到疲惫和恼怒到了极点，但是我们不得不多耽搁了半个钟头，因为海关关长竭力想通过手势和简短的德语和英语解释这句话：“自由的太阳将普照哥伦比亚大地”。最后我们完全明白了。

雅克琳的头脑最清醒，她负责掌舵开车。佛朗科坐在她旁边，免得她打磕睡。快一点了。我躺在后排位子上，在轮胎轻轻在平滑、光亮和绝对荒凉的高速公路上滑动的声音中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快亮了。几辆大型汽车按照和我们相反的方向缓慢地行驶。戴着保护罩的车灯把光线投向低处，在黎明的光亮中几乎分辨不清。我不能确定那长长的一串汽车的形状。

“那是什么呀?”我问。

“不知道”，雅克琳回答，她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直到早晨四点，当夏日灿烂的阳光倾泄在没有耕种的平

原上时，我们才发现那些汽车是苏联的军用卡车。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二三十辆卡车驶过，后面跟着几辆苏联造的、没有牌照的小汽车。有一些卡车上坐着未带武器的士兵。但是大多数卡车用军绿色的防雨布盖着。

如果和必须从最新式的美国小汽车中间开路前进的西德相对照，前东德高速公路上的凄凉景象就更明显了。美国军队的大本营位于离海尔斯贝格几公里的地方，它有一座小汽车场，场地在公路两边，宽达三千多米。但是在东德，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走错了路，好像沿着不知到达何方的高速路旅行。只有路边的围栏打消了点凄凉的感觉。在西德公路上树立广告的地方，这里却立着高大的阿登纳总统的漫画像。

我们同东方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接触出乎我们的意料。早晨八点钟，我们在高速公路边遇到一枚汽油弹，稍远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门前的霓虹灯招牌“米特罗帕”还亮着。那是国营餐厅的标志。佛朗科给汽车加满了油，然后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的马克，决定不顾一切再演一出装疯卖傻吃早饭的戏。

我永远忘不了走进那家餐厅看到的情景。仿佛遇到了一种我毫无思想准备的现实。有一次我毫无准备地走到那不勒斯一个陡峭崎岖的地方，当时正巧有些人用绳子从三层楼的窗口把一口棺材放下来。而在楼下的小胡同里，聚满了孩童、乞丐和装着切成碎块的猪肉的车子。死者的妻子又是撕衣服，又是揪头发，还嚎叫着在地上打滚儿，许多人竭力地制止她。餐厅里的情形虽然不同，但是同样紧张：我从未见

过在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那么悲凉的景象。人们在吃早点：大约一百个面孔憔悴、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女人在一个烟雾弥漫的大厅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土豆、肉和煎鸡蛋，同时低声地讲着话。

我们进去时，低声细语停止了。我不怎么注意自己的胡髭和红格子的红外套，我把人们的议论归咎于雅克琳那种奇异的身材。在那种寂静中，我觉得有上百只眼睛偷偷地投向我。我们向一张唯一空着的餐桌走去，桌旁有一台退了色的留声机，花半马克可以听一支曲子。节目单我们很熟悉：有佩雷斯·普拉多的曼博舞曲，有潘乔兄弟的博莱罗舞曲，特别是爵士乐唱片。

一位穿白工作服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面包和一杯黑咖啡。咖啡有一股强烈的菊苣味，不过，显然——比巴黎的便宜得多。而后来我们又和东德的薪水相比，证明它比欧洲任何国家的咖啡都便宜得多。在我们买单时，由于东德马克不够，服务员收了一个西德马克，但让我们在一张平常的纸上签了字，以作兑换的证明。

佛朗科面带沮丧的表情察看着那些顾客。有一些感人的瞬间很难再现和解释。那些人吃的早点是欧洲其他国家正常的午饭吃的东西，价钱很低。但是那些人像落难的，样子很痛苦，毫无兴致地吃着有肉有煎鸡蛋的极好的早餐。

佛朗科喝了最后一口咖啡，在大腿上摸索着找烟。但是没有找到。于是，他引人注意地站起来，向附近的一群人走去，打手势向他们要一支烟。我几乎没有发觉，邻桌上的人

拿着一盒盒的火柴、零散的香烟和没打开的成包的香烟，纷纷向我们拥来，争着嚷着表达他们那种共同的慷慨助人的热情。

过了一会儿，在小汽车向柏林飞驰的时候，雅克琳斜坐在后面的座位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在那个时刻唯一正确的评论。她说：

“这些人真可怜。”

一张可口可乐广告也没有

正值夏日，不按时刻表行驶的列车慢慢腾腾，令人窒闷。在行进了许多个小时后，一个男孩和一头母牛同样惊愕地望着我们通过。在种着烟草和向日葵的漫无边际的大平原上，黄昏很快就降临了。佛朗科——他是在布拉格跟我结伴的——落下了车窗，让我看到了金色的天穹下远方的晚霞。我们到了苏联了。列车停了下来。在铁路一侧，一道闸门敞开来。一群战士带着机枪从向日葵丛中钻出来。我们不知道那道闸门通向哪里。那里有用木板做的练习射击的人形靶子，但是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唯一可信的解释是，那里可能有一座地下兵营。

战士们证实，火车车轴间没有人躲藏在里头。两个官员上了车，检查护照和联欢节的证件。他们仔细地打量了我们好几次，直到确信我们和我们的照片相像。这是在欧洲如此谨慎地查验证件的唯一的边境。

乔普——离边境两公里远——是苏联最西边的镇子。车站上依然装饰着纸做的和平鸽，挂着用许多种语言写的表示和睦和友谊的标语，飘着世界各国的国旗，尽管一个星期前最后一批代表就入境了。翻译没有在那里等候我们。一个穿蓝制服的姑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到镇子里转转，因为去莫斯科的火车晚上九点才开。随后我看了看车站上的表，知道那里的时间是八点。而我的手表上还是巴黎的时间，必须往前调两个小时才能和苏联的时间一致。当时波哥大的时间是白天十二点。

在车站的大厅里，有一道门通向镇上的广场。门两边竖着两座雕像：列宁和斯大林的全身像，刚刚上了银白色的油彩。由于俄文字的写法，我觉得布告上的字好像在一块块地往下掉。这使我产生一种破败的感觉。看到人们那副寒酸的样子，一位法国姑娘很激动。我并不觉得他们穿得太差。可能是因为我在“铁幕”里生活了一个多月，习以为常了。那位姑娘体验到了我在东德有过的那种反应。

在广场中央——一座受到精心管理的五颜六色的花园环绕着一眼水泥喷泉——，有几个军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散步。傍晚，人们在新近用鲜艳的原始色彩粉刷的砖房子的阳台上和没有橱窗的商店门口乘凉。在一辆卖冷饮的小车前，一群提着手提箱和食品袋子的人在排队喝饮料。那里有一副乡村的模样和外省的贫困，使我感觉不到和时差为十小时的哥伦比亚农村有什么不同。这仿佛证明，地球比一个人想象的还圆，在离波哥大一万五千公里远的地方向东飞，同样能到达

托利马[1] 的城镇。

苏联的火车九点整到达。十分种后——正像预计的那样——，车站上的扩音器播放了一曲进行曲，火车开动了，人们从阳台上向我们欢呼和挥动手帕，热烈地欢送我们。车厢的设备在欧洲是最舒适的。每个包房都是一个温馨的房间，里头有两张床、一台只有一个旋钮的收音机，一个床头柜，桌上有一盏台灯和一个花瓶。车厢只有一个等级。质量很差的手提箱，装着日用杂物和食品的包裹，以及旅客那副寒酸的样子，和车内的豪华设备和一丝不苟的清洁卫生形成鲜明对照。和家人一道旅行的军人们脱掉皮靴和军上衣，穿着衬衫和便鞋在通道上走动。以后一定会证明，苏联军人和捷克军人一样，俱有简单的、日常的、普通人的习惯。

只有法国的列车和苏联的列车一样准时。在我们的包房里，我们看到一张用三种语言印的旅行路线图，分秒都不差。这可能是铁路当局为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而重新修订的。有更重要的事情给西方游客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并没有加以掩饰。其中，例如只能收一个台即莫斯科电台的收音机。收音机在苏联很便宜。但是听众的自由受到限制：只能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不然就别开收音机。

在苏联，火车不过是流动的饭店，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想象苏联的领土有多大，人的想象力是不够的。从乔普到莫斯科的旅行，穿过乌克兰望不到边的麦田和贫困的村庄，需

---

① 托里马，哥伦比亚西部省份。

要40小时，是最短的旅程之一。一列快车星期一从太平洋岸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星期日晚上到达莫斯科，其间的旅程相当于从赤道到极地的距离。如果在楚克奇半岛是早晨五点，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则是半夜，而在莫斯科，却还是前一天下午七点。这些情况可以提供一个关于苏联这个靠海的庞大国家的近似概念。它有一百零五种语言，两亿人口，数不清的民族：其中，有一个族全住在一个村子里，二十个族生活在达吉斯坦那块小地方，有一些族尚未定居。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三个美国——占欧洲的一半，亚洲的1/3,总之，占世界的六分之一，共计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一张可口可乐广告也没有。

这种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情况，从穿过边境的那一刻起就感觉到了。由于土地不是私有的，所以没有界桩界栏：在统计中，没有铁蒺藜生产这一项。你会有这种感觉：在向不可能到达的遥远的地平线旅行。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的东西不是按人类的尺寸做成的。要想理解那个国家，必须完全改变度量概念。在火车上安家生活，是在旅行中遭受不到遥远距离带来的晕头转向、感觉不到对可能导致自杀的无聊时间的绝望心情的唯一方式。唯一合理的姿势是躺着。在最重要的城市里，车站上都有急救车。由一位医生和两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会到火车上来给患者看病。发现有人出现传染病的症状，便立刻送他去住院。必须给列车消毒，免得时疫爆发流行。

夜里，我们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腐烂味弄醒。我们摸着黑

儿去寻找那种难以形容的臭味的来源。但是在乌克兰无边无际的黑夜里，连一丝遥远的亮光也没有。我心想，马拉帕尔特[①] 闻到这种臭味，会做出一种源于犯罪的解释，现在就是他的名著中的一章了。后来，苏联人自己也对我们谈到那种臭味，但是谁也说不清它的来源。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没有穿过乌克兰。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装饰的村庄里，农民们出来欢迎列车通过。在用鲜花装点的广场上，没有社会活动家的雕像，只有象征劳动、友谊和健康的雕塑，都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概念制作的：都是像真人那么大小、为了显得真实而用过分现实主义的油彩涂抹的塑像。显而易见，那些塑像是不久前又重新上的油彩。村庄显得喜气而清洁，但是分散在原野上的房子——附近有水车，鸡栏和猪圈里有翻倒的车，和古典文学里描写的一致——却是那么简陋、凄凉，墙用泥土垒成，屋顶上铺着草秸。

可敬的是，苏联的文学和电影忠实地再现了从火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生活景象。成熟、健康、像男人似的妇女——包着红头巾，穿着高达膝部的皮靴——和她们的男人比赛似的在地里干活。火车经过时，他们举起农具致意，对我们高喊再见："达斯维达尼亚！"爬到装满干草的大车上的孩子们也这样叫喊。大车由头上插着花儿的高大的佩切隆马拉着，慢腾腾地前进。

---

① 意大利作家（1898—1957）。

车站上，有些男人在散步。他们穿着色调鲜艳的、布料很好的睡衣裤。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旅伴，到站台上去蹓跶的。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城市里的居民，到站上来接人的。无论在何时辰，他们都穿着睡衣裤，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走。有人对我说，这是夏天的一种传统习惯。国家没有解释为什么睡衣裤的布料比普通衣服的布料高级。

我们在餐车上吃了第一顿苏联式的午餐。饭菜五颜六色，放了很多调味汁。在联欢节期间——从早餐开始就有俄式鱼子酱——，医疗服务部门不得不告诉西方的代表团，不要吃用那种调味汁泡过的肝脏。吃饭时要喝水或牛奶——这使法国人感到害怕——。由于没有饭后点心——因为烤制点心的才能全用到建筑方面去了——，让人觉得午餐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苏联人不喝咖啡——因为质量很差——，吃完饭时只喝一杯茶。他们任何时候都喝茶。在莫斯科的上好的饭店里，供应一种富有诗意的中国茶，茶水有一股沁人肺腑的香味，叫人真想把茶水倒在自己头上。餐车上有一位官员翻开一本英语词典对我们说，喝茶作为苏联的一种传统，还只有二百年的历史。

在邻桌上，有人讲着卡斯蒂利亚口音的完美的西班牙语。他是西班牙内战留下来的，1937 年由苏联运到本国抚养的三万二千个孤儿之一。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结婚，有了儿女，现在是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从业人员。在两种国籍中，他们可以任意选择。有一个姑娘——刚来时六岁——现在是莫斯科有学问的法官。两年前，有三千多人返回西班

牙。回国后，他们遇到了不适应国内情况的困难。熟练工人——在苏联，薪水比较高。有些人因找不到适合西班牙的劳动制度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些人遇到了政治麻烦。现在，他们又陆续回到了苏联。

我们的旅伴和他的妻子——苏联人——与七岁的女儿——和他一样，她们也讲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来自马德里。他的打算是彻底留在苏联。尽管他保留着西班牙国籍，怀着比一般的西班牙人更高的爱国激情、用更多的粗话谈论西班牙，谈论西班牙永恒的东西，但是他还是不理解，在佛朗哥的制度下，人们怎么能够生活。然而他明白，人们在斯大林的制度下是能够生活的。

他谈到的许多情况，后来我们从来自马德里的其他西班牙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为了不忘记西班牙语，他们一直学到六年级。他们学习了关于西班牙文明的专业课程，所有的人怀着同样的热情表现出的爱国热忱鼓舞了他们。西班牙能够成为莫斯科最广泛讲的外国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看见他们夹杂在人群中。他们接近讲西班牙语的人群。一般说来，他们都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但是提到苏联的制度时，并非人人都有信心。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回西班牙，有些人回答时信心不足，不过回答的方式是典型的西班牙方式：“因为血统在召唤”。还有些人承认，是由于纯粹的好奇心。最善于交谈的人利用可以信赖的一丝迹象，不安地回顾斯大林时代。我觉得他们意见一致，认为近几年间事情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一个人对我们透露说，他被囚禁了五

年，因为他躲在一只匣子里想离开苏联，被发现了。

在基辅，杂乱的人群唱着进行曲、挥动着旗帜和花朵、讲着十五天来很少听到的几句西方话，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设法彼此沟通，请他们指给我们哪里可以买到柠檬饮料。仿佛挥动了一下魔棍儿：人们从四面八方把贴着联欢节标志的柠檬水、香烟、巧克力和签名的本子送到我们手中。最令人敬佩的是，第一批代表十五天以前就过去了，那股难以言表的热情却依然如故。在我们到达之前的两个星期里，每过两小时就有一辆西方代表乘坐的火车通过基辅。欢迎的人群显得毫不疲倦。火车开动时，我们的衬衣扣子掉了好几个。由于人们从窗口扔进来的花束太多，我们的包房都进不去了。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丧失理智的人的国度，为了表达热情和慷慨，他们甚至连地方大小也不顾了。

我认识一位德国代表，他在乌克兰一个车站上称赞一辆苏联自行车。在苏联，自行车很少，并且很贵。那辆自行车的主人——一位姑娘——对那个德国人说，她可以把车子送给他。他谢绝了。当火车启动时，那个姑娘却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自行车扔进了车厢，不想打破了那个代表的头。在莫斯科，出现了一个场面，参加联欢节的人无人不晓：一个用绷带包着头的德国人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兜风。

为了让苏联人不至由于送礼而落得一无所有，做事必须小心谨慎。他们什么都可以送给人：有价值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在乌克兰一个村中，从人群里挤过来一位老太太。她送给我一把梳子。这种爱好，纯粹是为送礼而送礼。在莫斯

科，你如果停下来买一支冰激凌，就必须吃二十支，外加饼干和糖果。在一家店铺，吃东西很难自己付线，因为邻桌上的顾客已经为你付了。一天晚上，有个人拦住佛朗科，跟他握了手，把一枚沙皇时代的值钱的硬币塞在他手里，连等着对方致谢都没有就走了。在一家剧院门前的人群中，一位姑娘把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塞进一位代表的衬衫兜里，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她。我认为，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如此慷慨的热情，决不是来自某种为了感动代表们而下达的指示。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苏联政府一定会为本国人民的守纪律和忠诚感到自豪的。

在乌克兰的村庄里，有水果市场：一个很长的木板台子，卖水果的是一些穿着白衣服、包着白头巾的妇女，她们用富有节奏的、快乐的喊声推销她们的商品。我觉得这准是由联欢节出钱制造的民间景象。傍晚时分，火车停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我们趁着没有欢迎的人群下车去散步。一个男孩走过来，向我要一枚我们国家的硬币，但是他得到我们衬衫上的最后一个纽扣就感到满足了。他邀请我们去逛水果市场。我们来到一位女售货员面前，其他女人并没有停止她们那种嘈杂而笨拙的叫卖声。她们叫卖时还伴随着拍手。那个男孩对我们说，她们是集体农庄的推销员。他以真正骄傲的口吻但也带着某种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强调说，那些女人彼此并不竞争，因为货物都是集体的。为了看看他的反应，我对他说在哥伦比亚也是这样。小伙子感到惊讶。

根据预告，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第二天上午9点零2

分。从8点开始，火车就在一个工业密集的郊区穿行。莫斯科的效区是一种感觉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像某种烦恼一样不断向深处扩展。谁也不知道城市从哪里开始。突然，在一个不确切的时刻，你发现树木没有了，绿色让人联想到一种想象的冒险。火车发出的无休止的长啸传入一个由高压电缆、示警标志和像灾难性震动一般震颤的高墙构成的复杂系统。让人恐惧地感到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后来，出现了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一辆空空的公共汽车从一条既破败又狭窄的胡同里开过去。一个女人出现在窗前，惊愕地望着火车通过。在清晰而平坦的地平线上，大学的楼房看去像一张放大的照片。

尼龙袜是一件珍宝

两年前，我去苏联驻罗马使馆申请签证，以便作为一家新闻社的特派记者去莫斯科。我去了四次，四次回答了由四位不同的官员提出的同样的问题。最后他们都答应通过邮局把他们的答复寄给我，但是我还没有收到。在巴黎，事情就简单得多，好办得多。在格勒内尔街那幢复杂的大楼里，我被带进三个挂着列宁肖像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里接待过我们的那位官员在最后一个大厅里用勉强听得懂的法语回答我说：没有某个苏联机构的邀请，申请签证是徒劳的。

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巴黎，旅行社负责组织旅游团，十五天内可以以孔戈舞的步伐访问完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对一名正直的记者来说，那种旅行很危险：可能得出表面的、匆忙的和片面的看法，读者会认为你的看法是最后的结论。

当在柏林有人为我提供出席第六届苏联青年代表大会的

机会时，我曾想，那比参加旅游团还要糟。那将不是500人，而是四万人。为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苏联已经准备了两年。这使我有理由认为，我们将遇到的不是苏联的现实，而是为外国人制造的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很清楚，参加联欢节的多数人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准备去苏联发现它的缺点，他们缺乏直接地介绍他们的见闻的修养。不只于此：莫斯科联欢节具体要求尽量少派共产党员参加。“波兰人狡猾透顶，”两年前参加华沙联欢节的一位意大利姑娘在罗马对我说。“为了让我们相信波兰有宗教自由，他们敞开了教堂的大门，却到处安置了伪装成神甫的公共官员。事实上，华沙的重建工作是从修复天主教的教堂开始的。不参与政治的神甫们享受到了绝对的自由。最正直的资本家看不起重建国家的工作，而只满足于知道华沙没有小汽车，人们的衣着破烂，电梯卡在两层之间。在华沙，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因为华沙的大主教，红衣主教明斯曾基在监狱里。但是谁也没注意——共产党的代表也没注意——，共产党的领导人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也在狱中，联欢节结束一年后他才被人民解救出来，掌管波兰的命运。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趁着十五天的联欢节，让他们的间谍带着必要的指令潜入苏联。在莫斯科发现一张用英文印的传单，上面写着反对苏联的口号。前几届联欢节上也发生过此类的事情。明明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社会主义国家——有充分权利——仍然设法让代表们看到一个许多人在星期日穿着举行宗教典礼的衣服的民族。我不愿意见到一个为欢迎来

宾而梳妆打扮的苏联。见国家和见女人一样，应该见她们刚刚起床时的样子。

佛朗科的意见不同。他认为——现在我觉得他是对的——，看法之所以肤浅，部分原因来自代表本身。必须知道什么是联欢节，才能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城市里呆十四天却还不了解它。在莫斯科，举行过电影节，每天放映四场电影。举行一次世界戏剧节，同时举办三百二十五个绘画展、摄影展、民间艺术展和全世界的时装展。一次音乐舞蹈比赛每天演出六场，同时举办建筑、雕塑艺术、电影、文学、医药、哲学和电子学研究班，举行由全球的专家承担的关于无数个主题的讲座。苏联的每个组织都要举行一次所有的代表团成员参加的招待会。三百八十二个代表团中的每个代表团都要为各个代表团举行一次招待会。只有法国代表团——不算文化、体育和科学界的代表——几乎有三千名代表。在稍微轻闲的时刻，必须在看中国杂技、拜访巴勃罗·聂鲁达、参观克里姆林宫、看日本烹调展、应邀参观集体农庄、看捷克木偶戏、观印度芭蕾舞、看匈牙利和意大利队之间的足球赛或私下里会见一位瑞典女代表等节目中间选择。这一切占满了15天的空余时间，也填满了一座把人压垮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们需要一小时的时间到其他地方去。我由衷地相信，有一些代表连见一个苏联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佛朗科认为，可以利用一下那种混乱局面。应该放弃一些节目，到街上去和那些从苏联各个角落来的人聊聊，因为同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了四十年后，他们渴望和外国人交

谈。必须在联欢节和深刻了解苏联的现实之间进行选择。我们牺牲了联欢节。

如果说去苏联的签证花了六年才办成，去波兰的签证十分种就拿到了，并且没说一句话。经过努力，我被作为国际电影代表大会的观察员参加了由二十二名代表组成的一个条件舒适的剧团。证件是用波兰文写的。于是我拿着两张照片去了领事馆，把邀请信放在门房的桌上。隔着办公室的门，我听见领事同华沙通电话的声音，还听见他以十分强硬的口吻提到我的名字。一刻钟后，波兰的签证就装进我的口袋儿了。

已经过完假期的雅克琳回到了巴黎。佛朗科把小汽车存在柏林一个停车场里，我们继续乘火车去布拉格。我们没有捷克的签证。旅行持续了十五小时，但是四小时是在边境上过的：坐在空荡的受到严格控制的火车上。在德国的最后一个镇子，火车停了两小时，尽管海关的手续五分种就办完了。到了傍晚，火车开动了，以一种比人走路还慢的速度缓缓地离开了车站，并且这样通过了一个挂着德文标语的村子。在村子的另一端，火车停在了一座桥前，桥上有一条用油漆刷写的捷克文标语，标语用的是红布。桥上站着五六个拿着机关枪的土兵。等土兵们察看过车底下有没有人躲藏后，火车才重新开动。然后，土兵们分散在火车两边，以正常的步伐顺着隐没在杂草中的小路向前走，护送火车通过。火车行驶了一公里后到达捷克第一个车站。我们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

车站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是大喇叭里播送的音乐和穿着铁路职员制服的妇女。看见女人穿着长裤，毫不希奇。但是看见她们全身穿着制服、衬衫，系着领带，穿着男鞋，留着发髻，戴着帽子，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才发现，捷克所有车站的服务工作都由穿这种衣服的妇女担任。天气挺热……我错误地认为欧洲的事物和我们哥伦比亚村镇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使我觉得那个炎热、荒凉的车站——有一个男人在一辆卖冷饮的小车前睡觉，小车上放着五颜六色的瓶子——和圣玛尔塔的香蕉种植区的尘土飞扬的车站一样。由于播放的唱片潘乔兄弟唱的博莱罗舞曲，墨西哥的曼博舞曲和科里多舞曲，那种感觉就更明显了。博莱罗舞曲《背信弃义》甚至播送了好几遍。火车到站几分钟后，又播送了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唱的“米格尔·卡纳莱斯”，唱得很出色，但是我没听过。我想下车去看看唱片，但是车门锁着。一位铁路女职员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护照未经查验不能下车。

海关官员是两个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夏天穿的漂亮制服，像美国军队的制服那么轻便、那么舒服。其中一个人讲法语。他向我们要捷克签证。我对他说，我们没有。那个人好像不感到奇怪。他和他的同事交谈了一会儿，拿走了我们的护照。过了些时候他回来对我们说，他们在打电话同布拉格联系。半个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有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停留 15 天的过境签证。

手续那么简单，和东德的官僚主义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后来我们还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冷饮、捷克的上等啤酒，都

用纸杯子出售，杯子上印着一句话："此杯用完后请毁掉。"这种有益于清洁卫生的做法到处都可以看到。餐馆窗明几净，效率很高。医疗服务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好。当然比巴黎好得多。

火车停下后，在什么地方一定打开了一道门，因为人群急急忙忙地从地下通道里拥出来上火车。男人都穿着质地很好的衣服，女人大多数穿着为男人制做的长裤，长裤有襟门，右边有纽扣。特别是小孩，衣着整洁、雅致。军人们拎着手提箱和包裹，带着妻子和儿女，和人群一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火车便奔驰在一片连一片土地也不荒废的机械化农业区了。到处都能看到已经峻工的或正在进行的大型水利工程。在布拉格郊外。农田已被工厂取代。第一个夜晚，我们和一辆拉着崭新的公共汽车和尚未使用的农业机械的火车交错而过。佛朗科想打开车窗。一个大约有四十岁的捷克人腿上坐着一个用风雨衣裹着、正在睡觉的小女孩，看到他在用力地想打开封闭的玻璃窗，便用法语对他说：

"使劲向前推。"

我们的旅伴对我们解释说，公共汽车和农业机械是向奥地利出口的物资。他对我们说，捷克斯洛伐克是许多西方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甚至苏联的机械供应国。他是一名负责贸易的官员，这是他今年进行的第四次出国旅行，从法国回来。他坦诚地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对政治不关心，但是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愉快。他不想去美洲碰运气。他的护

照有限制：只能用于和他的贸易活动有关系的旅行。这一次，允许他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去认识巴黎。几个星期后我回巴黎的时候，在火车上还遇到一个去巴黎度假的捷克家庭。一个法国人像透露什么秘密似地对他们说：在巴黎有一个地方，换捷克币的价格比官方高三倍多。捷克人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这会损害我国的经济。"他说。

这是一个和东德的某些从业人员的态度形成对照的具体例子。该国的戏剧导演和医生拿着很高的薪水。国家教育了他们，让他们掌握了专业知识，然后却必须给他们很多钱，以免他们移居西方。我没有碰到一个捷克人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意。大学生们几乎没有表示对外国的文学和杂志的不必要的控制及出国旅行的困难感到不满。

我们到达莱比锡的那个晚上，佛朗科认为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由表面现象造成的：灯光暗淡，细雨绵绵。我们晚上11点到达布拉格，仍然下着小雨，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充满生气和快乐的城市，和十二个小时后我们在一个灿烂的夏日早晨看到的城市一样。车站上的国际服务处把我们送到布拉格最好的豪华大饭店。我们在那里得知，有两种兑换率；一种是正常的兑换率，大约一美元换四冠币；旅游兑换率，1美元换2冠币。区别在于：按旅游兑换率兑换时，给我们百分之六十的证卷，证卷只能在饭店里使用。算一下帐，我们花4美元可以住一间有卫生间、电话、提供三餐的房间。晚餐还提供在巴黎的便宜餐厅以这样的价格喝不到的法国好

酒。

半夜，我们逛了城市的中心区。在文塞斯拉夫大街的咖啡馆里，宏亮的乐曲声和从影院与剧院出来的人群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人群在树底下的露天酒吧里喝着啤酒，在刚刚看完近期观众爆满的两场演出即巴尔登的电影《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死亡》和加西亚·洛尔卡的话剧《玛丽亚娜·皮内达》之后又想起了西班牙。

从一家电影院出来的一群人走进同一幢楼里的一家酒吧间。我们问了一下价钱。电影票五冠币一张，啤酒四冠币一杯。那是一家国际性的酒吧，在欧洲的夏天能赚大钱。一位穿着开领上衣的女歌手在全景荧屏上用捷克语唱《锡沃内》。

我们要了啤酒。我慢慢地喝着我的一杯，一面竭力发现某个细节，使我能够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里。佛朗科从邻桌上拉来一位姑娘跳起舞来。那天是星期二。在这样的场合，顾客们不像意大利酒吧里的顾客穿得那么好。他们更像哥伦比亚的中产阶级在星期六的舞会上的穿着。跳完了舞，佛朗科把他的舞伴介绍给我。他们讲的是英语。我们请她坐。她去邻桌征得她的朋友们同意，拿着一杯啤酒回到我们桌上来。我对佛朗科说：

我没有找到两种制度之间任何不同的迹象。”

他使我突然明白；不同表现在价格上。当我起身跳舞的时候，他提醒我说：“你仔细看看那个女歌手。”我一边跳舞一边注意她。她留着呈铂色的金发，穿着高跟鞋还是显得很矮，着装是一身海员的蓝色晚礼服。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地方。佛朗科不罢休："你看看她的脚尖儿。"

应该注意的情况在那里:尼龙袜子破了,露出了脚指头。

我表示反对：不应该吹毛求疵，寻找一种制度的缺点。在巴黎，常见一群男女盖着报纸睡在路边，冬天也如此。但是并没有爆发革命。可是佛朗科坚持说，这种评价很重要，"必须善于评价细节。"他又说："对于一个关心自己的命运的女人来说，穿破袜子是一种全国性的灾难。"他喝完他那杯啤酒，又回舞池跳舞去了。

他一连跳了两支舞曲没回桌上来。从她跳舞的样子看，我觉得她跟他的舞伴十分投合。那个姑娘身瘦腰细，富有幽默感。他们消失了半天。他们回到桌上时我明白，他们是去酒吧喝酒去了，因为佛朗科有点醉了。他又喝了一杯啤酒，然后他用带有醉意的口吻柔情地对着舞伴的耳朵细语，要她跟他去饭店。他的舞伴笑了笑，模仿佛朗科的声调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

"你到那张桌上去，问问我的丈夫同意不。"

气氛平静下来。后来，两个桌上的人坐在了一起。那个姑娘讲了那件趣事，大家笑起来。啤酒撒在佛朗科的脚上。但是姑娘的丈夫避开尴尬的局面，建议我们到旧城城堡上去看黎明。他买了两瓶波兰伏特加，凌晨三点钟，我们唱着墨西哥科里多舞曲顺着石铺的胡同向上爬。佛朗科的舞伴突然坐在了路边，脱掉了袜子，把袜子装进了手提包儿。

"应该爱惜它，"她对我们说，"尼龙袜很贵。"

佛朗科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辉，他在我的背上拍了一

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尼萨——欧洲最宝贵的海滩——感受到过同样的快乐，当时我发现上潮时城市的垃圾浮上了百万富翁们正在游泳的水面。

租来的妻子

据说一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如果妻子不漂亮，出国旅行的时候他们可以带另一个女人去。说这话的人并没有多大把握，也许他不敢提供更多的细节。如果是关于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国家元首对借来的妻子的权利有多大，他们是睡在不同的房间里还是相反，虚假的第一夫人和合法的妻子是否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甚至亲密关系的最终结果，他就更不敢提供什么了。不管怎样，关于假妻子的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似乎已经被这一明显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了：在国际性的高层政界的招待会上，因其美貌、高雅的风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而更引人注目的女人是这样的美人儿：她们让西方国家的第一夫人显得暗然失色，使她们的丈夫惊愕不已，有时——确实如此——她们甚至毫不费力就能像某人的妻子。

既然一切的根源一般都能在《圣经》里找到，那就不可

避免地应该回忆：当亚伯拉罕——或者像现在写的那样叫艾布拉姆——带着他的妻子、被公认为那个时代最貌美的女人之一的萨拉伊去埃及时他遇到了什么事情。艾布拉姆担心埃及人为了占有她而把他杀死，便说服她假装她的姐妹，“以便由于你而使我能够一帆风顺，由于你而使我能够得救。”果然，两个人是那么顺利，法老爱上了萨拉伊，由于她，法老待他也很好。送给他绵羊、驴子、奴隶、女奴、母驴和骆驼。结果，耶和华——或者像现在写的那样，叫杰和华——以一种本人不知所犯的罪过使法老遭到了大灾大难，并把艾布拉姆和萨拉伊逐出了他的王国。对某些非洲君主的所谓习俗来说，《创世纪》的这个遥远的故事的寓意是，某个人为自己创造了租借妻子的故事，却突然发现他的家里由于他勾引别人的合法妻子而充满了灾难。

人们第一次听到关于某个第一夫人的丑恶历史是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执政时期。作家里卡多·穆纽斯·苏亚伊年轻时随着内战时期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华盛顿的时候见过她。他说他从来也不赏识她的热情，因为她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紧急援助，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她给他们的唯一有价值的和值得记忆的东西是给代表团每个成员的一纸筒冰激凌。但是他还说，总而言之，她是一个那么肥胖，那么不成比例，那么丑陋的女人，只能让人觉得她是一个有着古怪的姿色的女人。然而，她并不是那个时代最丑的女人，因为世俗的女记者埃尔莎·马克斯韦尔说，她把权杖一直执掌到她死亡，而且执掌得那么骄

傲，她不需要和任何一个国家元首结婚以便使她的丑貌得到普遍承认。她一生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在一次少女选美中获胜，并且有一次还发表了关于那次选美的照片，好让那些把儿女的照片装在钱夹里拿给人们看的父母们更谨慎一点。

美国的报纸从来也不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夫人尼娜访美时那么不谨慎。有人俗气地估计他们二人的体重加起来大概有200公斤，他们似乎穿上了从邮局寄来的，也许寄错了地方的衣服。不仅有失礼貌，那些看法还带着险恶的政治用心，因为他们毫不掩饰让他们同美国有史以来最般配的夫妻、当时在台上的约翰·F·肯尼迪和雅克琳·布维尔的仪表形成对照的意图。肯尼迪穿着无可挑剔的、运动员穿的外套，有着哈佛的阔气子弟的优雅的、让人无法忍受的风度。无庸置疑，雅克琳是世界上衣着最时髦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有一双温柔幸福的眼睛和优美的身段。相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却像穿着自斯大林死后苏联最高的官员们的制服出现在官方的典礼上：一件肥大的外套，仿佛从一个最高大的死者那里继承来的，两只袖子将将露出手指尖儿。当他脱下一只鞋、用鞋敲打他在联合国的元首办公桌时，他那种粗野作风似乎达到了顶点。但是不管怎样，嘲笑的焦点还是她——穿着带大红花的农民服装和粗笨的鞋子、春风满面、举止谨慎的尼娜。但是纽约的不幸的记者们害人不成反害己，因为在访问结束时，苏联第一夫人赢得了美国家庭主妇们的心，归根结底——正如她们的

称呼表示的——在家中，她们掌管一切。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干了现在都认为是非洲的某些统治者干的事情的话，他一定会犯这种严重错误：忘记在爱情方面——和人们所说的相反——已经知道的好东西也常常比还不知道的坏东西好。

不管怎样，所谓非洲的习俗最不公正的地方是，第一夫人们没有她们的丈夫享有的特别权力。就是说，当她们必须出国在没有国际政治色彩的橱窗里露面的时候，她们不能用一个更像样儿的人来取代她们的丑陋国家元首。有多少我们认为是租来的合法第一夫人必须在世俗的客厅里忍受和拖带着那么多真正的、像某个可怖的动物园的一闪而过的展品似的丈夫啊！当然不仅是非洲人，而且是任何地方的人，因为人们相当清楚，在成为丑陋人的时候，我们这些男人既没有时间界限也没有地理界限。但愿我们能成为像约翰·F·肯尼迪或艾迪·阿明·达达那样的国家元首。

两个命运交叉的人

一

很难说清，3 月 24 日承担野蛮轰炸科索沃任务的两个人物是否知道他们本人已成为他们的交叉命运的牺牲品。

其中一个人物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马德里人哈维尔·索拉纳·马达里亚加，一位五十七岁的人文学家，物理学教授，三个发生杀人案的部即文化、教育与外交部的安全无恙的幸存者。在他的众多的朋友圈内，他的表现总是依然如故：一个并不像留胡子的、而是由于失眠而匆匆忙忙没刮脸的知识分子。他深谙对话的魅力，认真严肃地读过应该读的一切书，也读过许多不应该读的书。奇怪的是，他从没有写过也没有对人谈过一首爱情诗。他享有这种当之无愧的世界声誉：他见人就微笑，逢人就拥抱，甚至他的一位朋友

说，他连电线杆也会拥抱。然而，有几次他无精打彩，他的眼睛使他显得像一位忧伤的、喜欢孤独的诗人。

在政治生活方面，他善于根据自己的观点同每个人保持距离，并总是像他叔伯祖父堂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那样对人彬彬有礼。但是同样尽人皆知的是，在理由充分时，他也会大发雷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对方是谁。他的最大的矛盾是大声疾呼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今天他却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北约秘书长。总之：他是一个一点儿也不平常的公民，看上去他连一个苍蝇也杀不死，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本世纪最危险的军事命令。他留给我们这些作朋友的唯一的安慰是相信那种野蛮行动不是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他的厄运从中作祟。

二

另一个人物，冒险行动的技术执行负责人，是美国的韦斯利 .K. 克拉克将军，世界上指挥人马最多的人。最初他在位于巴拿马的美国南方司令部，直到 1997 年，后来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任职。五十五年前他出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他的朋友、克林顿总统也出生在那里。1966 年获得西点军事科学院颁发的发展一等奖，还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名誉教授称号。他衣冠楚楚，还算知书达礼，他的战友们认为他是一个道地的旧式军人，他和他的部队同甘共苦，如果不知道他们对他的看法，

他便不能生活。几乎没有几个人怀疑在他那四颗星和奖章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可抗拒的梦想：他要让世人承认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知识分子和为社会谋福利的思想家。

三

我同哈维尔·索拉纳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良好的、富有成果的友谊源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和恩赐。我认识克拉克将军的方式却相反，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也最出人意料的插曲之一。事情发生在十三年前的巴拿马，当时以外交部长豪尔赫·里特为首的几个朋友约我去参观运河船闸的巨大绳索玩具和仍然被美国占领的地区的霍华德基地的遗址。我们刚刚通过检查站，就被南方司令部的一些军官拦住了。直到我们几乎举着双手走下公共汽车时，他们才对我们解释说，克拉克将军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们。我们始终不清楚，他是通过什么牌戏或军事智慧知道我们将从他家的门前经过的。但是他正像电影上那些殖民地的指挥官那样穿着热带的制服，坐在司令部一张桌子一端。桌上摆着各种美味可口的食物和饮料。你也许认为他不是克拉克将军本人，而是克拉克将军的完美的扮演者罗伯特·雷德福。

他的意图——通过牛津大学的修辞技巧和斯卡利特·奥哈尔的侄玄孙们简单方式表示的——是和我们交流对世界的看法。他几乎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谈起他从越南到波斯尼亚所担任的众多军事和政治职务中取得的经验，他认为他的社会

意识早已成熟。但是没有一个时刻他像是意识到——至少我这么看——他弄错了交谈的对象。我绝对缺乏关于抽象概念的才学、文化和爱好，我几乎不敢向他解释小说家的直觉和预见有时像科学院的科学一样无益于驱除现实的邪祟。克拉克将军却向我证明，他对抽象概念十分了解，尽管由于他的军事教育使那些概念变得也许陌生了。回到公共汽车上后，外交部长利特对那一个半小时难以形容的交谈做了唯一可能的总结：“这是两种有分歧的自说自话的总和”。

四

所幸的是，克拉克将军也和我们一样明白我们的文化障碍和我们的政治距离。我们通过共同的朋友继续交换着回忆和口信——或一本这样那样的书——。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位朋友居然是哈维尔·索拉纳。然而，我应该承认的是，当我得知他们在北约肩并肩地一道工作时，我觉得另一种神秘性偶然性把我们这些小说家的美梦打破了。今天很清楚：科索沃不是世界的任何部分，而是它的神经中枢之一。使科索沃备受其害的侵略行为存在着不可预言的和可怕的扩大的可能性。这对一个从来不想成为军人的文人和一个梦想成为文人的军人来说，都是坏消息。两个人都已陷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急先锋的巨大危险之中。

花儿遭受怎样的痛苦

为了使好运重新进入一个因遭不幸而萎靡不振的家庭，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家里摆一束盛开的黄花。它甚至是一种用来驱散在某些不可名状的日子常常搅扰神秘的写作工作的阴云的不可战胜的法术。如果打字的手指总是敲错了键，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人物在小说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气息呼吸，如果你找不到同情的话语来帮助人物毫不痛苦地死去，那一定是因为在写作的房间里的空间里缺少某种东西。所缺的东西几乎常常是一种花卉。

所以，如果书房里的杯子里不放一朵黄玫瑰，我便永远不敢写作。这不是由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迷信，而是由于一种纯粹而有效的经验使然。"花也是人。"我曾听到一个七岁的男孩这样说。毫无疑问，他很清楚他说这话的意思。其实，花儿和植物的类似人的行为在往常的诗中就已写过，好诗和坏诗里都有。如果不提及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某些美丽篇章

描述的含羞草在傍晚散发出的那种柔和的香气，就很难记起她们本人。含羞草，没有人碰它，只要有个影子从旁边闪过，它的叶子就卷起来。如果谁不同意勃朗特姐妹的这个看法，他就无权自称为诗人。她们认为：含羞草的香味是一个重返活人世界来寻找一位心上人的孤魂。我在我的某部作品中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使用了这个概念："素馨是一种有反应的花。"我这样写道，迄今没有人指责我。对威廉姆·福克纳最美丽的小说，我依然保留着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黄昏在窗前生长的一棵紫藤的主茎的牢固记忆。我总是怀着同样惊奇的心情重读关于德拉库拉侯爵的传说，就像布拉姆·斯托克在文学中永远描写的那样。但是那部可怖的杰作留给我的更深刻的印象不是吸血鬼的超自然的表现，也不是他那种变成狗后在伦敦港上岸的本领，而是乌头花在他的精神上引起的恐惧。

童年时代令我感到惊讶的事情之一是我外祖母在睡觉前把花束从我们的房间里拿出去时举行的那种仪式。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她那样做是有道理的：花儿散发出来的碳酸酐对关着门窗睡觉的人是有害的。但是，实情是，我外祖母跟神秘事物的联系比科学家们密切得多。她总是对我讲，摆在卧室里的玫瑰会刺激人做噩梦，那些噩梦会让我们一辈子不得安宁。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次朋友们的聚会上谈起这些事，一位朋友关于植物的灵魂讲了一番博学而迷人的话。一切全是由于有人提到约翰·怀德姆的长篇小说《三分裂的一天》而引

起的。这是一部我记得的最可怖的小说之一。三分裂——和我们许多人读小说时认为的相反——不是一种能够伸长贪婪的触角、短短的几小时就能把人吃掉的杀人植物。不，它不过是用来描述植物的一个普通形容词，形容某种植物分裂为三部分。只是小说的作者注入了一种新的含义，使之变成了一个象征：植物王国已经构成对人类的一种可怕威胁。

我们那位朋友的看法却完全相反。我相信他是对的。那天晚上他说："在居民家中，植物成了家庭核心的一部分。它们和我们一起享乐和受苦，面对言语的威吓它们会惊慌，遇到真正的侵犯它们会恐惧地死去，它们无力自卫。"对它们来说，大小动物，尤其是家里喂的狗、老鼠和某些害虫，是永恒的威胁。毫无疑问，这一点可以通过电流计的测量来确定。电流计是通过磁针的倾斜程度验证电流的存在、测量电流的强度、确定电流的方向的一种仪器。接触一棵植物：电流计就会有反应，甚至能反映植物最隐密的感情。

有一次一位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那种试验今天已闻名于世：他在其他植物面前割坏了一棵叶子树。不了解科学家的计划和试验目的四个学生也参加了试验。稍后通过电流计证明，那些植物面对被割坏的树而不是面对见证人恐惧地打哆嗦，甚至面对割坏叶子树用的刀子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面对幸福和快乐，"我们的朋友接下去说，"植物也会做出反应。"把一棵植物放在一对男女正在做爱的房间里，它会处在和相爱的男女一样的精神状态中。精密的电流计能

测出只有用极度兴奋才能说明的强烈振颤。

植物的神经中枢——我们的朋友最后说——位于根部的组织中。那些组织像人的心肌一样扩张和收缩。此外，它们也有记忆：能够积累印象，并能长时间保存。所以有人会想：一棵红杉——一种参天大树，可以长到一百五十米高，可以活三千年——能够积累什么历史记忆呢？

另一方面，有这样的植物，给它打上一针剂量很大的酒精，可以看到它的反应：痛苦的醉态。第二天，电流计会显示出类似我们人类由于纵酒狂欢而产生的状态。同样可以证明，和谐的声音能够影响某些植物的生长。植物最一般的爱好是听巴赫的乐曲，一般说来，是巴罗克音乐。但是，可以使它们的爱好提高一步，甚至可以让它们通过巴尔托克和舍思伯格的乐曲达到真正的陶醉。但是今天，植物似乎憎恶刺耳的摇摆舞曲，那种尖厉的声音会使植物的叶子变小。

在介绍过这些我认为很有道理的情况后，我不禁自问，邦萨斯树被日本人粗暴地变成了小矮树，该遭受多大的痛苦。我还要自问，哥伦比亚种植了许多工业用玫瑰，玫瑰的香味被除去，它们会有何感觉。我们的植物学家朋友不能够对我们解释把花儿的香味除掉的原因，但是有人说，这是美国进口商的要求，美国的顾客喜欢玫瑰，但是厌恶那种香味。勃内·杜蒙教授在他的一本对破坏生存环境表示抗议的书中揭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每个星期天出版的《纽约时报》都要消耗用数公顷森林造的纸。

然而，我们这些参加那次聚会的人并非都对植物遭受的

痛苦和森林的被毁灭感到那么惋惜。不只于此，刚才我又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证据：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异乎寻常的题目的。有一个朋友，我认为他既聪明又严肃。他打电话问我，这个星期我写的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我写的题目是关于植物和花儿遭受的痛苦。”我回答说。我的朋友以真正惊愕的口吻叫道：

“真见鬼！你是不是变成了女人气的人了！”

艺海拾贝

我们的海明威

欧纳斯特·米勒·海明威于 1928 年 4 月第一次来到哈瓦那。他乘坐的奥丽塔号英国海轮从法国罗歇尔起航，经过两个星期的航行到达基韦斯特港。他的第二个妻子波林·法伊弗和他同行，他们在十个月前刚结为伉俪。无论是他还是他妻子，对这座加勒比地区的城市都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只是在横越宽阔的大洋、渡过法国的严冬后想在热带地区停留两天罢了。海明威当时二十八岁，一战中曾任驻欧洲新闻记者和救护车司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获得一定成功，但是还远远不是一位著名作家。他仍然需要从事一种第二职业来餬口；此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也没有一处稳定的住处。跟他相反，那时波林是个善于交际的女人。她的叔叔是美国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巨头，对她像对孙女一样溺爱，生活中的一切她应有尽有，甚至具有弗朗西斯·麦库默的妻子的明星姿容和难以形容的幽默。但是那个四月她并非事事顺

心。她已怀孕，厌恶大海。他们唯一的渴望是早些到达基韦斯特港，在那里住下，好让海明威写完他的第二部小说《永别了，武器》。

当时哈瓦那（今天亦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由于新近兴起的甘蔗热带来的繁荣和美国的庇护，独裁者赫拉多·马查多得意忘形到了极点。他断绝了前几届政府同摩根银行保持的关系，而和洛克菲勒家庭的全国性的蔡斯银行公开“同居”。为了换得一切，该银行很少拒绝他的要求。物质上的进步带来的灾难到处可见。海明威从在中央公园租的一辆派克汽车的小窗口里看到种种灾难不能无动于衷。防波堤的林荫道——其维护与美化工程是在另一个时代开始的——一步步达到现在的规模。新型的林荫道和百万富翁们的住宅正在旧城的西面出现。但是最宏伟的建筑将是怪诞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国民大厦——一块石头挨一块石头地仿照华盛顿大厦修建——，在它的采石场上有一位名叫恩里克·利斯特尔的石匠在工作，几年后他竟成为西班牙内战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之一。

很快就把哈瓦那变成美国的豪华妓院的疯狂卖淫活动依然披着舞蹈学校的无辜外衣。人称舞蹈学院。它的快乐的姑娘们——半是处女，半是妓女——陪舞时每收五个生太伏，自己得一个生太伏。她们以一个让一位作家不会忽略的名字“女大学生”而为人所知。在可敬的国家剧院的扶手椅区搭了一个公众跳舞的台子。剧院最重要的活动是每年举办一次舞蹈大赛。独裁者马查多对美国的卑躬屈膝达到了甚至让美

国操纵大赛评委会的地步。这样，在世界上最爱跳舞的国家举行的舞蹈技巧比赛的获胜者就成了美国大使哈里·F. 古根海姆。

关于海明威在哈瓦那逗留的那四十八小时，他的作品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述。不错，在他的新闻报道中，他经常很巧妙地介绍他参观过的地方和认识的人。但是当时他决定暂时停止记者工作，以便全力以赴写他的小说。然而六年以后，他写了第一篇违犯自己的决定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在古巴的见闻。从此以后，他写了半打关于他在古巴停留情况的文章。不过没有一篇提到他重建他的私生活的问题，因为他总是一般地谈论那个时期支配着他的激情：热中于捕鱼。“过去，”1956年他写道：“是捕鱼吸引我们来古巴的。”这句话让人想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海明威已经在哈瓦那生活二十年了。当然，他侨居古巴的目的要比捕鱼的简单乐趣更重要，或者说至少比捕鱼的目的要多一些。

显然不是爱情问题，而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其秘密几乎在他成熟后的一切作品里都有所记述的概括。1932年他为了捕锯鳐而第一次去古巴时，他似乎确信他终于在基韦斯特岛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他在那里有了一个儿子，并写了第二部小说。毫无疑问，他还在那里种过一棵树，以便成为格言里说的完全的人。从那以后，由朋友乔·拉塞尔陪同，他曾无数次地往返于古巴。拉塞尔是基韦斯特岛乔氏低酒店的产业主，看来他是把捕鱼当作了掩护其他赚大钱的买卖的屏风。海明威写道：“他曾以最大的载量把有名的烈性

饮料从古巴运到基韦斯特岛。”当然，在美国的酒鬼们由于禁酒法的实施而渴得要命的时期，那是走私。但是那种根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短程旅行却使海明威同那些以海为家、至死都是他的好朋友的善良人建立了联系，并使他见识到一个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营养的世界。海明威本人在一篇于1949年7月刊登在《假日》杂志上的文章中谈到过那个时期他的古巴朋友是什么人：“我多年前就认识的倒卖彩票的人，”他写道，“为了我赠送的鱼而盛情回报我的警察，在投球场上和我坐在一起输掉一天的收入的小船主，驾车从港口和防波堤上经过、挥手向我致意的熟人，尽管由于距离远而看不清是谁，我还是举手回敬他们。”这就是说，从那时起海明威本人就认可自己是哈瓦那街头为人熟知的人物。

也是在那个时期，他认识了“小佛罗里达”。那是一家上世纪开业的、附设有海味餐馆的酒吧，如今它依然保留着原来的金色墙裙和高贵窗帘。那里时兴喝台克利，那是用岛上透明的甘蔗酒加冰末和柠檬汁调制成的一种鸡尾酒，在海明威的推动下，这种酒的调制法传遍了半个世界。但是据他自己说，很久以后他才把那家酒吧写入作品，他对那个地方的根本兴趣不在于去那里饮酒和用餐，也不在于渴望遇到他那些像洪水一样涌入这个城市的同胞。“那里的人来自联合国的一切国家和一个人住过的许多地方。”他写道：“有舰艇上的水兵、航海者、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赌徒、外交官、有志当文学家的人、处境好坏不一的作家、来首都出席各种科学大会的内外科医生、美国退伍军人会的成员、运动员、

身无分文的个人、一周或一年后将被杀害的人、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个人存放钱的银行的经理、某些衣冠不整的家伙和许多古巴朋友”。这些往事是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回忆起来的。这不仅是一些新闻工作的往事，而且也像是一本用来怀念旧事的电话簿。现在，如果不熟悉这个名单上的许多人物，想重读他的作品是困难的。人物所处的时间、地点不同了，并且被铅字改变了容貌，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地打着在“小佛罗里达”沾染的恶习的印记。如今在那个酒吧的一个壁龛里摆着一尊海明威的半身雕像，一位当年的老店主不知疲倦地告诉游客们海明威坐过的是柜台前的哪一把凳子。

“两个世界饭店”离“小佛罗里达”不远。海明威每逢上岸睡觉就在那里租一个房间，一来二去就把那个房间变成了他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归来后进行写作的长期不变的书房。那个房间总是原封不动：它位于饭店东北角五层楼上，没有房号。“房间的窗口——据海明威描写——对着古老的大教堂和港口的入口，北面是大海，东面是卡萨布兰卡半岛、一直绵延到海港的房顶和整个宽广的海港”。我始终不明白海明威为什么略而不谈“将军大厦”，那是从他的窗口望见的最漂亮的建筑，现在仍然是哈瓦那最美丽的建筑之一。若干年后在同乔治·普林顿进行历史性的会见时，海明威对他说：“‘两个世界饭店’是有利于写作的好地方”。由于对往事的怀念，他这样说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那个房间远不是海明威可写作而梦想的窗明几净的地方。那是一个只有 16 平米的

房间，有一张普通的木制双人床，“两个床头桌，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目前，两个世界饭店”是一家接待教师和高等教育部的官员的国家饭店，但是位于东北角五楼上的那个房间为了纪念那位著名的房客已经关闭，房间里的一切原封不动，甚至还保留着一部两卷本的西班牙文版《堂吉诃德》古本。此书好像被漫不经心地放在桌子上的。

当你想到海明威总是很认真地选择写作的地方时，他偏爱“两个世界饭店”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并不愿意，也许是不知不觉地屈服于了古巴的其他魅力。那些魅力与众不同，比九月的大鱼还难以辨认，对他的痛苦心灵来说比他的房间的四壁还重要。然而，任何一个必须等待他结束写作活动才能重新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也不能忍受那个毫无生气的房间。美丽的波林·法伊弗在他最困难的时刻离开了他。但是不久后海明威就与之结婚的马莎·盖尔霍恩却找到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找一幢房子，既能够使她丈夫愉快地写作，又能让她过得幸福。这样，她便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中找到了美丽的乡间别墅“维希亚庄园”。庄园离哈瓦那两里半①，她先是以一百美元的月租金租下来，后来海明威用一万八千美元的现金买了下来。许多作家在世界各地有好几处寓所，人们经常问他们哪里是他们的主要住处。他们几乎都回答说是他们藏书的那一处。在“维希亚庄园”，海明威藏有九千册书，此外还喂着四只狗，养着五十七只鸭。

---

① 里，西班牙里程单位，合5572.7米。

海明威在哈瓦那一共住了二十二年。在1949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他自己试图回答他为什么在那里生活那么多年的问题，却零乱地、甚至相矛盾地谈起了别的事情。他谈到了大热天早晨吹拂的凉爽的微风，谈到了饲养斗鸡的可能性，谈到了棲息在葡萄架下的小蜥蜴、院子里种的十八种芒果树和设在大路边的、可以下大注赌打雏鸽的体育俱乐部，他还再一次谈到离他家只有四十五分钟路程的海湾的水流，在那里可以进行他一生见到的最好和最丰富的捕鱼活动。然而，在这许多更确切地说是回避性的解释中，他还是插了一段心里话。“一个人之所以住在这个岛上，”他写道，“是因为……可以用一张纸盖住电话铃，避免任何电话干扰；还因为在凉爽的早晨写作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有效、更舒适。”在这段文字（写它时，他可能漫不经心，也可能为了投人所好）的后面，他又加了一句：“但这不是一个职业秘密”。其实他无需提醒，因为几乎无人不晓，用来写作的地方是文学创作的无法探测的奥秘之一。

整个哈瓦那，特别是维希亚庄园，是海明威一生中真正稳定的唯一住所。他在那里几乎度过了他作为作家的有用的岁月的一半，写作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的一部分、《过河入林》、《老人与海》、《不固定的圣节》和《海湾中的岛》。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新闻报道——包括《流血的夏天》，并无数次尝试创作描写天空、大地和水的普鲁斯特式的奇特小说，他一直想写这样的小说。然而，在他的一生中，那些岁月都鲜为人知，这不仅因为那些岁月是最隐秘

的，而且因为他的传记作者们对那些岁月都令人怀疑地一笔带过。

当海明威一个字一个字地营造为他带来荣誉的世界时，由独裁者赫拉多·马查多制定、由他的继承人们不幸实施的卖国求荣计划已趋于完善。政治和道义上的腐败达到了令人气愤的程度。到处都不难看到的对美国屈从的事情具有幻想小说的色彩：佛罗里达的渡船每天都要把一节火车车厢运到哈瓦那，然后把车厢挂在当地的列车上，这样把美国生产的日用必需品包括在古巴的海域里捕捞的鲜鱼供应给古巴岛。

有人十分轻率地说，海明威不过是那种歪曲文化的巨大工作的被动观察员，如果他不是沉默的同谋的话。在西班牙内战中清楚而热烈地表露过的他的政治思想，面对古巴的悲剧似乎变成了一个谜。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试图同哈瓦那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建立什么联系。在官方的堕落和公众的贪欲之中，哈瓦那文化界仍然是大陆文化气氛最紧张的领域之一。他那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对加勒比地区，而且也是对整个拉丁美洲。他对拉丁美洲从来就不了解，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严肃地提到过它。他访问的拉美国家，只有 1942 年去过的墨西哥和为拍电影《老人与海》而带领考察团寻找特大的鱼时去过的秘鲁。但是几乎没有上岸。海明威这样概括那次热情的冒险："我们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去捕鱼，从天亮开始，一直干到黄昏的阴影妨碍我们继续拍照为止。"

在海明威生前最后几年，人们争论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对古巴革命的态度。即使人们不记得他讲过什么受到大家赞同

的看法，但是，除了他的某些偏面的传记作者认为是他私下讲的不大可信的看法外，人们也不知道他讲过什么大家不赞成的看法。几乎在古巴革命胜利一年后美国政府的敌视政策出笼时，阿根廷记者鲁道夫·沃尔什在哈瓦那机场拥挤的人群的推搡和叫喊声中对海明威进行过一次闪电式的采访。鲁道夫·沃尔什记得那是他记者生涯中最短的一次采访，当然也是海明威一生中最短的和他生前接受的最后的几次采访之一。在那次采访中，海明威甚至用他讲的正确的西班牙语叫起来："我们必胜，我们古巴人必胜！"并没有人再问他，他却又用英语说："我不是美国佬，你知道。"在混乱的人群中，他没有能把话说完。一年半后他自杀了，这句话仍然没有说完。对这句话，双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是，古巴革命似乎对这种不必要的争论并未予理会。在古巴，没有一位作家——当然何塞·马蒂除外——受到过那么多次、那么高级别的纪念。从一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纪念活动的倡导者。海明威死后他最后一个妻子玛丽·韦尔什两次来哈瓦那时，是菲德尔亲自关照的。他们一致决定让维希亚庄园保持原样，就像今天这样一动未动，并决定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博物馆充满了生气，有时会让人觉得作家复活了，他穿着他那双肥大的死人鞋在各个展室里走动。他的遗孀带走的东西只有海明威个人精心收藏的当代优秀画家的作品。她于 1977 年最后一次来访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一群美国记者说，海明威是他宠爱的作家。必须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才能明白他从来不会为了简单的

礼貌而说这样的话，不管怎样他必须超脱某些重要的政治考虑才能那么自信地说这句话。事实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多年来一直是海明威的一位老读者，他非常了解他，喜欢谈论他，善于用令人信服的道理维护他。在漫长的和经常的国内旅行中，他总是在汽车上带一堆政府的文件以便研究，在文件中常常夹带着两卷红皮的海明威作品选。

不管怎样，现在要是有人试图弄明白海明威在哈瓦那机场上没有说完的那句话，决不容易。事实上，一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海明威。一个海明威致力于世俗的消费——一半是电影明星，一半是冒险家——，他自由自在地光顾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他随着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巴黎里茨饭店，他在西班牙的集市上赞助时髦的斗牛士，他同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演员、最勇敢的拳击手和最险恶的枪手一起合影，他在肯尼亚的草原上先杀死一头狮子，后来又杀死一头野牛和一头犀牛，此外他还炫耀接连两次乘坐的飞机出事的情景。这是一个引世注目的海明威，他没有读过一本书，也许他不喜欢世界上的任何人，他不会留下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但是在哈瓦那还有另一个海明威，他把自己藏在一幢被参天大树环绕的房子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各个房间堆满了世俗的海明威作为航海和归来的纪念为他带来的男性艺术的战利品。这是一位谁也不真正了解的不知疲倦的手艺人，他被职业的没完没了的奴役折磨得心力交瘁，他留下了不只是一句而是许多句没有说完的话。

这个神秘的海明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年轻的

古巴记者诺贝尔托·富恩特斯 1961 年 7 月被他的编辑部主任派往维希亚庄园写一篇关于海明威的文章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时海明威已在一周前用来复枪对着自己的嘴巴，开枪打碎了脑袋。那个时期关于海明威的情况，诺贝尔托·富恩特斯只知道一天下午他父亲在一家饭店的电梯上偶然遇见他时对他讲的那一点点。有一次——当时他还只有十岁——，他看见他坐在一辆很长的黑色普里木斯牌汽车的后座上经过。在他的想象中，他觉得他坐在城市的酒馆中无人不晓的灵车上被拉去埋葬。从那次短暂的经历后，诺贝尔托·富恩特斯便决心要完成“在古巴的海明威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一艰巨任务。在海明威死后，他的一些传记作者似乎不但热心于掩饰而且也热心于歪曲在古巴的海明威。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进行仔细的调查，辛苦的访谈，似乎办不到的回忆，直到把他从那些真正和他分担日常的焦虑的无名的古巴人的记忆中拯救出来。那些古巴人中有他的私人医生、他的捕鱼船的船员、他的斗鸡的伙伴、酒店的厨师、侍者和在圣佛朗西斯科·德·保拉的欢闹之夜喝甘蔗酒的人。他一连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解他在维希亚庄园生活的苦恼，终于在他始终没有寄出的信件中，在后悔不该写的手稿上，在未写完的笔记里，在他那闪耀着他的风格的全部光辉的杰出航海日记里发现了他的心迹。他根据自己的感觉确认，他在古巴心灵中存在的时间要比当时的古巴人猜想的长得多，留下那么多明显的足迹的作家是不多的，他的足迹达到了古巴岛意想不到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就是这部生动而清楚的报告文学。它交还

给我们一位活生生的、有点天真的、我们许多人感到在他的精湛的短篇小说中几乎看不到的海明威。这是我们的海明威：一个被犹疑和短暂的生命折磨得痛苦不安的人，他的饭桌上从没有过一个以上的客人，他终于像人类历史上的少数人那样揭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实有的奥秘。

坡的生平与小说

保尔·瓦雷里[1] 论及埃德加·爱伦·坡[2]时，说他是一位被他自己的同胞遗忘的陌生的天才。这位著名的巴尔的摩诗人[3] 受尽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的幻觉的折磨，在那座城市离开人间，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文学中至今没有出现像他这样的作家，也没有一种倾向可以被认为是爱伦·坡创始的那种忧郁而阴暗的审美行为准则在时间上的延续。美国的作家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英国作家根本不同——丧失了神秘感。

如果抛开在试图以公正的尺度评价爱伦·坡的怪异的文学产品的争论中出现的偏激的言词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结

---

① 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批评家。

②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③ 爱伦·坡生于波士顿，长期在巴尔的摩居住并逝世。

果就是：他的作品——无论其艺术质量如何——回答了一个在评价任何一位作者时也不能够忽视的深刻的人类问题。

爱伦·坡的一生走的是一条悲惨的道路。跟美国文学史上他的杰出的同代人——纳撒内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①] 一样，他在他的每一句话中都留下了支配他的心理世界一切方面的神经机能症的证据。人们指责他们——上面提到的三位作家——创作了一种逃避性质的作品，把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代的主要因素和在那个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为一种坚强而非凡的天性打下基础的人的心理学抛在了脑后。这是事实，但是这和在自己的诗歌中播下文明的交响曲的种子的强有力的惠特曼[②] 发生的情况相反。

路易生[③] ——在他那些关于美国文学的随笔中——相信，他是在那种神经机能症中发现了向不真实逃避的态度的根据。这种态度是我们所提及的三位作家的特点。正是那种神经机能症迫使他们躲避"最深刻、最宽广的艺术动机"，以便最后说霍桑、梅尔维尔和爱伦·坡没有写出路易生先生所渴望的作品，因为他们"不是充满人性味的作家"。

当然，如果缺乏必要的冷静而认为逼迫爱伦·坡在逃逸和幻想中为他的艺术急于寻求满足的那种"人类经验的缺

---

① 纳撒内尔、霍桑（1804—1864），美国小说家。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

②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

③ 路德维格·路易生（1882—1955），美国文学史家。

乏”也是一种能够以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塞万提斯那种相当大的、震撼人心的效果影响作品的人类天性的话，这种符合实际的断言也许对任何一位作家都具有决定意义。

人类的感动人的天性是霍桑的那种负疚感，它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 中是明显的，在《红字》[2]中却变成了哲学演说；或者是梅尔维尔的那种折磨人的感情，它使他在人和事情上，在其外部特征上，看到了具有普遍的恶的秘密警察或公众。这种恶在《莫比·迪克》[2] 一书中得到了狂热的表现，这就是在地球上的一切海洋中不顾一切地追杀一条白鲸。最后，人类感动人的天性还有无能为力和能力不足的感觉，它限制了爱伦·坡——作为人——的能力，是他那种折磨人的、使人悲伤的文学产品的根据。他在批评方面的弟子路易生最关心的正是这种感觉——它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供了大量资料——。实际上却很奇怪：路易生认为这对爱伦·坡的事业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他作为作家的基本条件之一。

当敏感的奥尔德斯·赫胥黎[3] 指责这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因系统地再次描写恐怖场景而陷入了庸俗时，是毫无道理的。有必要指出，爱伦·坡再次采用他自己的主题不过是一种既定的文学个性发展的结果。这种文学个性是以一种既定

---

① 霍桑的长篇小说，1851年出版。

② 梅尔维克的长篇小说，1851年出版，又名《白鲸》。

③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

的、尽管是痛苦的人类个性为转移的。在此引证患癫痫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天才的、遭受禁欲和结核病折磨的弗朗茨·卡夫卡的例子也许是多余的。

爱伦·坡不可避免地转回到表现奸尸欲，或者更具体地说，转回到对死去的爱人的美丽想象，是作品回答作者的内心冲突的确实性的一个证明。

爱伦·坡——在最悲惨的语义上说——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受过创伤。他的全部作品，他的作品的悲惨故事和令人心碎的气氛，都围绕着那种失败的人生展开。世界的景象，人世间的欢乐情景，应该通过他那下意识的巨大过滤器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更确切地说——他那感官的下意识的“准确性”传递给爱伦·坡。在坡的每部作品中，故事的整个结构都失败了，倒塌了，变成了尘土——就像他的故事里写的厄舍古屋那样——，变成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归咎于“落空的冲动”的那种最后的失败。

也许侦探小说的许多读者——其中包括，备感光荣地包括本文的作者——喜欢这么想：现在这种激动人心的体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支配爱伦·坡的生活的那种下意识，尽管有人把它的发明权归于托马斯·德·昆西[①]。柯南道尔、凡·戴恩、埃勒里·奎因倘若不写《异乎寻常的故事》或者《莫格街上的人命案》，也许就不会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声誉。

---

①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作家。

爱伦·坡——贵族，具有怪诞的学识——不可能完全舍弃在公共场合露面的那种渴望。他像精通科学问题的人物一样，头上环绕着高级智力的光环。他的神秘感是科学的，这不仅表现在他那不同凡常、独一无二的《瓦尔德马尔先生案件》中，而且表现在乘坐气球的那次横度中。在他的渊博学识中，这种神秘感无疑是使他感到劳神的东西。

所谓的神秘小说的作者们运用的推理方法——柯南道尔从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巧妙结构——在《金甲虫》中有其完美无缺的前例。从另一些跟我们现在谈的情况不同的方面讲，《金甲虫》是爱伦·坡的不怎么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

但愿他逝世的这第一个一百周年能够成为正确和必要地评价埃德加·爱伦·坡的一个决定性的日子。

故事里的故事

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在去世前不久把《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结局告诉了我。我经过一次漫长的旅行后从欧洲回来，我们面对凄凉的萨瓦尼利亚海，在礼拜天他的家里烧吃那种有名的、价值二千比索的金枪鱼。

“我有一个想法，你会感兴趣的。”他突然对我说：“巴亚尔多·圣罗曼回来寻找安赫拉·比卡里奥。”

正如他料想的那样，我惊呆了。“他们一起生活在马璃雷。”他接下去说。“他们老了，令人讨厌，但是二人过得很幸福。”他不用再对我说什么我已明白，这是他经过漫长的思考得到的结果。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在新婚之夜休掉妻子的男人，过了二十三年后又和她一起生活了。作为安赫拉被遗弃的后果，我年轻时的一位十分亲密的老朋友被指责为一桩始终未得到证实的奸污行为的罪人，最后当着全镇人的面被遭

休弃的姑娘的两兄弟乱刀扎死。他叫圣地亚哥·纳萨尔，为人开朗而潇洒，他是当地阿拉伯人社团的杰出成员。此事发生在我明白今生我将干什么之前不久，我急不可待地想讲述这个故事，这也许是永远确立我的作家才能的重要事件。

最先听我讲述这件事的人是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那是在大约五年后在黑女人欧菲米娅的石鸻妓院里。当时我已决定当作家，我父亲对我说："那你将来就吃纸吧。"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曾梦见把整令整令的纸撕碎，团成小球吃掉。我吃的纸，从来也不是我那时供职的报社剩余的纸，而是一种三十六克重的很好的纸，纸质不平滑，有水的痕迹，像信纸那么大，自从我有钱购买以后我总是用这种纸。然而，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和赫尔曼·巴尔加斯一致认为那个杀人的故事很值得写下来，那怕我吃纸。"杜撰"也没关系，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对我说："索福克勒斯也是这样杜撰故事的，只是要注意杜撰得合情合理。后来，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来，他也表示同意，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请我注意："唯一的危险是，这个故事缺少一条腿。"

的确，故事缺少在杀人事件过去二十三年后，他告诉我的那种难以预料的结局。但当时不可能想象到。赫尔曼·巴尔加斯以他那种与生俱来的谨慎态度劝我再等一年或两年，等把故事考虑成熟后再写。我等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三十多年。

推迟这么久并不是个例外，因为我写的每个故事都是在

故事发生后至少过去二十年后才写。但是在这次的情况下理由更明确：继续通过想象寻找三条腿桌所缺的那条必不可少的腿，强迫自己虚构它，根本不考虑生活也在以出色的智慧进行着创造。是堂拉蒙·宾耶斯给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黄金方案："多多地讲述吧，"他对我说，"这是发现一个故事内在的东西的唯一方式。"

当然，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多年间我在许多地方翻来复去地讲述这个故事，希望有人发现它的瑕疵。梅塞德斯[①]很小就记得这个故事的片断，听过多次以后，她全部重新进行了组装，终于讲述得好些了。在一个所有的作家都年轻的时代，路易斯·阿尔科里萨在墨西哥他的家中把这个故事录了下来。一个夜晚，我在莫桑比克一个遥远的村庄花了六个小时对鲁伊·格拉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个夜晚，古巴朋友为我们烧了一只野狗吃，他们要我们相信那是羚牛肉。即使这样，我们也未能发现故事还缺少什么。在许多年间，在火车上和飞机上，在巴塞罗那和全世界，我多次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听，每次她都像第一次听时那样落泪，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她之所以哭是因为故事非常感人还是因为我没有把故事写下来。唯一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的好朋友是阿尔瓦罗·穆蒂斯，没有给他讲的原因很实际：他向来是我的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我十分留神，让他看手稿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

① 作者的妻子

在萨瓦尼利亚海边的那个星期天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的那些话为我安排好了环境。巴亚尔多·圣罗曼归来和安赫拉·比卡里奥一起生活，无疑是故事所缺少的结尾。这样一来，一切就很清楚了：出于我对受害者的感情，我一直认为这是关于一桩残酷的杀人事件的故事，而实际上它应该是关于一桩可怕的爱情的秘密故事。只是我差一点永远不了解事件背后的细节，因为两小时后我和阿尔瓦罗乘卡车跌下了卡塔洞博·德·阿历杭德罗·奥布雷贡海岸上的峭壁，我们奇迹般地没有丧命。我们一边向那座肮脏的海底跌落我一边想”。那么费力地寻找故事的结局，到头来没能讲述它倒先死了。”一经恢复正常，特别是从恐惧中恢复平静后，我便去巴亚尔多·圣罗曼和安赫拉·比卡里奥位于马璃雷的幸福的家中去找他们，好让他们给我讲述他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解的秘密。那是一次比我想的还有意义的旅行，并且理由充分，因为我一面试图探察别人的记忆，一面发现我本人生活中的奥秘。

有两个村镇，彼此相距很近，但是大不相同。名字都叫马璃雷，一个镇子只有一条很宽的街，房舍一模一样，位于一座绿色的高原上，寂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母亲小的时候，曾被带到那里去消夏。在我外祖父母家里他们多次对我谈到那个产药物的镇子，当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我觉得我记得它，好像在过去的生活中就熟悉它。那一对幸福的夫妻不是住在那里，但是主教的侄子拉斐尔·埃斯卡洛纳领我们去另一个马璃雷镇时走错了路。我们正在镇上唯一的一家酒馆

里喝冰镇的啤酒，一个长得像树一样的男人向我们的桌子走来，腿上裹着骑马的绑腿，腰间掖着打仗的手枪。拉斐尔·埃斯卡洛纳为我们做了介绍，那人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里，望着我的眼睛。

“你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点关系吧?”他问我。

“我是他的外孙。”

“这么说，”他说，“是你外祖父杀死了我祖父。”

我没有来得及惊慌，因为他说话的态度那么热情，仿佛这也是攀亲戚的一种方式。他是阿马迪斯传奇式的走私者。和阿马迪斯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正直男人。我们坐着他的双层底的大卡车玩了三天三夜，喝热白兰地，吃半生不熟的烤羊肉，为的是纪念死去的祖父们。他带我去不同的村镇，一直深入到瓜希拉半岛内地，目的是让我见见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留在各地的无数儿子中的19个。一个星期后，他让我在另一个马璃雷镇下了车，那是一个面对一片烈火般的大海、生产硝石的镇子。他停在一幢房子前。那房子，由于我多次听到人们谈论它，无论如何我是认得的。“就是这儿。”他对我说。

在那个酷热的时刻，一个女人在窗前用机器刺绣。她穿着半丧服，戴着金属丝眼镜，留着发黄的头发。她的头上方，挂着一个鸟笼子，笼中的一只金丝雀不住地歌唱。看见她这样坐在田园诗般的窗子内，我不愿意认为就是她，因为我不愿意相信生活最终会那么像糟糕的文学。但是，毕竟是她：悲剧发生二十三年后的安赫拉·比卡里奥。

拉丁美洲的孤独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

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八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六百人中，只有五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一万一千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一百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母鸡，其鸡肫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察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三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十六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骑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三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

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十一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五次战争、十七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 1970 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十二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的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二十万男女献身，其中十万多人死在中美洲三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四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一百六十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一百万，占本

国公民的百分之十。乌拉圭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的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天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量少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我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

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三百个年头，又用了三百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二十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十六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一万二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八千名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二十三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作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

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三千里[①] 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七千四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七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一百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三十二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

① 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

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在 1982 年 12 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爱护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

上星期某日，我和梅塞德斯去几位朋友家吃午饭，发现他们正不知所措，等他们说明了原因，我们才打消了他们的困惑心情。原来那天早晨他们从广播里听到我去帕帕扬了。这样以来，他们不仅撤消了对其他客人的邀请，而且有点恼火，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向他做任何解释。实际上，那天早晨我们也听到了关于我去帕帕扬的虚假消息。和他们相反，消息反倒使我感到无比轻松“好极了，”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已经在帕帕扬，我就不必起那么早去帕帕扬了。”事实上，我在那些天为了亲自估计不幸事件达到的程度而预定的旅行不必去进行了，因为在广播的虚假消息中已经实现。此外，朋友们也已理解，我们便一起在厨房里临时做了一顿家庭午餐。

自从我们上星期回到哥伦比亚后，这不是我们吃的第一

顿不顺利的午餐。另一顿餐更不顺利，因为是在总统府，邀请者是十分高贵的主人。不是官方的活动，而是一位老朋友在临时住所举行的私人便餐，就餐者只有我们一致挑选的三对朋友。对我来说，当那天早晨读到国家新闻社的一份公函后，紧张的心情就产生了。根据那份公文，中午我将出席一次有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参加的隆重会议，会议是贝坦库尔总统为授予我博亚卡十字勋章而在纳里尼奥宫殿内召开的，对我来说，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双重的不快。第一，关于将挂在我胸前的奖章，总统什么也没有对我讲，尽管近几天我们曾多次通电话，商谈关于请帖的某些细节。第二，关于我国的一些总统行使颁发博亚卡十字勋章的最高权力所采用的方式和滥用职权问题，我有个人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也有共同性——。几年前，一位总统朋友对我谈过他颁发该奖章的愿望，幸好他痛快地理解了我的否定态度。我的否定态度是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当必须在不和睦的同事中间忍受时，接受荣誉——那怕是很高很高尚的荣誉——是不值得的。当最近几枚博亚卡十字章落在权力的抽屉里、像糖块一样分发给总统的私人朋友和政界的朋友时，总统在上届政府下台前的日子里对待十字章的慷慨大方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既然如此，我便很荣幸地接受了贝坦库尔总统举行的个人午餐。当时我有一种至少会成为一个被误解者的牺牲品的不快感觉，但是我怀着坚定的决心：我要告诉他，我不会以和前次同样的理由——这次更充分了——去接受博亚卡十字章。所幸的是，在愉快地用完午餐和持续到下午六点

的饭后点心的时间里，一分钟也没有出现不可避免地授章意向，更没有出现冷不防授章的迹象。像以前的那许多次一样，这一次一切又通过简单的事实得到了解释：授章消息是虚假的。

但是这件事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在我回到哥伦比亚的一星期中，那只是报刊每天发表的关于我的众多虚假消息之一。就在上星期五，我曾及时戳穿了一则弄得满城风雨的传闻，当时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龙刚巧打电话寻问我接受某人采访的某个细节，他听说我到波哥大后有人采访了我，《时代报》下星期就发表访谈录。采访内容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访谈录的年轻作者们以毫不令人妒忌的冷酷态度嘲弄了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龙的善意。卡尔德龙让我同其中的一位作者取得了联系。当那个作者通过电话告诉我访谈录是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合作炮制的，因为他发现要我接受一次真正的采访不可能。"你们编造访谈录问题很严重，"我对他说，"但是更不能容忍的是，访谈录编得太糟糕了。"实际上，在记者对我进行的无数采访当中，见诸报刊的最好的访谈录是在加拉加斯编造的。然而，我并没有提出抗议，反而对作者表示了祝贺，因为访谈录几乎完美地综合了近十五年来我对报刊讲的一切，并且以那么恰当的方式、那么准确、那么机智地进行了组织和改进，我真想自己也那么做。波哥大的那种假冒的访谈录却并非这样，那不过是对职业道德的一种轻率的嘲弄。

当然，对职业的这种亵渎行为不只在哥伦比亚受到鄙

视。几年前一份西班牙杂志所干的事更加令人气愤，它竟然把一种说法强加于我。按照那种说法，我一生的梦想是出现在苏联的百科全书里。这种做法使我大吃一惊：首先，因为我从没有说过这话；其次，因为从来也不清楚我会不会出现在苏联的百科全书里；第三，因为我是否出现在什么百科全书的什么部分里，对我毫无意义。我认为，如果任何一部百科全书省略一份读者感兴趣的资料，对百科全书本身的损害会比那份资料大；第四，因为那种编造有明确的目的，即为我个人造成损害，更严重的是欺骗读者。但我没有做任何纠正，因为我有不做纠正的习惯。再说，如何对待此类事情，我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此外，尽管我非常喜欢西班牙，但我认为它的刊物的丑恶行为是西班牙人的事。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国——我从没有干过一件故意伤害它的事，相反的，我几乎把我一生的每一分钟都献出来为它谋利。——，我决不能视而不见，惟恐有人不慎为它造成什么伤害。

在两个星期中，我在这儿找到了足够的理由不安地问自己：这种匆忙的、缺乏道德制约的新闻工作到底向何处去。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纯粹是唯心论所致，比如麦德林市的一位记者，我曾面对一台录音机对他说，我想请求改变对在美国判处死刑的哥伦比亚人的死刑。新闻却变成了我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把他处死的运动。我很清楚，美国人能够凭借的唯一根据是人道主义，犯罪所在国有权审判任何国家的罪犯。关于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爱国者的问题，引渡条约没有任何用处——显而易见不合理——，因为是美国和哥伦比

亚前一届政府签订的。然而，所有这些推断都一一在杂志发表的声明中消失了。不管怎样，错误完全是粗心大意造成的。上星期五在卡塔赫纳，我刚到该城就有大约十五位同行七嘴八舌地向我提问题。我对十五台录音机发表谈话，我想已经被录下来：我想创办的报纸“在全国引起了压倒一切的兴趣。”在一篇仿照《家长的没落》的标点符号抄录的访谈录中，却让我说“我的报纸高于一切国家利益。”这不仅和讲的话完全相反，而且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卑劣行为。

对任何一位公职人员来说——就像我很不情愿成为的那样，对我来说这很不幸——，这些愚蠢的流言和事件，都非同小可；而对我们这些首先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的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不仅对受害者，对我们来说更是这样，这些违背新闻道德的愈来愈经常、愈来愈丑恶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罪行，因为它们最终会损害和完全歪曲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

了却一桩不愉快的事件

打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我从来没有为某次书面赞扬表示过感谢，也不曾为报刊对我的伤害发过火儿。这是正确的：当一个人，像我遇到的那样，因其作品或行为而受到公众关注的时候，读者应该享有发表自己看法的特权，那怕他们的看法十分荒谬。所以很久以前我就放弃了反驳和纠正的权利——应该视为人类的权利之一，并从那时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尤其在哥伦比亚，我对蒙受到的多次伤害，没有做过一次回答。

现在我不得不允许自己破一次例，以便评论政府试图用来说明上星期我不应当离开哥伦比亚的两个理由。不同的官员异口同声地将两个具体的罪名强加于我。一个罪名是，我之所以离开哥伦比亚，是为了给我的下一部作品带来更大的广告效应。第二个罪名是，我那样做是为了支持旨在削弱哥

伦比亚威望的国际运动。这两个罪名不但相互矛盾，而且毫无根据，让人不能不气愤地自问：难道真的有人能够用两个手指操纵我们命运的方向盘?

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大不幸是宣传媒体的烦扰。和我相信应该得到的相反，这迫使我像逃犯一样东躲西藏地过日子。我从不参加公众活动和群众大会，从不举办讲座，从不出席也不想出席新书发行式，我像害怕坐飞机一样害怕麦克风和电视摄影机。我对记者们说，我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他们的职业，不忍心对他们说不行。这种不让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的决心，使我赢得了唯一无价的荣誉：维护了我的私生活。当公众的想象把巨人的职责加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却每时每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总是处在我是我自己的唯一气氛中。我的最大成功不是写了我的作品，而是保证了我用来帮助梅塞德斯把我们的孩子养育好的时间。我最满意的事情不是赢得了那么多和那么好的新朋友，而是迎着狂风巨浪保住了早年的老朋友们的感情。我从没有失过约，从没有泄露过别人让我保守的秘密，也从没有不用打字机挣过一分钱。我的政治信念清楚而坚定，不管怎样总是建立在个人对现实的理解的基础上，并且总是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让愿意听到的人们听到。我几乎走遍了世界：从被法国警察拘留和唾骂（他把我当成了阿尔及利亚叛匪）到和胡安·保罗二世一起被关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因为他自己转不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从在巴黎一只垃圾箱里捡吃人家倒的剩饭到睡在堂阿尔丰索十三世国

王死时睡的罗马床上。但是，无论在青少年时代还是成年以后，我都从未狂妄自大，忘记自己不过是阿拉卡塔卡一位报务员的十六个儿女之一。正是对我的身世的这种忠诚，产生了其他的一切：我的性格，我的文学命运和我在政治上的坦诚。

我曾说过，任何荣誉都要报答，任何资助都负有义务，任何邀请都欠着人情。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我一向谨慎行事。除了我的老朋友请的午餐外，我从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午餐。许多年前，当我做电影评论工作、忍受放映者的压力时，我总是保留着别人送的赠卷，以便证明我没有用它，我自己掏钱买的票。我也从不接受他人付费的旅行邀请。

上星期我们飞往墨西哥的机票——尽管墨西哥驻哥伦比亚使馆的女大使客气地反对——是我们用自己的钱买的。几天以前，一位热心的朋友事先未和我商量便请求波哥大市长改一改我家的配电时间表，使之和我的工作时间一致，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天然光线的书房和一台电动打字机。市长完全正确地回答他说，巴尔扎克比我还优秀，但是他点蜡烛写作。我的朋友气愤地对我讲了这件事。我反驳他说，市长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应该那样回答。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是我的真正为人，远不像人们传说和被故意歪曲的那样。如果我出厂时就不合格，要想重新做个人就太迟了。

第二个罪名，即我离开哥伦比亚的唯一意图是削弱哥伦比亚的威信，更站不住脚。不过，它得到了成为共和国总统

个人的创造的荣誉。由于他的政府在国外的形象愈来愈悲惨，他感到不知所措。糟糕的是，他把过错加在了我头上，然而我很幸运，我拥有纠正他的错误的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很简单，但是我请求人们集中最大的注意力读它，因为它可能令人吃惊。它是这样的：我在全世界接受的无数采访中，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一次采访中做过任何关于哥伦比亚国内形势的讲话，也没有写过一句被用来反对哥伦比亚的话。这是自打我意识到我手中拥有不受欢迎的权力后我强加给自己的道德原则，并且在近三十年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中顶风破浪地坚持下来。每当我想评论一番哥伦比亚国内形势，总是在哥伦比亚国内或通过我国的报纸进行。谁要是掌握着和我说的这句话相反的事实，我请求他立刻严肃而确切地、有凭有据地公诸于世。同时我也请求我的读者，如果这样的证据不存在或不可信，从现在到永远，你们就应认定并宣布我的理由是受到公众承认的。

第二个理由更简单，它既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于命运。它是这样的：我非常荣幸，我曾在全世界为我国带来比它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哥伦比亚人、甚至比最著名的人士包括共和国的每一届总统都多的威信。所以我可能为她造成的任何损害，我自己会提前补救，并且非常体面。

其实，政府之所以使用这两个幼稚的罪名，因为实质上它知道，我的责任感会阻止我说出及时提醒我的人的名字。我明白，陷阱已经准备好，我作为作家的身份对我毫无用处，因为对哥伦比亚的镇压力量来说，不存在摸不得的人

物，或者像卡马乔将军在逮捕路易斯·比达尔时说的那样："诗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托利马省议会主席毛罗·乌埃塔斯·伦希弗对记者发表谈话并向全世界宣布，大约十天来，军队一直在寻找我，要讯问我同"M—19"的所谓联系。关于他的谈话的唯一评论是一位高级官员私下里发表的："他是一个疯子"。相反的，声明在古巴接受过训练的第一个游击队员立刻同古巴断绝了关系。但是还有一件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事情：上星期三午夜，我和我妻子已在墨西哥驻哥伦比亚使馆呆了6个多小时，哥伦比亚政府通过哥伦比亚外交部秘书长胡利奥·龙多尼奥上校正式得知我们的决定。第二天早晨，当消息违背我们的意愿传开后，电台的记者通过电话对外交部长莱莫斯·西蒙兹进行了采访，此人一无所知。就是说，几乎在8个小时之后，他还没有得到下属的报告。政府总理更加迟顿，他甚至走到了否认有那样消息的极端。

实际上，关于军方要逮捕我的说法，几天前就在波哥大流传开了。和乌龟丈夫们相反，我并不是最后知道这种说法的人。有人对我讲："友谊是最可靠的情报机关。"但是事实终于使我相信，这并不是高原上[①] 的简单谣传：3月24日星期二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结束后，一位高级军官更加具体地说："福雷罗·德尔加多将军很高兴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他有几个与'M—19'有关的问题想问问他。"在同一天晚上的另一次不同的会议上，官

① 指地处高原的波哥大。

员们说，我和梅塞德斯从波哥大去哈瓦那，从1月28日到2月11日在巴拿马停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旅行是确实的，并且是公开的，就像我们每年都要三四次去古巴一样。目的是去出席在美洲之家召开的作家会议，另一些哥伦比亚作家也出席了。尽管仅仅是一种令人气愤的猜测，说什么我们的旅行和后来游击队的登陆行动有某种关系，但是我仍然小心行事，免得让军方有机可乘。然而，事情并未结束。我相信，时间会澄清一切的。

官方报纸谈论这一事件的方式已经有所改变，看来还会有更大的改变。

可供选用的例子多得是。海梅·索托——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位好记者，同时也是我的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以最憨直的方式解释我的旅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然而，最露骨的评论刊登在上星期日《时代报》社论版上，署的是笔名阿瓦托尔德。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从文章的风格和观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完全缺乏语义感，以其智力发育不全的逻辑玷污世界上最高尚的职业，完全缺乏对他人性命的同情心，谈论的方式好像对做人的艰难和责任毫无所知。

尽管用心险恶，但还是一篇重要文章，因为在可敬的报纸讲坛上第一次出现了企图在我新近去古巴的旅行和游击队在哥伦比亚南方的登陆事件之间建立一种准确的甚至具有时间顺序的联系的倾向。这和军方试图加给我的罪名一样，也和大多数提供关于我的消息的人加给我的罪名一样。关于这

个罪名，在我这几天发表的无数声明中一直没有提过。这个罪名来自官方，政府却试图掩饰，试图彻底粉碎关于我的作品所作的宣传和国际上诋毁哥伦比亚的运动。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军方为什么寻找我，我为什么要出走，我为什么要不情愿地继续生活在哥伦比亚国外，天晓得生活到何年何月。

不明确一下做人的诚实性，我不能结束此文。多年以来，时间一直在区分我的人格：一方面，我是作家，人们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天才的作家；另一方面，说我是一心要破坏他的祖国的凶恶的共产党。他们犯了一个原则错误：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我的政治立场和我写作依据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我作为作家，时间把所有的赞语甚至过分的赞语都献给了我，同时也使我成为一切谩骂甚至最无耻的谩骂如“政治动物”等的受害者。

在这两个极端，时间干着它的工作，不准我企图做任何形式的反驳，既不能表示谢意，也不能提出抗议。从三十多年前我们都是年轻人、都像我如今仍然相信的一样相信生活是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起，我就同埃尔南多和恩里克·桑托斯·卡斯蒂约——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距离，我仍然非常喜欢他们，因为我竭力地设法理解他们——，同罗伯托·加西亚·佩尼亚——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正派的人之一——保持一种忠实而密切的友谊。我恳求他们问问读者，我是不是为了你们的报纸对我的伤害向他们发出过呼吁，我是不是公开或私下纠正过他们的过分言行，或者，我是不是以某种方式改变过我的友谊观。不：我有健全的头脑对待这一切，权

当它们跟报纸毫无关系。我总是把报纸视为一种以自己的肝脏毒害自己的、不可控制的怪物。然而这一次，怪物达到了所允许的全部界限之外，进入了犯罪的阴暗地区。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不禁问自己：在区分怪物的驯养者的人格时，我是不是也犯了错误。

于是，整个这桩不快事件便作为确实性的两个对立面最终提了出来。一方面是一个高傲、腐败、丧失了方向、由一家痴呆的报纸支持的政府。多年来，这家报纸的古怪命运却由它厌恶的总统所左右。另一方面是我，我和我的众多朋友在一起，准备开始过一个虽不相配却应受赞扬的晚年。公众舆论只有一个选择：应该相信谁？我有无限的耐心，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我等待着舆论的决定。

灾祸的因素

这个星期，一本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集的书开始流传。从书的古怪内容来看，它不像哥伦比亚作家写的散文或诗集。书中充满了费解的、有时是忧伤的诗，书名儿则让人感到恐怖：《灾祸的因素》。书的作者、现任哥伦比亚“埃索公司公共关系部主任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或文学派别，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因为那时他总是忙于处理兰莎公司公共关系部和一家广播电台经理部的种种特别重要的工作以及上百件其他同样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的大多数朋友——他们认为阿尔瓦罗·穆蒂斯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不明白他是在什么时间写了他的作品的。

一清二楚的事情

但是，阿尔瓦罗·穆蒂斯之所以成为一位难以分类的作家，也许是因为他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不同。譬如关于跟他同代的哥伦比亚作家，穆蒂斯认为，在文化方面，他们的方向是错误的，和穆蒂斯同代的哥伦比亚作家——二十五岁和三十岁之间——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说：

“我们在做某种事情。”

穆蒂斯喜欢就事论事。他说：

“虚伪。倘若我们在做历史赋予我们的事情，我们就该严肃地调查玻利瓦尔是不是确实是个好将军，桑坦德尔是不是确实是个‘正直的人’，卡罗是不是真的懂西班牙语。所有这些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有的看法是虚假的。我们没有去复查，而是生吞活剥它们。”

“但是在复查时我们也可能弄错。”

“没关系。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确定新的结论，而是要有一个确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应该是严肃地复查民族的神话。”

“批评家们不敢这么做。”

“这是愚蠢的。”穆蒂斯说。“他们会遭到什么事呢？死去的神话不会伤害人，活着的神话也已经老了，变得温顺了，批评家们没有必要怕它们。譬如巴伦西亚……”

如何对待巴伦西亚

当穆蒂斯提到巴伦西亚时，争论就发生了。有人反驳他说，自从爱德华多·卡兰萨写了他的著名作品《诗人崇拜》后，年轻的作家们便采取了破除巴伦西亚神话的轻率立场，以图推动争论，集中人们的注意力。

穆蒂斯解释自己的立场说：

“不是因为我想重新为“石头与天空”派的诗人们制造一个替死鬼即巴伦西亚。当然，我同意《诗人崇拜》中讲的，而是走得还要远：巴伦西亚大师的全部作品，绝对是全部作品，其诗的价值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他是我国最博学的人。”有人反驳说。

“任何一个哈佛大学“肄业生”，巴黎路易大公学院最后一年级的任何一名学生，萨拉曼大学一二年级的任何一名学生，都具有巴伦西亚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希腊文和拉丁文要素和翻译这些语言的容易程度；至少掌握两种话的语言和坚实的历史与哲学知识。巴伦西亚甚至都没有实现这些知识的价值。一个逻辑清楚的头脑可能认为，凭着这些知识他就有条件让波帕扬他那些愚蠢的选举者为之惊讶。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惊讶的程度突破了省的范围，在全国漫延，把巴伦西亚变成了近五十年间哥伦西亚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这就丧失了比较的意义。

“但是，尽管这是真实的，却没有为真正的诗造成任何

伤害。”

“不对，造成了伤害，而且很大，因为出发点——巴伦西亚——是虚假的。当然，不必担心巴伦西亚其人不符合国家为他塑造的雕像。修正看法上的错误的时间是足够的。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严重的事情是由于巴伦西亚的神化而引起的对人的价值的可怕歪曲。由于这个原因，波菲里奥·巴尔巴·哈科夫在我们的文学中没有了位置。而巴尔巴·哈科夫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确是真正的诗人。当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人试图把波菲里奥·巴尔巴·哈科夫（见“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巴尔巴作品》中达涅尔·阿兰戈的前言）放在我国文学全景中应占有的地位时，所有的壁龛已经被木头般的客人们占据了。”

“可是不能否认巴伦西亚的演说辞是很好的。”

“是的，很好。但是为了一篇像巴伦西亚的任何一篇演说辞，马格达莱恩大学的一名学生便因举止不雅而被逐出了校门。”

有意义的诗

穆蒂斯的另一个观点是：“由于最后一次战争及其可耻的背景，世界上出现了这样的关心：诗人、小说家和画家应该使其作品具有某种社会作用。这种要求在共产党员中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当然有责任要求他们的同志的作品必须有这种社会作用。”

“和一切幸运的时尚一样，这种要求也随后传入我国。于是，哥伦比亚的年轻作家也像1936年西班牙的作家、诗人和英、法、德作家一样受到了这种要求的困扰。”

“那么，诗歌应该是怎样的呢?”有人问他。

“我认为这个标准既适用于诗歌也适用于其他艺术：一种艺术品应该起的唯一作用是创造持久的美学价值。我想声明这一点：如果这些美学价值偶然或侥倖同世界或国家形势的某种观点一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包含某种意义，也不意味着群众应该这样要求知识分子来解决群众的问题。《致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表现的具有政治倾向的战争热情，而在于它所创造的持久的美学价值。”

“真正的诗人也不会受伤害，因为只是要求他们的创作有一种意义。”

“但是文学会受伤害，因为文学上的卑鄙小人——咬文嚼字的人——都利用文学，他们用政治色彩美化他们的枯枝败叶，以图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上升。”

应该咀嚼神话

关于哥伦比亚的文化问题，很难同阿尔瓦罗·穆蒂斯达成一致。他那些看法是在研究美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穆蒂斯新近访问过的墨西哥的过程中形成的，赞成他的看法的人寥寥无几。譬如从墨西哥回来后，穆蒂斯一直这样说：“在哥伦比亚，每一代人都原原本本地接受神话，不加咀嚼即吞

下去。和哥伦比亚不同，在墨西哥，对民族文化的活的产品总是要加以检验，重新评价，以免虚假的价值偷偷输入，或避免国家靠干枯、坚硬、经过装饰和雕琢的羊皮纸生活。”

“但那是在墨西哥。”

“在巴西也一样。仅在里约热内卢就有十家先进的大型刊物。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一幢为学生们上课的建筑；而在其他国家，大学是一种生动的机构，是一个总举办活动的中心，整个民族的文化气氛都围绕这个中心振荡、争论、检验和加强。在拉丁美洲每个国家都在从事创造真正的文化价值的艰苦工作。在诗歌、绘画、音乐方面，大陆的明确标志正以具体特点在每个国家出现，每个拉美国家的民族特征必定赋予各种艺术以具体的特点。”

“在哥伦比亚，这方面的工作一点儿没做吗？”

“我们应该承认，在文化上努力使哥伦比亚在其他拉美国家中占优势地位的最后一代人是适逢独立百周年的那一代人。在使我们愈来愈成为我们自己的任务中，我们的进步就到那里为止了。后来我们这几代人只是盲目地赞扬所谓的杰出人物，因为他们既没有明确我们作为哥伦比亚人的重要性，也没有明确我们作为美洲人的重要性。

一代愚蠢的人

阿尔瓦罗·穆蒂斯特别喜欢用这种口吻讲话。他的言谈一向快活，无所顾忌，是他的健康体魄所决定的。他谈论电

影，谈论人，在回忆愚蠢的笑话和故意朗诵过分雕琢的诗时格外开心。但是当谈到他的观点时，他会十分严肃地表达他对哥伦比亚命运的由衷担心。他总是独立而清楚地研究哥伦比亚的文化问题。在这个方面他的观点是："哥伦比亚具有成为美洲的生动榜样和准确的缩影的最广大的可能性。长长的海岸线，崇山峻岭，辽阔平原，热带丛林，这一切一直是百年间的激烈内战、残酷地寻找民族性、寻找美洲的形象和声音的客观环境。在本世纪最初的年代，永远纪念我们那些特殊的精华的任务奇怪地停止，而我们那种以各种语言和欧洲的各种时尚进行夸耀的声音随之开始。那个过程以尚不成熟的几代人的没有生气的继续告结束。我们已不是不成熟的几代人，而是若干由愚蠢的人组成的大群体。在一片妨碍我们倾听我们美洲的召唤的愚蠢的喧闹声中，我们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和他人的声音。

诺贝尔奖的幽灵

每年的这些日子，总有一个幽灵使大作家们感到不安。这个幽灵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最长久的候选人之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抱怨预言家们使他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两个月。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博尔赫斯是在西班牙语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他们不能把他排除在每年预测的候选人名单之外。不幸的是，最后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候选人本身的权利，也不取决于上帝的裁决，而是取决于瑞典科学院院士们的不可探知的意志。

我不记得哪一次预测是准确的。一般说来，获奖者似乎是最先感到意外的人。当 1969 年爱尔兰戏剧家萨谬埃尔·贝克特从电话上得知获奖的消息时，不禁惊愕地叫道："天啊，这太糟糕了！"1971 年巴勃罗·聂鲁达在消息公开发表三天前从瑞典科学院一位亲密朋友那里得知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

奖。第二天晚上他在巴黎请一群朋友进晚餐，当时他在那里担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但是直到下午的报纸刊登授奖的消息前，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他请客的原因。“因为在没看到白纸黑字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相信。”事后聂鲁达克制不住地对我们解释说。过了几天，我们在蒙帕纳斯大街一家嘈杂喧闹的餐厅里吃饭时，他忽然想起，他还没有写受奖演说辞，而在四十八小时后授奖仪式就要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于是他把一张菜单翻过来，一次也没有停顿，也不在乎喧嚣的人声，当场像他呼吸一样心平气和地用他写诗时用的永不改变的绿墨水写出了他被戴上桂冠后发表的美丽演说辞。

在作家和批评家中间最流行的说法是，当五月间皑皑白雪开始融化的时候，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们就达成了一致，他们在炎热的夏天研究了进入最后一轮评选的很少几位作家的作品。在依然受到南方的太阳烘烤的十月，他们公布了最后的结果。另一种说法是，1976 年 5 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被推选为候选人，但是在 11 月最后一轮投票中落选。实际上，那一年的获奖者是杰出的、但是意志消沉的作家索尔·贝娄，是在最后一小时匆匆选出来的，尽管其他奖项的获得者中也有美国人。

的确，在那一年的 9 月 22 日——投票前一个月——，博尔赫斯做过一件和他的精湛文学毫不相干的事情：在庄重的接见厅他拜见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受到你接见，对此荣誉我感到有愧，总统先生。”他在他的倒霉的讲话中说。“在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自由和秩序正在得到拯

救。”他接下去说，并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最后他冷冷地说：“此事发生在一块被共产主义搅乱和破坏的大陆上。”这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一连串的昏话只可能是为了嘲弄皮诺切特。但是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们不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幽默感。从那以后，博亚赫斯的名字就从预选人的名单中消失了。现在，在受到一次不公正的惩罚之后，他的名字又出现了。我们这些既是他的作品的贪婪的读者也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者的人，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他终于从每年的焦虑中得到了解脱。

他的两个最危险的对手是两位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第一位于前几年几乎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中，现在是《新闻周刊》推出的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小说大师赫然显现在 8 月 18 日一期的封面上：理所当然。他的全名是维迪亚达尔·苏莱普拉沙德·奈保乐，四十七岁，生于离这儿不远的特立尼达岛，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加勒比地区人，被某些十分严肃的批评家认为是当前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另一位候选人是格雷厄姆·格林，比博尔赫斯小五岁。他跟博尔赫斯一样成就斐然，也跟他一样经过那么多年也未获得那份荣誉。

1972 年秋天，奈保尔在伦敦时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要做一个加勒比地区作家。在一次朋友们的聚会上我对他提起了这件事。他听了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思索了片刻，新的笑容重新出现在他那张沉静的脸上。“好主意，”他对我说。出生在伯克爱姆斯特德的格雷厄姆·格林却相反，

当一位记者问他是不是想做一个拉丁美洲小说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我很高兴，因为当前最优秀的小说家，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都在拉丁美洲。几年前，有一回我跟格雷厄姆·格林谈天说地，我把我的这种困惑不安的心情告诉了他：像他这么一位作品如此丰富而独特的作家，为什么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永远不会把它授予我，"他对我说，表情极为严肃。"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没有能获奖的大作家

人们多次议论，近八十年来最伟大的作家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便死去了。这未免有点夸大。但是并不过分。毫无疑问，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品。1910年，他在八十二岁的德高望重的年纪去世，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已颁发了十个年头。他的上述杰作已享有四十五年的荣耀，译本不计其数，在全世界频频重印。任何一位批评家也不会怀疑，这部作品将经久不衰，永世长存。

然而，在托尔斯泰在世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十位作家中，唯一活在世人记忆中的是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在那个时代，他很有名，但是他的作品如今只有在十分专门的书店里才能找到。不只于此，如果读者在法国字典里找他的名字，找到的只是一种像命运一样难以捉摸的解释："满足

于无能和平庸的现代典型。”前十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作家是波兰人亨利克·显克维奇，他以他那块不朽的砖头《往何处去》偷偷地骗取了荣誉。还有一位是费德里克·米斯特拉尔，一位用他的本地语言写作的外省诗人，他得到了同西班牙剧作家伊埃·埃切加赖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怜荣誉。埃切加赖是西班牙母亲生育的最不幸的戏剧家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但愿上帝把他留在他那神圣的天国里。

在后来的几年里，另外五位有史以来的大作家也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死去。他们是：亨利·詹姆士，1916 年逝世；马歇尔·普鲁斯特，1922 年逝世，弗朗茨·卡夫卡，1924 年逝世；约瑟夫·康拉德，1924 年逝世；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926 年去世。在那些年间，一些比吉·凯·切斯特顿差的作家也坐在他们的天才的席位上：切斯特顿却未获奖，1936 年去世；詹姆士·乔伊斯 1941 年去世，此时他的长篇小说已出版十九年，它改变了世界小说创作的进程。

相反的，在那个不幸的时代获奖的十四位作家中，只有四位与世长存：英国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以及爱尔兰作家乔治·萧伯纳。我们应该为之流下那么多伤心泪水的印度作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被见鬼的正义之风拖着走；在处于峰巅的 1920 年获奖的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遭到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不该遭受。两年后，瑞典皇家学院在西班牙语方面经受了第二桩致命的事件：难以形容的哈辛托·贝纳文特获奖，直到世纪末

上帝都尽可能地让他挨近伊·埃·埃切加赖。无论其成就大小，在这个时期获奖的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如上述死去的作家配受此奖。

由于疏忽而没有授奖给卡夫卡和普鲁斯特，是可以理解的。当 19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皇家学院由两位著名作家——卡尔·吉勒鲁普和亨里克·彭托皮丹——分享的时候，弗朗茨·卡夫卡不得不离开他的供职的保险公司，七年后在维也纳一家医院里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他的杰作《变形记》在他死前不久由一家德国杂志发表。直到 1926 年——或许人们相当清楚——，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才不顾卡夫卡的意愿，出版了他的两部天才的作品：《城堡》和《审判》。同年，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为了相信这一点，她又活了十年。

可疑的公正

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没有得到自己的荣誉而死去。他的顶尖作品第一部被好几家出版社拒绝，其中包括加利马德出版社，他服从了他的文学顾问安德烈·纪德的决定。纪德倒是无可指摘地获得 1947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普鲁斯特那部作品第一部由作家自费出版。1919 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在花枝招展的姑娘身旁》——，此作立刻为他带来巨大荣誉和最重要的法国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但是说话应该公正：只有一种真正具有猜测本领的人才能预见本世

纪这个光辉的时刻:《追忆似水年华》直到作者死后才全部出版。

昨天我在这儿跟格雷厄姆·格林进行交谈时，他对我说，他接受的两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是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生前他们双双被认为是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死的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瑞典作家魏尔纳·封·海顿斯坦。康拉德死的那一年，获得者是另一位生于波兰的作家——跟他一样——: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这两个作家都不是默默无闻的天才，毫无疑问，他们就像1963年获奖的希腊作家乔治·塞菲里斯和1978年获奖的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样。

和卡夫卡与普鲁斯特相反，康拉德得到了他的荣誉。他出版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大多数为精湛之作;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坚决拒绝英帝国授予的爵士称号。当时他刚刚满六十七岁，那个时候，这是他平静地死去的理想年龄。

玛丽·居里于1903年和她的丈夫皮尔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奖;后来在1911年，她独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由于发现了晶体管的作用，美国人约翰·巴登也于1956年分享了物理奖;由于对超导电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于1972年再次分享了物理奖。最后，1954年获得化学奖的莱纳斯·卡尔·波利教授1962年又获得了和平奖。相反的，爱因斯坦应该两次获得物理奖，但是仅仅授予了他一次。评奖委员会的人有预见性:他们担心相对论不真实，便由于他发现光电效应的规律

而授予他物理奖。

瑞典科学院不犯那类轻率的错误。相反的：如果必须承认一种美德的话，那就是它的严格性。它不怕出错——当然它出过许多错——，只授予一个人终生一部作品一次奖。它似乎认为，谁在某种科学上优秀，他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上也优秀。它犯过的唯一的轻率之举——也许不会重犯了——是在1931年将诺贝尔文学奖追授予瑞典大众诗人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当时他已逝世六个月。更奇怪的是，卡尔费尔德在1918年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那一年却宣布诺贝尔文学奖空缺。所以谁也不理解，当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和让·保尔·萨特先后于1958年和1964年拒绝接受诺贝尔奖时，为什么不同样办理，而仍然违背他们的意愿把奖授予他们。

不管怎样，在作家中间广泛流行一种迷信，希望诺贝尔文学奖永远成为作家死后的一种纪念：七十五位获奖的，只有十二位健在。我认识几个大作家，这些天，他们不像博尔赫斯那么焦虑，而是完全相反，他们感到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惧，因为这种看法越来越逼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谁也不会活七年。统计学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也没有破除它：二十二位获奖者在这个年限内死去。

最早获奖的作家树立了坏榜样：苏利-普吕多姆在获奖六年后去世。德国作家特奥多尔·蒙森在获奖一年后去世。挪威作家比昂斯藤·比昂松在获奖七年后去世。颁奖第一个十年的纪录被意大利诗人乔祖埃·卡尔杜齐打破：他于1906

年 11 月获奖，第二年二月去世。然而，目前的记录仍然由英国大诗人约翰·高尔斯华绥保持着：他于 1932 年获奖，获奖六十天后去世。

当然，不相信迷信的人们有这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获奖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四岁，所以统计的结果可能是：获奖者一般在获奖后七年内去世。年轻些的获奖者否定了这一点：最年轻的获奖者鲁德亚德·吉卜林四十二岁获奖，七十六去世；辛克莱：刘易斯四十五岁获奖，六十六岁去世；珀尔·西登斯特里克·布克早被人遗忘，她四十六岁获奖，八十一岁去世；尤金·奥尼尔四十八岁获奖，七十三岁去世。十分悲哀的例外是阿尔贝，他四十四岁获奖，正置其荣誉和天才的顶峰，两年后不幸死于车祸，他也许不该遭此命运。

但是生活总能找到反对逻辑的方式。三个最年迈的获奖者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作家保尔·海泽八十岁获奖，伯特伦德·罗素七十八岁获奖，温斯顿·丘吉尔七十九岁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海泽是个相反的例外，他在获奖后四年去世。但是丘吉尔获奖后又活了十一年，他每天吸一包烟，喝两瓶白兰地酒。伯特伦德·罗素打破了一切世界记录：获奖二十年后即在九十八岁时去世。

神秘的数字

最奇怪的、出乎人们预料的现象是萨缪尔·阿格农和奈丽·萨克斯。他们于 1966 年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阿格农

1888年生于印度，但是他和他的家庭移居以色列，加入了以色列国籍。无疑，他是最伟大的希伯莱小说家。奈丽·萨克斯是一位大诗人和十分优秀的剧作家，1891年生于柏林一个也是希伯莱人家庭，不过仍保留着德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逃脱了纳粹的迫害，定居瑞典。1970年2月17日，阿格农八十二岁时即在获奖四年后死于耶路撒冷。八十四天后，即5月12日，奈丽·萨克斯死于斯德哥尔摩。

让·保尔·萨特从没有向人们证明过他相信这些数字的神秘性。只有一次：当记者问他拒绝接受诺贝尔奖是不是后悔时，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这挽救了我的生命。"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他讲这句话六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

为什么去看下午场?

下午三点钟，城市还在工作，一辆入时的私人小汽车停在了一家剧院前。没有穿制服的司机下了车，不拘礼节地打开后车门，让一位矮小的老人挪下车。老人的脚像干瘪的水果，衣着却一丝不苟。司机去买票时，老人脚拖着地向门口走去。

让人很难相信，在这个时刻会有适于放映电影的气氛。卖三点一刻的电影的售票员几乎总是卖晚场票的那个女人。但是这时她有一副完全不同的外表。在下午三点，她的工作一如往常，毫无吸引力，既慢腾腾又懒洋洋，售票速度最快的时候是星期三，半个小时能卖掉二十五张票。其中的一张，几乎始终不变地卖给那位有自己的小汽车、私人司机和堂堂的仪表的老人。他总是三点稍过一点走进剧院，也许他上班从来也不会这么准时。

在下午场——一个硬塞进西班牙语的法文字[1] ——放电影的时刻，剧院里有一种凄凉的气氛。双脚踏在地毯上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响，但是事实是，凡是来看这个时刻的电影的人，都会下意识地轻轻走路。“这是对下午场的错觉。”有人说，他用这种方式解释下午三点剧院内的神秘而阴郁的气氛。

在下午场——正在恋爱的人和像是恋爱却不是恋爱的人喜欢的场次——开始前，听得见人们说话的只言片语和被打断的谈话。在晚场时刻，人们在前厅里等所邀请的人；同熟人打招呼，同他们交谈。有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愉快气氛。下午场却听不见一句话，听不见任何声音。仿佛每个看电影的人——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在这个时刻都躲在黑暗的剧院里逃避自己的过错。

看电影的时刻

为了避免压抑的感觉，许多人不去看下午场电影，尽管他们能够去看。“去看下午场电影是消磨时光的最糟糕的方式”，他们这样说，并宁肯做别的事情也决不舒服地去看两个小时的好电影。

放下午电影时的剧院更像一座博物馆。两者都有一种冰冷的空气和葬礼般的寂静。然而，下午三点是真正的电影工

---

① 即 matinée。

作者喜欢看电影的时刻。

真正的电影工作者

要想为“真正的电影工作者”下定义，是困难的。有专门的电影工作者。为了追求一个细节，一个拍摄角度或一个准确的方位，他们可以设计两个小时，介绍他们的设计也像一位学者辨认一张古老的羊皮纸文件一样认真。要说这就是真正的电影工作者，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然而，下午场是最适合专门的电影工作者观看的场次。下午三点，放映古老影片的剧场都被他们坐满了。

真正的电影工作者几乎总是独自进剧院看电影。他们往往一成不变地坐在靠边儿的座位上。他们不嚼口香糖，也不吃任何零食，即不看报也不瞧杂志，而是坐在阴影里，发呆地注视着银幕，直到电影开始。于是他们松开腰带，解开鞋带和领带结，把双膝抵在前面的座位上或把双脚蹬在前面的座位上。电影开始五分钟后，可能有一颗炸弹在剧场里爆炸，这是电影工作者没有料到的事。电影可能非常好，也可能一塌糊涂；这无关紧要。如果在街上有人对一位真正的电影工作者说某部电影糟糕得让人受不了，他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去看下一场，好相信那部影片确实很糟。

罗塞利尼去影院睡觉

并非对电影了解得多的人都是好观众。意大利大导演罗伯托·罗塞利尼在电影放映的时候总是睡得很香，并且像狗熊一样打呼噜。他自己曾说，即使在放映他自己的影片时他也睡过觉。不可超越的法国导演勒内·克莱尔则说，为了理解大多数影片，影片映完后应该给他解释故事情节。关于安德烈·纪德，有人说过，他有从擦黑儿就把自己关在影院里看连续放映的电影的习惯：他围着围巾、裹着毛毯，随着影片的放映，把它们一一取下。阿索林喜欢看各种类型的影片，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它们，不是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理解影片。他的一部和电影毫不相干的作品即《电影和时刻》便是他持久地光顾下午场的结果。在这本书中，阿索林对弗雷德·津纳曼的非凡影片《正午》做了有趣的文学评论，他发现加里·库珀跟堂吉诃德一样是一位曼却骑士。显然，他喜爱的演员是格雷戈里·佩克。

电影为了什么

所以，下午场最好的顾客是真正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不过，跟电影毫无关系的人也去看下午场电影。大多数去影院的人是受到电影演员的吸引。演员受到的评价首先取决于演员给人们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所担任

的可爱角色。“我不喜欢那种让女演员最后死去的影片。”这是看晚场或夜场电影的人们中间经常出现的评论。相反的，看下午场电影的人却很少有人发表这种意见。有的是因为他们相当理解电影，有的则因为他们不知道电影里发生了什么，也不关心发生了什么。

一个安全的去处

如果把中学校门关闭掉，看下午场电影的顾客很可能明显减少。经常成群结队去看电影的学生，除了躲在一个安全地方逃避上课外，他们没有别的兴趣。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很可能这就是犯错误的心情和我们某些成年人在下午场产生的秘密感觉的根源。

由于看电影的人稀少，所以对隐秘的约会，对秘密的爱情——出于某种原因——和逃避某种不能拖延的义务来说，下午三点的影院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去处。

“当你遇到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你就去看下午场电影吧。”不久前一家大企业的经理对他的公共关系部主任说。下个星期三，他们就在下午场影院门口遇在了一起。

下午场的疗法

在波哥大，看下午场电影的最引人注意的人物是那位衣着讲究的老人。他的小汽车在剧院门前等着他，直到电影结

束。本报的电影栏编辑几乎每天都看见他走进剧院、静静地坐在靠边儿的一个位子上。他的表现像一位真正的电影工作者：不嚼口香糖，不吃甜食，不看报纸，不到银幕上出现“剧终”的那一瞬间决不站起来。

然而，据那个看下午场电影的老人自己讲，他根本不记得电影演员的名字。他有一爿食品商店。对他那种着迷的习惯，他只有一个解释：

“九年来，我每天都按照医生的建议去看下午场电影。”

一位绝食的电影导演

本月10日，一个身材又高又瘦的男人穿着浴衣，拿着一把大扶手椅来到墨西哥城艺术宫前，坐下来读一本带插图的杂志。从那里走的无数市民看见了这位古怪的读者，他们也许会想，一部讲述种种事情那类电影可能在那里拍摄，其主要人物十分自然地坐在大街旁读东西。然而，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摄制人员却不见踪影；那个人穿着花格子浴衣，仍在那里看杂志，对行人的好奇心毫不在乎，好像他不是在城市的一个闹市区，而是在他家的露台上。

行人们经过推测，很快找到了答案。街头的那位读者叫吉列尔莫·卡列斯，是一名电影导演，年已六十，那一天他宣布绝食，因为他被禁止重返电影工作者工会导演组。

不动声色地坚持着

然而，新闻和电影界并不相信事情会那么严重。卡列斯是电影业的先锋之一，他的许多朋友竭力劝他放弃他那种耸人听闻的意图。失业的导演已有好几个小时不吃东西，水米未进。看来他要准备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直到有关部门重新考虑禁止他重新担任导演的问题。但是人们相信，他那六十岁的身体，虽然看上去结实有力，可能经不住绝食的考验。然而，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像他的同事埃米利奥·费尔南德斯一样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吉列尔莫·卡列斯仍然穿着浴衣不动声色地坐在艺术宫前，坚持着不吃饭的决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把所有的杂志都看完了，戴上了深色的眼镜。

“心脏不支我不怕”

在他绝食到第一个二十四小时结束时，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工会的气氛也开始紧张起来。有一些新闻评论员怀着沸腾的爱国热情，抗议外国导演的“秘密勾当”，在对待墨西哥导演人事方面搞歧视活动。艺术宫前聚满市民，人们紧紧地围着印第安人卡列斯，在电影界的朋友们支持下，他坚定沉着地继续进行斗争。他这个单枪匹马的绝食者没有说他的身体有什么不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不适。但是

实际上，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完全绝食，他的目光已模糊不清。第二天傍晚，他的心脏开始不支，他的朋友们不得不召集一群医生会诊。从此刻起，总有一名医生在他身边。全国演员协会的何塞·凯姆、拉蒙·埃切尼克和阿尔弗雷多·德·巴列博士轮流守护不妥协的绝食者，每六小时换一次班。绝食者得知自己的心脏不支后对一位记者说："我不怕，我要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我的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我宁肯绝食而死"。

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使成千上万市民拥向艺术宫大门前。电影界不同的团体也紧随其后，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在外国导演执掌大权的情况下，说什么他的主要不利之处是国籍问题，是荒唐的"。有的评论说。然而，影业工会导演部在卡列斯宣布绝食四十八小时后散发了一份简报。据墨西哥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讲，那份充满"空话和蛊惑言词"的简报里说："我们感到很遗憾，国家演员协会的成员吉列尔莫·卡列斯竟然采用绝食的荒唐手段，对这个组织施加压力，不肯按照章程中关于重新加入该组织的规定办理"。

尽管那份简报最后说"使吸收新会员的工作规范化的章程一旦被批准"卡列斯可以再次提出重新入会的申请，但是这个"印第安人"仍然不吃不喝地坐在艺术宫门前。

不是钱的问题

多年来，也许任何一个市民也比不上绝食的导演在二十四小时中收到的工作建议多。人们为他提了一些比他的愿望高得多的建议。但是都被卡列斯拒绝了。他的事情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上的问题。鉴于此，排炮便转向另一个方向：对准了鲁伊斯·科丁内斯总统，激烈的抗议电报纷纷飞向他，要求他出面干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联合会十二日声明，它要全力以赴地帮助危在旦夕的电影导演。

幸运的结局

“只要不通知我可以导演影片，我决不离开这里。”印第安人卡列斯已绝食三十一个小时，当医生们担心他随时都可能饿死时他这样说。同时他还肯定说，他的情况很好，“一点儿也不觉得饿”。头两天曾试图劝阻绝食者绝食的200名艺术家、技术人员和电影工作者这时也改变了态度：打电报给工会，表示抗议并威吓。其中八个比较偏激的人甚至和卡列斯坐在一起，声明他们也绝食。

在答复不计其数的抗议信件时，影业生产劳动者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何塞·罗德里格斯推卸责任，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他说，印第安人事件只应该由导演工会处理。

这时，正当事件变成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时，一项协议达

成了。不然的话，卡列斯得一直到领导人例行会议召开的日期即 12 月 13 日。卡列斯不仅支撑不到那个时候——绝食三十二天——，而且在未来的四十八小时里可能由于自身的大量消耗而死去。

波哥大首映的影片

一、《百万英镑》

在波哥大，已经很久未上演过如《百万英镑》这样令人愉悦、这样精致、尖锐的喜剧片了。在片中，格里高利·派克这位与众不同的演员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这部电影取材于马克·吐温的一部小说，它集剧本、导演和表演之大成，保留了这位美国作家的全部幽默和睿智、机敏的辛辣笔调。

《百万英镑》作为一位好导演的典范之作，其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就像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如果不是这么庄重、睿智，特别是这样出色地利用电影手段完成的话，很可能会拍成一部让人难以忍受的闹剧。影片的对白是出色的，它使用得恰到好处，不是为了取代剧情，而只是为了使剧情更为丰满。

《百万英镑》这部影片严格说来并不是一部艺术作品。但它是一部出色的影片，在九十分钟里它使人们得到了开心的享受。

二、《古堡幽灵》

可能许多导演都渴望拍一部像这样的片子，但可惜的是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对待事物太认真了。然而在《古堡幽灵》这部片子里一切都是在揶揄和欢快的即兴气氛中发生的，这使它成了一部构思巧妙、导演甚佳的轻松喜剧片。

西尔瓦娜·潘帕尼尼的表演看来大有长进，她之所以加盟演员阵容显然是作为票房上的诱饵。这场闹剧没有她也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它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电影用来惩罚我们的庸俗的、感情虚假的连载杂文攻势中的一股缓流而已。

三、《狂想曲》

好莱坞借助伊丽莎白·泰勒和意大利演员维多里奥·加斯曼拍摄了一部彩色商业片。它一方面抓住了喜爱少数派音乐的观众的心，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那些喜好资产阶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故事的观众。《狂想曲》完全不是一部音乐片，也完全不是什么别的片子。它是好莱坞拼凑的大杂烩，只不过这次比前几次更像样些罢了。

伊丽莎白·泰勒的表演还算说得过去，尽管她尚未从

《艾凡赫》中摆脱出来。但对于那些记得她刚开始她的少女生涯时在《新娘的父亲》一片中的出色表现的人来说这就显得不够了。路易斯·卡尔赫恩在《凯撒》一片中进行了杰出的表演。他没有权力拿他的声誉作交易。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与派给他的角色是相称的，而维多里奥·加斯曼假装演奏小提琴的样子无法令人信服。他扮演的自私的恋人所表现出的爱情与自私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四、《阴影中的爱情》

法国电影老导演乔治·拉孔布在《阴影中的爱情》一片中叙述了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由老练的、经验丰富的让·加宾和灵巧的马德莱娜·罗班松主演。虽然故事情节本身陈旧过时，拉孔布重新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却有些新意。

叙述得很慢、很烦人。它不像泉水一样涌出，而是拖泥带水，是通过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人猜出摄影机背后他充分经受过的东西。事实上，这才是《阴影中的爱情》一片的价值所在：片中分析了主人公们的情感并对一个因痛苦的回忆而变得冷漠的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剖析。

然而必须指出某些非常明显的失误，特别是在处理那些附带人物和那些纯粹装饰性人物时的失误，如去上学的女孩们以及街上的行人。他们让人觉得有点漫不经心，有些虚假，这与那些处在心理特写镜头中的人物相反。这是这位老牌导演的失误，他把全部注意力完全用在了述叙故事的深度

上，忽视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和述叙的速度。

五、路易斯·布纽埃尔的影片

本周上演了两部阿拉贡导演路易斯·布纽埃尔的影片：《幻想乘电车旅行》和《爱情的深渊》。后一部片子是根据艾米丽·勃朗特的著名小说《呼啸山庄》（已拍成电影）改编的。

《幻想乘电车旅行》是个美妙的故事，可是布纽埃尔没有很好地讲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他未能胜任其导演职务外，他还使用了糟糕的演员，而且对白又长得让人难以忍受。除了那些有趣的并且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拿圣经《创世纪》开玩笑的娱乐之外，它简直就是一部让人无法忍受的电影。

看过《被遗忘的人们》一片的吃惊的观众将不会理解为何同一位导演会导出这样一部电影杰作和本周上演的这两部滑稽可笑的片子来。这双倍表现出路易斯·布纽埃尔跌到了笨拙的深渊里而丝毫没有顾及其极高的名望。

李盛华　译

漫谈音乐

何谓音乐？我认为，凡是悦耳的声音都是音乐。其次我才能选择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从电台广播的商业性音乐到贝拉·巴托克的协奏曲，我都喜欢。我所理解的商业性音乐是明显地为销售而制作的音乐，而不是某些人由于找不到别的名称而也这样称呼的音乐。

西班牙音乐中的爱情歌曲就是商业音乐。这种音乐是专门为特定的时刻创作的。在这类商业音乐的作者中间，有一些人是没有什么名气的诗人，如曼努埃尔·亚历拉德罗。他的歌曲是不寻常的诗歌，到处都可以听到，其中有一些歌曲由胡利奥·伊格莱西亚演唱，有一些由拉法埃尔、罗西奥·胡拉多或埃曼努埃尔演唱。他们演唱的时候，听众常常欢呼："拉法埃尔唱得美极了！罗西奥·胡拉多唱得妙极了！"实际上，在这些歌曲的后面，有一位诗人，有一位曼努埃尔·亚

历拉德罗或一位拉法埃尔·佩雷斯·博蒂霍。他们把歌曲写出来，让任何人去演唱，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他们写的歌词，却是高水平的。关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资格这样说。至于歌曲的曲调，事实上，人们总是不断地修改，对它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采取各种各样的态度，但是歌曲经受住了考验。

甲壳虫音乐本不是商业音乐，但从甲壳虫歌曲在市场上出售、是一种商品、具有很大的销路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却变成了商业性音乐。我认为，当人们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畅销的时候，它们最先引起了人们的惊讶。《百年孤独》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当我看到这部小说是畅销书，并且至今仍然畅销的时候，我最先感到惊讶。我意识到，我写了一部我相信应该写的小说。我毫不怀疑，甲壳虫乐队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西班牙的商业性音乐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一产生就具有商业目的。不过，重要的是，值得注意的是效果如何。否则就别出售，但是要使它普及。如果普及它、使它进入社会的最佳办法，改变它、赋予它以一种社会功能和一种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文化功能的最佳办法是出售它的话，那就必须出售它。如果没有任何因素妨碍文化生产，文化就可以而且应该得到生产。重要的是，不要让跨国公司的剥削者借此发财。

顾虑在哪里呢？怕我们出售音乐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也不要出售食糖。为什么说出售音乐是不道德的，而出售蔗糖就不是不道德的呢？我认为两者都不是不道德的。古巴创

造了那么优美的音乐，也生产了那么好的雪茄和咖啡；蔗糖和咖啡作为商品出售，在全世界都有名。同时，古巴也生产和再生产各种音乐。为什么古巴人对国外不建立关于音乐使用问题的控制机构？为什么呢？既然别人在千方百计地出售？

早在革命胜利以前①，古巴就是一个生产音乐的大国，通过舞蹈、歌唱、电台广播和舞台表演把音乐变成了商品。但是古巴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它的音乐是由美国的唱片公司发行的。好处都让美国得去了。今天古巴音乐仍然存在于市场上，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萨尔萨。它不过是被帝国主义者和被流放的古巴人使用的音乐和瓜拉恰舞曲。那些古巴人并不因为是流亡者而不再是十分出色的音乐家，就像他们当年既是革命者也是音乐家一样。

在古巴期间，我很喜欢参加街头的狂欢节。嗬，在古巴可以听到多少音乐哟！那些音乐多么真实啊！具有多么悠久的传统啊！如果古巴有一家普及音乐的真正的工业，它将以萨尔萨席卷一切。譬如《疲倦的老牛》，它准能像曼博舞曲刚出现时那样产生巨大影响。佩雷斯·普拉多做了什么呢？是的，他把爵士音乐带到了热带地区，使它带上了加勒比因素。但是曼博舞曲所走过的全部成功之路是由于使它变成商品所做的努力。

那么，今日古巴正在创造的音乐大多数命运如何呢？没

---

① 哥伦比亚、古巴等国的一种流行歌、舞曲。

有得到很好地利用。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害怕商业化这个字眼：是否因为商业化的重要性，其好处或坏处，是有人通过音乐大捞好处？

我认为音乐应该跟文学或诗歌一样。有的文学的确把革命表现得很具体；有的文学则很朴实，只是为了发展人类的美的传统，或者说为了增加人类的文化财富。

我的目的是做一个革命作家。在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宣言，这类东西丝毫没有。但是相反，其中有另一种东西，你可以看到开电梯的人，可以看到汽车司机、知识分子、医生和看书的牧师。我做的努力是什么呢？我的努力不是牺牲一部作品的任何文学价值，但是要让所有的人理解。我坦率地相信，这一点要比专为政治写的文学作品需要做更多的革命工作。

音乐如果是好音乐，它就像革命的文学、戏剧和革命的诗歌一样，也是革命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革命的。

但是现在上演的剧目不适合现在的年代，或者演出不成功，譬如墨西哥的剧作者上演《最后一首歌谣》时，观众甚至笑起来，因为他们说，这种歌谣没有人爱听了。相反的，西班牙人推出的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伟大成功之一。我这样对你讲，是因为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很好地对待说唱剧，可能这是一个商业方面的，宣传方面的问题，可能没有排练好，使看演出的观众难以产生对那些说唱剧的留恋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善于推销。

很遗憾，我使用的术语不是资本主义为这类事情创造的

那些术语，这是实情。区别在于，在古巴销售的利益是社会性的，但是动机是一样的。必须善于推销。

如果歌剧在米兰是好剧，如果通过音乐史证明它是高级的艺术，如果在巴塞罗那是好剧，在这儿也应是好剧。所以，问题不在歌剧本身，而在于观众的文化素养。如果《奥赛罗》或《蝴蝶夫人》以及其他杰出歌剧在这儿不受欢迎的话，问题就是在这儿没有喜欢歌剧的观众。这种情况也自然使人想到，这儿也没有在小歌剧和说唱剧方面具有文化修养的观众。我相信经过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像古巴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有观众喜欢一切艺术表现形式的。譬如芭蕾舞，在古巴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但是阿利西娅·阿隆索成为世界芭蕾舞大名星之一这个事实，我不认为是使芭蕾舞拥有观众的唯一理由。我认为古巴人已经习惯和学会看芭蕾舞了。

我不只一次听人说写博莱罗舞曲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愿望。

其实，不只是我的愿望。至少一年来，我一直在和曼萨内罗努力写博莱罗舞曲。这是最困难的事情。能够用五六句话来概括一支博莱罗舞曲的全部内容，是一件真正的文学功绩。

曼萨内罗甚至劝我写一段故事，他去编舞。但是我想做的是写一支博莱罗舞曲的全部歌词。我还同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合作过。在试着创作博莱罗舞曲方面，我跟西尔维奥走得更远。我把故事给了他，他把押韵的歌词录成磁带给了我。他规定了每句歌词应该有的音节，甚至规定了韵脚。我

尝试了几个月，但是没成功，太困难了。一支博莱罗舞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作为一种音乐，博莱罗舞曲有巨大社会意义。说实话，博莱罗舞曲表现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使我感动，我知道也使我同代的许多人感动。博莱罗可以使恋人们彼此更相爱，这一点就是以激励我写一首博莱罗。使得恋人们更相爱，那怕是短暂的一刻，在文化上是重要的。如果在文化上重要，它就是革命的。

在哥伦比亚有一种音乐作品叫巴列纳托，它产生于巴列纳托地方。它多多少少具有“松”[①] 和多米尼加梅伦盖舞的血统。最初，在许多年前，它是一种赞美歌，就是说，它是歌颂真实的事件的。巴列纳托的作者们走过一个村镇，就了解了一个事件，然后编成民歌，到处去演唱，把此事传遍四方。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歌便普及开来，如今就成了一种和物质生活并行的商业性生产。从这种歌曲唱的是真事这一点来说，它使我产生了创作《百年孤独》的念头。

《百年孤独》是什么？它不过是一支四百五十页的巴列纳托。事实就是这样。我用我的文学工具所做的，跟巴列纳托的作者们用他们的音乐工具所做的一样。只是我运用的是更富有变化的文学技能，因为小说是一种更富有文化特点的产品。但是源泉是相同的。

那么，何谓古典音乐、高雅音乐和民间音乐呢？

---

① 古巴的一种民歌。

其实我们所谓的古典音乐之所以称之为古典，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因为浪漫主义音乐和巴罗克音乐也是古典音乐。至于高雅音乐，归根结底，也是来源于民间音乐，譬如有一张十分动人的照片。是贝拉·巴托克的照片，他很年轻，是二三十年代照的。他用一台曲柄录音机在山里收录农民的流行歌曲，收集他的祖国匈牙利的音乐表现形式，以便创造艺术上最精美的音乐，一种以他用辊式录音机收集的歌曲为基础的很高雅的音乐。

当一位艺术家离开民间的时候会怎样呢？我敢这么讲，如果不是贝拉·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①] 和舍恩柏格[②]，音乐早完蛋了。并非因为他们是伟大的音乐家，而是因为他们对音乐的丰富技巧如此着迷，他们能够写出任何一种没有内容没有特色的东西来，幸运的是产生了贝拉·巴托克，他来自勃拉姆斯[③] 的浪漫主义传统，开始在民间音乐中寻找源泉，就像贝多芬、巴赫和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音乐家那样。

我向来很喜欢音乐，可是我不能听着音乐写作，因为我会比写作更注意音乐。我必须在绝对安静中写作。不过，在我写作的时期里，我不但了解其他作品和生活的情况，而且注意音乐的情况，并且根据正在写作的内容选择所听的音乐

---

① 俄国作曲家（1882—1971）。

② 奥国作曲家（1874—1951）。

③ 德国作曲家（1833—1897）。

种类。

刚才提到了贝拉·托托克，我在写《家长的没落》的时候，几乎专门听他的音乐。有两个陌生人来见我，要求跟我交谈，他们说："我们仔细研究了《家长的没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小说的结构跟贝拉·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结构相同"。这使我多么吃惊。简直吓了一跳：我觉得我只是采用了贝拉·巴托克的一系列艺术手法，那两位先生竟那么突然地对我讲了他们的看法。最终我认为他们是对的。

我喜欢收集音乐磁带，从阿尔比诺尼到塞纳基斯，从巴罗哥到当代最富有试验性的音乐，全有。我有博莱罗舞曲的，兰切拉民歌的，有宾伯尼多·格兰达、达涅尔·桑托斯、基科·门地维；古巴的大音乐家和佩雷斯·普拉多时代的一切音乐磁带。普拉多是我崇拜的偶像，因为他是我这个时代的伟大的音乐表现。我总是紧紧地追随着音乐，所有的音乐。我一直不理解一个想做文化人的人怎么会不把音乐当作一种重要的文化修养内容。

说起来很有意思。多年前我在巴黎名叫"埃斯卡拉"的夜总会里当过职业歌手。我们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常在那里聚会。那个时代的拉丁美洲是不光彩的，古巴有巴蒂斯塔，圣多明各有特鲁希略，哥伦比亚有罗哈斯·皮尼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佩雷斯·希门内斯、索莫查、奥德里亚、斯特罗埃

斯内尔。庇隆[1]……那时，我当过记者，出版了小说《枯枝败叶》，正在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但是，必须维持生活。我们在夜总会相聚，并非为了吃喝，而是为了唱歌和挣钱。我和委内瑞拉画家索托在一个队里唱歌。你知道我们唱什么歌吗？我们唱的是墨西哥歌曲。付给多少钱呢？哼，老板有规定。一个晚上可以挣五百法郎，相当于一美元。

现在还有一盒磁带留在那里，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发疯似的想赎回来。磁带上录的是我和他用二重唱演唱的墨西哥歌曲。

作为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表现，拉丁美洲音乐在拉丁美洲各国很流行。

而拉丁美洲的三个国家，即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其最重要的文化表现就是音乐。你只要到世界上走一走，就会感觉到人们是多么喜欢拉丁美洲的歌曲。不过，那些歌曲是被别人加了工的。我们的音乐被曼托瓦尼和弗兰克·波塞尔拿了去，为电梯制作了音乐。我确信他们没有付版税。

拉丁美洲的面貌通过它的歌曲在世界各地得到更多的表现。我心里想，既然我们从事文化工作有利于树立我们的形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经济的观点同样取得利益呢？

在古巴人创作的音乐中，我在国外旅行时听到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新型歌曲。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歌曲受到古巴革命文

---

① 全是独裁者。

化当局最广泛的普及和最有力的保护。在古巴文化界，这种歌曲被认为是革命的文化表现。不过，正像我先前讲过的那样，在热闹的狂欢节上，在圣地亚哥，除了新歌外，我还听到另一种歌曲。有一个合唱队，他们在演唱，那是多么美妙的歌曲！现在我只有曼密苹果树……！你听，还有比这更美丽的歌儿吗？但是当我欢呼“好极了！”时，有人便对我说：“这个合唱队就要解散了，因为敲定音鼓的人今年将结束工程学业，吹萨克管的将结束医学学业。我心想：“古巴人是多么不会利用音乐啊！”

我还记得，后来我拼命地寻找录有这种悦耳的旋律的唱片，但是没找到，因为即使有这种唱片也不会很多，一两天就会卖光的。

请想想看，一种音乐唱片出这么少，无需任何推销就卖完了，还能传播到世界上去吗？我并非希望这种音乐的唯一出路是变成商品，但是要知道，商品化是传播的现代形式。这是资本主义为了达到个人赚钱的目的而发明的。但其结果证明，这种手段是可以利用的，我们应该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实际情况是，对像古巴民间音乐这么重要的文化支脉，古巴人竟不加以利用。如果不重视这个文化支脉，它就会灭绝。

巴兰基利亚的画展风波

在巴兰基利亚，时不时地举办画展。画展的重要性——这当然不取决于展览的重要性——几乎总打不破本地区的范围。艺术中心为纪念它自己创建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画展刚刚闭幕。在评奖结果宣布二十四小时后，情况表明：这一次评奖的结果至少引了一场全国性的风波。全国的三十位画家和一些外国画家在巴兰基利亚俱乐部的一间大厅里展出了59幅绘画作品，把大厅变成了一座绘画的迷宫。画展开幕十天后，在等待的紧张气氛中，五个评委中的三个成员宣布了评奖结果：一等奖，两千比塞塔，伊格纳西奥以其作品《迁徙》获得，从各方面讲，这幅画都可以说是哥伦比亚暴力小说的生动展示；二等奖，一千比塞塔，巴兰基利亚画家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以其作品《吃鸟的猫》获得，目前他正在华盛顿举办画展；三等奖，五百比塞塔，豪尔赫·埃利亚斯以其作品《死寂的大自然》获得。这样的评奖结果由于和地

方报纸前一天根据可靠消息报道的结果不一致而在全市像一颗炸弹一样爆炸开来。

意味深长的午餐

跟所有的绘画比赛一样，当评委会讨论的时候，人们，特别是画家的期待心情是很紧张的。在评选结果揭晓二十四小时前，有把握以其作品《自画像》获奖的卡塔赫纳女画家塞西利娅·波拉斯被评委会的两个评委即卡塔赫纳人米格尔·塞巴斯蒂安·格雷罗和定居波哥大的西班牙出版家、特地拉来当评委的克莱门特·艾罗（直到昨天还不知道是谁提议的）请去进午餐。在午餐过程中，大家谈论的自然是画展。吃饭后点心时，塞西利娅·波拉斯尽管没有说出来，但是她知道评选的结果如何。消息开始透露出来。第二天，在评委会正式公布评选结果前，地方报纸抢先登出了获奖人名单：伊格纳西奥·哈拉米约获一等奖，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获二等奖，塞西外娅·波拉斯获三等奖。但是当六小时后评委会正式公布评选结果时，却发生了一点变化：三等奖授予了豪尔赫·埃利亚斯·特里亚纳。于是，塞西利娅·波拉斯和《先驱报》一位编辑谈了话，对他披露了一些情况，一场轩然大波顿时掀起。

并不是那么回事

“在世界书店里”，塞西利娅·波拉斯说，“我偶然碰到评委会的委员米格尔·格雷罗和克莱门特·艾罗先生，我问他们：那天早晨《先驱报》关于评奖情况的报道真实性如何。他们一致说，的确，评委会曾决定奖励我的作品。但是后来改变了决定，因为有人反映说，我那幅作品以前展览过。”这种说法不正确，提供情况的人似乎指的是两年前在沿海地区艺术家展厅展出获奖的《破罩衫》。这幅画的人物的面孔很像《自画像》的面孔，但是作品是不同的。了解塞西利娅·波拉斯都知道，即使她为其作品取另外的标题，她的作品中至少还有六幅是自画像。

其他人的权利

沉默寡言、衣着讲究的卡塔赫纳女画家在她的声明中对评委会提出了严肃的指控。“本城委任了一个接受委员会，我知道它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接受了一定数量的绘画作品。对这些尚未给其艺术价值以不同评价的作品，应由评选委员会去评判。然而，评选委员会却决定使用接受委员会的职权，从而犯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公正错误。她根据这个论点，通过地方报纸对评委会展开了批评，每天发表一个论据，使评奖工作信誉扫地。

对评委会的指责

到现在为止，对评委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指责并不是塞西利娅·波拉斯提出的，而是定居巴兰基利亚的波哥大记者埃内斯托·罗德里格斯·普莱西奥提出并发表在《沿海报》上的。

那些指责综合如下：

一、评委会由五人组成，其中二人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因为一个人不在本城，另一个人情况不明。其余三个委员自做主张，在评委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工作，他们没有向艺术中心提出正式报告。

二、根据克莱门特·艾罗的投票把一等奖授予担任哥伦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的画家伊格纳西奥·戈麦斯·哈拉米略，而克莱门特·艾罗进入评委会是由哥伦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推荐的。

三、三等奖自然也是根据艾罗的投票授予画家特里亚纳先生的，而特里亚纳和伊格纳西奥·戈麦斯·哈拉米略同是一个商号的合伙人。

四、参赛的作品中有一幅曾经展出过，尽管有人事先提醒过接受委员会（知情者没说明此画的名称和画家的名字）。

五、应该调查：不完整的评委会是否还有权力拒绝接受展品；是不是有一幅从波哥大寄来的作品从前展出过；评委会本是五人，只剩下三人是否有效；在三个评委中，是否有

一个评委在道义上不准人们过问他作为评委是由一位参赛的画家委任的。

没有出席会议的委员

面对来势凶猛的舆论，评委会的三位成员——克莱门特·艾罗、米格尔·塞巴斯蒂安·格雷罗和建筑师何塞·阿莱杭德罗·加西亚——迄今一句话也还没讲。由于评委会不完整而提出批评的人们坚持要大家知道，评委会成员之一，作家费尔南多·特列斯早就提出及时把他换掉，但是未能如愿。至于第五个成员贝尔纳多·雷斯特雷波·马亚，他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先驱报》发表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解释了他缺席会议的原因："即使我像公众一样尊重评委会的决定，"雷斯特雷波·马亚说，"我作为评委对它也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我从没有被召集去参加会议，也不知道关于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的消息。"

人们的不满

报纸对评奖程序的抨击，和人们对评奖结果的普遍不满相呼应。来自了解情况者的一项统计表明，由于作品的水平而最可能获得胜利的画家是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恩里克·格拉乌·阿拉乌豪和塞西利娅·波拉斯。这三位画家均来自沿海地区，这种情况带来了地区主义的可疑预兆。然而，当两

个在波哥大工作的画家获得由一个受到一位来自波哥大的委员强烈影响的评委会授予的奖项后，一名定居巴兰基利亚的波哥大记者写道："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中央集权制的牺牲品吗？它已经扩张到我们认为对那个有权势、要阴谋的阶级没有危害的地区了吗？"

对一等奖的不满非常普遍，人们甚至提到不承认受政治观念影响的评委会：《迁徙》是一幅表现暴力的作品。应该注意到这个奇特的情况：和戈麦斯·哈拉米略的纯粹象征性的和轶事性的绘画相比，人们更喜欢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的抽象艺术。

根据上述理由，地方上的画家和批评家决定对评奖一事提起诉讼，但是关于有资格接受起诉书的机构，尚未达成一致。

一位哥伦比亚大雕塑家在墨西哥

1953年，一个墨西哥艺术家代表团去拜见鲁易斯·科丁内斯总统。有一个成员穿着沾满尘土的破旧工作服。在这群画家和雕塑家中，穿工作服的这位身材矮小、结实的客人仿佛是最典型的墨西哥人：一个纯粹的印第安人，留着梳不熨贴的头发，有一张难以形容的铜色面孔。然而，他却是代表团成员中唯一不是出生在墨西哥、而是出生在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乌维塔尔乡村的人。所以在他的同胞中，很少的人知道他叫罗德里科·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也许谁也不像鲁易斯·科丁内斯总统那么敬佩他，因为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观赏这个穿工作服的朴实哥伦比亚人在墨西哥城精密科学塔对面竖起来的高七米的普罗米修斯雕像。

此时此刻，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已被认为是全国最了不起的雕塑家，是善于根据一块火山石揭示阿兹特克人最深

邃的秘密的杰出种族解释者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才穿着工作服去见总统的。他之所以穿着工作服，是因为当他得知总统将在下午二点半接见他们时，下午二点钟他还在他的工作间里，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必须了解墨西哥才能明白墨西哥总统为什么不根据衣着看人。”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解释说。说这话时他已来到哥伦比亚，进行十五天的访问。这时他的荣誉、财富和威望已今非昔比，只是他没有系领带。

在美洲的肩头

在有血有肉的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回到哥伦比亚之前，墨西哥的报纸和艺术刊物就先让他回来了：总是让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带着他那张猴子的面孔爬在他的普罗米修斯的肩上，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眼珠比雕塑家的脑袋还大。人们看见他爬在那里，头上戴着一顶合适的帽子，身上穿着一件迷宫似的无袖外套，这是他十三岁逃出亚鲁马尔布道科学院后一直穿的唯一的一件像砍肩的衣服。

在哥伦比亚，有许多人认识他，知道1938年他在麦德林市生活困苦，住在“堂娜拉法埃拉的洞”中一间肮脏的小屋里，还知道一年后他进了波哥大美术学校。如今看到他爬在那么高的地方和那么大的一件东西一起拍的照片，觉得照片上的他很不像他们认识的那个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现在的他，又瘦小又忧虑，似乎没有能力爬到七米高

的一座塑像的耳朵那儿去。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哥伦比亚的那个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在波哥大美术学校没有能拿到教师资格证书时——因为路易斯·比达莱斯给他的历史课打了二分——，在把他引向普罗米修斯肩头的路上，他忍受着饥饿，断断续续地已经走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路程。

在班布科舞曲旋律中

当他 1939 年来波哥大时，最困苦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但是从他 1919 年在离弗雷多尼亚两公里远的乌维塔尔乡村第一次闻到泥土的香味和热牛奶的香气、第一次听到奶牛的叫声的那个黎明起，已经过去了一部分。10 月 24 日，他在天蝎座下出世。但是在他家中，没有人和天体有什么和纯粹的农业不相同的联系。罗德里戈出生时，他的双亲跟那些星期天穿着凉鞋、提着手提包，唱着班布科舞曲，到村镇的市上来出售土地产的果实的人一样，还是安蒂奥基亚农民，但是在未满五周岁之前——现在他没有对人提起此事，自己也没有准确地回忆它——，罗德里戈迫使父母改变了职业，丢下乌维塔尔乡间贫瘠的土地，移居到了弗雷多尼亚，好让孩子能够上学。当时谁也想不到，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居然会成为雕塑家。但是他父亲从小就当农民，同样也想不到，为了让五岁的儿子能够进学校读书，自己也在弗雷多尼亚当了泥水匠。这纯属偶然，但是现在，一个泥水匠的儿子成了

雕塑家，似乎更合乎逻辑。

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

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雕刻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弗雷多尼亚小学体魄健壮、慈父般的老师堂米格尔·耶佩斯。他给他的祖国历史课打了三分——尽管他始终不懂埃纳奥和阿鲁维亚的著作——，因为他在六岁时用铅笔画了一张《夕阳下的玻利瓦尔》，老师把它钉在了墙上，为其他孩子做榜样。那些孩子中，有现在任哥伦比亚社会保险公司经理的加夫列尔·巴连托斯·卡达维德博士。

米格尔·耶佩斯老师确信年幼的罗德里戈不喜欢学历史，因为他打开课本只是为了一天画三张玻利瓦尔的肖像，于是决定让他在其他方面发展。当老师高声朗读埃德蒙多·阿米希斯表现其最初的文学激情的作品《心》时，罗德里戈仍然画他的玻利瓦尔。四年级结束时，教室里便贴满了解放者的画像。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罗德里戈除了为玻利瓦尔雕像外对什么也不热心。

离开小学校后，罗德里戈没有别的爱好，整天呆在家里玩那些色彩鲜艳的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娃娃，那是他父亲为了哄他玩而制作的。但是他父亲想的是别的事情。他想，孩子会成为一个神甫。其一，因为他性情温和、恋家、慈善；其二，因为弗雷多尼亚教区神甫为他提供了一份去亚鲁马尔布道神学院学习的奖学金。

他去了神学院。像大多数安蒂奥基亚的孩子一样，除了砍肩，他穿的衣服一点儿也不特别。因为这个，还因为那里的铁的纪律，他不喜欢神学院。十八个月后，他丧失了对宗教的虔诚，一个黎明，他没有去望弥撒，跑到了大路边，爬上一辆拉猪的卡车，花了四角五分钱到了弗雷多尼亚。在大路的第一个转弯处，他就把砍肩扔了。

他的归来，对他的家庭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对罗德里戈本人却是一个难忘的事件，因为当母亲气愤地骂他、父亲丢下泥铲抓起皮带的时候，罗德里戈却一声不吭地坐在小凳上，不知为什么竟异常快活地想到，他要用木头雕一个身上流血、患溃疡的基督像。

在弗雷多尼亚统计科

1935年，拉蒙·埃利亚斯·贝坦库尔特从西班牙归国，他是罗德里戈的母亲的一位远亲，雕刻并出售基督的头像。但是此事在弗雷多尼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镇上到处是罗德里戈雕的遍体鳞伤的基督的像。那是一些可怖的基督受难像。用红颜料胡乱涂画，一副受尽苦难的可怕模样。由于基督受的折磨惨不忍睹，任何一位教区神甫都不愿意称颂他。那些基督像全来自弗雷多尼亚镇的狭窄而混乱的统计科，罗德里戈在那里随意地雕刻圣像。他在那里干了两年，每个月挣二十比索。在那两年中，那里的登记册不曾登记土地的数量，被砍头的人数和死亡的数字。

以前他曾当邮差，挣十二比索。送完邮件后，就雕圣像。直到工程师恩里克·乌里维·维特主编的一份《面包》杂志落在他手里的那一天，他没有干过别的事。他在杂志上看到一张哥伦比亚人托丰·梅希亚的一件雕塑作品照片，便用泥巴复制了一座，没有在乎那雕像是一位裸体女性。但是在弗雷多尼亚，先是居民，接着是天主教贵妇团体，最后是镇政府，都大惊小怪。居民和天主教贵妇团体打碎了他的塑像。镇政府成员则撤消了他在统计局的职位，让他干辅助性工作，每月十五比索，并派他去麦德林市加强——在《巴奇内》的作者何塞·奥拉西奥·贝坦库尔特之前——关于雕塑裸体女人的艺术的修养。

登上了去墨西哥的飞机

1944年3月19日，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飞抵墨西哥机场，纸板做的破手提箱里装着两件衣服和一对模型。当时他有成为外国人和在波哥大认识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豪尔赫·萨拉梅亚的优越条件。但是在六年前他第一次到麦德林时——每个月交十比索住在“堂娜拉法埃拉的洞”里——，不过是一个仿佛用绳子从弗雷多尼亚捆绑来的不知所措的男孩子。他在墨西哥最不利的方面是“他是哥伦比亚人”。那一次在麦德林和在波哥大美术学校里一样，也和1942年他第二次在麦德林一样。但是这一次他认识了画家佩德罗·内尔·戈麦斯和主编《哥伦比亚人》报文学增刊的

那群大学生。其中有些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是在艺术上是革命派：米格尔·阿维拉埃斯、奥托·莫拉莱斯·贝尼特斯、埃尔南·梅里诺、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特和阿尔贝托·杜兰·拉塞尔纳。这群人在《哥伦比亚人》报文学增刊上写简讯，署共同的笔名 PRAB，意思是“为了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用这个笔名发表的简讯由报社的经理办公室结算，由一家专门的基金会支付，把稿酬汇到在墨西哥的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这位雕塑家记得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曾收到一百美元的支票。第一次有人注意到，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能够说到做到。所以他的名字第一次印成了铅字，第一次出现在支票上：由于他在麦德林工业展览会的工作，他得到了一千比索的报酬。

他的第一张支票和佩德罗·内尔·戈麦斯——据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现在讲，那是在一个有五幅佩德罗·风尔的画就能活下去的国家里——使他增加了勇气。《哥伦比亚人》报的那些小伙子帮助了他。安蒂奥基亚省教育厅长拉蒙·哈拉米略·古铁雷斯拨了一笔款，让他登上了去墨西哥的飞机。倘若不是这样，他就在一条船上当锅炉工了。

来自弗雷多尼亚的墨西哥人

如今，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在墨西哥生活得很好，他跟利迪亚·罗莎斯结了婚，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叫何塞·帕特里西奥。他的家，不时成为艺术家们聚会的中心，

门牌是里约·德·洛萨博士街18号，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家罗马竞技场，为了挣饭吃，斗士们连骨头都摔断了。在墨西哥艺术家的领导机关办过公的通讯宫里矗立着他雕刻的“纪念考特莫克和祖国”的石碑，据他讲，那座碑比他那座著名的普罗米修斯雕像还高大、还宏伟、还成功。那是一座已被划归墨西哥艺术与历史遗产的建筑物，为他带来四万比索的收益。为了把它运来，当初不得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拆开，然后把工作间也拆掉，方才把大部件运出来。

回哥伦比亚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的朋友们发现，他还是那么朴实，热情，易动感情，仿佛刚刚从弗雷多尼亚到来一样，不过，他更乐观、更成熟了。他了解自己的能力，更了解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他喜欢阅读，尤其喜欢读小说，特别是美国小说。除了工作的时候，他决不吸烟。他认为他能够通过作为消遣而从事的绘画和摄影来合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每星期他至少进三次影院，偏爱意大利电影和他的朋友凯撒·扎瓦蒂尼的影片。他们是在墨西哥认识的，不久前他在意大利拜访了他。

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库尔特口袋里装着回去的机票，在墨西哥有几件事必须去做。但是他的朋友们希望他在哥伦比亚再呆些时间，希望他在波哥大留下一座玻利瓦尔的塑像。想到他早年在弗雷多尼亚画的那些已被遗忘的玻利瓦尔的画像，不管怎样，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那么做的。

创作漫谈

《百年孤独》的写作方式

《百年孤独》与西班牙小说

《百年孤独》是用一种健康的方式写成的。这是一部荒诞的小说。西班牙美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如此。不过，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像西班牙中世纪的作家那样写作，像侵入我们大陆的西班牙人那样写作。他们使我们的先辈对骑士文学沉醉。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期望我们做别的什么事情：出发点就是荒谬的了。西班牙人曾是世界上最精神失常的人。遗憾的是，现在不那么精神失常了。所以，当我们从意料不到的道路上冲出来时，谁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是西班牙埋下的种子……

阿莱霍·卡彭铁尔[①] 不久前指出，目前的西班牙美洲小说“尽管有人发表了看法，它的习语和它那种显得古怪的词语却是来源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保留下来的用语和流行术语。在所谓的‘美洲方言’中，许多就存在于塞万提斯的文学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

西班牙美洲的小说家把创作在我们中间不受重视的西班牙小说的任务承担了起来。在西班牙，长期以来人们就在写那种缺乏想象力和表现力，几乎为社会见证服务的小说。这些小说对不同的社会事件做了记录，但是——除了个别可敬的例子——没有出现一部高水平的。

包括风格、写法和华丽而完全的尽情表达，都缺乏可信性。西班牙美洲的年轻小说家——多少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人们并非吃着同样颜色的面包的国家的产物——，富有创造性，采用西班牙巴罗克[②] 的优秀传统写作，同时进行社会批评。这种社会批评虽然不乏渲染之处，但是仍然是严厉的。

我国的年经小说家尤其明白大洋彼岸的同行们的那种明显的教训。西班牙美洲作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题材和形式的问题。发生的影响是明显的，有效的。他们缓慢而笨拙地鼓动起翅膀从昏睡状态中起飞了。

我认为，在中世纪富有想像力的神志错乱中产生的骑士

---

① 古巴当代著名小说家（1904—1980）。

② 欧洲十六、七世纪的一种奇特、复杂、浮饰过多的文艺风格。

小说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什么都可能办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故事的价值。他们如果认为需要把骑士的脑袋砍掉四次，就把骑士的脑袋砍掉四次。这种神话般的惊人的能力曾经如此深刻地刺激着那时的读者，它竟然成了征服美洲的标志。征服者们所寻找的黄金国和青春泉只可能存在于被自由的想象美化了的世界里。不幸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竟会那么快地忘记了这些美妙的源泉。四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才找到了那个业已中断的传统的端头，注意到骑士小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罕见的相似之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在读描写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1] 的三十二次战争的那一章时，他发现这位上校在一个名叫内埃尔兰迪亚的地方签署一项和约。于是马里奥想起了这个地名在骑士小说中的回荡。他甚至指出，他觉得这个地名好像是《阿马迪斯》中的一个城市或地方。他认为这是对这部充满诽谤的作品的一种推崇，一种正名。

不，这种一致性，或者说拉丁美洲的现实与骑士小说之间的关系如此之大，很可能使人陷入这种推测。但是事实是，哥伦比亚的内战是以内埃尔兰迪亚和约结束的。还有一个情况。读过我的小说的人会看到，马尔伯勒公爵作为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的助手在哥伦比亚内战中打了败仗。关于这一点的真情是，我在小时候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唱过这支

---

① 《百年孤独》的主要人物。

歌儿：“曼勃鲁去打仗。”真的吗？我问我祖母曼勃鲁是谁，他去打什么仗。我祖母显然一无所知，便这样回答我说，他是一位跟我祖父一起作战的先生……后来，当我知道曼勃鲁就是马尔伯勒公爵时，还是觉得像我祖母说的那样好些。于是我就那样写了。

在《百年孤独》中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有一位生得很美却又很傻的小姑娘，她去花园收几条床单，突然飘上了天。关于这一细节的解释要比想象的那样简单得多，平常得多。有一个姑娘和我在《百年孤独》中描写的那个美丽的雷梅迪奥斯完全一样。她和一个男人从家里逃走了，她父母不愿意正视这件丑事，便一本正经地说，人们见她在花园里收床单，后来就上天了……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宁愿按照她父母的说法即掩盖家丑的说法来写，我喜欢真实的事件：她和男人私奔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西班牙美洲小说家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才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才打破了那种盲目的，近乎爬行的文学模式。我们起源并深深置根于西班牙的黄金世纪。对于近世出现的作家的作品，我们也留心地读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崇拜胡安·拉蒙·希门内斯[①]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对我们产生过影响，但是他的语言非常好，表达方式总那么干净利落。卡米洛·何塞·

---

①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西班牙诗人、散文家。

塞拉[1] 的作品，我也读了许多。在西班牙内战[2] 后的时期里，我们曾渴望从西班牙传来点什么信息。可是在我之后的一代人却不怎么喜欢卡米洛·何塞·塞拉了。

香蕉园故事的真实性

《百年孤独》中描述的香蕉园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问题在于拉丁美洲的现实中总存在着奇特的现象，甚至香蕉园的情况也不例外。那里的情况是那么悲惨，那么残酷，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随着香蕉公司的出现，世界各地的人开始向哥伦比亚大西洋岸边的这个镇子涌来。奇怪的是，有一个时期，这里的人们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人们彼此听不懂。并且出现了这样的繁荣局面，就是人们所谓的真正的繁荣：人们一边跳昆比亚舞一边焚烧钞票。跳昆比亚舞的人要拿一支蜡烛。香蕉园的普通雇工和工人拿的不是蜡烛而是燃烧的纸币。繁荣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一个雇工每月能挣二百比索，而当地的市长和法官只能挣六十比索。其实，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政权，政权是可以出卖的，因为香蕉公司随便给他们一点小费或者仅仅向他们行一点贿，就能够把整个司法权和政权掌握在手。有一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醒了。是一

---

① 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 ），西班牙小说家、散文家。

② 西班牙内战（1936—1939），西班牙共和派同佛朗哥将军的反动军队进行的国内战争。

种行业的觉醒。工人们开始要求基本权利，因为他们得到的医疗仅仅是一粒蓝色的小药丸，不管什么病都是如此。让病人排成队，一位护士往每个人嘴里塞一粒蓝色的小药丸。且莫说在这种蓝色小药丸上没有无限的诗意……这东西竟变得那么重要又那么平常，连孩子们也跑到诊疗所前去排队，护士把蓝药丸塞到他们嘴里，但是他们随后便把药丸吐出来，用它们去作赌盘号码的标记。有一个时候，由于药丸的问题，工人们要求改善医疗条件，要求在工人驻地建厕所，因为他们每五十个人才有一个马桶，而且直到圣诞节才更换……还有一个问题：香蕉公司的船开进圣玛尔塔港，装上香蕉运到新奥尔良去。但是回来时没有什么可装。这样，公司的船就白跑了。怎么办呢？很简单，为公司的商品代销处运商品。公司不给工人们发钱，而只给凭据，让他们拿着凭据到公司委员会去领工资。但是委员会只发给几张汇券，持券人只能到公司的商品代销处买东西。那里卖的东西全是公司的船运来的。工人们要求公司付他们钱，不要证券。于是举行了罢工，使整个公司陷入了瘫痪。政府不但不出面解决，反而派来了军队。工人们被集中在火车站上，还以为将有一位部长前来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军队包围了车站，并命令他们五分钟解散。结果谁也不肯离开，军队便开枪进行了屠杀。

小说所描述的这个故事，我是在事件发生十年后才知道的。关于这个事件，我逢人就问。有的说确有其事，有的说没有此事。有人说："我当时在场，我知道没有死人，工人

是平平安安撤走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人说：“有人被打死，确实有人被打死，我的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人们还提出了其他的要求。”问题是，在拉丁美洲，人们正在忘记凭一个命令竟有三千人被屠杀这样的事件……这种似乎难以置信的事件，恰恰发生在最平常的、每日的现实生活中。

这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而且我的小说也提供了军队用子弹杀人时所根据的命令的号码，提供了签署命令的将军的名字和他的秘书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就写在那里。事件在国家的档案里也有记载。现在人们在小说中读到了它，却认为是夸张……

《百年孤独》的叙述方式

无论是最平常的事情还是最有影响的事情，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装在了我的头脑里，因为那都是在我出生的地方和外祖父母抚养我的家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镇子[①] 和加勒比地区的任何一个村镇一样，房子是那些房子中的一幢，外祖父母跟镇上的居民一样迷信和轻信。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却有一种神奇的命运：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外祖父母一夜之间就死了，白蚁已经把房子摧毁，镇子一贫如洗。仿佛一阵破坏性的大风从那里席卷而过。

我一明白什么叫故事——这事大概发生在我 12 岁的时

---

① 指作者的故乡阿拉卡塔卡镇。

候——，我便知道在那场大规模的悲剧中存在着可以用来写一部无所不能的长篇小说的材料。17 岁的时候我想写它，但是我很快就发觉，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叙述的的事情。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看来是真实的事物和看来是神奇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因为在我试图表现的世界上，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但是需要一种令人信服的调子。由于语调的可信性，使得不那么可信的事物也变得真实可信了，并且不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此外，语言也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真实的事物不会由于它是真实的事物而使人信服，而是由于讲述它的方式。直到我生活了二十年，写了四本习作，才发现解决办法就在问题的根子上：我必须像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进行叙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即使老天蹋下来也不改变的平静的神情，任何时候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事情，无论是最轻浮的事情还是最可怖的事情，仿佛那两位老人知道在文学中除了自信而外没有更自信的事情了。

此外，这种借助日常事物表现神奇现象的方法——这是骑士小说的伟大发现——，有一个好处，就是同时也使我解决了语言问题，因为一次以一种方式讲述的真实事物，每一次以同样的方式讲述时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必须用我外祖父母讲故事的语言，简单地讲故事。拯救全部的词汇和一种讲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中已经过时的、几乎永远丧失的事物的方式，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应该无所顾虑地利用它们，甚至付出公民的一定勇气，因为总是存在受伤害和

有点不合时宜的危险。为了正视多情善感、虚假的情感、做作的举止、道德上的骗局和骇人的历史谎言——这一切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在文学中却不敢成为真实的——，这样的勇气是必要的。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我感谢。他对我说，《百年孤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了它，而在于敢写它。

《百年孤独》具有不同的层次，我却没预料到。批评家们以这种方式读它，律师们用另一种方式读它，女佣人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读它。关于这部作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评论。帕科·卡米诺说："这是关于一个多事的镇子上的一个很古怪的家族的故事。"马西尔则对记者们说："我正在读《百年孤独》"。

我们关心的是写小说，而不是出版它，请记住厄内斯托·海明威的话："整本书写完后就像一头死掉的狮子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部小说是有点难以置信的。我如果不自卫的话，我就可能变成一架衰老的机器。我不允许我的朋友们谈论这本小说。我记得在加拉加斯时，小说刚发表不久，激起了一阵爆炸性的热情。我的朋友们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我倒是参加了，但是我让人写了一张牌子："禁止谈论《百年孤独》"。

想象的自由是可怕的。现实使想象变得理智起来。寓言的功能已经丧失。西班牙人在把作品变成神话后，这种功能就没有了。

有一次我曾说,《百年孤独》就像是我嵌在我以前的作品中的七巧图的基础。所以,关键的东西存在于早期的作品中。

文学创作漫谈

我为什么写作

我是偶然开始写作的。我写作，仅仅是为了向一位朋友证明，我这一代人是能够产生作家的。后来我掉进了为了爱好而继续写作的陷阱。再后来又掉进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陷阱，而现在，我正面临着掉进世界上最危险的陷阱的危险：即向不足一年来买我的小说的几十万读者证明，这部作品[1] 并非像某个批评者说的那样是瞎猫碰上死老鼠，而仅仅说明我花了许多年才学会了写作，现在我仍然有精力写其他作品。

我已证明，我不是为了赢得批评家们的掌声而写作，也

---

① 指《百年孤独》(1967)。

不是为贪心的出版商们写作：十五年来，我出版了四部作品，一共售出了大约五千册。但是我仍在写作。说实话，我写作只是因为我喜欢向朋友们讲故事。

有时我却觉得，当作家还不如死了好。最不幸的是，在一块不习惯产生有成就的作家的大陆上，一个没有才能取得文学成就的人出版了一本像香肠一样销售的小说。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愿意把自己变成新闻人物，我讨厌上电视，讨厌出席作家代表大会，做报告，参加知识界的活动。我千方百计把自己关在距离读者十万八千里的房间里，与世隔绝。但是我的私生活还是少得可怜：我的家总像个公共场所。

但是，我不能不接受记者采访。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曾当过多年记者，倘若我拒绝一名记者采访，我觉得那是背叛。其次是因为这次是同委内瑞拉记者会见：我在那里生活过，我对那里的朋友、那里的人和我在那里的愉快的与可憎的往事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我觉得加拉加斯是一个可怕的、不真实的、冷酷的城市：第一次是在1958年，它用飞机轰炸迎接我的到来；第二次是在去年（1967年），它又用地震迎接我。第三个原因是我认为最终结束这许多无益的会见的最佳办法是让采访者纷至沓来，直到使全世界的人都对我感到厌倦，不愿意再把我当话题为止。

新闻工作和电影

我从事过这两种职业。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采访记者，这是讲述刚发生的事情的最好的职业。但是我的工作干得如此出色，报刊的负责人不是提升我担任社论撰写人便是让我当编辑部主任，以便为我加薪。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反倒让我坐在写字台后面感到无聊之极。不过，并非是新闻工作硬把一种贫乏的语言加在作家头上。问题在于报刊的负责人总是把采访记者放在学艺的位置上；而当他们真的掌握了本领、语言再也不贫乏了，却又让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世界，办公室更容易培养议员而不是作家。

但是电影的问题是，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创作。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在制片人的桌上读了十遍，被迫全部修改了十遍。最后，我的原始故事只剩下一个两分钟的镜头：一个刺客在织一双袜子。所幸的是，电影拍得还不错，但是它和我的故事的相似程度是难以理解的，就像兄弟俩，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一样。这些经历向我证明，作家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

我一向认为，电影由于具有强有力的视觉效果，它便成了一种完美的表现手段。在《百年孤独》以前出版的我的一切作品都似乎由于没有把握而显得笨拙了些。在那些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对人物和场景的视觉化的过分努力，一种在对话

和情境之间的微弱联系，甚至存在一种指明角度和取景方法的癖好。然而在从事电影工作的过程中，我不但明白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也明白了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认为，形象对其他叙事因素占有的支配地位确实是一个优势，但也是一个局限。对我来说，那一切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发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小说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电影方面的经验无庸置疑地开阔了我作为小说家的视野。

另一方面，我从新闻方面学到的东西并不是某些批评家说的“经济而直率的语言”，而是一些能够使读者相信我讲的故事合情合理的叙述方法。只要能够使读者相信，你怎么讲述都可以。一般来说，以眼前的现实因素为基础，采取某些新闻工作的技巧，是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我相信，一位《百年孤独》的读者，倘若没有那些白床单，他是不会相信俏姑娘雷梅迪奥斯飞上天去的。读者之所以相信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升离地面十公分，那时因为他喝了一杯巧克力饮料。想一想其他任何一种饮料，你就会明白，喝下去是不会上升的。我认为，这些令人信服的判断是新闻工作的方法。

我的作品受的影响

批评家们固执地坚持说我的作品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竟被他们说服了。实际上，当我偶然读到福克纳的作品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我

想弄明白批评家们所谓我接受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去美国南方旅行时，我才相信找到了书本里确实找不到的答案。那一条条尘土飞扬的道路，那一座座炎热而贫困的村镇和那些感到没有希望的人，非常像我在短篇小说中描写的。我认为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我出生的那个镇子，大部分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建造的。

我并不厌恶福克纳的影响，相反的，我应该把此事理解为一种荣誉，因为福克纳是一切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问题是，我不甚明白批评家们所说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事实上，一位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的作家总是设法不和任何人的作品相似。更确切地说，他会竭力避免模仿他所喜欢的作家。

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并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只有一些比其他作品更喜欢的作品。我每天喜欢的作品也不一样，而且我之所以喜欢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写得多么好，而是因为各种不同的、总是难以说清的理由，譬如我可以列一个书单。它们是索福克勒斯的《埃及王》；《阿马迪亚·德·高拉》和《托梅斯的导盲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皮加费塔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劳斯的《人猿泰山》和其他两三种。我不知道对批评家们可能意味着什么。说实话，许多年来我就不喜欢福克纳了。一般说来，我是讨厌小说的。几年来我只喜欢航海纪事。

小说是对世界的猜测

一切好小说都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批评家们主动而勇敢地担当起了破解这种猜测的任务，应该欢迎他们去做。当然我不是指《百年孤独》中那无数带有个人色彩的暗示。那些暗示只有我的亲密朋友们能够发现：每个日期都和某个人的生日相对应，某个人物会具有和我妻子一样的性格，某个人物想给他的孩子取跟我的孩子们一样的名字，以及其他千百件事情，简单地读小说是不可能发现的。但是相反，使我吃惊的是，竟然谁也没有指出作品出版后我自己发现的 42 处矛盾中的任何一处，也没有人发现意大利译者替我指出的六处严重错误。在再版和翻译的作品中，我都没有去校正，因为那样做是不诚实的。

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位批评家，只要他不放弃教皇的面孔，只要他还从“这部小说完全缺乏严肃性”这个再清楚不过的基础出发，他就不可能使他的读者对《百年孤独》有什么真正的看法。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因为我厌恶那许多卖弄学问的短篇小说，那许多顺从天意的短篇小说和那许多不是试图讲述故事而是企图推翻政府的长篇小说；我厌倦我们这些作家板着严肃的面孔，自以为举足轻重。那种权威般的严肃性迫使我们避而不写多愁善感、戏剧般的感情、做作的情绪、道德的骗局和其他许多东西。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实的，在我们的文学中都不敢予以正视，看看吧，那

么多年我们一直写那种用心良苦的文学作品，可是我们没有通过它推翻过任何一个政府。相反的，我们却闯进了非法小说的书店，我们陷入了任何作家和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原谅的境地：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读者。现在，我们以一种不那么傲慢的职业观，又开始赢得读者了。

作家的职责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不妨从目的说起。我相信，世界迟早将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我希望如此，并且希望早日实现。不过，我同样相信，可能推迟这个过程的因素之一是那种低劣的文学。然而我个人关于人们所了解的社会小说——介入小说的最高表现——的保留态度是基于那种不完全的、排他的、摩尼教的特点，它使读者局限于一种对世界和生活的狭窄的视野。这类小说在我们拉美国家的失败，使我们有资格这样想：拉丁美洲的读者，虽然不能表达，但是早已意识到了那种局限性。所以，怀着那么美好的愿望试图表现我们大多数人的可怕的政治与社会悲剧且仅仅表现这种悲剧的作家的极其可悲的处境就是他们变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没有人读他们的作品。萨特说过，为了让法国人记住被占领的恐怖，只要描述一下德国乐队在一座公园里举办的音乐会就够了。我认为这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认为，拉丁美洲的读者并不需要作家们继续向他们描述他们自己受压迫和受欺凌的悲剧，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有认识，且已亲

身遭受。他们企望于一部小说的，仅仅是为他们揭示一点新东西。

我认为，为了让拉丁美洲人生活得更好，我们更有效的贡献不是写那种刻意求工的、没有人喜欢读的小说。而是写一些好小说，对于那些自己觉得应该善意地向我们指出写作标准的朋友们，我想让他们明白，那些标准限制了创作的自由，而限制创作自由的一切东西都是反动的。总之，我愿意让他们记住，一部美丽的爱情小说不会蒙骗任何人，也不会推迟世界的前进，因为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有利于人类进步的，而今天的人类，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进步。总而言之，我认为作家的革命职责是把作品写好。这就是他的介入。

现实与想象

我能够确信无疑知道的只有一点：现实不仅仅表现在西红柿的价格上。日常生活，尤其在拉丁美洲，总在说明这一点。美国人 F.W. 厄普·德·格拉夫于 1894 年在亚马孙世界做过一次著名的旅行。在众多东西中，他看见一条小河在沸腾；有个地方，人的喊声能引起一场瓢泼大雨；还有，一条长二十米的森蚺浑身落满了蝴蝶。陪同麦哲伦做第一次环球旅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见过一些不可思议的植物、动物和人的足迹。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关于它们的消息。在阿根廷南方一个名叫科莫多罗·里瓦达维亚的荒凉地方，南极风把整整一个马戏团卷上了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上来的

不是海鱼，而是狮子，长颈鹿和大象的尸体。就在几个月前，早晨八点钟一名电工叩我家的门，刚把门给他打开他就说："你家的熨斗的电线该换了。"但是他立刻明白他敲错了门，道过歉，走了。几个小时后，我妻子把熨斗的插头插入插座，电线竟着了火。无需举更多的例子了。只要看看报纸或睁大眼睛观察，就会不由得像法国大学生那样惊呼："想象的力量多大啊！"

这块大陆的绝大多数事物，从餐勺到心脏移植，在存在之前人们就想象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以前就存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想象中了。佩罗格鲁略的那些真理富有诗意，它们使我们相信，地球可能不是圆的。只是在许多人考虑到时代的利益而想象地球是圆的时，它才开始被认为是圆的。我相信，正是这一系列没有理性主义偏见的考察为我们的小说开辟了光辉的未来。但是千万不要相信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或迟或早，现实总会认为想象是有限的。

我的短篇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描述的是教皇到一个哥伦比亚村镇做的一次不可想象的、轰动一时的旅行。小说发表十一年后，教皇去了哥伦比亚。更有趣的是，当我写这篇故事时，当时的总统身材又高又瘦，我写得却是又矮又胖，脑袋还秃，以免影射之嫌。但是不幸的是，现在欢迎教皇的这位总统恰恰是个头秃的矮胖子。还有一件事：费尔南多·比达尔·布西是南美出版社的经理，他在丛林深处看见一条被遗忘的船并拍了照片。最后一件事是：我这里有一篇来自巴兰基利亚的报道，报道讲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大胆泄露

说，他比其他男人多长了一件东西：一条猫尾巴。

我认为，问题在于受过中世纪的疯狂想象训练的骑士小说作者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故事的效果。如果他们需要将骑士的头砍掉四次，就把骑士的头砍掉四次。这种惊人的想象力居然如此深入那时的读者心中，它成了征服美洲的标志。要找到黄金之路和永恒的青春泉只有在想象自由的美丽世界中才有可能。不幸的是，拉丁美洲竟然如此迅速的忘记了这些绝妙的源泉。直到四个世纪后的今天，才由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找到已经中断的传统的源头，引起了人们对骑士小说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罕见相似的注意。

形象与写作

我的一切故事的源头总是一个简单的形象。我认为我的最优美的短篇小说《午睡时刻》的全部故事来自对一位穿黑衣服的妇女和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打着伞在一个荒凉的镇子上顶着炎炎日行走的情景的幻觉。《枯枝败叶》的复杂故事源自对我自己小时候坐在客厅角落里一把椅子上的情形的回忆。关于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所受的启发，最初是在巴兰基利亚的鱼市上看见一个男人在观望船只，许多年后我自己又在巴黎经受过一次焦急等待的不安心情。我把自己同对那个男人的回忆联系起来：于是我明白了等待是一种什么心境。许多年间，关于《百年孤独》的创作，我只记得一

位老人带着一个男孩去认识一个马戏团作为稀奇的东西展示给人们看的冰决。关于现在我正在写的小说[1]，许多年来唯一的形象是一位不知不觉衰老的男人在一幢到处是动物的宫殿里的许多大厅中踱步。这些原始形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关于我写最近一部小说[2]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十七年；这个想法既然如此牢固，我就不能不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构思了很久，我能够反来复去地多次讲述它，就像我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样。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写第一段。为了写第一段，可能要花许多个月份，甚至许多个年头，直到把它写好为止。只有写好第一段后，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应该写下去，应该采用什么风格，应该写多么长，需要用多少时间。

我每天写作，包括星期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在一个又安静又暖和的房间里写作，因为喧华和寒冷会让我感到心烦。在写作期间，我每天吸四十支黑烟，其他时间再设法解毒。大夫们说我是在自杀。但是我认为没有一种折磨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种自杀。另一个情况是，我总是穿着机械师的长工作服写作，部分原因是穿这种衣服比较舒服，还有一部原因是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束手无策而必须站起来思考时，我便用螺丝刀安装和拆卸家里的门锁和电线接头，不然就用鲜艳的色彩在门上涂画。

如果写的是短篇小说，一天写一行我就觉很满意；如果

---

①② 指《家长的没落》(1975)。

是长篇小说，我就努力写它一页。一般来说，越写就越是得心应手。所以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热情好客”：只须开一次头。而写短篇小说的开头和写长篇小说的开头花的工夫一样。有时我可以多写一点，但是我知道第二天，已经进行了很好的休息后，写作会更加顺利。在写作期间，在写《百年孤独》的十八个月里，白天黑夜我没有一分钟想别的事情。我总是和最亲密的、最通情达理的朋友们谈这部作品，但是一行字也不给他们读，也不让他们读，不让他们动我的初稿，因为我思想迷信：那样的话，工作就会永远白费了。

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

关于艺术创作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要讲的问题，我得从一个定义谈起。但不知这个定义是不是太具有个人色彩了。我认为，创作思想就是创作者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决定和影响艺术创作。问题是有些作家、电影导演和一般艺术家都不怎么相信他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他们每走一步都要竭力地说明他们想表现的思想是什么，从而创作出了不会让人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任何疑义的完美故事和章节，却忽略了诸如什么是创作、什么是主观世界的表现这样一些重要问题。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介入艺术"方面，这种艺术最终创造的与其说是真正的艺术品，毋宁说是灌输思想的教科书。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并不担心会出现这样

的问题，因为我有自己的世界观，我看到了世界，我会设法描述我看到的世界和如何看它的。我相信，其中的思想是不言而喻的。不但不言而喻，而且这一切是由思想决定的。所以凡是将自己的思想隐藏在文学创作或一般艺术创作中的人们，都不要担心自己有什么错，因为不管怎样，思想是能看到的，是会表露出来的。比如说一个法西斯分子，他竭力辩白说作品中写的不是他，但在某个方面他有所表露，不管怎样，他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的。所以我并不怎么担心，因为在我写的东西中，人们可以非常具体地看到我的思想。我总是竭力忠实地对待我所讲述的一切，竭力忠实地对待我所反映的世界并与之保持联系。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我的作品含蓄地表达了我的思想。

原始形象

我的故事的来源几乎总是一个形象，一个这样的形象；其结局几乎从来和故事的结尾没有关系。

但是奇怪的是，在《埃伦蒂拉》中，原始形象实际上原封不动地存在于整个故事中。这事发生在许多年前。那时我在上中学，年龄只有十四五岁。我在一个镇上看到一个流动妓院。就是说，有一位妇人，一个拉皮条的女人，她把一个地区的各个村镇主办的节日活动排了个队，然后带领一个妓院，即一群妇女，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招揽生意。有时她们安置在像马戏团架的那种帐篷里，里面隔成若干个小房

间；有时只租一间很大的房子，相当于一个帐篷。有一次我看见人们排成一个比平常的队长得多的队，打听出了什么事。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只用一包糖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被一个小店主糟蹋了。那个妇人把她招进了妓院，使生意变得非常兴隆……实际上，她成了这个流动妓院的名妓。当时那副情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拉皮条的女人变成了祖母。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考虑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把它看作一个视觉故事。一开始我就认为它是一个专门为电影准备的故事。所以我不应该试图让它来个文学再现。因此，我最初把它写成了一个电影剧本。起初是电影脚本，而不是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你想想看，光酝酿就花了差不多二十年，从第一次试图把它拍成电影到电影拍成又用了十二年，当然……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了。

改写成文学作品

后来，电影剧本《埃伦蒂拉》改写成了小说，因为写小说总比拍电影容易一些。电影剧本完成后四年过去了，一直未能拍摄。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感到绝望了。如果仅仅由于我坚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而不能写成文学作品致使它不能为人所知，那是很遗憾的。于是我坐下来把故事改写成了小说。但是实际上我做的，并不是以文学的角度来处理，而是对电影剧本进行的一种文学改写。也就是说，几乎整个过程

都和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反，因为这是把电影剧本改写成文学作品。倘若我必须重写这个故事并真正作为文学构思来对待，我不禁自问这样做是不是和改写完全不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两者大不相同。因为在改写成的小说中几乎可以看到摄影机的移动、镜头的剪接和我在写电影剧本时考虑过的一切电影因素，我没有花工夫划掉或取掉它们。我可以更确切地对你说，这是电影剧本的“文学化”，而不是对同一个故事做的文学性的描述。这就是电影与文学之间的不同点。对我来说，这种不同是很清楚的。《埃伦蒂拉》的例子非常典型。过去有一个例子，和《埃伦蒂拉》情况完全一样。那是格雷厄姆·格林的《第三个人》。他本人在前言中谈到了最初的情况，后来怎样和导演（奥森·韦尔斯）合作，最后又怎样决定把电影剧本写成了小说。当你看到电影并读过小说后，就会明白电影和文学之间有很大区别，明白二者之间确实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但它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品类。

电影的独立

这一点我在别的场合讲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只要未能从文学中摆脱出来，电影就不能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艺术。目前这种依赖性非常严重。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文学基础就不能拍电影。这对电影的独立存在来说害处是相当大的。当然，这个问题在美国更为严重。美国的导演或者大多数导

演不参加也无需参加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剧本是由作家和制片人写的。导演不过是最后照规定的镜头拍片的摄制者。他几乎不能偏离剧本的规定。在欧洲，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电影的初期，由于电影的摄制制度不像好莱坞那么严格，那么"专业化"，所以导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只要导演不具备制作"他的影片"的条件，就是说，亲自构思它，按照注意事项拍摄它并在摄制过程中真正进行创作，那么电影就只能是一种依附于文学的艺术，我认为这很不好。

不要混淆种类

无论电影、文学还是戏剧，彼此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品类。应该加以区分。由于不加区分，就造成了这种现象：每当出版一部看来非常好的小说，制片人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把它拍成影片。这也如同我们这些小说家一样，每当我们看到一部很好的影片，总要设法取得它的版权，以便将它改写成小说。好莱坞有时就这样做。他们签订一份把故事拍成电影的合同，然后再签订一份把电影故事改写成小说的合同。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把一个为电影写的原始故事的版权卖给了好莱坞一个制片人，他希望在合同中包括拍完片后根据电影写一部小说的权利，但不是让我写，而是让专门把电影改写成小说的人来写。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堕落，艺术上的堕落现象。我反对

这种方式，反对每出现一部好小说就要把它拍成影片的做法。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是不是错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一部好影片是由哪一部好小说改编的，然而我确实记得有许多很好的影片是从拙劣的小说改编的。

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一向反对把它们拍成电影，因为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差别。比如《百年孤独》……我更希望读者继续想像书中的人物，想象成他们的叔婶、他们的祖父祖母或者他们认识的和理想化的人物，同时创造我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形象。我认为，故事一旦被搬上银幕，它就会大逊其色，而形象在强加给观众时会比书中的文学更有影响力。它会对观众说："不，请注意，人物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而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演员的面孔。"我认为这就完全破坏了小说的文学价值。

我有讲故事的爱好。这是我真正的爱好。所以，我既在电影上讲，在报纸上讲，也在小说里讲，但是每次都是根据各自的种类讲，决不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当我的电影导演朋友们要求我把我的某本书改编成电影时，我便对他说"不行"，这些书是文学，不要去改变它们。如果你们希望我们一起拍电影，现在我就有我认为更适合拍电影的故事，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们拍成电影。

但是不管怎样，如果一位导演非要把我的文学故事拍成他的电影不可，那他就是继续坚持要电影附属于文学。我认为必须反对这种作法，因为这样做对电影没有好处。

现 实 主 义

一位美国女作家新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她访问萨尔瓦多的书。开头她说，刚到这个国家时，她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后来她发现，实际上他是一位社会现实主义者。

这和我讲厌了的问题不谋而合：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特征。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物，而对我们来说都是每天的现实。但是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由衷地相信这样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和理性主义者划定的现实的范畴相去甚远。理性主义者在所到之处发现某种事情正在发生，甚至看到了它，他们知道它存在着，但是却否认它的存在，因为这和他们的原则不相容，因为它打破了他们的界限，于是他们说这有点神秘，需要一种科学的解释。因为他们的理解方法比我们狭窄得多。我们接受了各方面的影响，正像人们说的，我们是由全世界的残渣构成的，所以我们的视野比他们宽阔得多，我们的接受能力也宽广得多。所以，我们认为是现实的、真正现实的东西，他们便认为是神奇的，并且为了进行解释而找到了神奇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说法。而对我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我自认为，我是个社会现实主义者。我不善于做任何想象，不善于虚构任何东西，我只限于观

察，把看到的东西讲述出来罢了。

血为什么是绿色的

在我前面所谈的问题谈完后，除了把这件事强调一下我没有别的可说：祖母的血液是绿的……因为它是绿的。祖母死时我们发现她的血液不是红的，而是绿的。我认为，按照我们日常的逻辑，按照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像祖母这样一个有种种与众不同的特点的女人，身上有绿色血液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我们要有勇气讲述它或描写它……只要我们能够讲得让人相信就行。因为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你能不能讲述你想讲的东西，只要你能让人相信你讲的东西就行。当你说这血是绿的时，是因为你已经认为它是绿的了。你从没有对我说过："这是荒谬的"，因为谁身上也没有绿血液。你只是问我为什么血是绿的，而你既然认为它是绿的……那它就是绿的。关于双重阅读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有意识地这么做，我只是相对我们的现实做这种富有诗意的再现。我发现我的作品中并存着不同水平的阅读性，我认为就是由于这一特点才使得出租汽车司机和科学院院士都能读我的作品。

爱情与死亡

为了获得自由，埃伦蒂拉采用了一切手段。为了达到目

的，什么办法她都用。这一点在小说中没有怎么掩饰。为了达到自由的目的，她甚至利用了爱情。埃伦蒂拉所追求的是不惜任何低价得到自由。她不杀人，因为她也许认为杀人不如爱情那么容易摆脱。作为一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爱情要比死亡强大得多。所以她不会玷污自己的双手。

接受的影响

一个人可以借助其他作家的作品学会写作。我常说，一个人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学会写作的。教一个人写作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其他作家。

比如说，福克纳的世界，福克纳笔下的地理和文化世界，就和我的世界，至少和我喜欢描述的世界有许多的联系。不应忘记，福克纳实际上是一位墨西哥湾作家。我则把他看作一位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他教给我的是一种美学。对我来说，美学就是用来歌唱的声音。他教会了我应该用什么声音来歌唱这个世界。在授予福克纳诺贝尔奖时，恰恰是在我分析了解他的世界以便我学会解释我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影响很可能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比较明显。奇怪的是，现在我不再读他的作品了，原因是最初我读他的作品是出于需要，今天我却觉得他的许多东西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另一位教会我应该用什么声音歌唱加勒比世界并给我很大帮助的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他不是我们的作家，而是一位自愿来到我们这儿的作家。他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的

情况看得很清楚，他教会我们如何认识热带地区，如何了解加勒比海世界。

至于鲁尔福……他才是一位属于我们的世界的作家。但是对鲁尔福，必须十分慎重。《佩德罗·帕拉莫》是一部比迄今为止我们对它做的一切评论都要深刻得多、神秘得多、重要得多的小说。鲁尔福是我知道的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在《佩德罗·帕拉莫》中让人真实而不可避免地感到，他已经死去，然后又回来给我们讲故事。对我来说，这具有决定意义。

再谈电影

我曾被爱好的选择问题所困扰。我学过法律，后来中断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当电影导演，甚至我一生学过的唯一专业就是在罗马的电影实验中心学做电影导演。我学完了全部课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因为电影不仅要依赖文学，而且也要过分依赖工业器材，文学却不那么依赖它。所以我感到，一个人仅仅把电影作为表达手段，的确非常困难，于是我便留在简单而孤独的文学之中了。

故事写完后的故事

克洛蒂尔德·阿曼塔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在小说的某个章节里突然叫道：“上帝啊，我们这些女人在世上多么孤独哟!”罗莎娜·罗桑达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在一次新闻采访中她问我是怎样得出那个结论的。“你从何时知道的?”这是她提的具体问题。没有一位记者让我那么费心地思考过我的某个人物的表现，尤其没有一位记者在那样的场合像罗莎娜·罗桑达那样迫使我那么认真地思考我的作品中——也许还有我的生活中——女人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许多批评家谈的不但比他们应该谈的还多，而且甚至也比他们知道的还多。

克洛蒂尔德·阿曼塔这个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从头到脚是我虚构的，因为我需要她和主要的女主人公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取得平衡。克洛蒂尔德的性格是我随着写作、根据难以预料的情节的曲折性一步步构思的。我一向有这样

的直觉：现实中的罪行难以避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像她那样的女人，有一个时候我很希望能在小说里避免它发生。然而，我每一步都意识到，为了避免罪行发生她唯一能够做的是请求别人帮助，而帮助她的那些人几乎总是男人。这是一个现实，不仅在小说中是这样，在镇上的社会环境中也是这样。在悲剧结束的时候，我个人不无惶惑地发现，克洛蒂尔德·阿曼塔无力阻止不幸发生，原因就在于此。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叫道："上帝啊，我们这些女人在世上多么孤独哟!"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她说的，尽管这件事情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难以理解。然而，我相信，她和我同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发现这个问题时我们意识到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能力理解它。这就是几个月前在罗马的《宣言》报上发表的一篇访谈录中我对罗莎娜·罗桑达的回答。

这部作品的一位最早的读者对我说："小说写的不过是女人们的一件丑事。"另一位读者向我指出："这是年轻人的一幕悲剧，因为实际上小说的任何一位主人公都不超过25岁。这位读者相信自己懂得，这部作品是一个证明，证明成年人的偏见决定了悲剧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相信，女人的参预对悲剧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符合我的这一信念：大男子主义是母权制社会的一种文化产物。在阴暗处导演悲剧的人是安赫拉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这种事，在现实中当然不会发生——我相信她那样做不是由于命运，而是因为她认为家庭不能在社会的唾弃下生存，她的儿子们不

能不洗刷耻辱。很久以后安赫拉才在里奥玡哈港的饭店里明白了这个真理。当时她回去看望抛弃她的丈夫，发现她对他的爱高于一切，她明白她母亲是不幸事件的唯一的罪人。直到这时，她才看出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一个对自己的缺点执迷不悟的可怜女人”。不管怎样，在我看来，对那个社会的不公平和贫困落后暴露得最好的事实是，镇上最自由的、实际上也是唯一自由的女人是有名的妓女玛丽亚·阿历杭德里娅。

罗莎娜·罗桑达感兴趣的另一个方面是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其实，我从来也不把不可避免性作为决定的因素而感兴趣。在《记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类似不可避免性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机械的叙事要素。就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写的那样——尽管在一部希腊悲剧中显得古怪——，其本质并非事件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人在寻求其身份和命运的过程中发生的悲剧。

在我的小说中，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发现和展示一系列几乎是无限的既细小又接连不断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使那场荒唐的杀人案在一个像我们的那种社会里得以发生。一切本可以避免。之所以未能避免，原因在社会，而不在命运。罗莎娜·罗桑达不只是同意，而且也许还阐释了最令人不安的关键问题。“这不是命运的悲剧”，她对我说，“而是责任心的悲剧。”不只于此：也是集体责任心的悲剧。我甚至相信，小说终将使命运注定一切的神话威信扫地，因为小说试图从它最基本的部件开始拆毁它，证明我们是自己的命

运的唯一主人。

每当我回忆起不幸事件在现实中发生的那个不祥的日子，我便觉得上面讲的那一切更加明显。我不是现场的目击者，但是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非常了解那几个主人公。归根结底，镇上的所有居民都是主人公。我还记得，当我得知不幸的消息及其细节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愤，因为考虑来考虑去，我还是认为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从这时起，我继续与之交谈的所有见证人都不断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自己未能阻止不幸事件的发生。我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出了为他们那一天的行为辩护的强烈欲望，我相信在他们那种欲望中看出了一定程度的惭愧心情。我认为，造成他们思想麻痹的因素是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仰：那种依照成规杀人的罪行是一种在社会上合法的行为。

巴亚多·圣罗曼和被他休弃的妻子回来时的情况，和小说中写的也不同。我应该承认，在这种情形下，现实更具有教育意义。看上去，一切都不过是事件发生几乎20年后在目击者中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根据这个说法，丈夫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便和被他休弃的妻子回来。是她不愿意接受他。毫无疑问，对她和她丈夫来说，岁月流逝的速度不同，岁月流逝的紧张程度也不同。不过，那时使我感兴趣的是，那种调解的尝试——也许是那些目击者自己想出的——立刻在还活着的人们中间传播开来，这些人传播那种说法，好像这已经是铁的事实：年迈的夫妻重新和好，将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也许他们觉得，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和好，因为就像

集体所犯的过错的结局一样，仿佛我们大家造成的不幸不仅可以得到弥补，而且能够从社会的记忆中永远抹去。对大家来说糟糕的是，总是出现一个使人扫兴的家伙，此人在世界上的唯一作用是提起别人早就忘却的事情。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我作为作家的长期经验和许多年间同各种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坚持不懈的接触，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拉丁美洲的某些文化现象。只是在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混血种人。我去非洲旅行过几次，我发现那里的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同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的艺术表现有一系列相似的地方。这个证据很平常，但是它帮助我从更多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和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拉美国家的文化状况；一般来说，这就是某些不同的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既显示了一种文化的民族性，同时也显示了它的多元性。这种不同文化联系的融合现象不知不觉或无需察觉地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但是写小说时，我对所有这一切多元文化因素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它们是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起作用的。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作品虽然包含着在写作过程中渗入的混合文化因素，但我事先并没有作此打算。拉丁美洲有各种混合

在一起，在整个大陆传播的文化因素，这为拉丁美洲带来了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大陆原有的，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的各种土著文化基础上，又增加了西方文化、非洲文化和某些东方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认为还存在一种可以称为“哥伦比亚文化”或“墨西哥文化”的文化。我早已不再认为和觉得自己仅仅是“哥伦比亚人”。我更觉得自己是拉丁美洲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为成为拉丁美洲人而感到骄傲。我认为，以西班牙征服美洲的事件为出发点来评价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一种虚假的前提。这个前提恰恰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昔日的西班牙总督统治下形成的这些国家，是我国人的专横决定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需要。在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桎梏的时期，在十八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一位勋爵在伦敦议会上断言：“拉丁美洲已不属于西班牙，现在它属于不列颠了。”我们必须考虑美洲被征服以前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许多问题。拉丁美洲各国之间所划的国界，只是为了便于统治。每逢需要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便高涨起来。当然，这只会使我们的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妨碍我们一起了解和体会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潜在的一致性。此外，这对提高我们的意识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而这种意识是很需要的，它可以使我们以适当的和积极的方式采取行动，以便为我们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状况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才能摆脱实质上是殖民地的，根深蒂固的

前提，避免滋长某种夸张的、消极的、同我们的社会与历史前提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比觉得仅仅是“哥伦比亚人”、“秘鲁人”或“巴西人”更重要。

不过，我认为还不能说目前存在那样的拉丁美洲文化。我们大陆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在加勒比地区就存在着非洲文化的全部重要贡献，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和拥有大量印第安居民的秘鲁和墨西哥等国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这一现象可以在拉丁美洲好几个国家看到。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同加勒比地区文化方面的联系比同安第斯山地区（它包括这两个国家）的印第安文化和联系更为密切。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岸地区和山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整个大陆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多重因素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拉丁美洲整个文化的基础，并使之具有了它自己的独特性、个性和对世界其他文化来讲它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文化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就像葡萄牙文化对巴西一样。西班牙文化存在于拉美生活的一切表现中，西班牙语便是我们讲的语言……在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化的存在是强大的。它的影响达到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因素。但是的确，它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因素，往往受到忽视。西班牙文化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现在有一种对拉美存在的一切西班牙的东西感到羞愧的虚伪感情。我认为这是过分的、危险的，它使我们的情况变得复杂了。与此

相反，我为这种贡献感到骄傲，绝对不感到羞耻。今天，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已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在本大陆的文化方面的具有的多样性，并表现了其深刻的混合特点和其渊源的一致性。拉丁美洲是由欧洲的残渣堆积成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种复制品。拉丁美洲是不同的另一回事。

我写作成那些作品的愿望是来自怀念，怀念我的国家，怀念我的过去。我的童年不同凡常，那时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的脑海里装满了他们在那种着魔般的、活动着鬼魂的现实中亲身感受的迷信观念。我外祖母在晚上以世界上最自然的方式给我讲述令人恐怖的故事。我外祖父是个非凡的老人。对他来说，时间和记忆好像停止了。我非常爱他。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八岁，完全无依无靠。他给我讲述他经历的一切和久远的过去在镇上和国内发生的一切，还给我讲述他参加过的战争的详情和香蕉园的大屠杀。那些大屠杀发生在我出世的那一年，在哥伦比亚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母亲非常可爱。我们兄弟几个在家里，每当有一个兄弟乘飞机旅行，他就燃上一根蜡，进行祈祷，祝我们一路平安。但是当我们不全在家的时候，她也总是点着一只蜡让它不灭，因为说不定我们中间有人会坐飞机旅行。我家的每个人对我都很重要，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的作品的背景中，我从来不忘记我是阿拉卡塔卡邮电所一名职员的儿子。

加勒比是一个能够使人类、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彼此之

间和谐共存的地区。那时我住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沼泽地区的热带丛林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小镇上。在那个地方，只有植物的气味毁坏人的肠胃。在那种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同周围的事物有着神奇的联系。大海具有一切可以想象的蓝色，飓风把居民的住房卷向天空，村镇笼罩着尘土，热气充斥一切可以呼吸的空间。对加勒比地区的居民来说，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悲剧都是家常便饭。此外，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非洲文化、奴隶带来的同大陆的印第安文化交织在一起的神话和西班牙文化的强大影响；尤其是安达卢西亚人的想象力，它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念，一种对生活的神奇幻觉。这种幻觉给生活周围的一切带来一种神奇色彩。这是出现在我的小说中的整个加勒比地区所独有的。

在加勒比地区，在拉丁美洲，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生活。我们认为，魔幻情境和“超自然的”情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平常的、普通的现实没有什么不同。对预兆和迷信的信仰以及不计其数的“神奇的”说法，存在于每天的生活中。在我的作品中，我从来也不曾寻求对那一切事件的任何解释，任何玄奥的解释。那一切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人们认为我的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时，这说明我们仍然受着笛卡尔哲学的影响，把拉丁美洲的日常世界和我们的文学之间的亲密联系抛在了一边。不管怎样，加勒比的现实，拉丁美洲的现实，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我认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仅此而已。

我们大陆的困难如果使我们自己、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自己因困难之大而不知所措，不能清楚地观察现实，那就很容易认为欧洲——沉醉在自己的文化景观和幻觉中的欧洲——掌握着用来表现我们的适当的方法。不难理解，欧洲人作为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仍在竭力用他们自己看问题的方式来评判我们，而不注意另一些区域的不同生活，不考虑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来说需要过舒适的生活、需要有自己的地位也是一种充满活力、富有戏剧性的现实。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如果用别人的图表解释生活，就只能导致更可怕的误解，使人们愈来愈陌生，愈来愈孤独，愈来愈不自由。

欧洲应该从它过去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一种没有节制的现实使他们忘记了他们历史上的坎坷历程。谁知道伦敦为了建造城墙竟然花费了三百年？罗马的辉煌需要好几个世纪才得以巩固？是一位埃特卢里亚[①] 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罗马？谁又知道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特诺奇特兰[②] 曾是比巴黎还重要的城市呢？有着宽阔的胸怀、建设着一个新欧洲、一个更人道更合理的大陆的欧洲人，如果检查一下他们理解我们的方式，就能真正地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梦想和愿望的真正支持应该化为真正的行动，援助在世界性的分配中渴望享有自己的生活的各国人民，使世界范围内的真正联系成为可

① 意大利地名。

② 墨西哥城的古名。

能。为什么认为欧洲国家竭力在欧洲实行的办法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成为拉美各国奋斗的目标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认为拉丁美洲历史上的暴力，贫困和冲突是在距离我们的家园数千公里外策划的阴谋，似乎除了依靠统治世界的强国活命之外我们便不能想象还有别的命运。

面对目前的不平衡，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几个世纪的战争并没有削弱生活的顽强优势。四十年前威廉·福克纳就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知道了，他所担心的恰恰是一种科学上的简单假设。面对这一令人震惊的现实，在国家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一个新时代即将诞生的时刻，我认为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乌托邦为时还不晚。在那里。我们可以共享一块土地，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决定，一向受排斥的各国人民将获得新的机会。在那个世界上，彼此的支持将真正成为可能。

我没有写的那许多篇小说

许多年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那个永远迷失在梦中的人的小说。那人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和他在现实中所睡的那个房间一样的房间里。在第二次做梦时，他又梦见自己睡在和前两个房间一样的第三个房间里，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就在这个时刻，现实中的床头柜上的闹钟响起来，睡觉的他开始醒来。当然，为了醒来，他必须从第三个梦中醒到第二个梦中。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是那么小心，当他在现实的房间里醒来时，闹钟已经停止作响，等他完全醒来后，他不禁对自己的迷失产生了片刻的怀疑；眼前的房间和一次次梦中所见的那些房间是那般相似，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否认那个房间也是他做的一个梦。

非常不幸的是，他因此而犯了一个重新睡觉的错误，因为他渴望探查一下他第二次梦见的那个房间，想看看那个房间里能否找到一种关于现实的确切迹象。由于没有找到，他

便又在第二个梦中睡去，好到第三个房间里去找现实；接着又到第四个、第五个房间里去找。

从那里——他的心房已经恐惧地跳动起来——，他开始重新往回下里醒来：从第五个梦到第四个梦，从第四个梦到第三个梦，再从第三个梦到第二个梦，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他竟忘了计算梦的次数，现实竟被他忽略过去。结果，他就在其余房间里的梦中接连醒来。但这些房间已经不在现实的前面，而在它的后面了。他迷失在了长长的一串没有尽头的同样的房间里，永远在睡梦中，在无穷的梦中踱来踱去，始终找不到通往现实生活的门口。在一个永远也不能够确定其号码的房间里死去，他才得到了安宁。

我曾长久地思考，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它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亲缘关系太明显了，而且，此外，它也比他的一切故事差。然而，现在我想到它并写下来时，我才意识到，我写作——用的是打字机，面前的窗口对着整个加勒比海——的房间跟我一直想为小说中所写的梦安排的房间一样：方方正正，墙壁光滑、无色，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没有其他家具，只有一张简单的床和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一只闹钟。它不得不在每个梦中的房间里不停地作响。但是它现在只能在现实的房间里打点。

现在我在现实中看到了它，我意识到，这个故事不是博尔赫斯的，而是属于弗朗茨·卡夫卡的更古老更吓人的血统。但无论如何，我一直没有写它，也许这是它最大的功劳。

这不是我唯一没有写的小说，在文学界这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作家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从没有写的作品。也许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些比写出的作品更为优秀的作品。但是奇怪的是，这一系列受到孕育却永未诞生的、几乎无穷无尽的故事，却是作家们的一部分无形的重要的作品：这部分作品永远不会被辑入他们的作品全集。

也是在许多年间，在那篇关于迷失在梦中的人的小说之后的一个时期，我还梦想过写另一篇故事。我只记得它的题目是：《为我们送蜗牛的溺水者》。我记得在皮拉尔·特内拉的妓院里的一个喧闹的夜晚我曾对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提到过它。他对我说："这个题目太好了，甚至都不一定非写一个故事不可。"差不多在四十年之后，我惊讶地证实，他的意见是何等正确。结果，那个身材魁伟、浑身透湿、晚上一定要为孩子们送些蜗牛的男人的形象，就永远留在了没有写的那些篇小说的高阁上。相反的，我都浪费了许多光阴，一次又一次想写关于那个拆卸机器的人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件不可避免使我十分着迷的新事情：灾难。一个男人徒步来到一个手工艺人的村镇，他通过一个人寻找一个用拖拉机耕作的人。不可避免的是：拖拉机不能再工作了。不久后他又去找女裁缝，她的缝纫机也不能运转了。不同工种的一切机器也都失灵了，而他同它们的主人都有点事要办。这篇小说我写了许多遍，对固执的作家们漠不关心的守护天使才说服我：不要再坚持写它了，那是一篇很蹩脚的小说。

与此相反，我总是认为另一篇我也没有写的小说是很不错的。我指的是在卡达克斯——布拉瓦海岸边最美丽、保存得最完好的镇子——以一个狂风大作的黄昏构思的那一篇。那场烈风刮了三天后，我突然得到了令人目眩的启示：我永远也不能回那个镇子了，因为它一定会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许多年间我的故事中的人物一定曾被同样的念头所缠绕，直到一个节日之夜他来到巴塞罗那一群朋友中间。朋友们怀着用愚蠢的办法为他治疗恐惧症的好意，硬把他拉上一辆小汽车，当晚把他带到卡达克斯镇。在旅途中，由于迷信他瘫在了车上。当他在大山的弯道上终于看到那镇子的灯光时，他便奋力摆脱掉他的朋友们，跑到悬崖上跳了下去，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归途的恐惧了。

那篇关于一位姑娘的小说也永远被束之了高阁。那位姑娘许多年间一直在寻找在一座公园里奸污过她的那个陌生人。最后她自己发现，她所以要找到他，只是因为没有他，她就不能生活下去。

还有那篇关于几个阴谋杀死国王、终于用一块有毒的糖块达到目的的孩子的故事，和那篇关于几个因为不能容忍一位无所不知的伙伴知道那么多事情而把他杀死的孩子的故事。有一篇我倒是写完了：有一个男子，为了吓唬他的朋友们，他在节日里钻进了一付钢盔甲，却再也钻不出来了，结果他就在盔甲里生活了许多年，最后因年老而死在里头。当我差一点要发表它时，一位朋友偶然读了它。他使我意识到，武士们的盔甲不是一件整个儿的东西——我却一直这样

认为——，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披在身上的，就仿佛斗士们那光闪闪的服装那样。结果，这篇小说跟其他许多小说一样也理所当然地永远被淹没在那许多篇没有写的小说的大海里了。

阅读、影响和写作

1943年我到了波哥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那时的波哥大是个遥远而凄凉的城市，从十六世纪初以来一直下那种绵绵的小雨。我在希帕基拉公立学校念中学。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诗歌。在那时，我入学的时候，我就会背诵所有西班牙经典诗人的诗作。不但会背，而且能朗诵，歌唱，永远都会。此外，我也能背诵"石头与天空"派以前一切哥伦比亚诗歌。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有几个人在创作一种费解的诗。此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事情是由某个敢于举手反对父亲的人引起的。反对的是吉列尔莫·巴伦西亚。谁是这场"混乱"的激发者、这场诗歌造反运动的引进者呢？是巴勃罗·聂鲁达。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启示。我捶胸顿足，恍然大悟，我曾经热中于浪漫主义、高蹈派和新古典主义诗人的诗作，我完全错了。于是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爱德华多·卡兰萨在星

期六增刊上写的介绍其他诗人的文章。他在那些文章中强调，他们的指路明灯是胡安·拉蒙·希门内斯。但是我一直认为（也许是因为我从没有读过应该读的胡安·拉蒙的书）“石头与天空”派的年轻诗人、卡兰萨、豪尔赫·罗哈斯和卡马乔·拉米雷斯是在四十年代中期比他优秀的诗人。就在这一发现令人激动之时，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个诗派的一个成员即卡洛斯·马丁，要来希帕基拉学校当校长。他举办了几次讲座。借给我两本重要作品：豪尔赫·萨拉梅亚的《图书的神奇活力》和阿尔丰索·雷耶斯的《文学经验》。

当然，那时我写了一些模仿“石头与天空”派的诗歌。不过，都是作为课堂作业写的。老实说，如果不是由于“石头与天空”，我不敢说自己会成为作家。多亏了这个异端，我才能把如此典型而贫乏的哥伦比亚修辞抛在后头。当若干年后我重读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的诗作时，我才明白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物，一个众人不齿的诗人，他的诗一句也不可取。

后来，在我开始真正认真研究文学的时候，我才理解我外祖父母的那种古老的讲话方式、也是哥伦比亚的典型方式的价值，因为他们老是纠正你的谈话。不过，在他们那种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诗意。例如我外祖母不说哭，而说落泪；她唱过一支歌，歌中有一对情人在抱怨。我相信其中一个情人肯定是以亚历山大体的诗和十一言诗演唱的。所以我就这样写进了作品。同样，如果《家长的没落》产生的文学时代要求鲁文·达里奥出场，他就会被引

进千百次。此外，鲁文·达里奥也总是被“石头与天空”派诗人尊崇为他们的伟大领袖。所以这就不奇怪了：每当我校对我的任何一部小说清样时，看第一遍稿总是尽可能地砍掉“石头与天空”式的比喻，但是这种比喻仍然存在。

“石头与天空”诗派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承认。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基础。我不但从它那里学会了比喻的方式，而且学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这便是对诗的热情和喜爱。我对诗的怀念与日俱增，它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思念之情，请想一想一个被几个冒失的诗人搅乱的国家吧。那几个疯子是有传染性的。在那个时候，由于诗而产生的动乱就像今天由“M—19”引起的动乱一样。

我是通过“石头与天空”认识阿图罗[①] 的。不过我从来不认为他属于这个诗派，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以前就存在的诗人。他在那个时候的决裂要比“石头与天空”的决裂更加受人赞扬。这是阿图罗的可贵之外：他带来了诗的精美和深刻性。这是“石头与天空”不曾做到的。他达到的水平，“石头与天空”派诗人从没有达到。当他们满足于：石头与天空”派而止步不前的时候，阿图罗却在继续飞翔，看上去飞得低了，但那是为了飞得更远。

在希帕基拉那所寄宿学校里，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前大声读一本书。由于我早就喜欢看书，这一点同学们早已知道，所以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我就担当起提示大家应该读

---

① 即奥雷利奥·阿图罗（1909—1974）。

什么书的责任。这样，老师就不用费心去挑选读物了。但是我在课堂上听到了一些我未来得及读的书。有人读了《魔山》全书。我们要求在读完一章前不要中断。然后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以便弄清楚汉斯·卡斯托普到底跟克劳迪娅·乔查特睡过觉没有。此外，我们当然也读《三个火枪手》（以前我读过《基督山伯爵》）等一大堆书。

不过，我仍然对诗歌着迷。所以中学毕业后去波哥大上大学时，我最开心的事便是挤上装着蓝色玻璃的电车，花五分钱就可以不停地从玻利瓦尔广场坐到智利大街，在电车上消磨那一个个不愉快的下午。那些下午仿佛拖着其他许多冷清的星期天的一条长长的尾巴。在那些懒散的环行旅行中我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读诗集。每走过一个街区，就能读完一节诗。直到在永恒的雨中出现第一抹晚霞。于是我便光顾旧城的一家郁闷的咖啡馆，找个热心人跟我谈诗，我刚读完的诗。有时我找到一个人，一般总是个男人，我们一边喝咖啡、抽我们自剩下的烟头，一边谈论诗，一直谈到后半夜，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做爱。

我从来没有余钱去买书，但总会有朋友借书给我。有一位叫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如今他是若干大企业的经济顾问，跟文化界毫无关系了。那时，他掌握着我所知道的一家大书店。他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借给了我。我回到我当时住的大学生公寓，脱掉外套和鞋子，躺在床上。我打开书读起来："一天早晨，格雷戈里·萨姆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我合上书，

说："啊呀！我的天，我竟不知道可以这么写。如果小说是这样的，我也能写。"第二天我就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①。那时我写的小说都收在小说集《蓝宝石的眼睛》里，都是颇具卡夫卡特点的小说。

那篇小说发表在《观察家报》周末增刊上。在那个时期，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是那份增刊的主编。他在上面介绍福克纳、海明威和考德威尔。他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知道最迅速的人——早晨在《时代报》上介绍的书，下午就出现在他的写字台上——。若干年后，我回到波哥大进《观察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上司和最好的朋友之一；实际上，他是一位出色的酒友。那时他针对一个青年的持久性的抗议信写了一封持久性的复信。那青年在信中表示了惯常的持久性的不满，他说青年人的作品得不到发表。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回答说，文学上的年经一代的作品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不过不管怎样，门还是为他们敞开着的。在大家的支持下，我给他寄去一篇小说，下个星期天就见报了，爱德华多还加了按语，他在按语中纠正了他那种悲观的观点，并说：不错，年经一代是大有希望的，这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一个。读到这句话时，我心中暗想：这可糟了，为了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失望，我只能做一个好作家了。

后来，我去卡塔赫纳，进了《宇宙报》社。我的工作是写简讯。报社下午一点钟关门，然后我们去跟埃克托尔·罗

① 即《第三次无奈》。

哈斯·埃拉索、多纳尔多·博萨和古斯塔沃·伊巴拉·梅拉诺一块瞎聊，朗诵诗。最后这位十分可敬，今天是海关的一名大律师。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读的那些东西很好，只是那全是空中楼阁。你需要一个基础。"他花了两年时间教我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我终生都感谢他。不是因为他借给我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而是因为他要求我一点一点地学习，然后检查我的学习情况。他是个天主教哲学家，所以他叫我读基尔基加德的著作和保尔·克洛岱尔的剧作……

在卡塔赫纳时，我通过报纸得知，巴兰基利亚文学界比较活跃，令人愉快。他们已经为我的短篇小说写了评论。于是我到那里去了，酩酊大醉的时刻随之开始，不用说，我们同时大谈文学。他们中间有人提到一本我不知道的书，第二天他把那本书借给了我。我虽然酒后不适，还是把书读了。到下午我就已经能谈论它了，而且谈起来滔滔不绝。我和古斯塔沃一起研究过三个重要作家：霍桑、梅尔维尔和爱伦·坡。但是对经典作家了如指掌的阿尔瓦罗·塞佩塔却对我说："那一切全都不值一提，你应该谈的是英美作家的作品。"巴兰基利亚"世界书店"的豪尔赫·隆顿要求我们为他编书单。当然我们也向他要求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每当进一箱子书，我们便高兴得不得了。那些书都是"南美"、"洛萨达"和"南方"出版社寄来的。那些杰作是博尔赫斯那群人翻译的。其中也有利诺·诺瓦斯·卡尔沃翻译的——福克纳的《对歌》——，他是哈瓦那《波希米亚》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译的作品在阿根廷出版。但是在卡纳赫纳时，我患了肺

炎，医生建议我到苏克雷我父母家去。我只好到那里去，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给巴兰基利亚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寄些书来我读。他们寄来三箱书，什么书都有：福克纳的、维吉尼亚·沃尔夫的、舍伍德·安德森的、多斯·帕索斯的、西奥多·德莱塞的。三个月后，当我把书交还他们时，我便决定写小说了。

有这么一件事：我母亲从巴兰基利亚回阿拉卡塔卡卖我外祖父母那幢破房子时，我陪她去了。我八岁那年离开阿拉卡塔卡，再没有回去过。我们到达那个烈日炎炎的破镇子后，首先去了一家药店。店里有一位妇女在用机器做衣服。我母亲喊她说："干亲家"。那妇人站起来，拥抱着我母亲说："干亲家"。两个人拥抱着哭了三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当日下午坐火车回来后，我向母亲打听我外祖父的家庭的历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记在心中的文学素材，但我不太清楚它会在哪里爆发出来。所以我一回到巴兰基利亚，就迅速动手写起《枯枝败叶》来。采用的完全是沃尔夫的方法：《达洛卫夫人》的技巧。但是愚蠢的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巴兰基利亚的《先驱报》后，我提着箱子去瓜希拉卖了一阵子医药书籍和厄特哈百科全书。我走遍了阿拉卡塔卡、丰达西翁、科佩尔、巴列杜帕尔、拉帕斯、比利亚努埃瓦、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丰塞卡、巴兰卡、里约阿恰和瓜希拉内地。但是没卖掉一本书，夜晚我便读百科全书。有一天我在巴列杜帕尔镇一家旅馆里，收到巴兰基利亚那些疯子

朋友寄来的《生活》杂志，上面刊登着《老人与海》，它就像一包炸药一样，因为小说家是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读者。他们阅读只是为了知道书是怎样写的，是一种技术性的阅读，是为了把书拆开，看它的内部是怎样缝制的。我始终认为，海明威——我写小说用的几种美妙的技巧都是从他那里汲取来的——没有足够的勇气写长篇小说，他的勇气只够用来写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被拉长了的，可以看到书中有许多多余的描述：关于迪·马乔的全部思考和球。但是有趣的是，海明威最美妙的作品是那部失败之作《过河入林》。人们阅读时会跳过那些做作的、关于种种异乎寻常的事物的对话，接受老人希望对你讲的一切。不过，这也是一篇拉长了的短篇小说。

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是《弗朗西斯·马库默的短暂而幸福的一生》，也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之一。但是这篇小说一开篇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海明威对我们讲述了马库默想的事情，水牛想的事情，威尔逊想的事情，女人想的事情，狮子想的事情。最后都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骗局：他说他不知道是不是女人蓄意杀死了他，还是事故所致。文学是一张棋盘，通过它向读者解说：从头讲起，棋子是怎样移动的。游戏一经开始，下棋的人自己规定的规则就不能改变了。

如何写一部长篇小说

无疑，这是人们比较多地向小说家提出的问题之一。根据提问题的人的情况，小说家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不只于此，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因为不仅像人们说的那样快乐是多种多样的，找到真理的可能性也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这件事是确实无疑的：我相信，最经常对自己提出如何写长篇小说这个问题的人是小说家本人。我们每次也给我们自己做出一个不同的回答。

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认为文学是一种旨在改善世界的艺术的作家。另一些作家，即认为文学是一种旨在改善他们在银行的存款的艺术的作家，他们具有写作的公式，那些公式不但正确，而且能够如此准确地解决问题，仿佛它们是数学公式。出版商们知道这一点。有一位出版商不久前就曾开心地对我说，他们的出版社赢得国家文学奖是何等容易。首先要对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作品和他

们的文学爱好进行一次分析。这位出版商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最终将产生一个关于评委会全部爱好的平均数。“为此，要使用电子计算机。”他说，一旦确定什么样的作品获奖的可能性最大，就以和生活中通常用的方法相反的方法着手工作：不是寻找那样的作品在何处，而是调查最善于写那种作品的作家在哪里，不管他是好是差。剩下的一切就是跟他签一份合同，以便于他按标准写第二年获国家文学奖的作品。令人不安的是，出版商把这种赌博交给了电子计算机，计算机为他提供了百分之八十六命中的概率。

所以，问题不是写一部长篇小说——或一篇短故事——，而是要严肃地写它，尽管写完后卖不掉，也得不了什么奖。这是不存在的答案，如果这几天有人有理由知道它，他就是怀着找到谜底的隐秘意图写本专栏的人。因为我又回到我在墨西哥的书房，整整一年前我把好几篇没写完的短篇小说和一部刚开始写的长篇小说，留在了那里，我觉得仿佛找不到线头来倒线团似的。那些短篇小说没有什么：它们被我丢在家里的垃圾箱里。过了有益的一年后读它们，我敢发誓，它们好像不是我写的——也许确实如此——。那些短篇是早年的一项写作计划的一部分。那项计划包括表现在欧洲的拉美人的生活的短篇小说六十篇或还多一些。它们的主要缺点是根本性的，我不能不把它们撕毁：连我自己都不觉得写得好。

我不敢狂妄地说把它们撕毁、扔掉时我的手不发抖，不只是我的手发抖，关于把手稿撕毁这件事，还使我想起一件

往事，那件往事似乎可以给人以激励，但是我都感到沮丧。那件事情发生在 1955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我作为《观察家报》的特派记者去欧洲的前夕：诗人豪尔赫·盖坦·杜兰来到我在波哥大的寓所，要我给他留下点什么在《神话》杂志上发表。我刚把手稿看完，已把我认为值得保存的部分安全地放好，把没有希望的部分撕掉。盖坦·杜兰对文学、特别对发现被埋没的价值的可能性如痴如迷，他居然动手翻弄字纸篓里撕毁的手稿，很快就找到了引起他注意的东西。“我说，这个是完全可以发表的”。他对我说。我对他解释了我把它扔掉的原因：那是我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当时已经出版——中抽下来的一整章，除了进垃圾篓，它不可能有别的正经用场。盖坦·杜兰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那一章在那部长篇小说中的确是多余的，但是它本身却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其试图说服他，不如满足他的愿望。我准许他用透明胶条把撕坏的手稿修补好，把那一章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发表。“那我们给它加个什么标题呢?”他用复数第一人称问我，在那种情况下，使用复数询问很少有那么合适的。“不知道”。我回答。“因为这一章写的不过是伊莎贝尔观雨时的一段自言自语”。几乎就在我对他说这句话的同时，盖坦·杜兰在第一页上端的空白处写上了：《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自语》。这样，我的一个受到批评界尤其是读者赞赏的短篇小说就从垃圾中被拯救出来。然而，那次的经验并没有让我用来避免再撕毁认为不能发表的手稿，反而教我明白必须把那种手稿撕毁，使之永远不能修补。

撕毁短篇小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为写短篇小说就像浇灌钢筋混凝土。相反的，写长篇小说则像砌砖头。这就是说，如果一篇小说在第一次尝试时不成功，最好不要再坚持。写长篇小说则比较好办：可以重新开始。这便是现在发生的情况。无论语调、风格还是人物的性格，都不适合我写了一半就丢下的长篇小说。不过，这次丢下的原因也是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觉得满意。为了找到解决的办法，我重新读了两本我认为有用的书。第一本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这本书，从遥远的大学时代的失眠之夜以来我再没有读过。现在读它只是为了避免某些可疑的类同。但是这本书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重读的另一本书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大约三年以来，这本书一直触动着我的心灵，它依然是一部美丽的作品。但是这一次我读了它却毫无作用，因为我要寻找的是关于老年人性行为的踪迹。但是我在书中找到的只是日本老人的性行为，那种性行为似乎和日本的一切东西一样古怪，当然和加勒比海地区老人的性行为毫不相干。当我把我的忧虑在饭桌上讲给家里人听时，我的一个儿子——他有较多的实际感受——对我说“你再等几年吧，那时你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弄明白的”。但是搞艺术的另一个儿子说得更具体：“你重新读一读《少年维特的烦恼》吧”。他对我说，语调里毫无嘲弄的痕迹。我果然读了这本书，不仅因为我是一位十分听话的父亲，而且因为我真的认为歌德的这部著名小说可能对我有用。但是，实际上，这一次读它并不像第一次那样读到最后即在主人公被可怜地埋葬时才流泪，而是只读

到第八封信即写痛苦的少年对他的朋友吉列尔莫讲述他是如何在他的孤独的茅屋里开始感到幸福的那一章，我就哭了。我的情况正是如此，所以我这样做并不奇怪：必须咬紧牙关，免得碰见人就问："请告诉我一件事，兄弟，怎样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呢？"

求助：有一次我读过一本书，或看过一部电影，或有人对我讲过一件确实发生的事。其情节是这样的：一名海军军官偷偷地把他所爱的女人藏在军舰的寝舱里，在那个窒闷的地方，双双无所顾忌地相爱，好几年也没有被人发现。我请求知道这段优美的故事的作者的人尽快告诉我，他是谁，因为我曾问过许多许多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并且我已开始怀疑，也许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写的，我已记不清了。谢谢。

好，让我们只谈文学

在很久以前的一次会见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说，那时的年轻作家的问题是，在写作的时刻，他们总是考虑成功和失败。跟他们相反，他自己在写作的时候，考虑的只是为自己。“我发表我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他在 1923 年说，“我让出版社印了三百册，散发给了我的朋友们，留下一百册拿到了《我们》杂志社”。杂志社的一位领导人即阿尔弗雷多·布兰奇恐惧地望了望博尔赫斯，对他说：“莫非你是要我把这些书全卖掉，是吗?”“当然不是。尽管我写了它们，但是我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访谈录的作者，当时在伦敦的秘鲁学生阿莱克斯·丁·西斯曼在旁注中说，博尔赫斯曾启发布兰奇，他可以把书中的诗塞进挂在他的营业处衣帽间的大衣口袋里。这样，一些短小的评论文章就在报利上出现了。

提到这个故事，别人也许会想起，美国已出名的作家舍

伍德·安德森的妻子看见年经的威廉姆·福克纳把纸放在一辆旧小车上用铅笔写作时问他："你在写什么?"福克纳没有抬头，回答说："一部小说"。安德森夫人不禁叫道："我的天啊!"但是几天以后，舍伍德·安德森却派人告诉年经的福克纳说，他愿意把他的小说带给一位出版商，唯一的条件是不要他读它。这部小说应该是《军人与报答》，发表于1926年——即在博尔赫斯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三年后——。在被公认为名作家之前，福克纳又出了四部作品。出版商们接受他的作品，无需太多的考虑。富克纳本人曾说，在这前五部作品出版之后，他不得不写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因为以前写的小说没能使他挣到足够的钱养家。这部被迫写的小说就是《神殿》。这一点应该强调，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福克纳关于畅销小说的概念是什么。

在昨天同罗恩·谢泼德进行的几乎四个小时的交谈中，我提到了在大作家们产生时发生的这些故事。谢泼德是《时代》杂志的文学编辑之一，他正在准备写一篇关于拉美文学的研究文章。这次会见有两件事让我感到高兴。一件是，谢泼德只对我谈文学，并且也只让我谈文学。他毫不卖弄学问地证明，他很清楚文学是什么。第二件是，他十分认真地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研究得很透彻，不但单独研究每部作品，而且系统地、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此外，他还怀着很高的热情读了无数访谈录，以免提出往常提过的那些问题。这最后一点，我不以为然，不但因为它恭维了我的虚荣心——此事，无论如何，在同任何一位作家、即使同看来谦虚的作家

交谈时，也不能和不该放弃——，而且因为它可以使我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更好地解释我个人关于作家职业的看法。所有被采访的作家都能立刻发现——根据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采访他的人是不是读过他所谈的某一部作品，并且从此刻起，也许没人提醒他注意，他就已处在了不利的地位。相反的，我却保存着对一位很年轻的西班牙记者的十分愉快的记忆，他对我进行过一次细致的采访，他认为我是《黄蝴蝶之歌》的作者，这支歌在那个时代十分流行，到处都能听到，我却一点儿也不清楚这支歌源自一部作品，并且源自我写的一部作品。

谢泼德没有提任何具体问题，也没有使用录音机，而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在一个学生笔记本上简单地记几句。他不关心以前和现在被授予过什么奖，他不想知道作家的职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卖了多少本书、挣了多少钱。我不打算综合我们的交谈，因为会见时谈到的一切，现在都已属于他而不属于我。但是我又经不住这样的诱惑：这是今天我的私生活的不平静的江河中的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我几乎只是一天数次以和往常一样的答案回答一些同样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这些同样的问题愈来愈同我的作家职业不相干。谢泼德却相反，他以和他的呼吸一样的自然的方式活动，不和文学创作最密切的奥秘发生冲突，跟我告别时他使我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很简单，一个人通过只谈论文学而愉快地享受着消磨一个又一个小时的快乐。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一切，什么也不如博尔赫斯的这句

话在我的脑海里印得那么深："现在作家们总是考虑失败和成功。"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也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在那些世界遇到的青年作家。幸好，我没有看到所有的作家都轻率地写完一部小说以便及时去角逐一次评选。我看到他们由于受到某种不利的批评，或其手稿受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绝而跳下了伤风败俗的悬崖。有一次我听到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过一句一开始让我感到颇为愕然的话："在坐下来写作时，所有的作家都要决定自己是做一个好作家还是坏作家。"然而，几年以后，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来到我在墨西哥的家中。六个月前他已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那天晚上他很得意，因为他刚刚把他的第二部小说交给出版商。我对他说，他这么匆忙地对待他尚未成熟的文学创作，我感到不解。他用一种我很不愿意提起的恬不知耻的口吻回答我说："问题是，在写作前，你必须深思熟虑，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期待着你写的东西。相反的，我可以很快地写作，因为读我的作品的人很少"。于是，就像拨开云雾见青天，我明白了巴尔加斯·略萨的那句话，那个青年已决定当个坏作家。他果然成了这样的作家。后来他在一家旧汽车公司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再把时间浪费在写作上。但是——现在我想——，倘若在学习写作之前他学会谈文学的话，他的前途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这些日子流行这么一句话："我们更喜欢说，而不是做。"当然，这是一句充满着严重的政治背叛的话，但是对作家们来说也是适用的。

几个月前，我对乔米·加西亚·阿斯科特说，比音乐唯一

更好的事情是谈音乐。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关于文学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后来，我进行了更仔细的思考。实际上，比谈论文学唯一更好的事情是把文学作品写好。

作家应该肩负的责任

多年来，我们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不得不承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可怕压力。当然我认为这种责任是存在的，而且应该存在。但是它不仅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也是木匠的、医生和足球队员的。凡是愿意把世界变成更公正的社会的人，都必须肩负责任。不过，我不喜欢这样提问题，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抽象的定义。我说过许多次，现在我再一次强调，对一个作家而言，把作品写好也是一种革命职责。而对我来说，这一点足够了。

作家分为两类：写作的作家和不写作的作家。不写作的作家经常抛头露面，他们使时髦的东西在世界上泛滥。当作家也成了一种时髦，尽管他不写作。另一类作家，即写作的作家，却很少抛头露面，恰恰是因为他们忙于写作，无暇顾及。

一般而言，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只在写一本书，尽管这本

书有许多卷。比如巴尔扎克、康德拉、麦尔维尔、卡夫卡、福克纳，都是这样。问题是，不管怎样，他们写的多本书中总有一本更为突出，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只有一本书的作家。具体说吧，譬如，塞万提斯写了许多作品，但是人们提起的只有《堂吉诃德》。但是作为创作，我更喜欢他的一些短故事，特别是维德里埃拉硕士的历史。但丁写了另一类作品，尤其是那些美丽的诗篇，人们却只知道《神曲》。事实上，尽管拉伯雷、弥尔顿、索福克勒斯、托尔斯泰都写了许多作品，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因为一本书而为人所知的。博尔赫斯的情况却非常有趣，他享有的名声和荣誉毫不愧色，因为他写了许多零散的篇章，但是没有一本书重要。在拉丁美洲，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说法：作家是一本书的作者。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比如罗慕洛·加列戈斯只有一本名著《堂娜芭芭拉》，我认为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本极好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数《坎塔克拉罗》最好。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由于《总统先生》而无人不晓，我却认为这部小说是本大陆写的最差的小说之一。然而《危地马拉传说》和许多小作品却无疑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不妨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授予他列宁奖金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在政治上，说得客气一点，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并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另一方面，人们都大加指责胡安·鲁尔福只写了一部《佩德罗·帕拉莫》。每当有人问他何时出另一部作品，他总感到恼火。这样对他是不对的。首先，我认为鲁尔福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帕

拉莫》一样重要。我再说一遍，这部小说，如果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长的、不是最重要的，但的确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中最美丽的。我从没有问过某位作家为什么不再写了。但是对待胡安·鲁尔福，我的态度还要谨慎得多。倘若我写了《佩德罗·帕拉莫》，我一生就会无忧无虑，永远不再写作了。

写作是一种牛马干的活儿。我有这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写作越来越困难了。有一个时期我想，这准是由于表现的才能在趋于枯竭。但是现在我认为完全相反。我认为其原因是责任的意识在逐渐加强。一个人越来越感到，他写的每个字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反响，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写作活动在童年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在发现了写作而兴致勃勃的时候本来是一件令人兴高采烈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推移却渐渐变成一种真正的痛苦。自从我能够开始写作，比如说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自从我开始靠写书生活的时候起，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种不同我以前的纪律。实际上，从大约十八岁我开始写作起到四十岁我开始靠我的书生活止，我只是在我的业余时间里写作。那些时间是为吃饭而必须从事的其他职业给我余下来的。这首先意味着最有用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最舒适的时间、最有利于创作的时间，我不得不用来干糊口的工作。其次还意味着，我保存下的或余下来可用于写书的业余时间，是我感到最疲劳的时间。当然这会严重影响文学创作。但是我从那个时刻写作的热情、流畅的文字和某种程度的无责任感中得到了补偿。那个时期，就像

我说的那样，只要有可能，我就写作。从我能够靠我的书生活的时候起，我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二点的工作制度。我还很年经的时候，大约凌晨两三点钟完成了报社的工作后，我就进行写作，在仅有的两三个小时内有时能写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稿。有时我坐下来一口气能写一篇故事。现在，如果一天能写好一段，我就认为很幸运了，尽管一般来说第二天我会把它撕掉、然后重写。就是说，写一本书要花许多时间，吃的苦头非常大。但是不管怎样，工作自觉得多了，一个人对所干的事情更加信心百倍了。

其实，关于作家的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构思故事，而我最厌倦的是必须把故事写下来。譬如在某个瞬间，在任何时刻，我想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一切细节和特点，我能够立刻把它讲述出来，就像我读过一样。我是最迷人的部分，我最喜欢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使一个人真正感到是一个作家的东西：在一瞬间构思一个故事的才能。现在，要把它写下来，这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我觉得最理想的工作是构思故事并像行吟诗人那样四处讲述它，或者为了在我们的世界，当前的世界稍微深入点，有人能负责把别人讲的故事写下来。这将是一种很好的工作，作家将变得更加多产，很可能被公认为最好的作家。

需要一位作家

人们常常问我，我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总是如实地回答：“一位作家”。听来似乎可笑，但并不那么愚蠢。有时这个晚上我会接到一项邀我写包括十五页稿纸的一篇小说的不容推辞的任务。于是我去求助过去的无数笔记，确信稿子会及时到达印刷厂。说不定是一篇写得很糟的小说，但是我把任务完成了。总之，这是我想用这个可恶的例子说明的唯一的事情。与此相反，我竟不善于写祝贺用的电文或致哀的书信，除非绞尽脑汁地写一个星期。对这样一些讨厌的事情，就如对社会生活中那些琐事一样，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作家宁愿请其他作家帮忙。

关于近乎可卑的职业荣誉感的一个有力证明。无疑就是我每星期写的这种简讯。到十月，它面世已两周年了。在这个角落里它仅仅缺少过一次。那不是我的过错，而是由于发排系统在最后一点钟出了差错。我在每个星期五写简讯，从

早晨九点写到下午三点。写作时我怀着像写一部杰出作品一样的意愿、意识、兴致和常常是同样灵感。如果没有确定好的题目，星期五夜里我便睡不好觉。不过经验告诉我，问题在睡梦中会自己解决的，等早晨我一坐在打字机前一切就会涌流而出。然而，我总是有好几个预先考虑好的题目。我慢慢地搜集和整理来源不同的材料，并十分严格地加以核实，因为我觉得读者们对我的愚蠢的作法不那么宽容，也许就像对待我所需要的其他作家那样。我写这些简讯的第一个目的是每星期教给普通的读者一点东西，这些读者都是我感兴趣的，尽管我教给他们的东西很明显，甚至对那些无所不知的天才博士来说是幼稚的。另一个意图（是最困难的），是不用别人帮助，尽我的能力把它们写好。因为我始终相信把文章写好是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唯一幸福。

我把这种束缚强加于自己，因为我觉得在一本小说和另一本小说之间有很长的空闲时间，我的手臂渐渐地——就像给球员递球的人那样——丧失了热力。后来，这种手工艺人式的工作就变成了对读者的一种承诺。而今天，它则是一个我无法走出的镜子迷宫。当然，如果没有一个为我而出现的幸运的作家的话。但是我担心事情太迟了，因为在我三次决定不再写这种简讯时，是我心中的小阿根廷人[1] 以其无情的专横态度阻止了我。

我第一次做决定是在我停止写作20多年后想写第一篇

---

① 指作者的良心。

简讯之时。我辛苦地干了一星期才写完。第二次是一年前在法亚陆军事基地同奥马·托里霍斯将军一起休息的时候。那几天，天气清朗，海水平静，使人更想到海上去航行而不是写作。“我给社长发一份电报，告诉他今天没有简讯。”我这样想，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但是我的心情很坏，吃不下午饭。下午六点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一个半小时，写的是我最先想到的问题。把简讯交给托里霍斯的副官，请他用电报发到波哥大去，然后再从波哥大发到马德里和墨西哥去。第二天我才知道，托里霍斯将军特地派了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巴拿马机场，又从那里转直升飞机到达总统府，通过总统府把我的文章经过某种官方渠道分发出去。

最后一次是在六个月前我醒来发现我多年来渴望写的爱情小说已在心中酝酿成熟之时。对这本小说，我要么永远也不再写它，要么立即把全部时间投进去埋头写作。然而说心里话，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使我入迷的星期专栏，并第一次做了一件我一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每天从早到晚写小说，一字一句地写，像院子里的母鸡啄食那么耐心，但愿也一样幸运，并且一天比一天更近地倾听着下一个星期五那头高大动物的可怕脚步声。不过，像往常那样，我们又一次相逢在这里了，但愿永远如此。

从下午我在波哥大我的家里开始写这篇简讯到第二天在墨西哥使馆的外交保护下完成，我怀疑我可能永远也逃不出这个牢笼了。在七月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克雷塔岛上的电报局说服一位值班报务员把我写的西班牙文文章发出去时，我仍

然在怀疑。当我不得不在蒙特雷亚尔买一台急用打字机时(因为我的打字机的电压和饭店的电压不同)，我还是怀疑。直到两个月前在古巴由于人们拒绝给我帮助而不得不两度更换打字机时，我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有人为我送来一台特别先进的电子打字机，我亲自在方格纸笔记本上打字，就像在遥远而幸福的阿拉卡塔卡初级小学时代那样。每当我想到一桩不幸事件，我就更加迫切地渴望有个人能够取代我的美好命运：做一个作家。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页数＝４１４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８７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１版

前言
目录
正文